

第一章 现代化的阵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与经济发展 (1949—1976)

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上反映了稀缺、思想意识和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贫困以及缺乏耕地、资本和技术上训练有素的人力的严酷现实，是由中国的资源因素造成的。对一个强大、自力更生、平等的国家和社会的强烈追求，则产生于中国的现代历史和当代的意识形态之中。系统地大量利用劳动力并以此代替土地和资本的作法可以证明这些资源的缺乏。而劳动力的动员和推动方法则反映了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功能。

——亚历山大·艾克斯坦：
《中国的经济革命》

在很多方面，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成就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非常突出的，……但这些成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拉曼·迈尔斯：
《中国经济的过去与现状》

第一节 概述

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美国对当代中国经济的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但直至 60 年代以前，研究工作是零散的。从 60 年代开始 鉴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历史经验教训，美国开始大力推动对中国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在这一背景下，对当代中国经济的有组织的系统研究迅速开展起来。

1959 年，在费正清和著名中国经济专家亚历山大·艾克斯坦等人推动下，福特基金会特拨专款，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SSRC-ACRC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下设立了“中国经济委员会”，负责协调全美中国经济研究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担任，其他主要负责人有瓦尔特·加林森（Walter Galenson）、阿伯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艾克斯坦、刘大中、蒋硕杰等。该委员会还吸收了大量美国华裔中国经济专家参与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叶孔嘉、郑竹园、陈乃润、赵冈、吴元黎、侯继明、唐宗明、马逢华等。

美国联邦政府也以中央情报局为主，开展系统的研究工作。商业部、农业部、国防部等都特别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收集、整理、分析中国经济资料 编制统计数字 定期出版报告。

美国的大学更是成了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领域。到 60 年代中期，许多著名大学均开设了中国经济课程。密执安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等 50 多所高等学府相继设立了亚洲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中心，在中国经济的研

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以“中国经济委员会”组织发起 1965 年 10 月在加州召开的第二次研讨会为标志，美国对当代中国经济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规模、水平。这次会议有 3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与会者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各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把美国的当代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推向第一次高潮。

遗憾的是，这样的兴旺局面十分短暂。1966 年以后，由于中国停止发表统计数字和出版经济刊物，研究资料来源中断，同时，由于越南战争的失利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美国的当代中国经济研究随即进入低谷。1969 年中国经济委员会宣布解散。不久，各基金会对中国研究机构的拨款也大幅度削减，使它们的研究难以为继，许多研究人员不得不另谋出路。继续从事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的，只有中央情报局和少数锲而不舍的学者。

从 80 年代开始，美国的当代中国经济研究恢复了生机，进入了第二次高潮。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等方面的迅速变革及其对中国国内和整个世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引起了美国各界的普遍关注；其次，中国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及中美关系改善，致使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迅速扩展起来，这种形势迫切要求美国对中国经济有更多、更深的了解。第三，中国统计资料的重新公布，大量经济刊物的出版发行，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总之，这一切既为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们提出了重大的新课题，也为重新评价老问题提供了条件。

二、主要研究机构与研究成果

在美国的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有以下机构和单位。

中国经济委员会（Committee of Research on Chinese Economy）是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学术机构。该委员会

于 1959 年成立 当时的宗旨是促进对中国经济的基础研究 以当代中国经济为主，并集中在定量研究上。1969 年曾因形势所迫而一度解散，1971 年重新恢复，由德怀特·珀金斯 (Dwight H. Perkins) 任主席，后由罗伯特·德恩伯格 (Robert Dernberger) 接任。恢复后的委员会的宗旨是根据中国近代遗产，通过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比较，运用综合科学方法，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分析、解释。中国经济委员会先后发起、组织、资助了一系列研究会议和专题研究，参加者都是有影响的中国经济专家。他们运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经济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成果奠定了美国的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的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成为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必要读物。其中包括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936—1968》、陈乃润的《中国经济统计》、赵冈的《中国建筑工业》、郑竹园的《共产党中国的机械工业》、马逢华的《共产党中国的对外贸易》、艾克斯坦、加林森、刘大中合编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艾克斯坦主编的《中国经济产出的计量方法》、托马斯·罗斯基 (Thomas G. Rawski) 的《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珀金斯主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当代经济》、德恩伯格主编的《中国的发展经济比较透视》等。

各大学的研究机构：在美国，设有亚洲或中国研究中心的大学达 50 多所，其中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方面比较著名的有：“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61 年成立，C. 雷默 (C. Remer)、艾克斯坦、德恩伯格等著名中国经济专家曾先后在此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并担任领导工作，主要出版物有《密执安大学研究集刊》等。“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57 年成立，珀金斯曾担任主管中国研究的副主任，艾克斯坦等曾在这里从事研究活动，出版物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国资料》、《哈佛东亚丛刊》、《哈佛东亚专刊》等。“康奈尔大学国际研究中心”，1961 年成立，刘大中、加林森等曾在此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华盛顿大学“当代中国研

究 H.杰克逊访问教授职务”，1984年由杰克逊基金会设立，在经济方面主要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工商业等。此外，“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委员会”、“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等，也都致力于对当代中国经济的研究工作。各大学研究机构的成果种类繁多，其中出版的主要专著有：雷默的《共产党中国的煤炭生产》、艾克斯坦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短缺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珀金斯的《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人》、李卓敏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潜力》、郑竹园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黄惠英的《共产党中国的货币及金融政策》、吴元黎的《共产党中国的钢铁工业》等。

政府研究机构 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商业部、农业部、国防部等都从事当代中国经济的研究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年编制中国国民收入数字，即使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从未中断过，一直为美国各界、世界机构及其他国家广泛引用。但它对改革前中国经济的估价事后证明并不准确，同后来中国恢复发表的国民收入数字相比，出入很大。从1981年开始，世界银行已不再使用它的资料。美国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除定期发表报告外，也出版了一些专著，如爱默森(P. Emerson)的《共产党中国的非农业就业》、郑竹园的《共产党中国的科学工程人材》、艾克斯坦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等等。

联合经济委员会：美国国会的一个下属机构，组织对当代中国经济进行系统的详细研究，参加者都是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专家，其中以政府各部门的研究人员为主，以学术界人士为辅。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包括了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研究成果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资料较新，广为各方所引用。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国会及政府各部门了解中国经济，为美国政府制订有关政策提供参考。迄今为止，这样的文集已经出版过六部：《中国大陆经济概述》(1967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评价》(1972年)；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评价》(1975年);《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1978年);《2000年的中国经济》(1986年)共分两卷 第一卷《四个现代化》、第二卷《四个现代化中的经济开放》。

其他研究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China Relations) 一个民间组织,1966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由致力于改善美中关系的学术界、工商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组成。艾克斯坦曾代表该委员会安排指导了三项研究 参加者达 30 多人 其中包括著名的工商界人士、政府代表和经济学家 研究成果以《中国贸易前景与美国的政策》题目发表,它对 1971 年美国解除对华贸易封锁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该组织的研究成果还包括《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资料来源和课程指南》等。此外 亚洲研究协会、布鲁金斯研究所、兰德公司、中苏关系研究所等也都在当代中国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

三、研究领域中的主要流派

美国专家对中国经济的评论各种各样,很是复杂。由于资料来源的时断时续,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是按照典型的积累方式发展,并不是在过去的研究结论上建立新的结论,而是根据新的信息不断得出新的结论。大致说来,在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领域中,可分为三个流派。

实证主义流派：这一流派在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影响最大而且广泛。许多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如艾克斯坦、珀金斯、德恩伯格、罗斯基、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罗伯特·菲尔德(Robert Michael Field)、肯尼思·沃尔克(Kenneth R. Walker)、约翰·格利(John G. Gurley)都属于这一流派。这一流派的主要特征是,认为中国的统计资料基本上是可靠的,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中国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激进流派 该派人数不多 影响不大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维克多·李皮特 (Victor Lippit)、卡尔·里斯金 (Carl Riskin)、斯蒂芬·安多斯 (Stephen Andors) 等。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 这些人对中国经济持不加批评的肯定态度, 而且对中国在这期间所推行的经济行政管理和建立的制度、组织表示赞赏。中国对极“左”政策的批判和经济体制改革, 对他们的观点的转变影响很大。

保守流派: 该派人数也不是很多, 影响也不大。在他们看来, 改革前中国发表的统计数字是不可靠的, 不足以成为评论中国经济的依据, 因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经济模式对中国的经济进行分析。一般来说, 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评论是悲观的, 而且对社会主义中国表现出程度不等的敌意或反感, 当他们看到成绩时, 承认的语气也不是那么情愿的。在这一流派中, 比较著名的有拉曼·迈尔斯 (Ramon H. Myers)、简·普里帕拉 (Jan S. Prybyla)、加林森、郑竹园、吴元黎、刘大中、叶孔嘉、安东尼·唐 (Anthony R. Tang) 等。

在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领域, 几个流派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 在这种争论中, 实证主义流派的观点无论是在政府界还是在学术界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广泛的影响, 被称为主流学派。例如, 在“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的中国经济文集中, 作者几乎全部来自这一流派。他们自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中国经济作客观的分析。它的著名代表人物珀金斯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总结时这样说道 在过去 20 多年里, 多数专家对中国经济的阐述是非常出色的。那些认为中国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性变化、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学者是错误的, 但他们只是极少数; 那些认为中国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认为中国经济到 70 年代才略高于革命前的水平的学者也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在 80 年代仍有一定的影响, 但几十年后随着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度增长, 这种观点也将

消失。

而保守流派对珀金斯的这一结论却很不以为然。拉曼·迈尔斯在另一篇评论中国的中国经济研究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学者对传统体制的批判和中国的改革恰恰证实了实证主义流派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是错误的，实证方法片面强调对经济活动和结果的研究，忽视了对生产率、经济成本和效率的研究。迈尔斯说，对中国经济做出正确估价的既不是激进流派也不是实证流派，而是保守流派。而后者之所以没有产生影响则由于学术领域中的政治因素，以及它本身的弱小、分散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他认为，实证主义流派的支配地位总有一天会受到保守流派的有力挑战。^②

概括地讲，各流派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方法论上的异同。激进流派的学者明显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里皮特将自己的方法称之为阶级结构方法，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统治阶级对剩余产品的支配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里斯金也承认，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方法是理解迅速变革社会中的经济变化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而实证主义流派的实证方法则回避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强调对经济变化和经济结果的定量分析。保守流派的学者则着重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并对社会主义制度持否定的态度。

同时，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十分强调分工，多数学者分别在某一领域做深入的研究，在联邦政府内，分工尤其细密。这种方

德怀特·珀金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研究》载《亚洲研究杂志》（1983年2月第345—372页。

拉曼·迈尔斯：《美国经济学家是如何理解共产党中国经济的？》，载肖喻明（音译编《大陆中国政治、经济与改革》第421—438页，韦斯特韦尔出版公司，1986年版。

法一方面促使研究人员对某个特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避免了浮光掠影和空泛的描述；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的结果，造成了结论上的分歧。

迈尔斯建议发展一种综合的科学方法，对由不同的所有制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各种社会中的经济发展进行统一的分析、比较和解释。这样一种方法无疑会大大推动中国的中国经济研究工作。但在短时期内，它还仅仅是一个设想。

其次，从客观上讲，这要归结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本身的复杂性。40 多年内中国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周期性的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形势的大起大落，的确给专家们提出了不少难题。同时，统计资料十分缺乏。在 1978 年前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停止公布统计数字。西方学者对 50 年代中国制度的某些方面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统计制度、工资制度、刺激手段、物价制度、预算制度、金融政策以及工业管理等曾做出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但生产、人口、政府收支、个人收支、外贸、就业等所有方面的统计数字均告阙如。在 60 年代整个十年期间，研究中国的经济专家们处于统计资料的一片空白之中，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根本无从下手。1978 年以来，中国逐步公开了统计数字，但专家们认为许多全国性的至关重要的统计资料仍然欠缺，省一级的依然极少，而在可获得资料中，许多也是不精确的。因此，专家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收集资料，证实它的有效性，建立描述经济发展的定量指标。由于资料来源、统计方法等方面的区别，学者们不可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尽管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计量分析做了大量的努力，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分析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最后，政治态度的异同。多数中国经济专家对中国是持友好态度的，他们力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如实、客观的分析。他们把中国在经济过程中建立的各种制度、组织看作是一种了不起的社会试验，并怀着浓厚的兴趣对它们进行研究分析。但一些保

守流派的专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抱有成见，不相信它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他们对中国经济活动中低效、浪费现象的分析，不能不说是中肯的、有价值的。

第二节 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

一、国民经济的增长

在美国对当代中国经济进行评价的专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进入了迅速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过程。争论只在于变化的大小，而不在于变化是否发生。大多数专家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稳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但中国总是能从衰退中恢复过来，重新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在 1952—1974 年长达 20 多年的期间里，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在 6% 左右。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取得这样高的增长率的国家是不多的。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到 197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 1952 年的四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尽管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中国的战略和体制使中国脱离了落后的农业社会，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到工业化的中等阶段，同时经历了重大的工业和技术变革。中国不仅具备了生产原子弹和氢弹的能力，而且还具备了包括一系列像载重汽车、火车头、重型机械和科学仪器等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的生产能力。1949 年，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异常的贫穷、落后为特征。到了 70 年代末，这个国家已经为它的人民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衣服和住房，医疗卫生有了保障，人人有工作，并显示出不断改善的巨大能量。

70 年代初,在艾克斯坦等的组织下,美国专家就中国的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计算问题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对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的有关方面作了分析和总结,研究成果以题为《中国经济产出的计量方法》的论文集出版。表 1-2-1 提供了各流派的主要经济学家的各种估计。这一结果证明了上述论断。

表 1-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主要构成的各种估计 (%)

	1952~1957 年		1957~1965 年		1965~1970 年	
	指数	增长率	指数	增长率	指数	增长率
工业						
刘-叶(1)	2.39	19.0	—	—	—	—
刘-叶(2)	—	—	1.46	4.8	1.21	3.9
伊斯海克瓦	2.48	19.9	—	—	—	—
罗斯基(1)	2.41	19.2	2.13	9.9	1.60	9.9
珀金斯	2.28	17.9	2.01	9.9	1.52	8.7
菲尔德	1.95	14.3	1.54	5.5	1.39	6.8
海达斯	2.27	17.8	2.22	10.3	1.44	7.6
菲尔德-拉迪-爱默森	2.28	19.7	1.95	8.7	1.68	10.9
罗斯基	2.28	18.0	1.98	8.9	1.68	10.9
农业						
刘-叶(1)	1.09	1.7	—	—	—	—
刘-叶(2)	—	—	1.03	0.4	1.09	1.7
伊斯海克瓦	1.27	4.9	—	—	—	—
赵冈	1.11	2.1	1.08	1.0	—	—
艾克斯坦	1.12	2.3	1.13	1.4	1.14	3.3
海达斯	1.25	4.6	1.19	2.2	1.17	3.2
文斯	1.25	4.5	—	—	—	—
国内总产值						
刘-叶(1)	1.35	6.2	—	—	—	—
刘-叶(2)	—	—	1.24	2.7	1.15	2.8
艾克斯坦	1.36	6.3	1.33	3.2	1.28	6.4
珀金斯	1.45	7.7	1.40	4.3	1.35	6.2
伊斯海克瓦	1.53	8.9	—	—	—	—
海达斯(NI)	1.53	8.9	1.32	3.5	1.42	7.3
菲尔德	1.40	7.0	1.42	4.4	1.34	6.0

(续表)

	1952~1957年		1957~1965年		1965~1970年	
	指数	增长率	指数	增长率	指数	增长率
工业						
刘-叶(1)	—	—	—	—	—	—
刘-叶(2)	1.77	4.5	—	—	4.21	8.3
伊斯海克瓦	—	—	—	—	—	—
罗斯基(1)	3.42	9.9	—	—	8.22	12.4
珀金斯	3.07	9.0	—	—	7.01	11.4
菲尔德	2.15	6.1	—	—	4.19	8.3
海达斯	3.20	9.4	—	—	7.26	11.7
菲尔德-拉迪-爱默森	3.28	9.6	1.36	11.0	7.50	11.8
罗斯基	3.33	9.7	1.45	9.7	7.60	11.9
农业						
刘-叶(1)	—	—	—	—	—	—
刘-叶(2)	1.12	0.9	—	—	1.28	1.4
伊斯海克瓦	—	—	—	—	—	—
赵冈	—	—	—	—	—	—
艾克斯坦	1.29	2.0	—	—	1.45	2.1
海达斯	1.40	2.6	—	—	1.74	3.1
文斯	1.50	2.4	—	—	1.87	2.9
国内总产值						
刘-叶(1)	—	—	—	—	—	—
刘-叶(2)	1.43	2.8	—	—	2.05	4.1
艾克斯坦	1.70	4.2	—	—	2.20	4.5
珀金斯	1.90	5.1	—	—	2.76	5.8
伊斯海克瓦	—	—	—	—	—	—
海达斯(NI)	1.87	4.9	—	—	2.87	6.0
菲尔德	1.89	5.0	—	—	2.65	5.6

a. 每个时期最后年的产量除以最初一年的产量

b. 菲尔德-拉迪-爱默森对1970—1974年的估计实际为1970—1973年的估计,文斯的数字是以1974年而不是以1970年为最后一年。艾克斯坦的估计是1966年而不是1965年。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经济产值的计量方法》,载艾克斯坦编《中国国民产值的估计问题》,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从比较的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通常被专家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虽然没有中华民国时期或 19 世纪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资料，但非常可能的估计是，当时经济的增长率在 1—2% 之间。在 1949 年以前，中国虽然已有小块孤立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地区，但仅限于一些外国统治下的飞地，如上海和在 日本占领统治下发展的东北。整个经济在 1949 年以前的一个世纪内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并没有任何的持续的发展。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更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与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过程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可称为高速度。从这方面讲，中国可列入经济最迅速发展的国家如美国、瑞典和日本之列，甚至超过这几个国家。19 世纪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是：英国为 2.5% 法国为 2% 德国约低于 3%，瑞典、美国和加拿大在 3~3.5% 之间，日本约为 4%。相比之下，中国 6% 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从当代的眼光来看显得有些逊色，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最快的一种速度，“4% 的发展速度在 1870—1940 年间曾将日本转变为一个主要的工业国。”^② 这个速度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比较动人的（见表 1-2-2）。

在 1956—1980 年期间，大多数采用苏联模式的国家都得到了较高的增长率。而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东欧国家的增长率，大大高于苏联的增长率。理由很简单，中国通过苏联经济模式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比其他相对来说更多地依靠自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最近经济情况与十年规划前景》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16 页。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变革》，载《中国季刊》第 54 期（1973 年）；《中国的经济革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 年版，第 225 页。

愿储蓄和投资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好地动员了国家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

表 1-2-2 净实物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

	1956~1970	1970~1975	1975~1980
苏联(GNP)	5.2	3.7	2.7
保加利亚	8.5	7.8	6.1
捷克斯洛伐克	6.8	7.8	6.1
东德	5.2	5.4	4.2
匈牙利	6.8	6.3	3.6
波兰	6.0	10.0	1.4
罗马尼亚	7.6	11.2	5.0
中国	8.3	5.5	6.0
非苏联模式国家		1965~1973	1973~1984
印度		3.9	4.1
低收入国家		3.7	4.1
中等收入国家		7.4	4.1
工业市场经济		4.7	2.4

资料来源：德恩伯格：《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延续与变化》，载布鲁斯·里莫尔兹编：《中国的经济政策》，优秀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许多专家都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他们指出，40年代后期，印度是一个在人口密度、人均收入和耕地数量等方面与中国相似的国家。在1950年至70年代初期这段时期里，印度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只有1.1%，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很少，同时还拿出大约70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

家。巴基斯坦稍好一些，但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大约也只是中国的二分之一略多一些。

但与亚洲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见表 1-2-3），虽然不同的学者在具体的统计结果上有所不同。

表 1-2-3

	GNP	人均 GNP
刘大中:		
台湾(1964 年价格)	9.0	5.6
南朝鲜(1965 年价格)	8.0	5.1
菲律宾(1955 年价格)	5.6	2.2
印度(1960~1961 年价格)	3.6	1.1
中国(1955 年美元)	3.1	1.0
艾克斯坦:		
台湾	9.0	
南朝鲜	8.0	
泰国	9.0	
印度	3.5	1.0
中国	6.0	4.0

资料来源：刘大中：《刘大中院十经济论文集》第 608—609 页。

艾克斯坦 《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26 页。

* 注：刘大中一栏中印度的统计期间为 1960—1961 年到 1969—1970 年，人均增长率为净国民产值

刘大中的计算结果是最低的，他根据自己的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就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1957—1970 年间，中国是亚洲增长率最低的国家。”虽然中国的工业技术具备

了生产原子弹和人造卫星的能力，但这是以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和经济增长缓慢为代价的。^{①*}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国外经济援助的依赖程度，比任何其他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都要低。即使在 50 年代，苏联贷款总计约 15—20 亿美元，这也是相当少的。同时，很快就开始偿还。到 1955 年对苏联的偿还数字已超过新贷款的数字。从 1955—1965 年中国是用贸易顺差的收入来偿还他们的借款的。在 50 年代中期，中国在开始对苏联偿还借款的同时，还开始实行对外经济援助计划，共给予 70 亿美元以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对一个发展水平还很低的中国来说，是相当大的净资本外流，其中半数是作为经济援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之，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不但极少依靠国外贷款，而且还承担了相当数量的外援的发展中国家。^②

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例如，迈尔斯指出：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在中国导致了严酷的阶级斗争，长期无情的政治运动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高度集权的经济模式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常缓慢，因此，中国的经济成就必须从它所付

^① 刘大中：《刘大中院士经济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出版，1976 年版，第 608—609 页。

但是，一些专家指出这种比较意义不大，实际上会使人上当。因为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照搬城市国家或小规模经济的模式。世界市场无法满足中国的需求。因此，他们更多地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见斯达韦斯：《中国的政治改革》第 15—16 页。

拉迪：《中国最近经济情况与十年规划前景》，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上）第 116—118 页。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 第 351 页。

出的人的代价这个角度去看。^①而且从总的发展水平来看 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 中国的经济仍然相当落后 并且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1978 年大陆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230 美元(1978 年币值)在世界银行列入统计的 126 个国家及地区中占第 104 位 排名在巴基斯坦及坦桑尼亚之后 这与中国跻身五强的地位极不相称。不仅如此, 到 70 年代 中国经济危机四伏, 整个国民经济有步入崩溃的趋势。从总体上看, 30 年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并没有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状态。而且, 粗略估计 中国经济发展 30 年来各种浪费达 12000 亿美元。如果不发生这些浪费和损失, 中国的国民收入可能比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的实际水平高出三倍 应列入小康之列。

中国 1949 年以来的发展经验还表明, 高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成功的现代化。伴随着这种高增长率的是发明与技术变革的延缓、产品质量与品种的缺乏、要素生产率与效率的低下, 以及相应的生活水平的缓慢增长。事实上, 过高的增长率会妨碍现代化的进程, 如尼日利亚、伊朗和中国都提供了同样的教训。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还表明, 它们的经济增长率通常都是很高的, 但增长过程是相当不稳定的, 从长期的发展过程来看都经历了波动周期, 而且增长趋势是下降的。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也显示出了这一特征。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和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和特征就是, 资本形成的速度是空前的。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在 30 年代大约是 5% 在内战年代

拉曼·迈尔斯:《中国经济的过去与现状》达克斯伯里出版公司, 1980 年版, 第 226 页。

② 郑竹园:《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第 110 页、126 页。

要低得多 到 1952 年上升为 10%，1957 年上升到 20%，1958 年高达 30%，60 年代初开始下降，以后又上升到每年 20—25%。到 70 年代初期达 25% 或更多一些。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都是很高的增长率。为了保持这种高速度，中国工业部门人员的工资基本上没有增加，以便将利润再投资，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¹

与经济增长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产率的增长记录是非常糟糕的（见表 1-2-4）。除了恢复因素占突出地位的经济发展的最初几年，总的来说，综合生产率的增长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虽然中国的统计资料还不足以对中国经济做出类似的估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中国的生产率最好的情况是处于停滞状态。

表 1-2-4 工业投入与产出的增多 1952—1975 年

	综合要素投入指数， 假设劳动力比率为：		工业总产值 指 数	单位综合要素产量指数， 假设劳动力比率为：	
	0.6	0.4		0.6	0.4
195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57	178.3	194.0	233.3	130.8	120.1
1965	427.7	520.2	510.6	119.4	98.2
1978	1246.5	1571.6	1649.2	132.3	104.9
增长率(每年%)					
1952~1978				1.1	0.2
1957~1978				0.1	-0.1

资料来源 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牛津大学，1987 年版，第 265 页。

1. 拉迪：《中国最近经济情况与十年规划前景》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上），第 117—118 页

1957年以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停滞乃至下降似乎是非常普遍的，但不同的部门具体情况也不一样。在农业部门，安东尼·唐的分析表明在1957—1977年期间要素生产率下降了21%。这一解释为后来D·约翰逊和其他专家的计算所证实，据他的估计，在1952—1978年间，综合要素生产率每年平均下降0.3%。在制造业，由于集体与私人部门的基金资料不足，因而分析起来比较复杂。托马斯·罗斯基和他的同事的分析表明，1957年到70年代末，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0.4%到1.4%之间，他们之间的区别取决于假设条件的不同。拉迪则认为，在1957年以后国营工业的生产率每年平均下降0.4%而且这对国营部门基本生产率还是一种偏高的估计。这就是说，在1957—1978年间工业部门的基本状况有可能大大低于-0.4%的增长率。

在上述分析中一些没有被列入的因素肯定会对要素生产率有利，如苏联援建的大量的新建工厂；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即人力资本的改善；新能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由于缺乏资料，这些因素在分析中很少被考虑进去。但这些积极的因素被另外一些消极因素给抵消了。

总的来说，中国生产率的发展状况远远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更不用说发达国家了。对25个发展中国家20—25年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调查表明，其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挥的作用超过30%。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这些国家，但生产率并没有发挥作用，甚至发挥了反作用。^①

从中专家们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要素的增加，尤其是固定资本的增加，只有极小部分来自投入的使用

^①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拉曼·迈尔斯编：《两个对立的社会主义40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胡佛研究所，1991年版。

效率的增加，甚至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主要来自人均物质资本的提高，来自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增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是由于这种体制过分强调资本积累的增加，忽视了技术革新。而这种发明与刺激的缺乏是这种传统体制所固有的一部分。它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¹⁾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运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的特点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正是那些生产率急剧上升的经济。日本之所以能够赶上西方经济就是因为它的劳动生产率长期持续的迅速提高。因此，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²⁾

三、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是非常不稳定的，在迅速增长的同时，显示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而且起伏很大。这种波动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1. 农业生产的循环变动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长期以来，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通过以下几个方式产生的：消费品的供应、轻工业原料的供应、出口能力、积累的来源等。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农业生产仍占中国国民收入的45%，轻工业所需原料80%由农业供应。在出口物资中，70%以上是农产品及农

(1) 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265页；桑伯格（Penelope Hartland-Thunberg）：《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未来的挑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989年版第2页；本杰明沃德：《中国社会主义40年》载乔伊斯·卡尔格林编：《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年后的中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90年版第112页。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40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业加工品。国家收入半数以上直接或间接取自农业。因此，农业对中国的资本形成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庞大的农业人口对稀缺的土地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人均农业产量很低，农民的剩余粮食较少，大部分都由农业部门内部消耗了。在这种农业经济中，国民经济活动的总水平就紧密地同农业部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而农业生产本身的变化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由于耕作方法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技术为主，使得中国农业的产量或多或少地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而中国的自然气候并不好，历年都有程度不同的水旱灾害。尽管中国在水利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建成大小水库八万四千多座。但由于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不成套的，未能发挥效益，所以中国农业收成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天时的影响。在第一次经济循环的繁荣阶段，三年丰收（1950、1952、1955年）主要由于风调雨顺所至。

其次是农业政策的影响，其中包括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比率，对农民劳动的刺激，对农业部门的投资等。1953、1956、1964年及1967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制农村的商业性活动，如限制或关闭农村自由市场、限制或阻抑副业生产等等，结果往往造成农业生产的衰退。1953年是一个正常的年景，当年水旱灾害极为轻微，但由于中国在年初展开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运动，秋季又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结果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致使这一年的农业增长率成为“一五”计划中最低的一年。而1959—1961年的农业衰退，主要因素则是大跃进所致。1962年后农业的逐步恢复，主要原因是农业政策的改变。自1960年起公社制度逐步得到修正，规模大为缩小，经营管理权限一再下移，由公社而生产大队而生产小队，直至最后实行“包产到户”。农民自留地普遍恢复，农村自由市场再度开放，副业受政府公开鼓励。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实际上已回复到1957年，对农民管制大幅度

放松，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此外，自 1962 年起，中国还修改了投资的优先次序，以发展农业为主，这一政策虽未能认真贯彻执行，但 1962—1966 年这段期间里，中国化肥产量及农机产量都有显著增加。这此都对农业的迅速恢复起了促进作用。

农业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周期性影响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充分显示出来。

1952—1957 年间，中国的粮食生产增加了 18.6%。同期工业生产增长了 108.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39.8%。对外贸易增长了 57.9%。

1957—1962 年间，中国粮食生产下降 5.8%，工业生产只增加 10%。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5.3%，对外贸易下降 10%。

1962—1967 年间，粮食生产开始回升，工业生产、国内生产总值及对外贸易也都再度上升。这一时期内农业增产 25%，工业上升 82%。国内生产总值上升 53.8%。对外贸易上升 48.1%。

可以发现，上述三个时期中，农业生产的增减对其他部门的影响之大。1967—1972 年，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粮食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开始下降。这 5 年中，中国的粮食生产只增加 6.7%，近乎停滞，但工业生产仍上升 90.6%，国民生产总值也上升 45.5%，对外贸易上升 50%。主要原因是，1965 年后机械工业与石油工业产值有显著增长。而它们与农业关系不大，所以不受农业生产的影响。

1952—1960 年期间，农业生产的变动对投资的变动也有很大的影响，两者的相关影响效应约有一年之差，即第一年农业产量导致第二年的投资的增加或减少。例如，1953 年及 1956 年国民收入较大幅度的上升，主要是前一年农业的丰收所致。1958 年的大跃进因在 1957 年农业歉收之后采取了拔苗助长的方法，因而导致了 1959—1961 年的经济衰退。

自 1965 年后，中国一方面强调农业多种经营，一方面又大规

模兴办小型工业。数以万计的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电力站、小机械厂如雨后春笋般设立起来。这些工厂大多利用非农业产品作原料，所以受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小。由于经济作物的扩展与农村小型工业的建立，逐渐解除了粮食生产对工业发展及对外贸易的制约。所以自 1967 年后，农业变动的循环已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的循环变动。此外，自 1966 年开始，在中国国民收入的结构中，农业的比重从 1966 年的 43.6% 降低到 1967 年的 41%。工业的比重由 38.2% 上升到 43.3%。在工业净产值中轻工业产值的比重由 1966 年的 47.2% 下降到 1976 年的 40.4%。重工业净产值的比重则由 52.8% 上升到 1976 年的 59.6%。由于重工业比重的不断提高，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农业生产增长率的关系比 50 年代进一步削弱了。

2 经济发展政策的循环

经济政策对经济循环的影响是直接而又迅速的。而中国经济政策又处于经常性的变化之中。在 1976 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 年所推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苏联式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为特征的，主要是将资源集中于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忽视农业及轻工业。投入农业的资金只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 7.6%，结果农业生产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粮食供不应求，原料十分短缺，造成轻工业部门设备的大量闲置。到 1957 年，农业已明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同时，“一五”计划又集中工业资金于资本密集型建设项目，新工业所能吸收的劳动力极为有限。1952—1957 年间中国劳动力增加 2000 万，而工业部门新增劳动力只有 178 万人，约占新增劳动力的 9%。大部分新增劳动力只能在农村谋出路，造成农业劳动力过剩。为解决农业生产停滞与农村劳动力过剩两大难题，中国改变了经济政策。

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中国推行了激进的大跃进政策。中国开始重视农业，但又不想放慢工业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政策下，势必要从总体规模上扩大投资。因为资金积累有限，中国企图以劳动力代替资本，以政治鼓励、思想动员来创造奇迹。由于政治、策略、技术、自然等各方面的原因，大跃进最终失败，造成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全面衰退。

经济调整时期：为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1961—1965年间，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的主持下，中国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工业发展全面下马，小高炉大部废除；农业生产被放在首位，大跃进期间由农村新招的二千万职工退回农村，加强农业生产；全面紧缩基本建设投资，196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大约比1960年下降80%，采取物质刺激与利润挂帅指导原则。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自1963年起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又开始复苏。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经济政策在中央引起了严重分歧，刘少奇等人主张继续实施新经济政策；而毛泽东则强调政治挂帅。权力与政策的斗争引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大跃进的许多激进措施开始恢复，如强调思想斗争、群众路线、贬低科技人员、取消企业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等等，经济再度陷入混乱。

新经济调整时期：1971—1975年间，周恩来主管经济，邓小平复出，中国的经济政策进入新的调整时期。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如灵活自力更生原则，向西方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初步确定四个现代化的方针等，经济又出现恢复的势头。

总之，经济政策的变动导致生产波动，生产的波动反过来又促成经济政策的变动，二者互相促动、互为因果，因而往往强化经济波动的程度，增加波动的频率。

3. 政治斗争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经济政策波动的根源在于共产党政权对毛主义理想的认可，这种理想就是造就共产主义新人、强调人的意志、

大公无私与首创精神等等。这种认可导致采用经济动员的方法。农业的集体化与非农业部门的国有化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政权的动员能力。伴随着集体化和国有化而产生的动员方法及其后果，在经济增长上产生了一种波动发展的倾向。波动产生于这样一种事实：任何一次新的动员高潮都有一种达到临界点的倾向：(1)开始超过政权的组织与官僚能力的承受力；(2)导致由于经济组织的破坏而产生的生产过程的混乱；(3)导致比例失调、紧张和生产过程中的供应瓶颈；(4)产生不利的刺激效应。因此，动员高潮的初始阶段是以增长率的加速进行为特征的，直到投入的增长效应为抑制性的非效率效应所抵消为止。当由此而造成的增长率的减缓为领导人所认识时，便导致了政策的调整、动员步伐的放慢与动员方法的终止。这样，由于刺激与效率效应受到更充分的认识，增长率又开始恢复了。然而当这些效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市场刺激政策受到重视时，就会达到这样一种临界点，即在此之后，由于储蓄率下降，增长率再度减缓。这样，当资本和其他要素开始得到有效地利用的同时，可供应的全部投入量开始减少，以至刺激与效率效应至少部分地被取消了。这一点一旦为计划者和决策者所认识，另一次动员阶段重又开始，于是循环出现了。

这样，经济政策的循环就与权力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不能说毛和他的同事没有从经济波动中吸取教训，勿宁说是，由于思想和方法的分歧，他们从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不但没有减轻循环的冲动，反而加重了这种冲动。只要毛主义的影响占支配地位，结果不仅是将经济进一步推进政策波动周期，而且会进一步远离中国的经济现实。如果毛主义的影响减少了，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经济政策的周期特征就会减弱。其他领导人会得出与毛不同的结论，他们会认识到，农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政策的失败。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循环也不大可能消失，因为它深深根植于中国共产主义决策与价值体系的结构中。

美国的中国当代经济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如要摆脱大幅度的波动现象，就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发展规划，同时还要看工业的发展能否摆脱农业的约束。如果现有的工业企业能彻底更新设备、改善管理，产生较高的利润作为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时农业的技术发展能克服收益递减的限制，逐步建立起粮食储备、减少对外粮的依赖，则中国经济可能步入较稳定的阶段。如果政局不稳，经济政策不断变化，国营企业继续大量亏损，农业依然落后，经济就仍然不会稳定。^①

四、分配、就业及其他

（一）分配

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缩小收入差别是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表现出特别高的关注，将此目标放在十分优先的地位上。虽然他们并非总是成功的，但取得的显著成就却是不可否认的。^②

1. 由生产关系变革所引起的收入再分配

所有制关系变革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是巨大而迅速的。罗尔（Robert Roll）在这方面作出了权威的研究。他的分析表明，50年代早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大大促进了农村收入的平等，最高阶层的收入减少了20%而最低阶层人口的收入则大约增加了50%。1955—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又使收入平等的

^① 这一部分的主要参考文献包括：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的有关章节，《中国的经济发展：稀缺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第十一章，密执安大学，1975年版；迈尔斯：《中国经济过去与现状》第227—228页，郑竹园，《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第199—232页，《中国的经济发展》第293—330页，韦斯特韦尔出版公司，1985年版；安东尼·唐：《农业政策与成就》载艾克斯坦等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趋势》，阿尔丹出版公司，1968年版。

^②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第47页。

趋势进一步加强，消除了由个人土地规模和质量而产生的收入的不平等现象。

城市的情况则类似。50年代的社会化运动大大地改变了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基本上消除了财产收入。中国社会的半封闭性质和禁止自由移民，使中国可以不付很高的工资而保留高技术人员。八级工资制决定了大部分就业者的收入。自1956年以来，这种制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2. 农民的收入分配状况

但是除了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而实现的平均主义之外，其他还有什么办法使农村收入平等化有所改进就不得而知了，而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

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除领导人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外，原因主要有两个：在生产队内部由于家庭劳动力不同所造成的工分的不同，有好劳力的家庭收入也比较高；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生产队之间由于土地数量和质量的不同，以及发展和改进能力的差别。住在贫困、土地质量差、又很少灌溉设施的山地农民，如果得不到外来的援助，肯定只好受穷。而居住在土地质量好、有水利灌溉区的农民，生活水准一定高。地区之间收入的差别是相当大的。消除这种不平等要通过税收、投资和由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的移民来取得。卡尔里斯金指出，虽然财政政策在缩小各省之间的差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更小一点地区如县、乡村，更多地提倡自力更生。地区内部的粮食方面的自力更生政策是为了缩小地区内的差别，但其结果却是惩罚性的，它不仅损害了经济作物，而且损害了粮食作物。由于强调自力更生政策，国家向贫困地区的投资也不多。¹

各地区之间收入分配方面的差别也有缩小的可能。到1957

¹ 迈尔斯：《中国经济现状与未来》第232页。

年，中国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还很大，可能比意大利、南斯拉夫或印度更大。然而，从可得到的数据表明，这些差距在 1952、1957 年和 1971 年之间正在缩小之中，虽然过程比较缓慢。当然，把中国的一个省作为衡量这些差别的单位可能太大了。因此，如能找到县或公社一级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或产值指标，那么，这些结论就将会改变。总之，在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和这些广大的部门内部以及在不同的省和大区之间，仍然保留着很大的差距。^①

3. 工人的收入分配状况

1972 年底，艾克斯坦教授等人曾到中国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在参观的工厂、地方企业、学校及其他机构中，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工资收入的资料。他们的结论是，产业工人的工资差别一般是 3:1 至 5:1 这种工资差别的幅度在其他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如，美国或欧洲企业的工资差别一般为 3:1。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结构并不比其他国家特别带有平均主义的性质。但是，这些工资数据中有许多不是完全可比的，所以对这个结论必须持谨慎态度。高级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包括正教授在内薪水为 300 到 400 元。这说明在中国，工资与薪水的差距为 10:1 的例子至少也会偶然遇到。而且，如果将工资幅度的两极进行比较，即把学徒同老教授或政治上的头面人物相比，那么 20:1 的差距也是会遇到的。但这种状况在中国只是极少数。如果要在这种极端的意义上进行比较，那么其他国家的收入差别要比中国大得多，其中还不算资产收入。比如，美国的最大工资差别是 50:1 甚至到 75:1 印度和非洲刚毕业的

^① 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250 页 珀金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载德恩伯格编：《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经验》，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 年版 第 128—129 页；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30 年代与 50 年代的比较》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 年版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版 第 326 页。

工作人员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高达 30 : 1 私营工厂主与工人的工资差别达 80 : 1。当然，工资的数据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分配的情况，因为不能得到每个有收入阶级的具体人数。除此之外，10 : 1 或 20 : 1 的工资和薪水差距中国与美国、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可能代表程度非常不同的实际收入差别。在中国房租是微不足道的，极少超过每月收入的 2% 至 4%。产业工人的医疗保健是免费的，而且对工人家属也只收极少的费用。物价是按对一切生活必需品定得很低、而对奢侈品则定得很高的原则制定的。这样，物价结构本身含有某些累进的要素，使中国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间的实际购买力差别趋于缩小。这种情况又因下面的事实而进一步加强，即由于在消费者的预算中占突出地位的生活必需品是定量供应的，这就使高收入阶层也不能出高价买走。^①

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可能比人们所观察的要大。虽然货币收入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缩小了，但在与个人和团体的政治权力相关的实际可得到的产品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差别。

4. 城乡收入差别

同解放前相比，城乡收入差别已经大大改善了，但仍有较大差距。罗尔的研究表明，在 50 年代，由于允许对生活成本差别给予补贴，收入差别并不很大，而且，1952—1957 年期间，工人和所有雇员的实际工资虽然提高得很快，但 1957—1972 年间只是略有增加。同时，农产品收购价格几乎提高了 65% 而工业品在农村地区的销售价格却只增加了不到 15%。可以看出，农村人口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这导致了城乡平均收入差别的缩小。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农村提供了更多的医疗教育人员与设施等。从 50 年代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347—348 页；《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29—304 页。

未到 70 年代末，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了。一般来说，农民的月收入相当于城市工人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因为，有些政策是在扩大这种差别，如农业领域的投资仍保持较低的比率，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迁移，农产品价格偏低，而且城市服务的不断提高等。总起来说，这些因素的影响大于那些趋于降低这些差别的因素的影响。

总之，虽然中国在追求平等目标时并不总是成功的，但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平等。一个人在旅游中国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可以看到贫穷，但看不到通常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悲惨和苦难。人们吃得饱穿得暖，无论是男是女，在穿着方面几乎没有差异。这与印度或亚洲其他地区穿着上明显可见的贫富悬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专家们普遍承认，“在毛泽东的统治时代中国穷人的处境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好得多。”

（二）物价与就业

在 80 年代以前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大多数中国经济专家对中国在物价稳定和就业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艾克斯坦指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特征是追求稳定。中国实现了政府预算平衡，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预算都纳入国家总的预算计划。中央政府还改革了税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连朝鲜战争也未引起通货膨胀，人民银行实行了紧缩通货的信贷政策。全国工资稳定，物价稳定，币值稳定。因此可以说，1952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货币、财政和价格的稳定。然而，必须强调，这个发现是以官方的物价指数为依据的，它可能低报了非定量供应商品的价格上升，这似乎可从 5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某些代表

1 珀金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第 129—130 页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326 页。迈尔斯：《中国经济：现状与未来》第 232 页

性商品和工资的比较中得到证实。

在价格政策方面，中国与苏联不同，它对价格的控制要严得多。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对人口流动和职业转换实行了严格的控制。而且由于缺乏独立的工会，提高工资的压力不大。1928—1932年苏联粮食生产下降，供应紧张，促使工资提高，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国在1959—1960年和1962年也经历了类似的农业危机，尽管食品短缺，但因家庭购买力也同时下降，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苏联相应的时期来得缓和。这并不是说中国完全没有通货膨胀，而是说，中国的工资和零售价格的增长都很缓慢。总而言之，中国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成就，如果用这个国家过去的经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历，以及当前世界上泛滥的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更不用说拉美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了——的情况来考察，就会给人们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就连战后的西欧和日本也不如中国。

但是，物价稳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取得的，即生活水平的停滞和体制的僵化。例如，郑竹园指出，过去30年中国推行一套低工资低物价政策。一方面冻结工人和农民的收入，20年未调整工资，一方面实施严格配给制。前者控制社会的有效需求，后者控制物资供应，所以能稳定物价。

普里帕拉指出，在改革前20多年的时间里，通货膨胀不是不存在，而是表现形式不同。通货膨胀由于对价格的严格控制而受到压制，因而它不是以价格上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消费者排队长和商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失业肯定存在，但采取了隐

①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296—297页。

②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159—190页。

③ 郑竹园：《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第41页。

蔽的形式那样。^①

在解决就业方面，中国也取得了成就。50年代初期在城市地区有明显的失业现象，当时的经济正在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因此生产能力还没有充分利用。公开失业现象在1960—1962年或1963年期间的危机年份又重新出现。但在其余年份里，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失业的现象。在农业中有些季节性的就业不足，以及在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中劳动力有些浪费或利用率不高的现象，这些是不可避免的。^②

郑竹园指出，中国在解决就业问题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1976年以前，部分地由于采取了严厉的手段，如“一碗饭三人吃”，并将二千万城市过剩劳动力下放农村等办法，公开的失业基本上避免了。但这只是暂时的，下乡青年是一只庞大潜在的待业大军，它只能延缓但决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而且为了满足就业需求而牺牲了企业效率，多数企业人浮于事，人员录用常常不考虑技术需要。这种现象归结于许多因素：首先，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而且工农差别一直在持续扩大，这种差别导致城市就业机会供不应求，只能采取行政的强制手段，如禁止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其次，中国主要发展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创造相应的就业机会；第三，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抑制集体和私人企业的发展。^③

（三）生活水平问题

由于数据贫乏，要对中国的生活水平及其趋势作出严密的估量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些问题至少可以部分地和间接地加以阐明。

^① 普里帕拉：《中国的改革与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美国企业研究所，1991年版，第181—182页。

同^①，第296页。

^③ 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266—267页。

几乎每一个来访者所看到的中国社会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国人已经成功地保证实际收入有一个最低的限度，人民看来是能吃饱穿暖的。由于极少看到极奢侈和极高的生活享受，这种印象就更为深刻了。^①

确定无疑的一点是，中国的收入平等程度与二、三十年代相比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国有化和集体化必然使 1949—1955 年或 1956 年期间的收入分配发生重大的变化。艾克斯坦指出，在这种情况下 纵使从 30 年代到 50 年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由于这个再分配，使穷人的消费水平得以很大提高。这样，根据一定但并不是不现实的计算数字以及某些简化的设想，如果占人口 5% 的最上层居民得到收入的 25—30% 而在底层的一半人口只获得 15—20% 那么 把上层的收入减到全国的平均数，就能得到足够的剩余来提高投资和消费的水平。经过这种再分配 原先在最上层的 5% 的人将只获得国民收入的 5% 而底层一半的人口将获得 30—40% 。这样，从 30 年代到 50 年代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值有少许的增长，也就是增长 10—15% 来吸收额外的投资 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就能够提高一倍。

这表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值可能在 1933—1952 年期间稍有下降 而到了 1957 年则超过了过去的水平。自此以后，除若干中断外仍然继续上升。结果，到 1974 年就超过了 1957 年的水平大约 90% 以上。这说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必定已经开始从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根据这些推测的估计数字，从 1952 年算起，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量可能已接近于 3% 的平均年增长率增长 如从 1933 年算起 则是按 1% 的速度增长。^③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29—304 页。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99—304 页。

艾克斯坦：同，第 305—309 页。

本杰明·沃德也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农村这一事实反映在消费政策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城市工人相比，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出现了急剧减少的趋势。然而，在中国，尽管有庞大的农村人口，虽然在计划时期城乡收入比例发生了变化，但总的来说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在改革前 20 年的时间里，农村人均消费以每年接近 2% 的速度增长，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消费政策中是一个重大的、了不起的成就。^①

然而，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相比，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是缓慢的（见表 1-2-5）。

表 1-2-5 对人均产值的估计

年份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52 年币值)	非消费份额 (百分率)	人均消费额 (1952 年币值)
1933	140	10	126
1953	130	20-25	98
1957	160	25-30	112
1974	310	35-40	186

资料来源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26-227 页

1978—1980 年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略低于 1955—1957 年的水平 地区性的贫困普遍存在 与此同时，70 年代国家调配粮食的能力已不如 50 年代；在城市地区，1957 年工资冻结以后 到 1977 年人均实际工资下降了 17%。人均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劳动力规模的扩大，1952 年劳动力的就业率为 36.1%，1985 年为 47.7% 同期的失业率从 13.2% 下降到 1.8%，由此导致了在每个工人的年收入不变情况下人均收入上升了

① 本杰明·沃德：《中国社会主义四十年》第 112—113 页。

50%。但是，虽然 1953—1978 年人均收入每年提高 6%，实际人均消费每年却只增加了 2%。就食物供应而言，人均粮食和食油消费实际下降了，人均肉、糖和服装的消费从 5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任何提高。每年人均产量（实际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3.4%，而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仅为 1.3%。由于长期忽视非生产性投资，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1952 年的 4.3 平方米下降到 1977 年的 3.6 平方米，人均储蓄还不到 100 元。农村居民的居住面积略好一些，但人均居住面积也不到 10 平方米，人均储蓄还不足 10 元。¹

第三节 现代化的宠儿：工业的发展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工业的发展一向被放在优先的地位，因而它所取得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尽管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则是无可否认的。

一、中国工业的发展

德恩伯格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经济的改组，使规模有限、结构和布局在 1949 年都十分不正常的工业部门，在建国后四分之一的世纪内增加产量 80 倍以上。这种每 5 年生产翻一番的惊人发展速度，在 60 年代曾两次中断。一次是大跃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然而，总的来说，过去 25 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是持续、高速的。但由于对工业的投资比较集中，主要投向生产资料部门，因而阻碍了对其他部门的投资，影响了工业的综

¹ 德恩伯格：《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延续与变化》载《中目的经济政策》第 114 页。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261—263 页。《中国的消费与生活水平：1978—1983》载《中国季刊》1984 年 12 月第 100 期。

合发展，引起工业生产结构的失衡。中国领导不得不把这些问题承担下来，作为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代价。德恩伯格得出的这个结论在专家们当中是很典型的。

表 1-3-1 中的数字是专家们运用极不相同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 表 1-3-2 则是专家当中具有代表性的结论与中国统计的数字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到，这些结论是非常相近的。这一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工业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而这种高增长率并不是有利于工业产品的价格扭曲的结果。

表 1-3-1 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 (%)

时 期	罗斯基		菲尔德 / 中央情报局	菲尔德-拉迪-爱默森
	1952 年价格	1957 年价格	1952 年价格	1957 年价格
1912-1933	10.7		--	--
1912-1936	10.2		--	--
1912-1949	6.0		--	--
1949-1973	15.9		--	14.2
1952-1973	13.3		11.8	11.6
1957-1973	11.5		10.2	9.6
1965-1973	12.2		11.0	10.3

注：罗斯基使用的工厂生产总值，包括现代化工厂和雇用四人以上的手工业工

厂。

其余使用的工业生产总产值，它不仅包括工厂生产总值，而且包括个体手工业

资料来源：罗斯基：《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20 世纪的生产物资与经济发展》密执安大学，1980 年版 第 85 页

① 德恩伯格：《毛以后的中国经济前景》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上），第 45-113 页

表 1-3-2 中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 1952-1974) (%)

时 期	菲尔德	中国官方资料	时 期	菲尔德	中国官方资料
1952-1957	16.0	17.9	1957-1974	9.0	9.5
1952-1960	18.0	23.1	1960-1966	4.0	0.2
1952-1966	12.0	12.7	1960-1974	6.0	5.2
1952-1974	11.0	11.4	1966-1974	8.0	9.1
1957-1966	10.0	9.0			

资料来源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19 页。

按国际的和历史的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是快的。中国在 50 年代的工业发展，可以同增长率非常高的苏联的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相比；而在 1928-1959 年，苏联工业的年增长率约为 10%。根据一般的标准，日本的工业化比较成功，而它在 1890-1940 年的增长率约为 8%。与除日本以外的其他的工业化国家相比 中国的成就更为突出。例如 在 1860-1959 年期间 美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4-4.5%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四五十年时间里的增长率也在 4%左右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30 年间的增长率约为 3%，1880-1940 年的增长率为 2% 英国在 19 世纪初期的年增长率低于 5% 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则徘徊在 3%左右。相比之下，中国工业的增长率是相当快的。^①

像通常那样，专家们认为，由于印度和巴西与中国的国情相似，且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都强调生产资料部门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因此，彼此之间的可比较性也较大。它们之间的比较也最能说明问题。

首先，就产量的增长方面而言，中国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表 1-3-3 通过不同的统计方法对中印两国的工业发展作了比较，结

^①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19-220 页。

论是一致的，即中国工业的发展大大快于印度工业的发展。

表 1-3-3 中国与印度的生产资料产量的增长
(1952-1973 年) (1952 年为 100)

	1957	1965	1970	1973	年平均增长率: 1952-1973(%)
中国产量					
1, 中国权数					
A. 1957 年价格	320	1016	1869	2906	17.4
B. 1975 年价格	272	777	1356	2094	15.6
2, 印度权数	421	1301	2420	3748	18.8
印度产量					
3, 中国权数	171	448	574	674	9.5
4, 印度权数	158	374	525	591	8.8

资料来源 罗斯基：《中国向工业主义的过渡》第 107 页

巴西工业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是：1949-1973 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10.8%，1965-1973 年为 12.3%。这表明，只是到了 1965 年以后，它的增长率才赶上中国。¹

就工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方面而言，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可得到的证据表明，中国的成就也超过了印度和巴西。在巴西，工业的孤立——无论是在地理方面还是在投入—产出方面——表明，工业的发展对其他部门尤其对农业部门的产量和生产率的提高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在印度，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经常落后于国内需求的发展，在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和改进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工业发展对其他部门的影响也不大。

在中国，生产资料部门的增长与技术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结构的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消费品工业现在都需要由生产资料部门提供塑料、人造纤维及其他非传统的原料。中国

1: 罗斯基：《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第 107 页

的能源基础也进入了从煤碳到石油和天然气的转变过程，到 70 年代，后者提供了中国原始能源的三分之一以上，而 1957 年仅为 5%，1965 年也不过为 14%。生产资料部门还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持续增加的物质基础。¹

二、工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工业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伴随着产值的迅速增长 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见表 1-3-4）。

表 1-3-4 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1933	1952	1957	1965	1970	1974
珀金斯:						
制造业	198	262	318	—	416-476	—
农业	592	479	459	—	361-324	—
服务业	210	259	223	—	223-200	—
艾克斯坦:						
工业	16	21	31	—	—	54
农业	57	47	39	—	—	20
服务业	27	32	30	—	—	26
菲尔德:						
工业总产值	—	100	100	100	100	100
工业品	—	35	48	53	55	62
消费品	—	65	52	47	45	38

资料来源：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15 页、229 页。

珀金斯：《20 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载珀金斯编：《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经济》，斯坦福大学，1975 年版

注：工业包括工厂与小企业手工业，公共事业和建筑业；农业包括渔业和林业；服务业包括运输、贸易、政府及其他服务业。

¹ 罗斯基：《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

1949 年以前，在中国工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及其他一些消费品制造业，这些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生产资料部门的规模还很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虽然在 50 年代产量大大增加了，但综合、机动和创新的机械工业仍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不能满足需求结构转变的要求。

专家们认为到 1957 年以后，中国才进入了自我维持的工业化阶段，在这期间，强调产量的冲动式的工业发展转变为强调质量和互补性的和谐的增长。国内资源的调配已开始通过供应新产品、吸收新技术和调整现存商品及资源的比例，满足日益增长、变化的经济的需求。60 年代以后，中国石油和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开始了一个始料不及的结构变化过程。如果没有从冲动的到和谐的增长政策的转变，这种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其他一些在 60 年代后创办或扩大的部门还包括电子、计算机、化纤、塑料、及一系列的航空工业、核工业等。这些部门曾受益于 50 年代进口的装备和技术，但 50 年代苏联技术援助的突然中断及农业和国防的新要求，迫使中国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自此以后，中国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一直就快于整个工业部门的发展。

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资本产品的主要供应者，中国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向国民经济自我维持的增长的过渡中发挥了支配作用。在 1949—1973 年期间，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13%。与此同时，生产资料部门的增长率达到了 20% 以上。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的比例下降了，而机械制造业、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等部门的比例则迅速上升。到 1973 年，它们的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二。因此，生产资料部门在中国经济中居领先地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 1957—1971 年期间，生产资料部门的增长约占中国总产量增长的一半，是服务业的两倍，农业的三倍。这同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机器与装备的自给自足率在

50年代接近75%到70年代则高于90%。由此,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率迅速提高,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综合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颇为显著。与此同时,在生产资料部门内部也发生了结构变化,新兴工业部门的比例不断扩大,而传统工业的比例则持续下降。前者包括冶金业,金属加工业和石油工业,后者包括煤碳工业、动力、木材、造纸和金属矿物业。

关于经济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郑竹园认为是多方面的。在积极的方面: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表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农业的比重下降;在制造业部门,金属产品在总产品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而消费品则下降了;很大部分的国内生产总值转为资本积累,尽管人均收入非常之低;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工业、人口和运输设施的分配进一步平衡了。在消极方面:自1957年以来,人均产量没有明显的提高;工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②

关于中国工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克雷格作了如下估计:大体上,机械工业的基本技术能力,来源于共产党掌权头十年从苏联大规模输入的技术和设备。在苏联技术援助撤走之后,中国通过进口成套工厂和设备,收集西方技术资料,聘请国外技术专家,派人出国培训而得到使用西方技术的好处。获得西方技术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机械和设备的进口。但中国很多产品仍存在严重缺陷,或是没有生产能力,或是没有生产资源,仍然大大低于工业化

^① 德恩伯格:《中国的未来》,麦肯罗-希尔夫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98页。罗斯基:《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第49页。珀金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载德恩伯格编:《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经济》,第126页。陈乃润:《毛以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政策、问题和前景》,载《毛以后的中国经济》,第297页。

郑竹园:《中国的经济发展》,第437-438页。

国家的水平，而且工业各部门之间很不平衡。^①

工业在国民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是现代经济增长定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业的这种发展状况对中国现代化具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专家们作出了不同的结论。

艾克斯坦所作的结论是 按照一般的标准 直到 1952 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不发达的、低收入的国家。而到了 70 年代 中国国内总产值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来自农业，而大约一半的产值来自工业。工业结构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到 70 年代 消费品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下降到 40%，而机械工业的产值则从 1952 年的十分之一上升到 70 年代早期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就农业产值而言，中国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工业结构而言 到 70 年代，中国经济已具备了先进发达国家的许多特征，它可以同多数发达国家比较了。对现代发达国家工业经济发展的系统研究表明，直到经济达到相当的工业化阶段以前，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不可能占支配地位。这就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寻常的。

珀金斯得出的结论是“起飞”通常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发现并开始将现代科技应用其经济的过程。“起飞”一词特别表明与昔日突然分开，即由“传统”经济和社会传统占支配地位的状态突然开始进入增长状态，并经历了结构的变化。依此分析，1949 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处于“传统”的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起飞”。然而，1949 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不是典型的“起飞”即不是在欧洲、日本和最近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所经历的“起飞”，

^① 杰克·克雷格：《中国机械工业的调查》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上），第 498-499 页。

^②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19、228-231 页；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30-31 页。

勿宁说它是共产党国家的‘强制要求’增长的一个实例。^①

而郑竹园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通过综合比较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比表明，到 1975 年，现代部门的比例使中国列入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农业部门的比例使中国列入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服务部门的比例则使中国低于任何一组国家的平均数。

劳动力分配的比较状况表明，中国很大比例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在现代部门劳动力的比例则小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平均数。中国大量劳动力仍保留在农业部门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在过去 30 年的时间里的工业化是失败的（见表 1-3-5）。^②

表 1-3-5 中国与其他国家工业结构的比较

生产结构	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部门
中国(1952-1957)	43.5	33.5	23.1
中国(1975)	37.0	38.0	25.0
组 I 和组 II	15.2	49.5	36.3
组 III 和组 IV	24.6	34.3	42.1
组 V 和组 VI	39.0	27.4	33.5
组 VI 和组 VII	48.0	19.6	32.4
劳动力结构			
中国(1952-1957)	72.9	16.1	
中国(1978)	74.0	16.5	
组 I 和组 II	18.9	45.7	
组 III 和组 IV	39.5	30.7	
组 V 和组 VI	53.6	23.0	
组 VI 和组 VII	59.3	18.8	

珀金斯：《20 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 载珀金斯编：《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经济》第 115 页。

郑竹园：《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419-420 页。

注：国家的分组以人均收入为基础。组 I 和组 II 是最高收入国家。组 VI 和组 VII 是最低收入国家。原始数字相加不等于 100。

资料来源 郑竹园，《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419 页

艾克斯坦也指出，工农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个主要特征。农业劳动力占 75—80% 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中国 70—80% 的农业劳动力只生产了国内产值的 20—30%，而占 20—30% 的工业劳动力却生产了 70—80% 的国内产值。他认为，这种现象有其主客观原因，具体说就是，政府政策和土地资源。在一个土地短缺的经济中，农业产量只能通过亩产量的持续上升才能提高，这就需要逐年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在一个资本稀缺的经济中，就要提高劳动力等其他投入。为此及其他原因，中国政府有意识地阻止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同时鼓励劳动力回乡。其结果就是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劳动力结构相对稳定，同时，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上升了。可以预料，工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迟早会导致消费压力的上升，并进而导致城乡收入与生活水平差距的进一步扩大。^①

三、增长与变化的原因

如此迅速的增长和如此明显的结构变化是怎样取得的呢？

艾克斯坦指出，在分析中国的工业发展时，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即，一个在 20 世纪中叶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与一个在 19 世纪在自由放任条件下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相比，必然会发生一种不同的工业结构。这部分地是由于 20 世纪的技术更加具有资本密集型的性质，落后国家可以从国外学得先进技术，因而节省

^①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30—231 页。

了研究开发过程。而且，与一个小的外向型经济相比，像中国这样一个资源丰富、市场巨大的国家，倾向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展机械工业。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推行的政策的结果。对中国工业的发展分析表明，主要依靠行政控制而不是通过市场分配的办法来调拨资源，有助于中国在提高工业产量、改变其结构和降低工业产品的实际成本方面取得成就。中国的工业增长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比较，以及许多工业民主国家在战时采取不通过市场来分配主要资源的历史都证实了上述结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期间，中国急于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业基础，而且优先发展提供钢铁、煤碳、水泥和电力这样的基础工业，同时还伴随着 50 年代机械制造业的迅速膨胀。中苏联盟强化了这种趋势：这首先表现在中国采取的苏式发展模式上，同时，还由于需要从苏联进口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的完整的工厂。中苏关系破裂迫使中国调整其经济政策，强调自力更生，迅速发展机械制造业特别是国防关联的部门。同时发展的还有石油工业及与石油有关的工业，即石油开发业和炼制业。对农业的强调则意味着发展与农业相关的部门如化肥与农业机械工业。因此 电力、钢铁、煤碳、水泥业、纺织业在 50 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造纸业在 60 年代开始放慢，另一方面，原油产量与化肥产量迅速上升。在 60 年代增长了 10 倍。但在 60 年代，增长放慢的部门却经历了质量上升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量的下降。^①

另一个不言而喻的重要因素则是中国的强烈的积累倾向。中国的积累率从 1952 年的 11% 上升到 1957 年的 20% 到 1958 年

^①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19 页；《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30—36 页；罗斯基：《中国的工业体制》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下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 年版。

达到了 30% 的高峰。虽然在 60 年代初的萧条时期急剧下降，但从此以后大约一直在 20-25% 上下浮动。与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对不发达国家而言，这都是相当高的比率。一般来说，在其他不发达国家中，当人均收入达到几百美元以前，积累率一般为国内总产值的 15-17% 而中国的积累率在甚至以 1930 年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大约刚刚达到 100 美元时就已经超过了 20%。这种固定资本的大量投资将会导致新的生产能力的出现和比较现代化的生产方法。许多技术进步、先进的生产方法及先进技术都体现在新资本的建设中。总之，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反映了由高积累所引起的劳动力与资本的大量运用，同时还反映了人力资源与资本资源质量的持续的改善，并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提高。^①

高积累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但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高的积累率呢？珀金斯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首先是中国采取了斯大林式的强制的行政方法。1957 年以后积累率的提高是在没有增加新税、没有提高税率和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取得的。价格平稳的部分原因是企业之间没有为劳动力而发生强劲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苏联导致了实际收入的持续上升，货币工资上升得更为迅速。在中国有证据表明，自 50 年代中期以来，货币工资几乎没有增加。1971 年的实际工资与 1957 年相同，虽然住房和卫生保健有了变化，两者都得到了大量的补贴。

工资的压力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力使得领导人可能通过行政命令冻结工资。但一个似乎更为可能的解释是，提高工资的压力不大。其中有若干原因。第一，中国是一个封闭性社会，感受不到提高消费的压力，这

种压力是被通常所谓的示威效应激发起来的。高消费的旅游者，外国居民及电影、电视及广告所显示的高水平的生活景象，在中国都不存在。第二，在中国没有高收入者在高消费方面对邻居产生刺激，这不仅仅是因为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相比收入比较平等，而且“摆阔性的挥霍浪费”受到严格限制。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可能性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因而缺少对劳动力的竞争。^①

形成高积累率的原因不仅仅是工资率没有提高，还由于个人消费支出相对稳定。全国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在 1952—1957 年间上升了约 30%，但在 1957—1970 年间，仅上升了 20%，年增长率约为 1.5%，仅为国内产值增长率的一半。

除了城市工资停滞外，1957 年后，消费的缓慢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减缓了城市化过程。由于城市工人的服务费成本高、示威效应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以及其他的城乡差别，城镇的人均消费远远高于农村。所以，即使人均消费水平保持不变，劳动力从城镇到农村的转移也会提高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中国领导人成功地减缓了城市化过程，虽然工业增长了四到五倍，但城市人口只增加了一倍。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尽力降低农村的移民，使城市居民从事乡村建设，中国的城市人口会大得多。^②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遗憾的是，专家们没有确切的资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应归结于生产要素的增加，还是归结于技术进步，或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的增加。但他们一般认为，上述因素都发生了作用。在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以 11% 的年平均速度增长，而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则可能不超过 2%——肯定会有高速增长。在工业的增长过

^① 珀金斯：《20 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载《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现代经济》第 135 页。

^② 珀金斯：《20 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 136—137 页。

程及结构的变化中，非农业部门劳动力素质的改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文化程度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普遍上升、受过科技训练的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迅速增加，都必然会带来人员素质的明显改善，因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做出了贡献。

在六、七十年代里，要素构成与生产资料部门的技术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工业技术的发展过程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发展过程相似。在这一过程中明确地显示出一种资本深化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了，自动化也日益发展。这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他部门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日益扩大。^①

此外，尽管存在着明显的技术限制，但中国在将国外发明移植到国内工业方面，在将新技术新产品从先进企业和地区普及到一般企业和地区方面，以及在用新方法解决现存的技术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有效的经验。

罗斯基对中国在利用落后技术发展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进口替代政策会导致使用落后的技术、生产低质量的产品、阻碍工业内部的分工，这种论点对多数工业部门来说是适用的，但它没有考虑到，在高度综合的工厂中使用落后的技术生产低级产品，从长期的过程来看是必不可缺少的，正如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工业部门，而且在整个经济中都导致了技术、产品质量与生产率的提高。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里，需要大量的资本产品来承受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这种资本产品不可能通过国际交换解决。除了要遇到外汇的困难外，与贸易关联的工业化战略也将很快遇到供给问题。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中国每年需要进口的机器

① 罗斯基：《中国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第 77、99 页。

罗斯基：《中国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第 77、99 页。

工具，将大大超过美国的产量。日本相对开放的经济史也说明了在早期转向国内制造生产资料产品的意义。从 1890 年开始，日本资本产品供应中进口部分的比例开始持续下降，到 1900 年进口部分已经低于国内机器产量的三分之一；在 1930 年进口部分只相当于国内机器产量的八分之一。其余的供应来源则是那些在当代经济学家及最近一些贸易导向发展战略的经济学家看来在技术上相当落后的生产者。日本和中国的经验表明，低级资本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可以发起并维持一个导致技术、质量和生产率的改善并伴随着产量增长的连续的过程。在中国，正像早期的工业化国家那样，正是这种改善过程使得生产资料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①

但是，正如第一章所阐述的那样，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归结于生产要素的数量的增长，而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水平是比较落后的。

第四节“园艺”的奇迹：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那一流派的中国经济专家，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必须依靠仅占全世界可耕地 7% 的土地上的产品，来养活几乎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奇迹。亨利·格罗恩说得更为动听：“这个任务是靠农业的精耕细作来完成的，这种制度与其说像种田还不如说像搞园艺。”^②

但总的说来，从发展的角度看，自 1949 年以来一直到 70 年代

① 罗斯基：《中国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第 109 页。

② 亨利格罗恩：《中国的农业生产》，载《毛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下），第 190 页。

中期，农业的增长速度一直比工业慢得多。中国的农业发展状况并没有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更加稳定的基础上。

一、中国农业的增长状况

按照艾克斯坦、珀金斯、李皮特等人的数据估计，中国建国后 20 多年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约为 2.2%，与此同时，粮食产量的增长则缓慢一些，约为 2%。这个增长率使得中国把粮食总产量从 1949 年的一亿一千一百万吨（或者从恢复基本完成的 1952 年的一亿六千一百万吨）增加到 1977 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农业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农业的发展却被几乎是同步增长的庞大的人口吞噬了，在同一期间，人口的增长率约为 2%。在 1952—1970 年间，农业生产增长了约 30—50% 而人口增长了大约 45%。^①

因此，尽管中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到 1975 年，粮食供给或者落后于人口增长的需求，或者略高一点，仅够维持每人的口粮，棉花和油料作物的增长则落后于粮食的增长。农业的发展没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超过温饱水平。因而也不足以向工业或外贸提供较大的额外数量的原料。而且，1957—1958 年以后，人均粮食产量实际上急剧下降了，中国农业从大跃进的灾难恢复后，一直到 1977 年也没有达到 1957 年的水平，或者仅仅达到当时的水平。到了 1978 年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自 60 年代初期以来到改革前夕，中国年年是粮食净进口国。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在人口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农业发展是太不尽令人满意的。农业的发展状况表明，中国的国民

李皮特：《中国的经济发展》，夏普出版公司，1987 年版，第 178 页；郑竹园：《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392 页；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12 页。

经济仍然建立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基础上。^①

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好的趋势。每小时产量在 1957—1975 年间下降了 15—36%，虽然总产量随着劳动力的劳动日的增加而增长了。如此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上升和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压力。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压力反映在农民收入的停滞和穷困生产队（人均收入少于 50 元）的比例上。1976 年，这种穷困的生产队占 42.8%。1957—1975 年农民人均实际消费仅增长了 22.2%，考虑到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的起点极低，这算不上是重大的增长。^②

尽管如此，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历史上的农业发展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 70 年代，是中国农业发展比较辉煌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农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 1914—1918 年间和 1931—1937 年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只增长了大约 8%。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农业产值增加了 15%。根据珀金斯的研究，在 1914—1975 年间，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0.7%。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增长率至少是中华民国的两倍。但由于人口的增长率也以同样的倍数增长，其结果是，自 1949 年以来，人均农业产值并无显著的提高。

通常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是农业在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方面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国家。但在 1885—1917 年这 22 年的时间里，它的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 1.8%。在 1905 年和 1936—1940 年，它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2%。因此，战前日本农业的增长速度并不比中国自 1952 年以来农业的增长速度快。

李皮特：《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178 页 郑竹园：《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392 页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12 页。

② 李皮特：《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178、181 页。

类似地，丹麦通常也被认为是一个农业在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但在 1870—1879 年至 1930—1939 年期间（1915—1920 年战争期间除外），丹麦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 2% 与中国相同。

总之，日本和丹麦战前农业的增长速度并不比中国 1952 年后的增长速度快。此外，中国的粮食增长是在农业土地面积没有变化的基础上发生的，也就是说，这反映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然而，由于日本明治时期最初几十年的人口增长率很低，日本农业的人均产量要比中国高得多。因此，这一成就使它的人均农业产量增长率达到了 0.5—1%。此外，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加速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成功，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3%。

如果说，同明治时期的日本农业的发展相比，中国 50—70 年代的农业还显示不出什么优势的话，那么在分析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农业发展状况时，结果就不一样了。当时，在农业的实际产量中，最初几十年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年增长率为 1.2—1.5%。在该世纪中期，达到了高峰，1821—1831 年、1851—1861 年间的最高年增长率为 1.8%。在 19 世纪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农业增长率便开始下降，一直低于 1%。

同战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亚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发展状况是比较落后的。例如，在另一个亚洲农业大国印度，1950—1951 年、1960—1969 年期间的年增长率为 3%。但从发展趋势的角度进行分析仍能看到中国农业发展比较光明的一面。因为，印度农业产量在 50 年代的增长率为 4% 而从 60 年代开始呈下降趋势，仅达到 2%。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农业从大跃进恢复后便进入了持续的增长阶段，1963—1970 年达到了 2.2% 的平均增长率。而且，由于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中国，两国农业的人均水平大致相等。此外，由于印度农业生产的

基数较中国为低，提高产量也相对容易。

所有这些资料表明，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的农业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从人均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业发展不能算是成功的。因此，中国必须找到一个进一步加速农业增长同时降低人口增长的途径。在这方面，战后日本的经验是最具启发意义的，为了加速农业发展，日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投入了大规模的现代设备。除了重大的技术突破之外，这可能是实现中国农业发展的最佳途径。然而，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取得这一成就就要比日本困难得多。但是，即使中国能够接近取得战后日本的成就，中国也将很难打破人口与粮食竞相增长的困境。

二、影响中国农业发展的各种因素

专家们对此问题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早期发展阶段，影响农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领导人对经济事务并没有很好的理解。在“一五”时期，中国采纳苏联发展模式，把投入的资金集中投放在某些工业部门，用来生产其他工业部门所需的物资，这种做法，最严重的后果是限制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资。这种通过强制性的压缩农业来加快工业化进程的观点甚至在农业基础较好的 20 年代的苏联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在中国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对一个从农村起家，并且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以农民血统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来说，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至少持续到 1954 年或 1955 年人们对农业不会对工业化产生较大的制约作用这一点是坚信无疑的，而且他们还认为，较高的增长率可以不必依靠增加投资，而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土地和其他投入，主要是通过互助组的推广即可达

①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12-213 页；《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28-29 页；李皮特：《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212-213 页。

到。在“一五”计划结束时，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面这一点上，即把农业生产小组并为合作化生产单位，就能动员劳动力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这一点后来证明也是错误的。

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惨败之后，农业才开始在经济政策中占据真正重要的地位。制造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显著扩大。从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急剧上升。投资基金从 1952—1958 年期间每年平均十亿元增加到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的年平均近 500 亿元。从投入的实物指标来看，以 1957 年的供应水平指数为 100 到 1975 年，农业机械的总马力达到 40672 农业动力消费为 13079，每亩耕地的化肥消费也迅速增长。这一方面表明农业投入的起点很低，但同时也表明农业投入的迅速增长。到 70 年代，投入的绝对水平已经相当高了。为了说明中国农业的相对地位，可以做一个比较：1975 年和 1979 年中国每亩土地的化肥投入分别为 53.8 公斤和 109.2 公斤，1954—1955 年法国的投入量为 72.5 公斤，日本为 219.3 公斤。这说明，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

农业体制则是影响中国农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土地改革以后，中国便急于推行集体化。普遍承认的是，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具有潜在的积极的促进作用：集体化为提高积累、动员大量人力在农闲期间参加水利建设、改善灌溉条件和其他建设项目提供了条件；个体农民的资源在遇到灾害的年景中得不到充分利用，而集体化可以克服这一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在个体经营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多种

① 拉迪：《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载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 170 页。

② 李皮特：《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181 页。·珀金斯：《牵制中国农业发展的几个因素》载《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下卷）第 72 页。

经营——即使进一步的分工更为经济——以便满足家庭的多种需要，而在合作社中，经营体扩大了，在以前的小块土地上可以实行完全的专业化的同时，实现了更大规模的分工与专业化；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限制两极分化。^①

关于合作化能否产生规模经济问题，拉迪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他指出，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来说，使这种观点成立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中国的主张是建立在对这样一些合作社考察的基础上，它们不是被任意抽查的，而是依据一些未加说明的标准选出来的，而且，这些资料没有区分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差异。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在亚洲，小农业的单产总是保持在高水平上，其生产效率通常也很高。集体化没能改善人口与土地的比率，也没能提高劳动生产率。^②

由于许多方面的因素，合作化的积极作用或者没有发挥出来，或者被抵销了：在具体的农业政策方面，由于国家收购部分随着产量的变动而变动，而农民的收入却相对保持不变。这实质上是一种榨取政策，与累进税没有什么差别，因而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集体化本身也在分配、管理和刺激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工分分配体制下，除非每一年都是丰收的并且实物产品稳定，除非政府的收购或农产品的征收也同样稳定，否则农民就不可能对劳动日的价值和收入水平进行估价。作为提供必要安全的一个因素，自留地对农民有着强大的诱惑。这样，集体耕作与自留地之间就劳动力、有机肥和其他资源产生了竞争。从农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它的消极作用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③

① 安东尼·唐：《农业政策与成就》载《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第 494—495 页

② 拉迪：《重压下的中国经济》，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年》第 163 页。

③ 郑竹园：《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91—92、124—130 页。

人民公社体制总的来看是失败的，它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是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的根源。人民公社未能改善人地的比率，只能引起农民的消极抵抗，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在“三级所有制”下，因为公社和大队两级是空架子，要发展公社及大队经济，必然要大批调用生产队的人力、物资、资金，使生产队无力开展多种经营。由于公社与大队是两层脱离生产的行政管理机构，公社可以发号施令却又不负经济责任。再加上脱产干部繁多，平均每—公社脱产人员达 300 人左右，加在农民头上的负担极重，生产队能分给社员口粮，往往只占其总产量的一半。

另一个因素是农业政策问题。沃尔克和艾克斯坦指出，中国农业政策的突出特征就是迅速而经常的变动，没有一个固定的原则可循，农民感到无所适从。中国农业的问题不是变化太少，而是变化太多。在引进技术方面步伐太快，没有考虑到地方的具体条件。土地改革才刚刚结束，强调的重点便转向集体化，把这当作“技术改造”的前提条件。在 1959 年春夏，政府又将注意力转向集体化步伐放慢和农业增长率减缓上，到 1969 年初，又强迫干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农业技术问题。

安东尼·唐指出，中国的经济困难来源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它的即包含着榨取因素又包含着发展因素的农业政策具有固有的矛盾。虽然它的前一部分是成功的，但它的发展部分却明显地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简而言之，中国的农业政策集中在两种思想上：(1)进一步利用现存的资源；(2)动员劳动力以替代资本。也就是说，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增加产量的资源。但遗憾的是，虽然这些资源机会成本很低，但促进增长的能力却是

① 郑竹园：《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第 118 页。

沃尔克、艾克斯坦等编：《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72 页。

限的。新资本投入与技术的作用不是没有认识到。有证据表明，中国试图经济地、尽快地“现代化”。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方案只产生了微不足道的效果。中国从事了一些建设性的现代化活动，如增加化肥的使用量，但这种积极影响却被生产者积极性的挫伤而抵消了，在传统的生产技术下，外延与内涵的递减收益已经逐渐穷尽了。因而导致了 1952—1957 年农业生产的下降。到 1957 年，中国已经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农业增长的传统因素将近枯竭，中国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通过组织生产和动员人力发起激进的运动，同时，通过建立乡镇企业帮助农业满足自己的“现代化”需求作为补充，或者通过加强农业的开发研究与向农业投入资源，进一步实现现代化。中国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它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灾难是可能避免的；错误主要在于计划与贯彻。^①

虽然投资的重点在 60 年代已有改变，并对过去忽视生产农业所需物资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中国所需排灌设备、农业机械与设备、化肥等等，仍远远超过国内供应能力。因此，继续高速度发展这些工业，仍然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必要条件。增加这类产品的产量，是一种非常费钱的事，即每增加一个单位产量，其边际资本需求比较高。所有统计指数都预示：即使中国增加这些物资的投资，农业生产的增长也将逐渐下降。换言之，成本将相当高，而收益却不如预期的那么大。

直到最近，许多农村地区，还不能迅速利用现代工厂生产出来的投放物资。这种情况的产生，部分由于忽视对运输系统的投资，部分由于工业传统的地理布局并无显著改变。中国领导曾试图通过变换城市化模式和控制农村户口向城市迁移的办法，来纠正这

^① 安东尼·唐：《农业政策与成就》载《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第 504—505 页。

些问题。农村地区虽然出现了一些中型工业中心，减轻了对运输的一些压力，可是发展这些新兴城市中心，将大大增加社会管理资本，对增加生产也无直接贡献。¹

再一个因素是管理体制。这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影响中国农业最主要的问题。中国一直在寻求适度集中化，以保证从农业得到预期的剩余产品与技术发明，同时提供适当的物质刺激。但中国领导人几乎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极端：一是过分强调了集中，以至于基层只能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令。这种过度集中和“命令主义”的趋势由于不现实的目标而趋于严重，这些目标有些是强加到集体头上的，有些是集体迫于压力自己提出的；再就是忽视了物质刺激，在集体化时期，吃大锅饭、奖罚不明这种消极的刺激结构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以及土地、劳动力及其他投入的生产率的提高。在影响技术发明和农业生产效率方面，这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拉迪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就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问题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农业政策是决定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农业政策强调对地区和生产的直接的计划的时期，效率就遭受损失，农业生产就受到阻碍。在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的时期（1952—1957年，1962—1965年以及1978年以后）农业政策都以间接计划为特征，更多地依靠价格和较少的直接的中央控制。在直接规定产量指标和推行自力更生以粮为纲政策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农业生产都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

珀金斯对中国的农业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那种认为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加速工业化步伐而造成农业发展相对缓

德恩伯格：《毛以后的中国经济前景》，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1卷（上）第60页 珀金斯：《牵制中国农业发展的几个因素》载《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价》第66页。

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哥伦比亚大学，1984年版。

慢的普通的解释是不对的，虽然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采取了斯大林的模式，但中国领导人从未采取斯大林的牺牲农业的立场。在大跃进后的 1959—1961 年，农业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严重的经济衰退的结果。而且，大跃进之后，中国对农业的投资大规模地持续增加。此外，中国还大幅度降低了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价格，同时还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投资。尽管如此，1957—1970 年农业在国内产值中的比重与 1952—1957 年相比还是更为迅速地下降了。自 50 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六、七十年代，都允许提高农作物的收购价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零售价则维持不动或者有所降低。在这个时期，在工农业交换方面农产品的地位继续得到改善。此外，农业税也没有增加。

他指出，中国农业产量的周期性变化与农业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但政策本身并不能对农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做出全面的解释，技术进步、土地资源和其他投入的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农业政策在技术和投入的有效利用方面产生了影响，对长期增长也有一些影响，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投入和技术将发挥基本的作用。

以下几个因素也对农业发展发生了影响。

自然条件：

珀金斯指出，对农业部门比重相对迅速下降的一种更有道理的解释是，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提高农业产量更为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剩余和土地短缺的社会，耕地面积有限仍然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中国绝大部分可耕地均已长期使用和耕种。要开垦其余土地必须有大量投资。也就是说，投资的增加伴随着边际产品非常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和实际

① 珀金斯：《牵制中国农业发展的几个因素》载《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下），第 72 页

上固定的土地规模。农业增长率没有提高得更快的主要原因，看来只是由于中国试图在基本上不利的情况下取得农业大增产。在耕地面积非耗费巨资不能再有扩大，投入的肥料、水和劳动力已经高度使用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同样的肥料、水和劳动力所得到的收益，将不会是很高的。这里，土地短缺意味着，除非付出非常高的代价，否则就不可能扩展耕地。它还意味着，现存技术允许的范围内的亩产量已接近最高水平，现存土地已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另一个可能的事实是，中国的气候不适合生产有经济价值的热带农作物 如咖啡、椰子和橡胶等。

机械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机械化一直使中国人着了迷。但在集体化之后，因为有富裕的农村劳动力，国家对农业设备制造工业的发展并未给以十分重视。和其他与农业有关的工业部门相比，这一部门所得投资较少，许多重要农具的生产受到了限制。农业机械化是以机器代替人类劳动或提高人类劳动效率的过程。但像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实行精耕细作的国家，它的农业机械化和西方的农业机械化不同，保持土地的高生产率所需要经常解决的任务和其他实行粗放耕作的农业国家也不相同。

中国将近 80%的人生活在农村，而且劳动力增长迅速，机械化将影响到农民的生活，难以为农民所接受。而且，任何单纯代替农村劳动力的机械化，并不能增加产量，只能解放劳动力把它投入其他部门 当然 在农忙季节 机械化能够在诸如播种、收获、打谷等方面减轻对劳动力的压力，使更多劳动力从事其他作业，例如多种一些多熟的作物。但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农作物产量已经很

珀金斯：《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的现代经济》第 144 页；《牵制中国农业发展的几个因素》第 79 页 陈乃润：《毛以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政策、问题的前景》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上），第 299 页。

高的场合，农民可能不愿意搞机械化。而且，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经济上也有困难。它不仅需要大量的操作和维修工人，也需要大量的钢铁和石油，而这些物资在国民经济中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用途。

中国农业实行精耕细作制度，能否提高生产率取决于能否不断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机械化似乎不能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手段。拖拉机和其他农机具，在使用上必须能够和中国农业制度中的其他投放物资起相辅相成的作用，才能适应并成为这一制度中的组成部分。例如，为了不断扩大多熟制，提高土地生产率，就要发展插秧机、脱粒机和运输机。机械化必须是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另一种方式。农机制造是否能符合具体作业的实际需要也存在若干问题，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犁、圆盘耙、条播机和小型专用设备 而并不强调大型机械。

化肥：

化肥工业的增长，是把投资资金优先分配给生产农业部门所需物资的工业的最显著的效果。历史上，中国大量依靠有机肥料，而在农业生产上大量使用化学肥料还是最近的事情。

在六、七十年代里，提高产量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在传统作物上采用良种，结合增加使用化肥。但是，化肥带来的边际产量在 60 年代中期和 70 年代初期确有显著下降。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结论。在其他地方也有大量证据说明，如果种籽的质量保持不变，单是提高每公顷土地的施肥标准，收获量反而会

亨利·格罗恩：《中国的农业生产》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下），第 189—258 页 陈乃润，《毛以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政策、问题的前景》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2 卷（上）第 299 页。

② 亨利·格罗恩：《中国的农业生产》，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下）第 189—258 页 陈乃润，《毛以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政策、问题的前景》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2 卷（上）第 299 页。

降低。^②

水利：

大量使用新种籽和化肥，改种高产作物，推广多熟制，扩大施肥和精耕细作技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搞好蓄水和治水为条件。从历史上看，能否管好水，对于中国农业能否利用有限的可耕地来养活庞大人口，是有决定意义的。中国有一句口号，“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到 70 年代，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已经达到将近一半，而美国、苏联和大多数欧洲国家还不到 10%。^①

治水的某些重要方面，中国人的努力显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大洪水似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治洪和粮食的配给已经大大消除了过去从吃饱到挨饿，又从挨饿到吃饱那种反复循环的情景。在中国南方，水已经不是严重的问题。1949 年以后，尤其是在 1955 年到 1956 年以及 1958 年合作社和公社成立后，灌溉面积扩大了，已有的灌溉系统也经过了修整和改进。在 60 年代，主要的改进是广泛采用电泵代替效力差得多的水车或类似的东西。到 70 年代，华南及华中产米区，再要更大地改进治水工作，其潜力看来已严重地受到限制。至少，这是 1974 年那些在中国的美国治水专家们的看法。将水源引到华北干旱土地上的问题，还是很难办的。华北水利的落后并不是北方地区的努力不够。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几亿农民移走大量的土方、石方，力图解决北方水的问题。但由于不尊重科学，并没有取得什么效益，灌溉面积简直没有扩大。这表明，要根本解决北方水的问题，就要治理黄河和其他北方河流。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但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亨利：《中国的农业生产》，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下），第 189-258 页；

财力。^①

科技：

中国在 70 年代的耕种面积大约与 50 年代中期相等 因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20 年内 粮食产量的增长 主要是由于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耕作的集约程度，而这又是依靠治水的改进和早熟、高产种籽的采用。中国对大米和小麦的培育计划已十分成功，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但是中国最重要的谷类作物——大米的单位面积产量，仍然大大落后于亚洲其他成功的地方，部分原因是国家对种籽的发展着重于早产而不是高产；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肥料的使用水平仍然低于最适宜的标准。含氮肥料的使用水平，甚至把有机肥料包括在内，也远远低于台湾省、南朝鲜和日本。曾经有机会对农田进行视察的西方植物学家经常发现中国农作物含氮不足的症状。

中国的科学能力既是一个力量的源泉又是一个潜在的弱点。文化大革命前，在农业科学方面，着重实际的研究。那时，对于发展新品种种籽的长期研究正在进行，其他的深入研究也是如此。国外的科研成果及科学杂志都在科学界中传播。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报刊上开始指责中国的农业专家为“象牙之塔”里的学者，主张农业科学实验应由农民群众来搞，农业科学家们应该分散到农村基层向农民学习。随后，农业科研机构被大批砍掉，研究人员被送到农村接受实际锻炼。到了 70 年代 这种做法仍在继续 但形式有所改变 要求科学家在农村过几个月以后再回到实验室、教室过几个月。遗传学研究中断大概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最具破坏性的后果，而这种研究，不仅对于改造进口的高产种籽以适应该地条件，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于从国内的基因中培育这样的种籽，也是不可缺少的。根据西

^① 珀金斯：《牵制中国农业发展的几个因素》 载同上。

方科学家代表团的报告，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在精深程度和连续性两方面都是不够的。以研究的精深程度来说，比西方大约落后 25 年，也就是说，差不多还停留在最后一批中国科学家在西方大学留学时所学到的水平。中国的科研政策将严重地阻碍长期有效的农业发展。为了眼前利益，牺牲了长期的深入研究，而这种研究对于获得技术上的突破是必要的。科研工作在地方上各搞一摊，科研的结果只在地区之间进行有限的交流。国内的科学杂志及科研论文很少在地方上传播。

① 陈乃润：《中国最近经济情况与十年规划前景》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 1 卷（上），第 128-129 页。

第二章 两极冲突：中国政治的发展与演变

在西方人看来，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中国与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的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白天黑夜。他们难以理解，何以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代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极端的政治文化呢？

——卢西恩·派伊

《官员与干部 中国的政治文化》

在本世纪内，中国现存的政治系统不可能发生基本的改组，而是它的发展和完善。立法机构的权力将会增大，较高层行政机关的直接选举会发展，政府官员的教育水平也将会持续提高，但真正的多元主义自治的政治组织与独立的政治权力的竞争则不大可能出现。

——洛厄尔·迪特默

《毛以后中国改革的起源》

第一节 概述

相对中国经济研究来说，美国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兴起得比较早，研究的规模和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早期的中国政治研究是以传统的历史方法为基础的。同时，由于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早期的研究很不景气。而在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这一段时期内，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吸引，以当时可得到大量的新资料为基础，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第二代学者开始崛起了。第二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的特征就是发展了许多的理论、模式和概念框架，以便对中国政治过程做一般化的描述和解释。到了 80 年代初，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他们也开始为第三代所取代。第三代学者所关注的是有待解决的新现象，主要研究内容是毛泽东以后的政治经济改革。他们最有利的条件就是他们可以得到这一时期中国发表的报刊、大量的档案，并可以在中国进行广泛的实地研究。新一代学者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将过去发展起来的一些模式加以省略，使它们更为精炼、实用。

一、几种基本的模式

第二代中国政治研究发展起来的研究分析模式种类繁多，十分复杂。大体上说来，应用得比较多的是以下的几个模式。

(一) 倾向模式 (Tendency models) 这种模式将中国政治作为一种中国领导人在不同而持久的可供选择的、思想、政策倾向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这种模式的主要著作包括奥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 和史蒂文·戈德斯坦 (Steven Goldstein) 的《中国的政治范围》、奥克森伯格的《中国动荡的社会》、帕里斯·张 (Parris Chang) 的《中国的权力与政策》以及 B·安 (Byung-joon Ann) 的《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弗朗兹·舒尔曼 (Franz Schurmann)

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等。例如在帕里斯·张的关于中国发展政策的分析中，将中国政治视为“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之间的斗争，而 B·安则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巩固”的压力与“改造”倾向之间的冲突。这种模式主要论述政治过程的参与者，同时也大量地涉及到政策结果。它力图表明各种思想观念和政策取向之间的冲突。

(二) 派别模式 (Factional models)：一种将中国的政治描述为在中国领导人当中形成的各种庇护网络之间的冲突的模式。有关这种模式的论著包括安德烈·纳森 (Andrew Nathan) 的开创性文章《中国政治中的派别模式》以及卢西恩·派伊 (Lucian Pye) 的长篇著作《中国政治的动力学》、《中国政治的常与变》等。这一模式主要论述的是政治决策的参与者，同时也论述政治参与的过程。它假定，领导人被分裂为若干个派别或忠诚的团体，它们是以官僚利益或诸如庇护——依附关系、区域关系、旧有的流派关系为基础的。

这一模式的假设前提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权力问题远比社会经济政策问题更为重要。所谓政治就是领导人之间为了地位、影响和安全所展开的斗争，部分是为了自己，部分是为了他们自己形成的庇护网络。政策只是发挥手段的作用。

(三) 官僚政治模式 (Bureaucratic models)：这种模式将中国的政治生活描述为党政军等各种机构为获得资源和权力而展开的竞争。其中最著名的论述有威廉·惠特森 (William Whitson) 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指挥部中的组织观点与决策》、弗雷德里克·泰维斯 (Frederick Teiwes) 的《中国的省政治学主题与变化》。前者论述的是中国军方中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后者是对 50 年代中期中国各省为争夺稀缺的资源而竞争的分析。

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就是，中国政治的主要分裂在于党政军等机构各种不同的竞争力量。不同的官僚机构在重大政策问题上

采取不同立场。更具体地说，官僚领导人被假设为：(1) 为使其机构得到更高的地位、权力和财政资源而竞争；(2) 在重大问题上采取由这些机构的特定观念和倾向性所形成的立场；(3)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官僚系统外各种社会选民的利益，他们的合作与遵从对这些机构在有关问题上取得成功是重要的。例如，在中国，各省都为得到更多的中央投资而竞争；重工业部门制定和支持有利于该部门发展的发展战略；人民解放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其主要来源的农民的利益。

(四) 结构模式 (Structural models) 对制定政策的机构、组织以及权力与权限在这些机构与组织中的分配进行一般性描述的模式。其中的代表作品包括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鲍大可的《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治权力》等，它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僚政治进行了分析，帕里斯·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策变化的研究注释》和肯尼斯·利伯索尔 (Kenneth Lieberthal) 的《中国党中央会议与中央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等，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工作会议系统作了研究。大卫·兰普顿 (David M. Lampton) 和理查德·萨特迈耶 (Richard Suttmeier) 则对公共保健和科学技术部门的决策结构进行研究。不言而喻，这种模式主要阐明决策的组织结构。它所强调的是与政治决策相关的组织、制度与结构。

最初的结构模式试图从对正式的党政组织结构的详细研究中来推断中国的决策过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得到的资料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在中国主要的决策场所——中央工作会议——并不是按照正式的组织规划举行的，他们由此修改了研究中国政治的模式。

(五) 规范模式 (Normative models)：有关政治生活准则与规范的模式，其中的一些准则与规范来自制约着中国决策的共产主义的教义。有关方面的著作有约翰·刘易斯 (John Lewis) 的

《共产党中国的领导》和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的《毛主义的决策理论与组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等,它们都对中国的有关组织与决策学说进行了研究,弗雷德里克·泰维斯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竞赛规则”》则对中国政治生活中不那么正规的竞赛规则(the rules of game)进行了分析。这一模式主要集中在决策的程序上。

最初,规范模式主要集中在官方共产主义的教义上,试图通过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矛盾学说、认识论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建立一种“运行准则”以后,学者们就不再在官方教义的宣传上下功夫,而是试图证实一种不那么明确但更为有意义的制约中国政治的“竞赛规则”。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种从强调正式的结构和教义转向发现一种不那么正式的决策机制的趋势。

(六)毛控制模式(Mao-in-command models):一种将中国政治描述为由不断变化的毛泽东进行决策的模式,即毛泽东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在忠实的助手和政治局的协助下实行统治,并得到受政治灌输的群众的崇拜。这种模式假设,10亿人的政治生活可以通过对一个领导者的心理和思想的研究得到理解。在有关文化大革命及其起源的文献中包含着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对这一模式的最著名的阐述是奥克森伯格《毛领导下的决策,1949-1968:概述》和泰维斯的著作《中国政治,1949-1965:变化中的毛》。帕里斯·张认为,这种模式过于简单,不足以解决中国复杂的政治发展。

(七)世代模式(Generational models)将中国政治作为不同年龄的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竞争的模式。威廉·惠特森在《军队的世代观念》一文中曾用这种方法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分析,迈克尔·亚胡达(Michael Yahuda)在《中国的政治世代》曾将此方法用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

(八) 利益群体模式 (Interest group models) 将中国政治描述为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群体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模式。其中包括奥克森伯格的《职业群体与文化大革命》、阿兰·刘 (Allan Liu) 的《共产党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群体冲突》、彼得·穆迪 (Peter Moody) 的《共产党中国的对立与异议》。

(九) 合理性模式 (Rationality model): 一种将政治生活视为根据科学方法进行合理决策的过程的模式。它假设一种对不同政策的平稳的程序估价, 对一套连贯政策的选择, 这些都是由一个团结的决策者作出的, 而且选择的标准是提高国家利益。

这种不同的分类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模式的不同领域及他们所以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且会提醒我们留意这一领域的疏忽。

此外, 奥克森伯格在《当代中国政治英文著作书目》一书中将美国政治学家有关中国政治问题的著作归为以下 7 个研究方法或模式: 即历史性的、现代化的、官僚制度的、极权主义的、比较共产主义的、革命社会性的和方法论的。所谓“历史性模式”可称之为“中国之为中国的”方法, 它的重点是有关中国历史的变迁和持续问题; “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将中国视为力求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方法”, 它认为, 中国与其他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 因此, 可称之为“将中国视为印度或阿尔及利亚”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 就特别注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因素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影响; “官僚制度模式”将中国的政府机构与其他所有的官僚制度加以比较, 可称之为“将中国视为通用汽车公司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方法, 它认为“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政权所面对的许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措施与其他国家的官僚制度是相似的”; “极权主义模式”是以“中国最突出的特征是政治组织对整个社会的渗透”这种论点为基础的, 可将其称为“中国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与纳粹德国”的一种研究方法; “比较共产主义模式”是以中国政权的主要特征是共产主义的这种论点为基础的, 这是

一种“将中国视为苏联或南斯拉夫”的方法；“革命的社会模式”的出发点是将中国看作一个正在经历革命的痛苦过程的社会，在它看来，暴力的泛滥、旧制度的破坏、新阶级夺取与巩固政权是任何经历剧变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这种研究模式可称为“将中国视作 1789 年后的法国或 1958 年后的古巴”的方法。最后所谓的“方法论模式”是指因为中国代表一个不能做实地考察研究的“封闭”社会且资料缺乏难懂，使研究中国问题如同解释犹太法典一样困难，它是一种“将中国视为 1940 年末期的苏联或研究犹太法典”的研究方法。

二、模式的特征与局限性

中国政治研究中各种模式的兴衰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复杂多变，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和局限。这些模式的适用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研究的历史时期，例如，官僚模式就很少适用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因为当时的制度结构与程序是不稳定的；这些模式还反映了不同的分析水平（层次）例如，合理性模式最适合国际政治层次，在中国的对外政策研究中趋占支配地位，它更多地适用于中国的政策内容而不是政策过程，首先涉及到中国领导人在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权力模式适合于领导政治层次，便于理解高级领导人的个性、利益及其所采取的战略，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建立纲领作出有关人事和资源分配的关键性决策的权力。官僚模式适合于精英政治，在这种政治模式中，领导者与负责中国主要部门的官僚和省级机构的官员们相互作用。

在这些模式中，大多数模式只是涉及决策的某个方面，例如，组织模式论述作出决策的组织领域；规范模式只论述决策程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涉及到参与者。对中国政治参与者的这种一般性描述的不同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国家与社会。利益群体模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世代模式，都假设非官方的、官僚系统外的团体可以而且确实在中国的政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所有其他的模式都作出了相反的假设：在中国，国家是如此之强大，自决的社会利益的表达被降到了最低程度，政治活动只属于官场上事。

另一方面是它们所描述的中国领导人的动机。倾向模式认为，中国领导人首先是国务活动家和政策的倡导者，它主要论述他们对国家的发展道路的看法。相反，官僚模式只把中国领导人看作是政策的倡导者或热心者，表达他们负责的官僚机构的观点和利益要求。派别模式则将中国领导人描述为“野心家”或“明哲保身的政客”，他们只关心维持或发展自身及追随者的权力。

虽然研究模式种类繁多，但在这些模式中，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运用最多的是倾向模式、官僚模式和派别模式。

关于倾向模式 奥克森伯格曾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观察家”总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研究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国家。文革时期人们观察的主要焦点是：继动乱之后，谁将成为中国的领导人？谁属于哪一派别？哪个派得势，哪一派失去了权力？但事实表明，这种分析方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永远处于安定的边缘，而后走向另一次动乱。因此，奥克森伯格断言，理解中国最好的方法是分析它的思想史，分析其信仰、社会与政策的相互关系。正是思想——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思想——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动力。从更真实的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中的每一次动荡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任何一套观念支配着中国，尽管毛努力要把他的思想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派伊也说：“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大，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要研究中国政治，通常是要从对当时的意

识形态的内容开始做起，无论是儒教、三民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①

“倾向”一词来自美国学者富兰克林·格里菲斯对苏联政治的开创性分析。他在自己的分析中将“倾向”一词定义为：“社会价值观配置的各种可能的取向。”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在中国研究中发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同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60年代末中国使用的一些术语由西方学者加以翻译和校订。中国人将不同思想派别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或革命的”和“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路线。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这种标鉴翻译为更具有社会科学术语色彩的词，如“改造”与“巩固”；“平等取向”与“效率取向”等等，或至少翻译成缺少中国那种带有阶级色彩的词，如“毛主义”与“刘主义”，“激进的”与“温和的”等等。但无论是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中，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都得以保存了下来。

然而，这样一种简单、静止的区分法使得这些概念难以让人接受。洛厄尔·迪特默 Lowell Dittmer 和纳森指出，两条路线斗争模式将中国政治描述为两个持完全对立的观点的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他们的成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相对来说保持不变，对重大问题的立场也相对稳固；而且它还有浓重的道德色彩，不仅将中国政治描述为两种不同的思想之间的冲突，而且还把它看作正确与错误的摩尼教式的冲突。这种模式假定，存在着一种永久的分裂，将领导人分为两个“司令部”（两个组织上不同的非正式的决策单位）两条“道路”（两种不同的政策主张）两个“阶级”（由对立的群众所支持的精英集团）。它和派别模式一样，否认此前人们所接受的中国领导人统一的形象；但与之不同的是，它仅将派别限制在两个之内。此外，派别模式是以领导人最初的联系作为集团

^① 派伊：《中国政治的精神实质》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1968年版 第31页。

形成的基础，而路线斗争模式则假设以意识形态的联系为分裂的根源。

哈丁认为，两条路线斗争模式本质上是中国政治的一幅漫画，最初是由中国领导人作为动员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发展起来的。当然，夸张是中国政治风格的一个特征。两条路线斗争只是倾向分析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第二位的、一般的表现形式，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久以后，西方的中国政治分析家试图创立一种更有力、更客观、更有价值的倾向模式。这种修正的模式不是将具有不同倾向的集团描述为具有固定的成员，不认为他们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对立的，不对他们进行道德方面的分析，同时，也不仅仅将他们限为两个不同的集团。虽然这种模式仍然具有简化的特征，但它们不再采取漫画式的政治形式。例如，奥克森伯格和斯蒂芬·戈德斯坦将中国的政治领域分为四个持不同思想的群体：“西方化的中国人”、“有选择的现代化的倡导者”、“基本的保守派”、“军方的原教旨主义者”。多罗西·索琳格(Dorothy Solinger)则根据中国领导人的经济发展思想将他们做了“改革派”、“调整派”、“保守派”的区分。哈里·哈丁则有“乌托邦主义”、“发展主义”、“自由主义”之分。帕里斯·张将中国的发展政策作为“保守”与“激进”势力之间的斗争来加以分析；而李希腾斯坦将中国领导人做了“保守派”、“强硬派”、“左派”、“自由派”、“右派”之分。

李希腾斯坦进一步分析了改革前后之间的区别，指出，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的政治力量总的来说可分为“左派”和“右派”。左派信仰继续革命原则，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而右派则信仰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将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优先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

迪特默：《理论与实践中的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反思》，载《中国季刊》，1977年12月，第675—712页。纳森：《中国政治中的派别模式》载《中国季刊》，1973年2—3月，第24—66页。

上。在改革时代，这种派别的区分更为复杂一些，因为它包括了一些在政治上比较保守，而在经济上更少激进色彩的人物。因而，左派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在政治上的毛主义者，第二种类型，经济上苏联模式的保守分子。哈丁则将第二种人称之为“复辟主义者”因为他们希望回复中国 50 年代的那种苏联经济模式的稳定状态。而右派则是那些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以及为此目标而愿意“自由化”和社会决策过程分权化的领导人，他们希望在资源分配上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中央计划者的作用。他们更为实际，为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惜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制度。这一派也比较复杂，因为他们在共产党的社会作用时题上存在着分歧，一些人不仅要改革经济体制，也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另一些人只赞成经济改革。^①

显而易见，这些新的倾向模式中有许多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学者们所分析的时代不同。奥克森伯格所分析的是 1840 年到目前的中国历史；哈丁只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索琳格只分析毛以后的改革时代。相应地还在于他们各自研究的着重点不同。遵循费正清的观点，奥克森伯格和戈德斯坦认为，中国的历史是由确定中西方关系的基本问题所形成的，而索琳格则将选择适当的发展道路视为基本的问题，而哈丁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上。

这种研究模式强调政策本身及政策过程的行为者。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包含着比较分析的方法。例如，奥克森伯格和戈德斯坦对 1949 年前和 1949 年后的中国做了比较；哈里·哈丁以及索琳格则对中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的分析方法可以使人们对许多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

李希腾斯坦：《处在边缘的中国》，普里格出版社，1991 年版 第 93-97 页。

这种方法缺陷在于，它是高度抽象的，在这种模式中，所有政策问题的争论都可以理解为领导人之间基本的思想上的分歧。而实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政策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只是更大、更全面的政策问题的一部分。而倾向模式则是将复杂的现实简单化了。

它的高度抽象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它只分析思想——政策、哲学、和纲领——而不是在政策过程中实际相互作用的具体的个人、群体和组织。它不能一贯以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析为基础，因而不能对斗争双方的社会政治基础作出理解。“确切地说，倾向分析与其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分析不如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分析。”它将中国政治描述为一种空洞的思想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现实的社会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一些学者在评论这个模式时说，这种模式对中国政治采取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它对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太过认真了，认为他们都从事于对重大事务的合理性分析。许多学者指责说，它忽略了中国政治中的阴暗面，即中国领导人在为权力而斗争，而政策和纲领在权力斗争中至多只是发挥一种工具的作用。

最后，这种方法也不能将竞争集团的最终目标或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与他们实际采用的政策区别开来。实际的政策变化远比竞争集团的言论的变化更有意义和更为稳定，这种模式是按照政治参与者所倡导的政策，而不是按照他们所实施的政策来确定他们的集团的。毕竟，它是一种关于决策的参与者而不是决策的结果的模式。

派别模式对中国政治分析专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许多专家认为，它对于理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关系”的重要性极有帮助。它同共产主义中国政治在本质上是人格主义这样一种解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证明这种方法是很有效力的。

汉学家当中的一些人对中国政治生活中各种“关系”是有些着

迷。多数人指出，“关系”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卢西恩在其著作中所说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不变因素”即是指派别。费正清就这个问题论述说：中国很大，地方的利益有很大市场，这很容易产生派系。另外，这个国家把个人的行动，包括人的关系，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一个派系等于是由某些人和某个领导的支持者组成的。在一个法律和上诉程序不完备的社会，派系斗争显得特别激烈也是很自然的事。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举例来说，在美国，有组织性的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和犯罪集团以及大小工业都是一些组织网。它们各处其位，各尽其能。在中国，政府提供一切就业机会，提供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对象，规定所有工业生产的目标，这种作法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要求太高太多了，而且这肯定会惹出麻烦。^①

但这种模式在实际运用中有一个具体的困难，那就是如何划分派别，如何确定具体的个人属于那一个派别。就这个问题而言，有关方面研究的多数结论与其说是基于及时可靠的证据，不如说是基于言传、历史关系，甚或是主观臆断，一些人则根据领导人的政策主张作出判断。但事实上许多专家不得不承认，政策与派别的关系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在这种模式中，人们看到的只是，领导人从事政治是为了追求权力和特权，是为了这些目的而玩世不恭地操纵权力。与倾向模式相反，派别模式对中国政治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

但是，这种模式没能说明，中国政治为什么以一些持久的不同政策之间的对抗为特征。如果政策只是追求权力的一种手段，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政策——农业中的物质刺激与集体主义以及工业中的动员与财政平衡，等等——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

^① 《费正清谈中国》载《编译参考》编辑部编：《美国人看中国》，1987年版。

实际上，就连他们自己也认识到，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安·芬维克(Ann. Finwick)在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派的崛起与灭亡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虽然以某种方式结为一个派系网络，但他们的行为并不符合派别模式。他们采取的政策立场与其说加强了他们潜在的基础，不如说削弱了这种基础，这些政策明显地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虽然事实表明如果采取比较温和的方法他们的政治前途也许会更好。

官僚模式也是一种正在迅速发展、广泛流行的模式。这种模式据说最符合对中国政治基本特征的理解。因为，几乎所有的专家都特别强调，中国的政治多少世纪以来在本质上就是以官僚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就是官僚官员；立法机构、法院、新闻机构、普通群众只起很小的作用。在当代中国，中央工作会议是主要的决策者，这些会议的参与者都是中国主要官僚机构的代表——各部委、党的机构、军队各部门以及各省的党政机关的领导。因此，在汉学家们看来，中国政治首先是这些官僚机构的冲突这样一种概念完全符合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一些学者已经从研究中国的政策程序转向不同的官僚机构在社会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大卫·兰普顿指出，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思想意识、自己的使命感以及对解决稀缺权利的优先倾向。每个部门都认为，它的目标体现了普遍的利益。每个机构都害怕它不能得到充分的注意，担心它的利益被忽视。他还进一步指出，官僚机构在中国政治的重要性归因于相应的组织对于在其中工作的个人的重要性：机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工作地点，它还决定着一个人的住房、下一代的教育乃至个人的整个生活。因此，在中国，对机构的留恋、机构意识，以及对机构变化的抵制极为强大。

但这个方法也有许多缺陷。它不能从中国的新闻媒介中得到

不同官僚机构的立场。在确定竞争中的官僚机构这一点上学者们也难以达成一致，例如，有的人的划分方法比较粗略，将中国的官僚机构分为党政军；有的人则按部就班地按照中国业已建立的机构将它们划分为各个机构和部门。而实际上，它们的划分和利益要求并没有如此明显的、严格的分界线。因而，这种分析方法难免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色彩。

另一些问题性质上更为严重。首先，官僚机构内部的分歧似乎并不比机构之间的分歧少，例如，研究人民解放军的学者经常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苦恼，军队在许多问题上有多种声音。这表明，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官僚机构的界限并不是最突出的分裂线，在一些问题上形成的同盟或许是跨机构的。

哈丁指出或许学者们会发现那些经常调整和重建的、或者比较新的机构利益不会很强大；在政治上不很敏感，老机构更有能力发展自己或许他们将发现在对一些政策问题的看法上比较大的机构比较分散，而比较小的机构则比较统一。

三、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向

中国政治研究中有关这些方法的争论持续了十多年之久，并没有明确的结论，它们各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自己的缺陷与片面性。学者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以适当的方式来应用这些模式。

（一）选择法 (Selection)

一种方法是，以牺牲其他模式为代价，选择其中的一种模式，派伊的《中国政治力学》就应用了这种方法。他对许多模式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治集团的基础是宗派主义，并提出了他所谓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权力至上”观点。他认为，官僚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这一体制还没有制度化到官僚们足以维持他们的利益的程度。而就世代模式而言，同一代人

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并非一致。政策倾向的表白只不过是冲突双方的领导人“要试一试人们的忠诚，强迫人们在双方之间做出选择”。为了证实“影响宗派斗争”的集团，他列举了军队、农村干部、宣传干部、经济计划者等等。换句话说，他列举了中国社会中一些最重要的官僚利益集团。但是，派伊的这一结论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因为他的证据和例子主要取自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方法对相对稳定的时期是不适用的。事实上，当他转向毛以后的更为稳定的年代时，他已经转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

邹说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半批评纳森说，纳森过分强调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宗派主义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他，而后者也承认，中国共产党精英内部的联合与冲突方式也许已经发生了变化。

总之，这种选择法只是对特定情况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例如，很明显，毛控制模式显然不能用于毛以后的时代，而官僚模式则不可能应用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二）排列法 (Sequencing)

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一些学者选择了另一种方法，即确定一种编年史式的排列方法，即对不同的时期运用不同的方法。费雷德里克·泰维斯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利用不同的模式描述了不断变化中的中国政治生活的各个转变时期，并做出了如下的结论，官僚政治模式最适合于政治相对稳定、领导相对团结的时期，如在 50 年代中期。倾向模式最适合于紧张的政策辩论时期，如 60 年代初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辩论。派别模式和社会利益集团模式有助于理解紧张的斗争和大混乱时期的中国政治，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和 70 年代初期。

但是，这种方法仍不能赢得学者们的满意，因为，即便这种方

① 泰维斯：《中国政治中的竞争规则》载《中产主义问题》，1979 年 11—12 月 第 67—76 页。

法也是对现实的一个极大的扭曲。问题在于，一个模式只有助于阐明一个特定时期的大致轮廓，但另外一些具体的社会现象就被忽略了。例如，50年代中期被普遍认为是官僚政治时期，但在这一时期不同的倾向也同时出现了，如对经济计划和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争论。又如，在60年代初期，虽然是典型的发展政策倾向时期，但在党内和军队内部，官僚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总之，这种模式也不足以适应政治生活的多维现象。

（三）综合法 (Synthesis)

最近，一种更为流行的方法是综合方法。它认为，各种模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说明了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例如，就派别模式和官僚模式而言，从纯粹形式上来说，它们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安德鲁·纳森指出，正式的组织机构为宗派主义的成长提供了条件、框架。换句话说，领导人可以在他们负责的官僚机构内寻求一个紧密的庇护—依附网络。这反过来又使业已形成的宗派代表着相应的官僚机构的利益。邹说也指出，一旦宗派在官僚体系中形成，“就会增加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非正式的集团事实上也同样具备了该机构的特定的思想，以及该机构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体系中的普遍思想的某些成分；他们的行动目标不仅仅是扩张这个非正式集团的权力和物质利益，而且也是由这个机构的正式的目标所形成的。”又如，就派别模式和倾向模式而言，不同的派别会通过不同的政策倾向来号召它的社会力量。就倾向模式和官僚模式而言，不同的政策倾向会来源于不同官僚体系的观念和取向。许多汉学家在运用这种综合方法上面做了大量的研究。^①

这种模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如哈姆琳在《中国与未

邹说：《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非正式集团研究》载《中国季刊》第98-114页，1976年3月。纳森：《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派别模式》。

来变化中的政治模式》和迪特默在《革命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当中都使用了这种模式。

迪特默根据两个变数对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政治做了概括：权力的配置与协议的配置。前者可作等级与社团的排列，后者可作团结与分裂的排列 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协议配置	
		分 裂	团 结
权力	等级	组织纪律	同事中居首位者
配置	社团	宗派主义	集体领导

决定这两个变数配置的因素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正式的官僚地位与非正式的关系网，中国人称之为“政治基础”。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权力分配明显不同的是，在中国，正式的官僚地位是最不重要的。可以说，要想在决策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它是必要的条件，但不是充要的条件。因此，将一个人从官僚职位中清洗掉就可以从权力角逐中消除一个对手，但只要他的基础没受到触动，他甚至能在清洗后恢复元气。在中国，政治基础的重要性是政治生活的人格化和正式制度化程度的一个函数。如果一个人的基础比其他人既广且深，那么权力的分配就是等级型的；如果若干人具有相当的基础，那么权力的分配就是社团型的。正常情况下，政治局成员可达成一致，特别是在权力的分配是等级性的而经济运转又顺利的情况下。但至少在两种形势下将会产生对抗性的分歧。

第一种情况是路线错误：也许由于实践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过分夸张了他们对历史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科学认识，路线错误一向被认为是进行清洗的充要条件。因此，虽然在广泛一致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最终证明是错误的，但斗争的规则是要

找出一、二个替罪羊来。

第二种情况是继承危机：在继承危机中，领导人的选择对于他们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继承问题相对地是一个纯权力—政治问题，因此，当不同的领导人被列入考虑的范围时，派别阵线容易发生很大的变动。继承危机也可以为政治创新提供机会，如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解放后毛的任职期间，政治局内的权力分配总的来说是等级性的，而在 30 年代当毛不得不同他的对手王明、张国涛等人分享权力时，则似乎更多地是一种社团性的分配。建国后最初的对抗性分歧是在 1953—1954 年发生的，它导致了对高岗和饶漱石的清洗，因为，他们似乎对刘少奇、周恩来的地位提出了挑战。1959 年，领导人内部就大跃进的责任问题又产生了争论，彭德怀成了替罪羊。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许多分歧主要是围绕着继承危机进行的。在毛以后的时代，开始时是集体领导方式，逐渐发展为同事中居首位者 *primus unter pares* 的领导方式。^①

将这些模式综合起来就会得出如下的普遍的观点：

1. 中国领导人既考虑权力也考虑政策。为了得到和维持权力，他们必须形成和提倡对一些机构具有吸引力的政策；为了追求有利的政策，他们必须建立和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

2. 在中国，权力的基础既是正式的，也是非正式的。也就是说，领导人既寻求官僚的权力基础，使其具有正式的权威；也寻求派别的权力基础，从中使用一种庇护关系；还寻求社会的权力基础，以便在周期性的领导冲突中动员这些力量。因此，要理解个别领导人的谋略和活动，就必须通过派别的模式、官僚政治和社会利

^① 迪特默：《革命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四十年后的中国》。

益群体。

3. 在中国，国家和共产党在社会中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然而，作为一种官僚机构，作为各种社会与经济政策的目标，作为领导集团与同盟的潜在的社会，社会集团也有一定的影响。

4. 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权力基础的不同成分的不同要求的压力。他们对这种两难境地的反应将部分地取决于所考虑的问题。官僚的利益在日常政策的考虑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宗派利益有时是出于个人的考虑；社会利益有时来自领导人的冲突。

5. 一些领导人会同另一些领导人形成一种长期的同盟关系，这种同盟的基础通常是共同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经济纲领，或共同的政策倾向。这些不同的观念和纲领提供了各种领导同盟所提出的政策的粘合体。在广泛、长期的经济计划和长期的权力斗争中，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6. 领导者与领导者同盟会与其他领导人或同盟形成短期的联盟，通常是为了追求特定的目标，如击败其他领导集团或采取特定的政策纲领。^①

第二节 “惯性”：中国的政治文化

一、当代中国政治中的观念体系

这是汉学家们研究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前一节介绍的“倾向模式”实际上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奥克森伯格在《中国：动荡的社会》一书中对当代中国的观念体系的基本内容作了最全面、最权威

哈里·哈丁：《中国政策过程的不同模式 种类与估价》载张京育编《大陆中国发展透视》韦斯特维尔出版公司 1985 年版 第 61-83 页。

的概括。

传统的观念体系 中国传统观念的范围是广泛的，这里不仅是指儒教，道教和佛教，而是多种哲学思想的结合体。它的主要概念就是对下述价值观极为重视 秩序、等级社会 和谐、忠诚与中庸观念；与自然和睦相处；家庭的中心作用。按照传统的信念，人通过社会行为得到精神的满足。但他的社会角色是受到严格规范的。他不应该改造他的社会，而是发挥人们期望他所发挥的作用。每个人生来就从属于他理应尊敬的义务网络。尽了这种义务的便获得了满足，同时也促成了别人的义务。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遵守了他的义务时 社会就会得到和平 井然有序。

这种文化的特征是明显的。它避免公开的冲突，鼓励相互依赖，压抑独立思想和行为，讲究礼节。它强调的是依从而不是主动性。人们渴望成为一个社会工程师，而不是开发自然。教育体系是培养多面手而不是技术专家。在经济方面则追求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系统。人们不期望福利的逐年改善，而希望他们的家庭能够得到一个固定馅饼的相对增大部分。在当代中国，虽然没有一个领导人公开提倡传统的价值体系，但它的潜在影响是很大的，对毛的神化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革命的观念体系 这种思想观念与传统的思想观念是长期共存的。它在不断的农民起义中涌现出来，并在 20 世纪初由于从西方和日本引进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毛泽东则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突出了它的意义。革命的观念强调财富与收入的平等分配，它对人类通过意志来改变社会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它认为 中国的群众 特别是农民 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因而轻视精英的领导作用。它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的改造，而不是对环境的技术改造。它认为，人类的罪恶根源是人对人的剥削，这种剥削是贫穷和疾病的根源。它反对那些它认为是从事剥削的社会集团 特别是商人、官僚和知识分子及城市居民。

改造人的思想是革命的思想观念的中心问题。本质上，这种观念怀疑组织而倡导自发性。在它看来，组织的纪律与控制经常妨碍人们从经验中解脱出来。参与自发性的集体运动被认为是切断了个人与过去的联系，使他得到同代人的团体感。这种观念所期望的乌托邦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中，剥削才会消失。它力图消除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心理障碍，将城乡差别保持在最低限度。中国的革命观念的另一个方面是地方主义。它拒绝外部世界与中国现实需求的相关性，强调中国人民改造社会的内在能力，同时贬低外援的价值或必要性。

这个政策从中国政策的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官僚必须不时地参加体力劳动，以打破脑力劳动的障碍；建立乡镇企业以削除城乡差别；取消军衔制；教育与宣传机构主要是改变态度而不是传授知识 强调自力更生。

中国为什么会强调革命的观念呢？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在毛以前它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民粹主义、平等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冲动从广大的乡村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在人类历史上，农民阶层表现出二元的倾向——他们通常是保守的，但也能够转向暴力的、激进的运动。在中国，农民总是激烈地要求改变他们的艰难处境。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依靠农民取得的，它的农民成分也比较多。因此，在革命 20年后，使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些社会阶级观念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就不足为怪了。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工业化过程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广泛的社会不平等，这使许多人在受益之前就感到了它的危害。

技术观念体系 这种观念所提倡的是人之于自然的优越。在这种观念中，科学技术可以使人们控制并改造其物质环境，可以消除贫穷和疾病，还可以为人们提供改造社会与政治的能力和需要。因此，技术观念产生了加速技术发展、工业化和生产的政策；它鼓励怀疑主义、大胆的实验和个人的首创精神。这种观念对人

的判断是根据他的技术能力和成就，而不是他们的个性、品行和背景。与其说是鼓励人们去完成社会义务，不如说是号召人们通过改变物质条件来实现他的潜力。一旦这种观念占居了支配地位，人们就会期望并努力改善经济条件，社会就会变得更富有创新性。它同时还提倡一种解决问题的经验方法。在这种观念中，经济活动会更加务实而不是主观。

这种观念在中国比较新，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它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信仰，首先是因为它能使国家强大。那些利益与之相关的人——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职业军人、熟练工人——逐渐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并在最高领导层得到了响应。在中国，这种观念的社会与物质基础已经发展起来了，但在一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国度里，没有一个赖以移植的基础，它是不可能占支配地位的。

官僚主义观念 这种观念绝不是理想社会的观念。由于认识到手段会影响目的，它更多地集中在维持和发展社会的必要机制和程序上。这种观念强调，人的福利取决于他从事复杂工作的能力。因而要求对每个人的工作进行分工，并发展用以协调这些工作的机构。因此，这种观念鼓励发展为机构的有效运行作出贡献的美德——忠诚、合作、服从与效率。此外，组织内的生活成了个人满足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报酬、级别的关注及社会中组织声望与权力的关注就成为这种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观念中，权力属于组织而不是人。它的魅力在于，它强调法制，可使公民免遭滥用权力之苦；它的缺陷在于，它会导致推卸责任、易犯错的官员、僵硬的规则、惰性和贪污腐化等。

在中国，强大的官僚思想的存在是有其客观基础的：地方传统文化的多样化、缺乏现代化的通讯与交通系统、分割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经济体系及其庞大的人口。只有一个复杂的政府机构才能保持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意识之

所以为列宁主义——本质上为组织意识——所替代是不足为奇的。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这种观念首先得到了官僚，尤其是负责党的机构的官僚的发展和支

持。极权主义观念体系 它提倡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否定自治与自由，提倡一个意志坚强的独裁者通过各种手段——政党、宣传机器、警察军队、教育网络、企业——按照自己的理想对社会进行改造。整个国家只对统治者的恐惧、希望、能力和情绪作出反映。“政治是统帅”是对这种形势的恰当的描述。极权国家的倡导者有两个基本目标。第一，他们希望尽可能地分散他们的社会，使每个人都隔离开来从而使其服从政治控制。第二，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尤其是一个全能的行政机构。这两个目标的焦点是权力。

在中国，这些价值观念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例如，传统与革命的观念关于理想社会的看法是全然不同的，但它们都强调人的社会性，提倡培养多面手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与技术观念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但他们都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极权与官僚观念都强调国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但前者希望一个不受节制的国家政权，后者则希望法治。这些观念在许多方面又是互相交叉的：传统与官僚观念都重视权威、等级和纪律；官僚和技术观念都强调专业化、能力和秩序。传统的、革命的与官僚的观念都赞赏人改造社会的能力。汉学家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些观念的交叉才使得各种观念的信徒结成同盟。

中国思想文化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中影响巨大而在中国缺少的是：(1)强调人与超自然的生物关系的重要性的神权政治观念（中国的佛教除外）；(2)将个人自由放在优先地位和尊重多样性、多元化社会的自由民主观念。其次，与各种观念相关的历史记录。传统的观念由于国家的强盛时代而得到认同；技术观念被认为是西方的，因而是

不情愿地接受的——如果表明是中国的就极容易接受了。革命观念将现代官僚与旧中国的品级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因而对它持深深的怀疑态度。革命观念对中国的青年有特殊的号召力，因为它与“五四”运动、抗日运动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是自由民主传统的薄弱和对希特勒、斯大林野蛮行径缺乏了解使中国人对极权主义的恐怖没有太深的感触——至少在他们亲身经历了各种运动的残酷性之前是如此。第三，表现在各种观念地位方面。革命的观念具有突出的力量。

二、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对立因素

费正清说：从一个政策的极端到另一个政策的极端，这种摇摆，是中国的特征。在毛泽东主义的时代里，各种运动有时采取了一种路线，造成了过火的影响，然后又通过一个新的运动，加以改正。也可以看到革命动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交替。派伊也指出：在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中国与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的中国这两者之间，尤如白天黑日的区别那样明显。因此，西方人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社会、同一代人，为什么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形式？^①

派伊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政治摆动的主旋律也表现出奇异的特征。世界各国的政治总有“左”、“右”之分，但中国则不同，它要复杂得多。中国政治的主旋律不是左右的摆动，而是上下的波动。这个两极包括在一个极端，是强调一致、约束性的中央控制、正统的信仰和纪律。在另一个极端，则是最大限度地容忍个人的主动性、控制的放松、分权和摆脱正统的解放。中国的政治主要是组织

^① 奥克森伯格：《中国动荡的社会》，1970年版，纽约：美国对外关系协会。

^②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33页，派伊：《官员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88年版，第36页。

等级内部的紧张，因而是中央化与地方化、正统与异端之间的冲突。^①

专家们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容纳的因素。

奥克森伯格指出，从更真实的意义上讲，中国的动荡反映了上述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观念没有哪一套能支配着中国，尽管毛努力要把他的思想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本杰明·施瓦茨指出，在占支配地位的儒教传统中，包含着若干种对立的两极，它们构成了不同政治文化的基础，儒教文化中的这种冲突的两极因素主要包括：自我修养与社会秩序、现实中的内在王国与外在王国、行动与知识。弗雷德里克·W·莫特(Frederick W. Mote)深入研究了儒教传统中的隐士哲学，这种隐士哲学为官场上的官员和隐退的隐士接受出世与入世这种极端的个人行为提供了基础。总之，在儒教中存在许多学派，它们可以为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提供基础。^②

卢西恩·派伊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中的对立因素做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的两极表现在正统的儒教和非「统的道教、佛教以及具有地方色彩的各种信念中。前者是赞美学士权威、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儒教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推崇教育，反对神秘主义，要求建立以理性、法律为基础的有秩序的社会结构，它得到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和维护；后者是一种神秘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道教佛教混合体，它赞美反抗、神秘地改造社会现实，它使平等主义的价值观理想化，动员农民造反，蔑视正规

① 派伊：《官员与干部 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39 页。

奥克森伯格：《中国：动荡的社会》，第 4 页 施瓦茨：《儒教思想中的某些两极》载大卫·S·尼维森、阿瑟·F·怀特编《行动中的儒教》斯坦福大学，1959 年版，第 50—62 页 莫特：《元朝的儒教隐士哲学》载阿瑟·F·怀特编《儒家的追求》斯坦福大学，1960 年版 第 202—204 页。

教育以及那些认为自己比普通人高尚和聪明的人的主张，往往把信仰万应灵药和有魔力的口号作为政治事业的准则。^①

历史上，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彼此间相互容纳的趋势所制约，这种容纳通常是以隐晦、迂回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在思想与行为之间经常就有一种奇异的、固有的矛盾：政治精英们宣扬儒教在行动中的重要性，而在实践中他们却带有道教的无为色彩；百姓们自称信仰道教的无为思想，但他们的行为却符合儒教所要求的勤勉精神。在传统的中国和毛泽东的中国，通常采取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形式逃避正统。因此，在两种文化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调合。

这两种文化还存在两种共同的特征，这种特征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它们延续了几个世纪，以及为什么它们能够长期共存，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摧毁另一个。首先，两者都接受这样一种思想：最高的统治者无论是皇帝还是“王”都具有神圣的或神秘的一面。但需要说明的是，两者之间的神秘的共性并不掩盖两者在对其他尘世事务的信仰程度上的区别。反抗文化，如毛主义，具有信仰的激情，而儒家，如邓主义者，则更多地受他们的思想主张的束缚。历史上，中国人一般的理解是，狂热的、有魔力的宗教信仰是一种激发反抗运动的力量，它很像当代中国在毛主义文化中所看到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激情。正如无神论者儒家认识到不受约束的宗教的激情与迷信一样危险那样，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邓主义者也对意识形态的动荡失控感到恐惧。

其次，这两种文化都将“和谐”理想化为最高的价值观。和谐的概念使两者都强调群体之于个人的重要性。然而，两者之间在和谐的概念上是存在着区别的：强调个人修养的儒教中的精英主义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余地，它有时接近认识到，个体

派伊：《官员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39-40 页。

是与文明世界联系在一起、而群体行为是与野蛮状态相联系在一起。在儒教看来，大众文化是具有群体取向的，因此感觉不到野蛮状态的危险。因此，在儒教中，和谐首先是与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与社会的统一；而在道教中，和谐是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最终的目标则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一致以便合而为一。

在当代中国，毛主义与邓主义这两种共产主义文化并没有明确地赞扬和谐。的确，毛赞美矛盾与冲突。但实际上，他的最终理想是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与传统上的反正统的政治文化所提出的目标有所不同。邓主义者也像儒家那样，在追求政治目标时需要每个人都趋向一致，并达到思想统一。

但在历史上更具有意义的则是它们的区别。崇尚“权力主义的社会责任”的儒教与“自我取向的无政府主义”的道教保持了各自的特征，其冲突有时是非常激烈的，甚至是血腥的。但它们都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两者间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它奠定了毛泽东的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邓小平的现实主义这两种矛盾的政治文化基础。

那么，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为什么能够适应这两种文化的冲突所产生的剧烈的变化呢？派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首先，是社会结构上的因素。虽然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中国社会是组织在一个小的、密切的、面对面的群体当中，即家庭和单位。当变化来临时，每个中国人不必受到大的、非个人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转变。通常，他们可以通过良好的、熟悉的关系来改变自己的行为角色。

其次，是心理上的因素。美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表现出他们永远是言行一致的，而中国的政治家就没有这个必要。在中国，无论是领导人还是他们的追随者，很少在认识不一致上遇到麻烦，因为

他们认为：环境上的变化能够而且应该产生态度与行为方面的变化，至少这种观念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不同的文化对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影响，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一个人可以在作为毛主义文化的热情参与者之后迅速转化为一个邓主义者，并且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不自在。

最后，中国文化中对响应形势的逻辑有着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被一种有时似乎采取一致特征的现实主义所引导。^①

三、国家、个人与社会

派伊指出，传统的与当代的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两者都强调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秩序是其他社会、经济、法律等秩序的保证和前提条件。从历史上讲，中国从来没有发展这样一种概念，即政府的权威应该受到制约，以便使政治以外的人类关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受到尊敬。在欧洲，甚至从中世纪起，就对在同一社会中各种不同权威系统的共存的可能性给予确认。无论是在世俗领域还是在精神领域，都已经有了各种不同角色系统的专业化，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动力和纪律。商人、放贷者及银行家等都必须遵循其行业的逻辑，国王、士兵等也是如此。甚至在深受中国思想影响的东亚，在受到西方影响很久以前，从其中央封建主义的特殊形式中就发展了一种将经济与社会领域分开来的意识。在日本，人们也承认，应该尊敬经济规律，有必要遵从“经济法则”，不能只肯定政治权力的力量。而在中国，自治的经济系统的概念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仍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支配地位，并且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政治意识形态足以处理所有的公共问题。中国的干部们要以经济理论作为确定政策和优先项目的一个

适当因素是非常困难的；对他们来说，不懈的政治动员就可以制约公共生活的各个因素。因此，当共产党掌握政权并确定他们的目标时，当他们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当他们发动大跃进时，他们总是低估经济现实，过高地估计政治控制的效能。经济学家们没有权力和地位，而政治家们则在经济理论方面近于无知。

派伊在分析中国极端强调政治权力的原因时说，主要的因素之一是这样一种信念：由于权力可以服务于多种领域，其他因素的缺陷可通过政治权威的运用来弥补。政治权力可以毫无疑问地阻止和扭转社会与经济力量这一事实，通过阻碍商人或是通过控制知识分子，似乎将中国人错误地引向这样一种观念，即政治权力可以轻易地用于建设性的发展。在当代中国，政治权威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反映在意识形态教条与专业技术的基本冲突上。“红与专”问题不过是政治生活制约其他社会生活这一传统观念的现代形式。^①

与其相应，中国政治的另一个独特性表现在政治活动的范围上。在中国，官位级别以及正式的官职高度地反应了相对的权力的现实。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传统的国家，都不像中国那样，政治活动只被限制在官员的世界里。现代的政治学家认为，政府只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正是由于政治活动只属于政府、官员们只关心他们的信念这一事实，使得中国政治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异常敏感并执着地抵制。中国政治的这一特征为中国的政治结构为什么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这一长期困扰中外学者的问题提供了某种答案。

派伊指出，现代化的趋势要求社会分工，依靠先进技术的现代企业倾向于更广泛的结构性和、更高度的分权化和不同领域的更多合作。因此现代化的压力将会对维持单一结构的政治系统产生威

① 派伊：《中国政治的精神实质》第 13-16、24-28 页。

胁。

官僚等级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神实质。如果中国政治不是以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等级和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为特征，中国人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不满意和不安全。首先，对等级与意识形态的极端强调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任何明确承认的和法律上接受的政府与私人利益之间的联系，人民与官员、普遍的要求与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实际生活中，政府与私人利益的界限趋于一种绝对化。任何人，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承认，私人利益对政府没有合法的要求。不存在以民间为基础的权力群体，人们接受的教育是，对政府提出任何私人利益的要求都是错误的、危险的。任何基于私人利益的有组织的压力和要求，一旦公开表达出来，就会被认为是对公共和平与秩序的威胁。对于政府，人民应该是服从而不是要求。这就是说，利益的表达和利益的聚集永远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并从属于正统的意识形态。

如果用结构-功能分析的语言来表达 那就是说 政府的功能不包括对“社会投入”的加工，并将其转化为公共政策。中国人从来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就包括合法的利益，这些利益是竞争性的、矛盾的，但它们可以在政府内得到合理的表达，并期望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响应。在理论上，不需要利益团体的政治活动，因为如果官员们认真地遵从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行为法规，他们的活动将保证正义得到申张，社会各阶层得到公正的待遇。政府的道德正义为利益表达和代表问题提供了绝对的答案。因此，家长式统治就成为政府的最高理想，而贪污腐化也就成为困扰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长期问题。

① 派伊：《中国政治的精神实质》第 13-16、24-28页。

② 派伊《中国政治的精神实质》第 16-19页。

同样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还是组织的垄断者，每个组织、社团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归属于政府之下，要不然就被认为敌对于政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危险的。从历史上看，非政府组织只有秘密结社和各种同业行会，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一些自卫性的团体是允许存在的，而一旦它变成一种压力集团时，政府就要将其解散。出自民间的组织被认为是充满爆炸性因素的。政府历来只不过是稀疏而分散地凌驾在广大民众之上的行政和司法官员构成的薄薄的一个阶层，作为统治者，与其说是依靠其实力，还不如说是依靠其威信。因此，任何一个能够控制民众运动的新兴组织的产生，都构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只有在它形成之前就将其摧毁。同时，一定程度上还是因为组织总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像公民对统治者效忠一样，新兴的组织意味着新领袖的出现，而新兴的领袖就构成了原有统治者的事实上的对手。结果便是：过去一个长时期以来，所有新兴的组织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①

一些专家从这个问题出发评论当代中国时指出：在共产党中国，对自治的利益团体合法性的否认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绝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如此。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官员知道最需要为人民做什么，政治是只属于那些被政府承认为参与者的人的事情。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之间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含糊不清，在两者之间沟通的规则方面，理论与实践是完全不统一的。政府似乎表明，这种界限问题在他们的统治下已经奇迹般地消失了，因为，党、政府和社会已经结合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中了。的确，在实践中，为了寻求全面的控制，政府已经寻求将其影响渗透到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然而，为了使新的制度理想化，共产党希望，是全体中国人民自动地走出来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问题托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第199页。

付给政府来解决。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人民仍缺乏自由的和竞争的利益的表达。总之，人民的利益和福利仍然受到垄断着意识形态的官方行为的保护。¹

中国社会结构中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文化的同一性和蜂窝状结构。派伊曾指出：“理解中国过去与现在的领导与公众的关系的关键是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是一个非常易于统治的国家。”为什么呢？首要的原因在于：尽管它的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多样，但中国被它的文化的同一性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被政治权威结合在一起。它的生存是由于一个有限的政府更多地关注礼仪而不是对公众的需求作出反应。欧洲也曾有过一个相对的文化的同一性时期，但当要维护地方的利益而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要求时，它分裂为众多的国家。而中国文化的同一性则延续到今天。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强化，是由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促成的，而不是由于对众多的各种需求作出反应的要求。中国如此地易于统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人民统治自己。中国永远是一个参与的国家，然而这种参与并不是一致的国家政治系统中的参与，而是地方团体的参与。过去，这种团体包括家庭、部族、保甲、村寨、行会以及秘密协会。所有这些团体都遵守内部的纪律和自给自足的思想。如今，家庭仍然很强大，家委会、单位这样的团体还是很有纪律的，它们在某些方面是相应的传统组织的再生，它们的设立是用于控制和满足要求，以便没有人再去打扰更高一层的政府。

中国社会总是精心地组织为蜂窝状的群体这一事实对全国性的政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间组织从来不曾发展为一种压力集

派伊：《中国政治的精神实质》第 21 页。马丁·金·怀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载《共产主义问题》，1992 年 5-6 月 第 61 页。

派伊：《官员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154-155 页。

团，没有组织起来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除个别情况外，它们本质上是维持一种防护性的协会。国家的或省一级的官员们可以遵守规则，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但大部分公众则尽可能地避免同政府打交道，虽然他们对不公平的待遇也有抱怨，并希望加以纠正。但他们却没有要对有关政策提出要求的自觉。国家和社会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尽管它们具有共同的儒教和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中国政治的传统很容易为共产党所接受。同时，他们又接受了列宁主义的传统，认为所有的权力和权威应保留在官场世界，在党和政府之外不应有竞争的权力。同过去一样，现在的地方官员也对他们的中央上级提出挑战，要求削减本地区的税收负担，尽量增加自己可保留的财政收入。然而，这是在已确定的政策的背景下发生的事情，是国家领域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的一部分。^①

再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涉及面很广，其中包括现在广泛议论的人权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看到西方与中国文化中一种深刻的差异。

派伊在谈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时认为，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赞美国家而贬低个人。传统的儒教，以及现代的毛主义都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而将个人的权力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中国人总是将无上的权威赋予国家，而且总是个人隶属于团体，国家与个人间关系的不平衡构成了人权问题的结构与文化基础。这一问题成了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有争议的问题。^②

费正清认为，中国并不否认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价值，但那是从社会的观点来关心的。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它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这一切意味着，一个人行为的好坏主要应看它对社会

派伊：《官员与干部 中国的政治文化》第155页。

派伊：《国家与个人 综合解释》载《中国季刊》1991年9月。

福利和安定是否有贡献来判断。个人本身不是受赞扬的。他既不是唯一、永存的，也不是世界的中心。重视个人的自我表现，很容易流于放纵和无政府主义，所以，中国的传统强调社会行为。妥协和容忍，达观和幽默感，关于人性的透彻了解，通过律己养成的品格，所有这些形成了个人所追求和社会所赞许的部分道德结构，使个人在他的社会生活里获得动力。这种礼教习俗因其关心人的事务，当然可以称之为人文主义的，但它也助长了家长式统治，并容许了高度的专制主义。

美国是从福利和政治这样一些实际的角度来限定“人权”的意义，而中国人所重视的、可以替代的概念或同意义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和中国的价值标准的巨大差异可从中国儿童为适于进入社会而通常必须经过的各个阶段表现出来：儒家所强调行为标准是接受父母权威 克己 循礼和见贤思齐 这些都是为了训练儿童避免成为乱臣贼子，避免他们在依靠权威的同时又怨恨权威。

关于这个问题，所罗门 (Richard H. Solomon) 所进行的研究是最权威的。按照所罗门的说法，在权威关系方面，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以“服从——支配”综合病症为特征的。在任何一个权威等级中，每个人都服从其上级的意志，同时对其下属具有同样的支配地位。在传统的中国，正是这种社会权威模式在垄断性的组织结构中得到了制度上的表现。更明确地讲，中国的“服从——支配”模式是以在困难时对上级的主动性、指导和帮助的依赖感为特征的。通过对孝道的膜拜、学习，以及对祖先的尊崇而使权威不受侵犯的制度化的程度，在中国的文化中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从个性发展的角度上讲，这种儿童的社会化方式对成年后关于对权威的态度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假设是，传统中国人对权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97 页。

② 同① 第 55 页。

威的态度是建立在对敌对感情能量的极大焦虑的基础上的，一旦“适当”的社会权威关系（角色）被打破，这种能量就会释放出来。

所罗门进一步的结论是，在一个追求现代、参与社会的当代中国，中国人看来陷入了一种文化传统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人们由于有受到侮辱和依赖心理的被利用而憎恨绝对的权威；另一方面，对这种憎恨的表达却进行了必要的压制，以便将社会结合在一起。在传统的中国，这种两难并不突出，政治精英的主要目标只是维持能使农民生产他们赖以生活的财富所必需的和平与和谐。而在当代中国，对这种两难的嘲弄就变得尤其尖刻了，因为精英们所渴望的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将人民动员到现代经济中去才能取得，在这种经济生活中，自愿的参与和合理的批评是效率的先决条件。

因此，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鼓励更大的主动性和自愿的参与，同时必须保持党的优先项目的实施，并且防止释放敌意的风暴。中国似乎努力通过以激烈的感情主义运动使其统治和规划合法化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似乎感觉到，仅仅依靠人民对使中国现代化计划的理性的服从还不足以保证党的合法性。他们试图打破传统权威关系，它阻碍了现代化的矛盾，进入到一种韦伯称之为对领导者的感情服从的过渡阶段，这个领导人被赋予将人民导向希望大陆的“超凡的魅力”，中国的具体做法就是慎重地操纵人民的感情，将毛塑造成这样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

最后，在中国人的行为中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对比：对朋友和家庭忠诚，而不顾公共利益；一丝不苟地履行按照惯例所必须履行的责任，而对陌生人的疾苦或并不特别涉及某个人的坏事则漠然置

之。这种不太理想的行为显然一部分来源于这样的事实：无论作为效忠的对象或个人幸福的源泉，家庭都比社会重要，特别是在改朝换代、天下无主之时，政府本身无法博得民众对它的忠诚，至少是无从获取他们的尊敬。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宗教的消极态度和个人主义方面。这种消极态度补充并导致了专制政府。^①同时这种行为还是派性之所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中国人是更多地依据他们在群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不依据自己的个性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如此强调个人对集体的依赖，就必然把关系和忠诚放在重要的地位。由于家庭是中国最明确的集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实体，派性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和婚姻联系在一起了。在国家这个词汇中，国意味着公众，家意味着家庭。在中国，决定着家庭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与忠诚，使国家成为一个“公共的家庭”。^②

四、道德、法律与民主

所有研究中国政治的汉学家们都看到了“仁政”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哈丁甚至说：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被视为教育过程。费正清也特别强调 儒教靠“仁政”理论博得重视 是西方任何学说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而仁政理论的主要之点是“行为端正即为有德”的思想，以礼持约，行为端正本身就能给人以道德地位或威望。这种道德威望又能给人以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权力。

仁政的理论基础来自儒家的下述学说：人是自然秩序中十分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89 页。

特里尔：《我们时代的中国》，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92 年版 第 89 页。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6 页 哈里·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以后的改革》霍普金斯研究所，1988 年版 第 25 页。

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人的行为必须与看不见的自然力相协调，否则灾祸便接踵而至。而君王是介于人类与自然力之间的。只有当他以德统治天下时，才能维持人与自然间的普遍协调。^①

派伊则从更广泛的角度上论述了“仁政”的原因。他说，由于对当权者没有制度上和结构上的约束，对官员的道德的要求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政治系统缺乏任何形式的公开的竞争和公共的批评，官员首要的约束就只能是内在的和主观的；由于对政治系统寄予如此多的期望，所以向个人灌输公民的美德以及因此而建立他们自己内在的防止反社会行为的约束，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了；最后，由于中国的政治系统缺乏将自己加诸整个社会之上的结构能力以及垄断所有的社会功能的能力，因此，就将权力、权威、道德和说服密切联系在一起。^②

费正清在评论中国的“仁政”时说：在世界上大多数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教权威的时候，儒家给现行政权的行使权威提供了一种理性上的和伦理上的依据，这是政治上的一大发明。如我们下面将要论述的那样，马丁·金·怀特 *Martin King White* 对中国的仁政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潜在的基础。^③

但是这种“仁政”也引起了许多消极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它冲淡了法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过依赖法庭审判。在毛领导下的一个时期，法律和道德混合在一起了。结果是法律和政策完全吻合，毫无二致。违反党的政策就是非法。^④

由于传统的和当代的政治结构都把加强自我修养作为得到权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5 页。

② 派伊：《中国政治的精神实质》第 28—30 页。

③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5 页。

④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336 页。

力和运用权力的理论基础，由于只有掌握和拥护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人才能获得官职，而当官的人又认为他们的主张为社会问题提供了确定无疑的答案，这必然会导致一个消极的后果，即中国政治是一个极少受到人民或非政府精英影响的自制的体系，无论是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在政府之外，都不存在重大的非正式的权力结构。由此而增加了中国政治结构的保守性和稳定性。^①同时，仁慈的统治者极度强调的儒教传统与永远正确的党的领导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在当代中国产生了一种对领导者推崇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党的资历的概念与中国人对老人的尊敬溶合在一起了。现实的结果是，不同世代的党的成员享受不同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他们入党的时间和环境。这种对资历的强调促使干部老化倾向的出现。

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要求官员们既要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又要精通业务。实际上，许多官员一点也做不到。此外，许多政治机构的职位（如人民代表大会）是为了奖励劳动模范，而不是给那些具有独立的政治领导能力的人。政治系统中充满了一种感恩的气氛。较低级的官员为了升官而服从高级的官员，不愿意批评他们。

最后，这种文化特征还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要在创造其领导人人为的形象方面比其他大多数过渡社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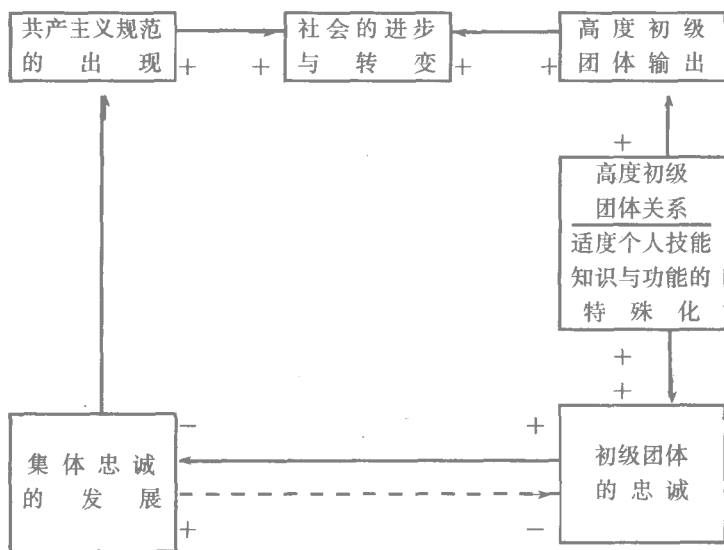
中国政治文化中浓厚的道德色彩一直延续到当今中国社会。这种道德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当今，它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在思想改造运动 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 都

① 派伊：《中国政治的精神实质》第13页。

② 派伊：《官员与干部 中国的政治文化》第139-140页。

③ 同②第28-30页。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政治风格是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主要杠杆。在毛统治的时期，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更是成了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主旋律。理查德·威廷汉·威尔逊（Richard Wittingham Wilson）在分析这个现象时，做了一个图解模式。这个模式把复杂的社会现实加以简单化与抽象化，归纳为两个因素：一个是价值观念，一个是工作技能 即德与才：



这个图是一些连结并不很严谨的假设的结合，图中的箭头表示因果关系的方向，或者说是某种关系的自变项与因变项。正号（+）与负号（-）表示直接的或相反的关系。

虚线并带负号的关系是表示政府认为是相互对立矛盾的关系。就“高度初级团体输出”而言，它作为一个自变项是不言而喻的。就“共产主义规范”而言，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它是一个因变项，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毛主义者则视之为自变项，正如本图所表明的那样。因此，两者的高度发挥将可产生“社

会的进步与转变”。但是，“高度初级团体关系——适度个人技能知识的特殊化”的高度发挥一方面产生了符合期望的“高度初级团体输出”另一方面却也产生了阻碍“集体忠诚发展”的“初级团体忠诚”。而任何阻碍“集体忠诚的发展”的因素也将阻碍“共产主义规范的出现”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与转变”。因此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浓厚的道德色彩，一方面表明了中国领导人高度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对“初级团体忠诚”的忧虑。

他分析说，“初级团体忠诚”这一因素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其社会心理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儿童社会化模式”。中国儿童的教育是在作为初级群体的家庭中完成的，而家庭的教育方式主要是使儿童产生羞耻感，教养者着重于爱的操纵（Manipulation of Affect），因此，儿童的行为都是以是否获得其周围的人的赞同为标准，且唯恐为失去其亲人的爱而焦虑，中国儿童的道德判断模式是外向的，而不是内向的。如此的儿童教育方式是使中国人始终忠心于初级群体的基本社会心理因素。

威尔逊指出，虽然中国领导人对“初级团体忠诚”的社会及心理因素并不一定充分了解，但对这一因素的强度，他们却是充分感受到了。因此政府努力充当着“道德宗主”的角色通过灌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削弱“初级团体忠诚”的作用。^①

中国的法律概念也根本不同于西方。关于这一点，费正清曾有过较长的权威性的论述。他说：在西方，官僚政治受法律调节，个人可以求助于法律的保护，来对抗官员的专权，西方的公民自由权就靠这一点，而中国早期对法律的运用，是作为协助专制政府实行政治统一的工具。中国的法律起源于古代中国人对天理（自然

^① 理查德·威廷汉·威尔逊：《从社会控制与偏态行为来研究中共政治文化的一些课题》载《第五届中美“大陆问题”研讨会专辑》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印，1976年，第243—252页。

秩序)的观念,认为人的行动必须合乎天理,而统治者的职责是维护这种协调一致。统治者是以懿行美德而不是以法律来影响百姓的,所以通晓事理的人会受这种榜样和高尚行为规范的指引,而无需绳以法规。按照这一理论,只有对那些野蛮的、未开化的人,即那些不遵圣贤教导和皇帝榜样的人,才需要实行惩罚而使其慑服。

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可以作如下的概括。首先,中国人不把法律看作社会生活中来自外界的、绝对的东西;不承认有什么通过神的启示而给予人类的“较高法律”。摩西的金牌律是神在山顶上授予他的,但孔子只从日常生活中推究事理,而不求助于任何神灵。他并不宣称他的礼法获得什么超自然的认可。他只是拐弯抹角地说这些礼法来自自然领域本身的道德性质,来自这个世界,而并非来自人类无从认识的另一世界。据此,法律条例就只是这道德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可供仿效的模范或榜样,或者是施政或守礼的有效准则。法律从属于道德。它之获得认可,在于理性,或者说在于那些作为道德基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就避免了不适当的二元论,这是西方在法律条文与遵属道德常情二者之间产生出来的一种主张。在实践上,中国古代法典主要是刑法,是为惩治缺乏教养的人用的。它也是行政性的,并规定了典礼的细节。换言之,法典的一部分是由行政裁决积累而成的。它几乎全是公法,其内容涉及办事手续、婚姻、继承以及有关施政的其他重要事项。法律在公众活动范围内所占地位是比较小的。^①

在关于中国法律的功能的看法上,斯达韦斯与费正清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引申说:虽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法律传统的国家,但传统的中国法律是为了强化政府,是为了使国家权力的实行进一步系统化。而在西方的观念中,法律系统的目的恰恰相反,是为

^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86页。

了限制政府。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民主。普遍认为，中国缺乏民主制度的传统，相反，它却有着与民主制度水火不相容的官僚—独裁传统。这一事实并不仅仅意味着统治者不按人民的意志进行统治。中国的帝制包含着许多独裁的因素。例如，国家儒教被视为唯一正统的思想，所有那些对这种思想产生威胁的思想和组织都被视为异端、遭到镇压。在儒家文化中，国家本质上是权力主义的，以防止混乱。中国的政治思想极少涉及参与问题，从未将民主作为一种可以且应该存在的政治形式。在中国，国家是家庭权威的延伸，国家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家”的特征，统治者对于国的统治具有父亲之于家的权威。无论国家作为防止混乱的一个工具，还是作为一个大家庭，都是以极权主义为基础的，统治者为老百姓作决定，而不是让人民作决定。对中国人来说，在独裁与混乱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通过法律、规则的渠道使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这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在中国，如果不造反或没有个人关系，就只能寄希望于正直的官员。^②

斯达韦斯还指出，中国也讲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概念与西方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的民主意味着“人民的统治”，这一术语是含糊的，而实质上民主的概念包括有加强政府的思想，以便国家能够保护人民，发展经济。在西方，民主也像法律一样，意味着限制政府，使其不能干涉日益崛起的资产阶级，民主决不意味着加强政府。西方民主中的许多内容，如选举竞争、多党制、法权、民权、自由和保护少数人，使中国人联想到的是混乱，是对一个强大、稳

斯达韦斯：《中国的政治改革》，纽约，普里格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7-72页。

② 怀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载《共产主义问题》，1992年3-4月，第60页；斯达韦斯：《中国的政治改革》第40页。

定、统一的政府的威胁。由于政治系统中结构性社会参与的欠缺及法律系统的薄弱，中国的精英政治通常表现为大规模的派别斗争。意识形态的阐述通常是为宗派斗争服务的，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是“实用主义的”，但他们的实用主义则是基于对局势的应变和对实际需求的判断，而不基于对固定的程序的义务。中国的传统价值之所以仍然存在，是因为在许多方面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符合并加强了传统的政治模式。共产主义制度有一种高度结构性的官僚体系，它的合法性取决于“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合法性的来源更多地是“天命”和“神权”而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赞同”。

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与民主的概念相对立取决于许多因素。从哲学和历史的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不接受人民主权和平等的概念。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政治系统中，都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西方的宗教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存在的。中国人从来不曾想过他们应当选举自己的统治者。在西方，有霍布斯、洛克或卢梭关于人民自己建立政府的理论，因而，政府应当对人民负责。^①

中国还缺乏民主化的一些先决条件，以下的这些观点与其说是历史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学的，它们是在对欧洲经验的概括的基础上的。这些前提条件包括：

(1) 一个发达的、强调法制而不是人治的法律传统；

(2)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和货币经济，以便促进市场上的平等和法律面前平等的概念，以及相对国家的个人自治；

(3) 允许独立的权力与观念和信仰自由的存在，它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独立的教会统治集团、竞争性的小社会制度、制度化

^① 斯达韦斯：《中国的政治改革》第 40、67-72 页。

的集团以及特许城市，等等；

(4) 一个大的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和 或者 中产阶级 以及地
产阶级和商业阶级之间的冲突。^①

但是，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政治传统完全是专制主义的。例如，怀特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也有一些积极的民主因素。

首先，它来自仁政的传统。儒教中家长式统治要求统治者具有很高的道德品质，统治者被赋予神圣的权力的同时，他们还有义务促进人民的福利，当其行为和政策偏离了和谐与进步时，儒仕和官员就可以规劝统治者 在极端的环境下 人民可以依据“天命”为推翻一个政权、建立新政权提供合法性。

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个民主因素来源于它的“人之初，性本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人通过教育是可望从善的。虽然这种思想承认，与大多数人相比，一部分人受到较好的教育，行为也比较端正，所以这部分人可以管理和控制大众，中国人对通过教育和道德榜样指导人们从善从来都抱有坚定的信念。与封建的欧洲、日本不同，更不用说印度了，在中国，只有极少部分人被看作是生性恶劣的，这种思想为民主公民概念提供了某种潜在的基础。

地方共同体和地方协会的自治。怀特认为，上述派伊所说的中国社会结构中的蜂窝状特征，是中国民主的另一种潜在的基础。他指出，在广大的中国社会中，帝国官僚实际上是很小的一部分，它对社会的控制一般不超过县以下，在更基本的层次上，一些地方官员致力于组建地方性的组织，如保甲之类的半官方组织，但这种做法并不总是成功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人通过诸如家系、宗族社团、行会、宗教团体、秘密协会等 组织自己的生活 其中一些组织的管理形式是相当自由的，一部分组织则要求具有成员

^① 怀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载《共产主义问题》，1992年3—4月第61页。

资格。在中国，人们在无需官方的指导下组织自己的事务方面是有很长的传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治思想的兴起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传统。^①

第三节“钟摆”：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与变革

一、改革前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政治任务，不是将旧的国家机器的碎片重新粘合在一起，而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机构。最初，这个国家只拥有最原始的交通运输系统；强大的传统的地方势力和地方观念顽强地阻碍着现代民族意识的发展；而在经济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前资本主义形式只为民族统一提供了最脆弱的物质基础。要在这种条件下实现现代政治统一的目标确实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任务。而这一任务却非常有效和极为神速地完成了。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历史性的成就，而且也是一项独一无二的成就。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政治（即使它还不能提供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在多数情况下，伴随着革命的，是长时间的政治动荡、混乱和暴力，并且经常还发生内战。但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但没有产生政治混乱，而且还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并愈演愈烈的混乱时代。孙中山曾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②

^① 怀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载《共产主义问题》，1992年3-4月第63页。

^②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56页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97页。

这个伟大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新统治者在中国共产党内拥有一个极为有效的组织工具。共产党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当时它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和严密的组织性。它的领导人和干部不但是经验丰富的革命组织者，而且也是经验丰富的行政管理者，并且他们还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感和目的感。由于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相当时期内，共产党就行使着一种准政府的职能，所以，共产党可以为新政府的形成提供主要的组织基础、领导干部和组织群众的方法。^①

尽管存在着许多问题，中国领导人非常成功地建立了一种政治体制，使中央决策与中央权力所涉及的范围和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传统上，通过官僚系统，中央政府的权力可以以某种效率达到县一级的水平，但在此之下，由诸如乡绅这样的传统的精英集团和各种其他社会机构控制的“非正式的政府”占支配地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改变了这种形势。他们摧毁了这些旧的精英集团和大多数传统的社会机构，代之以新的共产党的精英和共产党的机构，使中央政府的权力达到村的一级。现在行政管理的触角一直深入到每家茅舍。当然，这并非说，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使其能够取得各种宏伟目标的政治工具，中国的权力机器遇到许多困境，有许多弱点，效率也不高。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有纪律的精英团体、一个新的党政机构，使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前所未有地向中国的大多数人口贯彻他们的意志。^②

在毛统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的政治生活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点。在中国，意识形态不仅为权力结构和社会特权提供了一种含糊的合法性，如同在大

^①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84—97 页。

^② 鲍大可：《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治权力》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 年版 第 430 页。

多数制度中那样，它还是运用权力和贯彻政策的手段。由于法律传统的相对缺乏，意识形态就成了最抽象的政策的制定方法。中国的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它带有更多的民粹主义、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成分。为了维护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向人民灌输新的意识形态，改变基本的行为方式，共产党创立了新的政治机构和政治行为模式，一场接着一场的思想改造运动令人眼花缭乱，精疲力尽。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都受到政治领袖的指导。结果，整个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化了。与此同时，中国相应地对非正统思想的压制也异常严厉。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并未导致公众对党的教条的服从，相反，在毛泽东的晚期却导致了严重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危机，因为显而易见，那样的一种意识形态不能使经济停滞和政治压制合法化。于是，逐渐地，对意识形态的服从让位于普遍的怀疑主义 真诚让位于虚伪。

中国政治生活中另一个明显而又独特的方面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动员政治。在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仍然依靠群众运动而不是通过正常的行政方法来贯彻它的主要政策和纲领。这种革命的运行方式是早期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发展起来的群众动员方法的产物。从本质上讲，用群众运动方法来贯彻政策包括以下若干因素：提出明确的近期目标，将这些目标作为压倒的优先项目，从不同的政治系统中动员和训练大量的干部贯彻这些运动，最后是动员群众参与实现这些目标。这种运动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如果灌输了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群众被合理地组织起来，

迪特默：《革命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年后的中国》第42页 哈里·哈丁：《中国的政治发展：1949-1989年》载《两个对立的社会：40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7-323页。

他们就会积极地行动起来实现社会的基本目标。人的意志和劳力而不是技能被看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民是被当作臣民，而不是作为积极的参与者来对待的。他们的责任就是积极地支持政府的政策，而不是提出制约政府行为的要求。

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方法的效力是无可争辩的，但在用它来实现现代化时，效力和适用性就无法确定了。它的有利性在于：它使得领导人能够在任何必要的时候集中精力于既定的目标，动员大量群众为此而工作。但在许多方面则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他未突出的任务通常受到忽视；经常导致国家有限的特殊才能的滥用；具有一种固有的政治倾向，并对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严格的控制；对正规的政府功能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然而，中国的领导人无疑将最后的一种影响看作是财富而不是负担。事实上，他们坚持使用群众动员的这种革命的方法显然部分地出于有意识地抵抗政府的常规化，他们担心，这种常规化将促使官僚化的发展，使干部丧失革命热情，使资产阶级价值观复生“修正主义”发展削弱革命运动。^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人一直试图找到一个方法，将基本决策权的集中和地方推行贯彻决策的责任有效地结合起来，以便防止政治生活中的僵化和地方主义现象，达到地方利益与中央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平衡。与以前的政权相比，中国传统中的集权倾向与共产党的“集中制”倾向，导致了对基本决策权的集中控制。与此同时，中共又强调分权化，相当大的行政权力下放到省或省以下的行政区，中央政府中省一级的代表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便使地方干部有更多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从毛泽东统治时期总的趋势来

^① 鲍大可：《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治权力》第 437—438 页；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80 页；哈里·哈丁：《中国的政治发展：1949—1989 年》载《两个对立的社会：40 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323—328 页。

看，地方领导的自治权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主要原因是，主管经济的官员们认为僵硬的中央计划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毛泽东也希望通过分权抑制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虽然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各级权力机构之间如何有效地分配权力和责任这个长期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圆满的彻底的解决，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也确实难以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着，导致了中国政治生活中集权与分权的不断循环。

官僚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新的共产党官僚机构迅速发展，无论就其“理性”特征还是就其办事效率来说，它都是典型的现代官僚政治。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等级观念始终存在，身居官职仍然意味着享有特权。实际上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可以根据资历、工资和职权在权力和地位方面找到其等级的位置。这一结果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列宁主义遗产共同作用的产物，也是中国在相当落后的条件下急于实现现代化而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必然产物。

另人吃惊的只有一点，即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和冲突相对说来也没有那样尖锐和严重。与官僚主义相关的传统的行为模式，如贪污腐化、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里存在着两个限制因素，一是毛对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

① 鲍大可：《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治权力》第 440 页；哈丁：《中国的政治发展：1949—1989 年》载《两个对立的社会：40 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332—335 页。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349、350 页；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332 页；哈丁同上，328—332 页。

规化和制度化。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是在革命年代的艰苦奋斗中形成的深深的平均主义精神和价值观念，而群众路线的指导原则又要求在干部和群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和保持普遍的团结。为防止革命意志衰退，中共使官员们廉洁的方法比旧中国所实施的方法厉害得多，如增加干部的体力劳动、将他们下放到农村地区、废除军衔制等。^①

毛泽东本人与中国共产党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压倒一切的主题。在建国初期，毛并没有利用他的威望和权力把他的意志强加给党。不仅如此，他还有意识地努力维护党的统一。这或许是因为这位领袖的意志恰与党的政策一致。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关系，在 1955 年垮掉了，当时毛抛开了党的多数领导人，发动了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运动。他 7 月 31 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并不是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而是在一次非正式的省、市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发表的。涉及千百万农民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由党的领袖说句话就可发动起来，而无视党作为一个组织的作用，个人崇拜新政治气候由此进一步发展起来。毛与党的紧张关系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又加剧了。当时，毛又一次对党的革命性有了疑问，决定冲破官僚机构对他所提倡的激进的新社会经济政策的阻力，这样一来，他促进了使他自己不仅仅作为党的主席而且是群众的杰出代言人的政治进程。在“大跃进”运动期间毛就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动荡，对毛的崇拜减弱了。毛与群众的联系也由于这场运动所产生的组织混乱和经济危机而受到破坏。饥饿的群众在政治上变得无情了，党和国家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权威又恢复了。但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很快表明在中国大地上不满现状的人民群情沸腾，渴望崇拜毛本人及其思想。当毛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时，起来反对

^① 鲍大可：《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治权力》第 435 页。

党及其组织的当权派时，数千万人起来投入了战斗。在大规模混乱的冲突中，毛作为乌托邦预言家和最高领袖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他通过自己的思想和幻想直接和革命群众联系在一起，千百万忠诚的追随者将他发出的教导和指示变为新的革命的行动。

毛泽东与党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是由许多原因促成的，其中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单纯从两者的直接关系而言，费正清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么多东西都是毛创造出来的，以至于可以认为它是他的创造物，所以他有特权要改造它。只有把他认定为一个君王，才会想象得出为什么中共领导会任凭毛把党零敲碎打直到完全毁掉也跟着他干。詹姆斯·迈尔斯（James T. Myers）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毛作为超凡魅力的预言家—领袖角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曾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一部分。为此，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树立了毛泽东的威信。^①

中国政治的这些基本特征，即使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但也孕育着极大的潜在危机，正是这些危机构成了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并引发了始料不及的政治经济改革。

二、改革时期的中国政治

7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了改革时代。中国的改革，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就其进展的速度而言，是几乎所有的汉学家所始料不及的。最初，他们睁大了吃惊的眼睛，望着太平洋彼岸的巨变，充满迷惑和不解。慢慢地，当中国无情地剖析自己过去的失误，大步迈向新的时代时，疑虑大大减少了，接下来便是审慎、严肃的分

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3页；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97页；詹姆斯·迈尔斯：《毛泽东的角色 中国革命中的神秘性与领袖的超凡魅力》，载维克多·C·法尔肯海姆〔Victor C. Falkenheim〕编：《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美国优秀出版社，1989年版 第17—37页。

析、探讨。中国的改革对学者们的观点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观点变化的趋向是“右倾”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他们现在在中国右边的距离等于过去他们在中国左边的距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对过去否定得不够彻底，步子迈得不够大。但总的来说，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

对改革的必要性，汉学家们作出了如下的分析。

首先，是维持和加强现政权的合法性，解决严重的政治危机。毛晚期时的中国的极权主义在许多方面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极权主义有相似之处。无论是毛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试图对社会实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两者都试图以其所标明的公正和进步的社会经济变革来证明这种控制的必要性，都实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恐怖统治，两个人都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凌架党的决策机构之上。这种极权主义注定要导致毛以后的重大变化，正如 1956 年以后苏联出现的非斯大林化那样，官僚精英和一般公众都要求政治生活中有更大的可预见性和社会生活中更多的自由。但中国要求变化的冲动更为强烈，因为，毛死时的中国面临着比斯大林死时的苏联更大的危机。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基本上是以保守的和杰出人物统治论为基础的，因而造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而毛的专制主义则是激进的和民粹主义的，因而有一种毁坏政治稳定的倾向。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的职责就是防止混乱，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不但没有防止混乱，反而制造了混乱。因而，文化大革命严重削弱了现政权的合法化。而且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权力斗争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权威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无法再对现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

从政治“供给与需求”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增加了中国社会

① 哈里·哈丁：《毛以后的中国的政治发展》载鲍大可编《中国的现代化》韦斯特维尔出版公司，1986年版 第 14-17 页。

的需求而降低了它的资源供给。在需求方面：人口增加了教育水平提高释放出的力量；交通、通讯的改善释放出的力量；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而在资源的供给方面：由于迅速强化的工业化，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民众基础减弱了；可供统治者用来动员全国资源的机构已不如以往有效了，在当政的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机构繁多的官僚体系，而不是一个有共同思想的、响应最高领导的团体；再有，中央政府每年可配置的资源数量减少了，来自苏联的外援停止了，革命时期没收的财富无法再开发了。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很困难。因此，中国的政治处于一种困难的形势中。¹

中国改革的动力还来自 20 多年所经历的政治经济事件的惨痛教训。中国领导人终于认识到，过激行为导致失败，失败导致分裂，进而导致激烈的权力斗争。从积极的方面讲，这种不断的斗争培育了一批善于接受变化的领导精英。伊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和哈丁等许多学者都指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教训尤为深刻，它向中国指出了一个政治死胡同，没有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悲剧，中国的改革就不会走得那样远，那样迅速。“邓小平及其同盟者正是将文化大革命变为对自己有利的事件 努力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²

同时，经济改革必然引起政治体制改革。局部的改革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充满着危险。基本的问题就是，政治仍然控制着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就，官僚主义最终将毁掉改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所发生的情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严密的组织与控制将窒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窒息新的经济思想与企业的创造性，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企业也不愿与一

奥克森伯格：《中国动荡的社会》第 50—54 页。

斯卡拉皮诺：《发展政治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 74 页。

个保持僵化行政管理体制的中国交往。

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复杂化，对政府就复杂的技术和经济问题做出迅速决策的要求提高了。在社会生活中，集体化、私有化和商品化使毛时代蛰伏的社会力量 and 个人的雄心释放了出来它们的突然释放对中国党政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效率却削弱了，政治体制不再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协调一致了。这部分是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老化，部分是由于政策的失误，同时也是 1949 年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带有浓厚的农村意识，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成员是在家长式权威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人关系在党内和社会的其他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内的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传统的神秘性社会。迷信较之科学更为流行，人民寻求可奉之为神明的领袖。长期的战争环境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带有神秘色彩和严格纪律的工作作风，对党的政策从来不作公开的讨论。在革命以后，中国的领导人很少发生变化而且革命的元老们已经建立了一种制度文化，年轻的领导人不得不在这种制度文化中发挥作用。他们必须接受、学习和适应这种传统的游击队式的行为方式，以便保证自己的地位或得到提拔。革命时期的工作作风被制度化了。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有许多缺点，其中包括效率下降、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①

斯达维斯指出，政治改革的另一个压力来自中国的青年一代。由于中国在这一世纪的复杂多变，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经历。这种不同的经历产生了不同的生活观、政治文化和政治经验

^① 斯达韦斯：《中国的政治改革》第 17-30 页 沃格尔：《天安门事件前夜的中国社会》迪伯拉·戴维斯、伊兹拉·沃格尔编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第 5 页；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74 页。

及要求。基本问题是，中国年轻的一代不像老一代那样与中国共产党有政治契约关系，这对现存体制提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1949 年时 20 岁左右的人现在已经年过 60 了，1982 年他们占总人口的 11%。他们对革命前旧中国的贫穷、饥饿、落后和内战有很深的印象。他们渴望一个能够带来和平、稳定、经济发展和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政府。他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一个有效开明的独裁政府。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占 1982 年中国总人口的 13%，他们成长于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年代，在较大的程度上，这一代的政治要求也是有限的，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前提，满足于在党内的非正式的协商地位（群众路线）。这两代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他们要求法律和秩序以及制度化的程序，以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占 1982 年中国总人口的 22%。他们的经历对其观念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有限的高等教育机会、政治领导人根据含糊不清的政治表现指定工作，产生了一种竞争、不信任和愤世嫉俗的社会环境。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送到工厂、农村从事劳动，走的地方很多。他们的丰富经历使他们受到了广泛的训练，对中国的现实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行动上也颇为自信。这些人正被提到领导岗位，他们的行为在许多方面都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精力充沛、经验丰富、自信心强。正是这一代领导人将确定政治改革的未来。

接下来的一代是在 80 年代成熟起来的。他们出生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占中国人口相当大的比例。1962—1971 年出生的青年人占 1982 年总人口的 20%。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过是学步的孩童，对文化大革命的知识来自二、三手资料。他们是在一个提倡学习、对外开放和努力赚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的读物包括洛克和孟德斯鸠关于政府是由社会契约形成的著作、尼采的关于领袖是人不是神、公民有权改变政治结构的著作；弗洛伊德

的性心理学著作；弗洛姆关于人道主义的著作；托马斯·潘恩、帕里克·亨利关于民主的著作。他们对马丁·路德·金关于世界自由与正义的梦非常熟悉。这一代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反映在“现代”生活方式中，尤其是在城市。他们的服装、发型和对音乐艺术的欣赏以及性观念与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接近。在农村，新的消费方式如服装、摩托车、电视等也已经普及，西方的价值观远不如传统的价值观流行。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城乡的经济交流正在增加，在 90 年代，新的政治观念将传到农村。¹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展开了全面的政治改革。改革时期，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为了给当代中国政治的权威奠定新的基础，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已经从强调思想斗争与阶级冲突转变为强调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转而强调社会主义民主，解决迫切具体问题的实用主义政策取代了在平等目标名义下进行的改造社会的乌托邦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明显减少了，韦伯的理性—合法权力思想确实发生了影响，许多知识分子和专家越来越多地利用了这种思想，努力将政治生活建立在制度、法律和法定程序的基础上。更重要的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形式，即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也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韦伯所没有明确预见到的，在本世纪后半叶，它们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改革以后，这两种意识形态形式日益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居支配地位。

同时，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淡薄了。改革后的中国领导人承认，一系列广泛的学术、科学和技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与政治原则无关。其结果就是许多政策可以根据自身的价值做出判断，不受教条的约束。而且，甚至在被认为是相关的领域中，思

1: 斯达韦斯：《中国的政治改革》第 17-30页。

想意识也不再当作教条，不再认为能为现实政治问题提供具体、可靠的解决方法；相反，它被当作分析政策问题的方法以及未来的广泛目标。¹¹

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的变化也是非常深刻的，它开始或多或少地反映现实的经济生活。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僵化的社会发展的蓝图，不如说是一种灵活的经济发展的纲领。这样一种概念已经形成，即对大众的需求和愿望的实际反映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这种概念一方面提高了政府的作用，从而对经济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相对降低了党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意识形态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组织机构不再去符合意识形态确定的目标，而是按照实际的、可能的方法管理经济，以便使人们的具体需求能够得到满足。¹²

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仍被确定为官方的正统理论，对它的评注仍花费不少时间。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可理解的事。党和许多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是出于政治和文化上的考虑。党的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这样一种概念上，即它是一种科学、正确的思想体系，为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否定马克思主义不仅会损害它的合法性，而且会引起政治动荡和混乱，这正是中国人所极力避免的。同时，中国领导人总是担心社会主义将被毁灭，革命的原则将受到破坏。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此，中国的政策总是，也永远是带有意识形态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批评的特征。中国的领导人总要问自己：一项政策是否会使中国偏离社会主义？这种意

鲍大可：《中国的现代化》引言 沃格尔：《天安门事件前夜的中国社会》第 4 页 哈丁：《毛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载《中国的现代化》第 29-30 页；《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 184 页。

迪特默：《毛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载《大陆中国发展透视》，第 57 页。

识形态上的反省在西方人看来是很特别的、完全不必要的。美国的立法者与政府领导人没有必要总是问自己一项法案或政策是否会对资本主义有利，因为，每一项立法或政策都是用来维护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稳固的，不会像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疑问那样对“建设资本主义”提出疑问。区别在于，中国努力创造一个新社会，而西方试图保存现存的社会。^①

而且，许多中国人至今仍然相信，统治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既需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一力量，也需要一个一体化的全国的政治组织力量。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当代世界两种可替代的主要的思想体系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选择资本主义，不仅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要提倡个人主义、竞争和多元化，这些会对国家的统一产生威胁。马克思主义强调集体主义、合作和民族的统一——这是一种使中国免受来源于基层的离心力影响的价值观念，它与儒教传统是相吻合的。^②

中国政治生活中人事方面的变化也非常显著。党努力通过吸收比较年轻和受过教育的干部并许诺他们更多的自主权，使政府和各个机构恢复活力。

改革在废除干部终身制，让老干部退位，以年轻的干部取而代之的做法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1982年和1984年官僚系统内的人事安排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在1983—1985年期间，大约90%的省一级地方干部发生变动。1985年9月，131位老干部退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人的安排和提升从毛时代的政治表现和革命热情的标准转为强调专业、教育和青年人。新上任的干部大都比较年轻，受过较好的教

① 李希腾斯坦：《处在边缘的中国》第43页。

② 迪特默：《革命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四十年后的中国》第60—61页。

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领导阶层最大的和平变动，而且，更替的工作是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的。与此同时，中国还规定了干部任职的年龄限制。

组织机构与国家政体的改革非常引人注目。毛泽东死后，党政组织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党的重建工作存在着许多困难。过去，整风运动是取得党内一致和加强纪律的一种有效的机制，但这一运动在 1986 年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这一事实表明，在一个经济增长成为首要目标的年代里，运动式的政治活动被视为具有破坏性的。党不可能通过强调政治而进行一种过于深入细致的运动。

党政机构改革更为激进的方式在 80 年代初开始进行。党的十二大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组织机构自身的力量再次得到确认；引进了制约机制：实行集体领导、建立了平等的行政部门，即将中央委员会分为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三个机构，虽然在它们当中引入监督一制衡关系的思想落空了，但这些机构的建立可能已经导致了较大范围的分权。在当前的领导中，权力更加分散，更加具有集团操作的性质。废除了主席制，使党的书记成了党的领导人，从而使党的领导机构更像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党的总书记只有召集党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议的权力，因而，他的权力相对被削弱了。最后还推行了严格的保密法，党政及其他各种常委会召开会议的次数增加了。这些改革使中国领导人比 50 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有纪律。领导之间的争论与精英派别仍然存在，但政策分歧的解决不再对公众采取隐喻的形式，清洗也不再引发分裂的宗派主义（实际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群众参与）¹

林恩·怀特：《中国革命的终结》，帕里斯·张：《毛以后中国精英冲突的不同性质》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 67-113 页、第 117-138 页。

党政分离也是长期的优先改革项目。通过这项改革，党将放弃对各种经济与行政事务的直接控制，主要是通过建立政策的重点来实行领导。一旦党的政策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它的执行和监督就成了地方政府的事。党将保留通过推荐的方式指定关键政府职位的权力。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减少对经济事务的政治干预，使党能够从扰乱其领导的具体日常事务中脱离出来。党政分工的意义是深远的，但对它们管辖的范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①

这些改革措施的意义是深远的。在毛的时代，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手中，毛使革命人格化了，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既是统治者又是“至高无上的神父”——他通过一种特殊的角色实现政策的合理化、政治一体化和制定政策、解决冲突，并实现至高无上的“立法者”的功能。毛的救星—预言家的角色表达了一代中国人的政治愿望。政治改革已经瓦解了对毛的崇拜，邓将恢复集体领导当作政治改革的中心议题，并恢复了集体领导制，邓虽然是最高的领导人，但他只是一个平等群体中的第一号，并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几个元老人物和邓小平处于同等的地位；没有“邓小平思想”，他也没有能力集所有关键的领导角色于一身。高层政治斗争的准则也更具有人道的色彩，失势者仍能保留一定的影响和地位。总之，中国正在处于从领袖的超凡魅力权威到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性—法律权威的过渡。^②

集体领导的趋势，虽然越来越不稳定，看来仍会持续下去，因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在走向领导岗位时没有经历那种使英雄主义大放光彩的艰难历程。他们的领导地位将会下降。这些最初的改革

^① 林恩·怀特·帕里斯·张：《毛以后中国精英冲突的不同性质》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 67-113 页、第 117-138 页。

^② 哈丁：《第二次中国革命》第 184 页。

建议是向着某种制约与平衡体制发展的。这种改革究竟能不能阻止另一个强人的出现还不得而知，对 1978 年以后的决策过程的研究表明，一种协商性的更为复杂的程序正在形成，因此，可能会阻止一种由一个权威即兴作出决策的出现，正是这样一种决策导致了人民公社的形成。

但是，中国政治仍具有高度的老人统治的特征，老年人比年轻人掌握和操纵着更大的影响，“一个人，一张票”的公式不适用于老人政策委员会。许多老官员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保护人。同时，个人关系和庇护关系仍在提升中发挥作用。实际上，就 80 年代领导人更新的速度而言，裙带关系问题也许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改革中倡议的文职人员制的实施，职业市场和改革的就业体制的出现，将有助于纠正这些问题。²

改革在扩大参与机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将竞争性选举引入地方立法机关，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通过各种组织机制加强与社会各群体的协商，成为毛以后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在毛主义时代，选举只是一种形式，党控制着选举程序并指定候选人，1979 年的选举法允许将直接选举扩大到乡村和城市的市区一级，更重要的是，根据法律可实行差额选举，普通公民可指定候选人参加选举。中国政府反复表明，他们不想允许真正竞争性的政党体系，但他们允许在党内有更多的竞争。不言而喻，如果立法机构在决策过程中不发挥什么作用，这种选举就毫无意义。过去，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使党的决议合法化，自 1979 年以后，它的作用扩大了。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已经建立了机能委员会，专门负责内外政策的某些特定方面，并在起草法律方面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人大会议的次数也逐渐增加，成为代表们坦率地讨论国家

迪特· :《毛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载《大陆中国发展透视》。

同。

与地方政策的讲坛。尽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被人们称为“橡皮图章”但在 1979 年以后，它的声望和权威大大提高了。例如，在 1980 年 11 月的五届人大上，代表们公开向部长们就政治高级官员的贪污和渎职行为提出质问，至少有一名副部长被解职，几名重要领导干部受到指责，其内容还在大众媒介上公开报道。1986 年春，一些人大委员实际上开始投票反对一些提名的报告。在 1988 年 3 月的 7 届人大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委员辩论和异议。^①

但是，实际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参与机会仍受到许多限制。例如，选举法在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选举规则不允许候选人为本阶层或本地区的利益呼吁。选举的范围并未伸到省与国家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也受到限制，它们的活动、其代表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保守的。从总体上讲，它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咨询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它不能经常提出立法、否决国家的建议，或要求党政官员承担义务。^②

相应地，中国在法制和民主等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重大成就。法律是规则地解决社会冲突的保证，可以提供一种更为民主的气氛。没有法律，公民就仅仅是被庇护者，只能寻求权势的保护；有了法律，官员就要受法律的限制，公民就可以要求他们的正当权利。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发展并强化了法制。1981 年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要在党外建立一个真正的司法体系。1982 年的国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关，一切法律由它制定并且由它执行。各种法律、法规逐渐健全起来，政法人员的训练和培养也在大力展开。政治部门践踏法律的行为也开始诉诸法院。

^{①②} 理查德·鲍姆(Richard B. Baum):《中国的政治制度:40 年的评价》,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 年后的中国》第 68 页 斯卡拉皮诺:《发展政治学》第 79 页;哈丁:《第二次中国革命》第 179-180 页。

律师作用逐步加强，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通过法律来解决。中国在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知识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努力。

有两项改革涉及到民主化问题，其一是建立“协商与对话”体制，以便加强公民与统治者的沟通，同时，请愿渠道、反馈机制、上访程序等正在逐步加强和走向正规化。其二是立法机关的作用日益加强，选举制度和统一战线制度正在逐步推行和推广。中国在分权改革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从地方到基层，从政府到企业，中央的权力都大大地削减了。

但接受法律和民主原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目前中国这方面改革的问题与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制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党凌驾于司法权之上这一历史形成的趋向，中国政府还保留着废除法律的权利。当然，废除旧的不合理的法律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法律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废除的话，它们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了。虽然党很少干涉一般的案件，但重要案件通常是党委作出决定，此外，也没有制定司法独立条文，以监督党政官员的行为，除非党本身愿意把干部交给法院审理。法院系统独立性这一基本原则难以实现。另外，中国还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律师得不到严肃对待，物质条件比较艰苦，有些律师发现，许多法院裁决在审判以前就已经写好了。防止不合法的拘捕与审讯的保证还只停留在理论上。

问题的根源在于，在中国，自由、法律和民主更多地仍然是进行控制以及其他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不是反对国家干扰的保障，也不是为了从以道德治国转变为以法治国。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自由是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和经济活力；法律是为了增加可预见性以维持人民的支持；民主是为了解决人民与政府疏远的信仰危机。可能的情况是，中共统治下法制的发展，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任意使用权力，而不在于保证个

人的人权。这个基本原则是党的控制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是它的工具之一。这当然令人回忆起传统的统治，而不是现代的多数表决制。^①

总而言之，虽然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法制的国家，但它还不不是一个法制的国家。虽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中国现在都更加具有法治的特征，但党是否接受无条件地保证公民不受其控制的长期的法律程序还不清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是以人治为基础的，是以政治的高度的个人化和微弱的制度化作为特征的。因此，一个领导人的权力或影响更多地取决于他本人和他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他的正式职位；领导者的地位不仅必须依靠法律及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来确立，而且必须通过他们的良好的道德风范、合乎道德的目标及高尚的动机等来确立。法治意味着：法律变成至高无上的东西；国家必须通过行政法规和刑事法以可预见的方式来加强它的政策；公民拥有法律程序性的、规定权利与义务的权利，它们要由宪法来保证，国家不能践踏；领导者的地位必须通过法律来确立。^②

最后，在改革时期，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似乎不如以前的深入和全面。这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放松，是改革者对公民的私生活的尊重的结果；也可能是党的削弱和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法激发中国人民的理想主义的结果。也许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社会本身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共产党的支配了。例如，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336-337 页 斯达韦斯：《中国的政治改革》，第 40、50-51 页；洛厄尔·迪特默：《毛以后中国改革的起源》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 55 页 林恩·怀特·帕里斯·张：《毛以后中国精英冲突的不同性质》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 67-113 页、第 117-138 页 哈丁：《毛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载《中国的现代化》第 32-33 页。

② 帕里斯·张：《毛以后中国精英冲突的不同性质》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 117-138 页 哈丁：《毛以后中国政治的发展》载《中国的现代化》第 32-33 页。

在反对白桦的《苦恋》的运动中 虽然大众媒介最终都参与了批评，但没有发表反对的文章，大多数主要的作家都没有参加对白桦的批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自身的合作。普通公民在信仰、言论和消费等方面所享受的自由要比过去多得多。宗教不再被谴责为迷信，教堂和庙宇重新开放，农村的风俗习惯也得到尊重。

在激烈的对当代中国政治控制的讨论中，邹说将“豁免领域”与“中立领域”区别开来。前者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活领域，即党通过一种有约束力的和长久的方式承认，党没有权力干涉；后者则相反，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领域，国家只是在一定时期内不愿干涉，但它不放弃将来进行干预的权利。显然，中立领域在毛以后的中国大大扩展了。但在保持国家促进道德文明传统的条件下，中立领域还没有转化为固定的豁免领域。^①

对于中国已经贯彻的改革的意义，专家们认为难以作出估价，但他们承认，虽然党和政府的改革规划没有满足由雄心勃勃的改革建议所产生的期望，没有使权力的组合发生基本的变化，但它们确实导致了自党的七大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最广泛的中央领导的调整。这种调整似乎将继续下去。这些改革可以减少使政府的合法性进一步削弱的低效、失误和腐化。此外，这些改革可以产生未来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哈丁认为，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取得的明显成就表明，毛主义时期的政治危机已经得到了解决。

改革已经使中国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林恩·怀特和帕里斯·张将这种变化称之为“从个人独断专行的统治到了寡

^① 迪特默：《毛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载《大陆中国发展透视》哈丁：《毛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载《中国的现代化》第17页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175页；林恩·怀特、帕里斯·张：《中国革命的终结》、《毛以后中国精英冲突的不同性质》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67-113页、第117-138页。

头统治与老人统治的混合体”哈里·哈丁称之为“从极权主义转变为一种协商性的独裁主义形式”；哈姆林称之为“从革命家的寡头政治到一个更新、更为开放的和容纳型政治的过渡”；斯卡拉皮诺则认为中国正在从列宁主义转向一个权力主义—多元主义的社会。

这种体制与刚结束不久的极权主义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向一个更为开放的政治的过渡过程才刚刚开始。在中国政治正在变得更具有协商性的同时，它还不是一个充分民主的，或者说，它还没有转变为真正多元的政治秩序。甚至不是一个准多元性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并没有脱离党的控制。政治竞争的权利仍受到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候选人是由党来提名或指定的。政治参与的形式、内容和程度仍受到限制。有关中国未来的战略决策仍受党的精英支配，并受意识形态与制度方面的约束，中国政治的许多方面仍与列宁主义的政治结构联系在一起。总而言之，虽然自 1976 年以来公开的政治参与增加了，但它仍然受党的支配而不是完全的自治。由于认识到要从人口中的关键部分获得信息，建议和支持，它变得越来越具有协商性。但由于要压制不同政见，建立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将最终的决策权保留在党手中，所以它仍然是一个独裁主义的。^①

三、政治改革的特征与前景

从改革的战略上讲，如同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以局部的改革为特征的，这就难免引起社会混乱、利益失衡、顾此失彼等一系列的弊端。中国的改革者并不是没有看到局部改革的

^① 哈里·哈丁载《中国的现代化》第 32-33 页；《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 200 页。斯卡拉皮诺：《发展政治学》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0 页。斯达韦斯：《中国的政治改革》第 17 页。卡罗尔·李·哈姆琳（Carol Lee Hamrin）：《中国与未来的挑战 变化中的政治模式》韦斯特韦尔出版公司，1990 年版第 210-211 页。

局限性。早在 1978 年初，改革的政策顾问们就想彻底地研究出一个整体改革规划方案，并迅速引进社会经济模式，以便防止产生混乱。但由于政治和实际执行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存在着怀疑和批评；其次，改革理论家和官员们太无经验，又在具体的改革战略上过于分歧。其结果就是一种局部的、经验性的改革。此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无疑也是渐进的经验主义改革的一个因素。中国人已经对毛主义的政治运动和空洞的口号变得敏感，对于迅速和僵化地引进的社会经济模式推广而不论其适应性如何的做法也相当反感。而且，改革者们也缺乏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以及相应的研究与思想工具。因此，经验主义反映了对现实政策和体制灵活性的探索。

在改革的具体方式上，中国的改革是通过一种由上至下的程序进行的。如果想要成功地改革中央计划经济，就必须对政治经济权利进行综合的、同步的分配。然而，这样一种分配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在党政各个等级上的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对权利分配的这种保守的政治反应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碍。这种“阻碍效应”随着改革的加深而上升。结果，不是新的分权市场制度取代旧的中央计划制度，而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物。它是一种妥协，是非此非彼的一条中间道路。由此导致的未来政策的摇摆不定引起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因此，推行全面改革的能力取决于改革派在党内受支持的程度，而这又取决于领导的政治领导能力。只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够在权利的分配中减少阻碍效应。然而只要存在强大的反改革的保守派，在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的改革就不会成功。只有一致才能成功，但在中国，一致是不可能的。看来，在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内分权化的成功只有在整个党受到基层民众的压力下才能够取得。党不能领导社会主义社

① 卡罗尔·李·哈姆琳：《中国与未来的挑战》，1990 年版。

会走向分权化和市场化；党必须在人民的推动下才能进入分权化和市场化。由上至下的改革永远会受到阻挠。只有自下而上真正的改革才能完成。要同时维护现存的权利关系和使经济体制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要保存中央集权就要对经济政治和思想自由进行压制；而现代化则恰恰需要政治经济和思想自由。^①

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作指导，而是取决于中国社会对变革的各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认识和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来自于领导人对早期几十年党的统治成败的认识，它更多地是消极地抛弃过去的错误，而不是积极地对未来的有意识的思索。对改革方案最具渗透力的观点，来自经济迅速发展、政治稳定因而被许多人视为金色的 50 年代以及在刘、邓等人主持工作时使中国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 60 年代。当时刘主义发展战略的特征就是将政治和经济分离开来的实用主义精神。但最终的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所问题的，因为，由这种发展战略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压力和社会分化被毛泽东以民粹主义的方式用来向邓和刘的实用主义领导人发起挑战。其结果是巨大的社会动乱。当今经济与政治间的类似的分离也面临着类似的危险。

80 年代中国改革方案的另一个主要缺陷在于，它没能改变单一的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最高领导层的个人独裁政治，没能产生更带有自治性的组织以及能够代理国家、官僚以及社会政治不同利益的较为灵活的程序。这样，在危机期间，决策只能在高层领导中不同派别的竞争中作出，很少得到代表不同官僚利益阶层的信息和建议、处理社会矛盾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以及在政治经济上可能产生的国际反应。这种改革原则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即国家有权通过按照

^① 李希腾斯坦：《处在边缘的中国》第 125—127 页。

迪特默：《毛以后中国改革的起源》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 42 页。

官方的教义教育公民，以促进他们的道德行为，国家必须防止可对中央政府控制进行挑战的政治组织的出现以维护社会的和谐，这种中国的价值观和列宁主义原则允许国家镇压社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思想异端，排除政治多元化的出现，为党对其他政治机构的全面控制提供依据，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

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已经使中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它必须在以下两种可能中做出选择：或者走向一个尚未确定的、激进的社会主义；或者只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作温和的调整。如果两者都没有达到，它就会陷入危险的停滞状态。但是改革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人民都已看到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因此，未来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改革，而是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改革，是快还是慢。以下是一些专家对改革的两种可能的取向的分析。^①

保守的改革方案 这种改革就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改善和修正，以便使它进一步合法化。它的依据是，许多中国人对稳定与经济强调甚于对民主化的强调。它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政府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就能取得人民的支持。这个因素可以和民族主义、经济增长、传统的独裁观念、政治冷漠和犬儒主义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效应，观念与利益的差异都会由此而减色，国家将会维持它对社会的控制。

在中国保守的改革者当中，有一种杰出人物统治论与专家政治论的倾向。这种主张的倡导者希望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专家治国论

^① 卡罗兰·李·哈姆琳：《中国与未来的挑战》第3页；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173页。

^② 斯达韦斯：《中国的政治改革》第129—144页；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99—128页；福尔肯海姆：《过渡中的中国政治》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前言。

者认为，在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阶段，经济增长只有在独裁政治中才能完成，并以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日本的经验证实他们的论点，因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国家的强大集权为快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并为以后的民主改革建立了长期的基础。这种观点在 80 年代是有一定的效力和影响的。这种保守的改革方案推行的结果将会在行政管理方面作出重大的调整，并试图消除或减少贪污腐化现象。他们将会赞成党、政功能的一定程度的分离，赞成为提高效率而对企业管理作出重大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将会产生一种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多数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多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

这种保守的道路总的来说是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相符合的。它首先承认一个能够保持秩序、经济增长和讲究礼仪的政府的合法性。对于这样的一种合法性来说，西方式的选举与多党制竞争是没有必要的。中国人从来也没有接受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哲学。在他们看来，西方家庭体系的毁坏、吸毒、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是与这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主张的倡导者认为，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日本 18 世纪晚期明治维新有许多类似之处，而日本的这一改革是成功的。这种改革也与儒教传统中的开明观念相吻合，这种观念反对腐化，主张通过伦理道德建立一个好政府。中国保守的改革也同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治改革类似。

中国的青年会反对保守的改革并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吗？不一定。就整个世界而言，一般的规律是，学生运动可能会产生保守的反应，因此，下一代的学生可能会对这种行动失去兴趣。

这种保守的改革的有利之处是，当中国推行非常有争议的劳动、价格和住房改革的紧张时期，它将可以维持若干年的稳定。保守的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可能不会激起那些希望经济迅速增长的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和政治领导人的热情，并压抑他们

的创造性。而且，政治冷漠和传统的权威观念会对那些“土皇帝”形成一个有利的环境，他们的腐败、无能将会削弱中央体制的合法性。因此，保守的改革将以长期的问题为代价来加强短期的合法性（正统性）。这种方法也不会得到香港的欢迎，香港的企业家将会转移资本，留下一个停滞、拥挤的城市。它也会使得台湾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而且，这种改革所维持的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是不会长久的。例如，在南朝鲜和台湾，存在着游行示威和增加民主参与的其他要求。对这种要求的保守的反应将会是镇压，像南朝鲜那样，这将会使中国走向苏联式的道路。这绝不是不可能的。

激进的改革 这种改革方案不是要调整现行的体制，而是要基本上改变它。激进的改革是要赋予人民，尤其是青年以有效参与的机会与能力感。在西方，赋予这种感觉的关键因素是不同党派的竞争。在这种体制中，由于对党派的选择是按照适当的程序民主地作出的，即使他们对选举的结果感到不满，他们也容易接受政治领导人与政治活动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保证了西方政府的强大与稳定，尽管存在着表面上的选举的混乱，以及政府不胜任、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等现象。无疑，这种政体也为印度和墨西哥的政治稳定提供了保证，虽然在那里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如果中国建立了一个竞争的政治体制，共产党仍将保留支配地位。但它有可能失去地方的选举，并可能有时失去国家的选举，像印度的国大党那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竞争会促使它更好地工作，因而使它更加强大，给予它更加明确的合法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可能为政治竞争提供条件，1987年制定的新法律允许在候选人之间进行某种程度的竞争。罗伯特·达尔曾经观察到，民主制大多是从一种在普遍参与的公众竞争的制度中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看，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中更为公开的讨论和最终正式的投票程序将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的过渡阶段。但在中国，要建立这样一种政党体系确实是非常困难和危险

的，它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这种改革方案存在着许多障碍。首先，中国没有发展容忍不同种族、宗教和经济群体间的冲突的文化和制度，而在欧洲和北美，这些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具有传统的政治观念。他们期望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政府，他们希望稳定。政治竞争会产生焦虑，因为它会使人们想起混乱。中国的农民对家庭以外的事务极少关心，他们可能倾向于一个与其说靠选票不如靠大棒的强人。民主需要受到良好教育、有知识的公民，如果人口过于贫困且又严重文盲，他们就不能对政治事务作出正确的判断。此外，在一个充满着富裕国家的世界上实现国家统一和现代化、为了应付人口的增长及其他一些紧迫的危机，中国看来也需要一个强大的能够动员全国资源的中央政府。总之，虽然目前的缓慢的政治自由化和社会多元化包含了以后更具有参与性的体制的萌芽，但在一个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具有强大极权统治的历史传统，而其政治文化反映了这种传统的国家里，较早地从极权主义过渡到民主的前景是暗淡的。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之前，西方式的民主化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此外，由既得利益者产生的问题也将十分严重。

发展民主价值观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由文化价值和青少年教育方式形成的权威结构。中国政治文化的沿续性、中国政治文化中权威关系的持久性、乃至传统政体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幼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即在家庭和教育系统中将这种权威模式制度化了；根源于传统的中国人在感情上对无节制的权威的憎恨，同时又需要从这种权威关系中得到安全。但当孩子们被告知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以及忠实于集体的重要性时，自己就没有任何余地了。由此引起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斯达韦斯强调指出，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中国并没有讨论如何改革教育制度以便产生一个民主的政治文化。读书的孩子们仍然是笔直地坐着，两手背在后

面。他们齐声背诵，站着讲话。历史上的政治理论家们历来强调通过教育来改变后代的价值观。中国在这方面的进程将是民主改革的指数。因此，政治的变化将是渐进的过程。^①

迪特默在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时说：在本世纪内，现存的政治系统不可能发生基本的改组，而是它的发展和完善。立法机构的权力将会增大，较高层行政机关的直接选举会发展，政府官员的教育水平也将会持续提高，但真正的多元主义自治的政治组织与独立的政治权力的竞争则不大可能出现。

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将政治与经济、党的精英与社会环境分离开来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此时，有三个其他的选择 第一 抛弃这种职能分工 重新肯定“政治挂帅”重新确立党的作用和全面控制社会生活。从其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来看，这种方案很可能是短命的。第二个更富有挑战性的选择就是，重新确定党的使命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富有成效的领导，与此同时，对经济进行有效、灵活的管理。这种选择将以党的先锋队传统为基础，提倡政治品德，利用日益增长的知识分子与党的干部的关系，促进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在过去几年里，曾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很有希望的进展，但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这种方案受到了挫折。第三个，也是最有可能的选择就是，党既不阻碍，也不引导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改造，而是坚持目前的状态，并试图以一种看来必要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来适应变化。由此可以预见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党将从原来的先锋队作用逐渐地下降到一种更为消极的社会地位，它将控制出现的危机，而不是寻求保持一个独特的精英亚文化群，将社会导向一个

所罗门：《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现代化问题》 派伊：《官员与干部 中国的政治文化》.前言。

预先注定的英烈祠。”

第四节“困惑”：未来的挑战

专家们在承认改革以后中国政治的相对稳定的同时，也强调了现存的潜在的危机。在某些方面，党和国家的权力已经受到威胁；中国辽阔的疆域和多样性，对经济政治控制的放松已经使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力受到了质疑。此外，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在知识分子和专业阶层引起了不满，在目前至少削弱了体制及其领导人的合法性。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的形象是一个强大的、需要重大改变的国家。能否有效地处理这些危机，对中国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最重要的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现的信仰危机还没有得到解决。詹姆斯·迈尔斯在观察从超凡魅力领袖政治到寡头政治的转变中，提出了新的领导人能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教义或规范基础的问题。他指出，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最有吸引力的价值体系很可能是以旧式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这种价值体系是否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基础、维护公共秩序还不得而知。而另一方面，对修正后的官方教义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公众并未表现出多么大的兴趣，更不用说引发他们的激情了。相反，中国缺少一个令人信服的、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学。毛以后有限的政治改革仍落后于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由于通货膨胀、不平等和贪污腐化而引发了不满；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而引进的新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新的政治模式以及经济中心。但政治改革并没有与这些新的要求协调一致，结果信仰危机不但未缓和，反而加剧了。政治体制与政治要求之间的距离还有

迪特默：《毛以后中国改革的起源》，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34、63页。

可能进一步扩大。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意识形态中仍有一些很容易产生混乱的含糊的地方。当意识形态退却为实用主义时，它对解决实际问题的意义越来越小了，其结果就是“信仰危机”。^①

第二是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国改革工业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削减中央计划者的权力，将决策权下放到企业的实际管理者手中，让他们对市场作出迅速的反应，以便提高企业的效率。改革以后，省级政府的财政独立性以及企业的自主权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改革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也取得了成功。但这也导致了中央对地方的失控，当国家对地方企业所需要的原料和供应物资只能提供三分之一时，就不可能做到要地方上唱什么调就唱什么调。虽然中央仍保留对地方人事的决策权，实行有效的控制，但在其他领域，或在中央存在分歧的问题上，省和地方领导人已经能够反对不受欢迎的决策和指示了。他们也已经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和中央进行谈判了。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公然对中央挑战的事几乎还没有，但是规避、延拖以及其他形式的巧妙的抵抗已经不是稀罕的事了。而企业实际上也寻求省和地方的保护主义的避难所，以避免来自其他地区企业的竞争的威胁。这项改革所遇到的矛盾在于，如果要削弱省和地方的权力，加强中央计划者的权力，那么就与最初要限制它并让市场发挥更多作用的目标相矛盾。从此意义上讲，中央与地方之间肯定要发生紧张关系，地方政府可以规避国家政策，虽然他们不会修改这些政策。

中央控制力减少后的一个副作用是地方上腐败程度增大了。

^① 迪特默：《革命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年后的中国》第60-61页 哈丁：《中国的政治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第323、328页 福尔肯海姆：《过渡中的中国政治》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13-14页。

派伊：《官员与干部 中国的政治文化》第156-157页 哈丁：《中国的政治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第335页。

“做官发财”的观念在中国土壤里是根深蒂固的，随时都可能发芽滋长。在毛泽东主义时期，地方干部驱使民众干这干那，是按照教条主义方式。在责任制时期，可以官吏身份进行投机倒把，利用地方关系，勾结其他集体企业的经理人员，共同腐败，坑害政府。以前经理干部试图从人民手里拿去财物，现在他们却从国家经济中抓取好处了。

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一个危险是它很可能向“左”转，恢复中央集权制。中国大一统的概念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历史负担。为了维护国家的自尊，它必须统一，必须有一个集权的政府。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然而，当中国谈到动乱的风险时，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统一的潜力。中国具有道德的、语言的和文化上的统一。封建的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按世界标准衡量的个人与地区的贫富差别并不很大，中央政府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之久，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无法做到的。文化大革命常常使人联想到动乱的岁月，但那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混乱不是自发产生的。与印度、瑞士、德国这样的国家相比，中国更有能力处理政治竞争离心力的问题。但要在满足参与者日益提高要求的情况下发挥这种能力，将有一个复杂的学习阶段。因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关键所在不是要不要在继续分权的方向上走下去，而是怎样走的问题。人们在判断中国政治家的智慧时，主要是看他们有没有搞地方分权的魄力，让每个省都能有自己的风格。

未来的情况可能是，与 80 年代相比，中国中央政府机构——不论是更多的“改革”趋向还是“保守”倾向——都有可能变得更加软弱，维持连贯政策路线的能力也会下降。地方领导人将会发现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333-334 页。

② 费正清：《费正清谈中国》载《美国人看中国》第 285 页。

一种政治真空。结果，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不平等将日益严重，并导致地区间的冲突和社会紧张。北京的主要角色或许是担任相对自治的地区间争论的仲裁者和中间人，而不是追求一个统一的政策。也有可能，中国的政治系统可能会进入一个在中央与地方当局之间保持平衡的比较稳定的时期，地方拥有很大的实际上的灵活性，而中央仍将保留足够的资源以便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是继承问题。20 多年以来，中国政治一直为继承问题所困扰。虽然邓小平试图设计并推行一个更为制度化的继承程序，规定了任职期限和退休年龄，但由于长时期内缺乏一种继承机制，以及儒教的尊老倾向、经济依然落后的状况、政府依然保持高度的人格化的特征，继承问题仍将十分严重。这就使中国政治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无法确定在毛或邓死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外部世界来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政策取向是持续下去还是要发生变化；对这个体系内部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不可避免的权力关系的调整中，哪个集团会有所得，哪个集团会有所失。

迪特默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捉摸不定的因素，但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从中国继承政治的规律开始：对竞争者来说，至关重要的一项是，一方面要对充分的持续性作出承诺，以便被认作是合法的继承者，另一方面，还要提出充分的变化希望，激发党内成员改善地位的雄心，以便赢得他们的支持。在这两个基本的约束之间，施展策略的余地并不是很大的。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角色，他们必须表

肯尼思·利伯索尔：《中国的政治动态》，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1991年版 第15—28页；克里斯多夫·克拉克(Christopher M. Clarke)：《中国向邓以后时代的过渡》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14页。

派伊：《官员与干部 中国的政治文化》第142页 哈丁：《中国的政治发展》，第336—338页。

演为在继承的过程中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因此，合法性通常属于那些表演——至少是暂时地——维持现状的人。这样，在继承的斗争中，每个人必须努力宣称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以前党内最高层领导人的安排。然而，成功者必然是那些人：尽管受到这些约束，他们能够通过暗示变革而得到新的支持者，并夺取反对派的支持者。迪特默预测说：邓的继承问题将有可能不会像毛那样剧烈。毛时代的主要继承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而邓的主要继承问题是实质性的政策问题。

第四，90年代的中国经济问题将更加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由邓小平的10年改革期间成长起来的新的政治经济主体的参与、支持。这些因素包括私人企业、农村专业户、出口导向的企业、国际金融机构、外商、旅游者、双边贸易协会、地方政府等。这些人将要求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和更基本的政治改革，作为他们支持的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和消费品——也是过去任何时候所不曾有过的。日益增加的期望已经导致了政治变化压力的增长，这一趋势有可能还会持续下去，甚至会加速增长。国际环境的迅速变化将使中国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至少在今后几年内，中国在国外投资、最惠国待遇或人权政治方面将不会受到特殊的关照。社会主义世界的变化将使中国面临更为严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亚洲邻邦和地区的变化也将对中国提出特殊的挑战，如日本日益崛起的政治军事压力、北朝鲜的继承斗争、台湾日益增长的独立情绪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东南亚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竞争等。

第五，其他社会问题。就领导问题而言，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已

派伊：《官员与干部 中国的政治文化》第142-143页。

克拉克：《中国向邓以后时代的过渡》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14

成为一个难以确定的因素。群众利益日益发生分化，以至于对群众意识的界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群众动员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排除掉了，领导人对群众自发的言论变得非常敏感。这使得仍然为人厌恶的官僚系统成为唯一的接触媒介。它将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

在党外群众日益富有的背景下，对党的道德优越感的坚定信念必定会产生一个自解放以来党从未遇到过的两难境地：非党上层阶级在财富、声望、乃至在权力方面与地方干部竞争的前景。显然，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吸引力，新生的中产阶级需要党的干部扫清政治障碍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而干部则需要新生的中产阶级作为推动力的源泉。但是，对于一个明确表示要保持这个精英亚文化群体纯洁性美德的党来说，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也充斥着危险。传统上，干部与中产阶级的非正式的联系被斥为腐化。实际上，许多新生的中产阶级都是那些看到并利用了机会的干部或以前的干部。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总的趋势就是政治与经济日益溶合在一起：国家利用财政与金融等手段干预经济，而私有部分也通过院外活动集团、竞争种种手段对相关的公共政策发挥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府理所当然地要对经济进行管理。事实上，在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中，政府拥有国民经济的所有权，并像管理一个大工厂一样管理它。但当私有经济和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之后，问题就产生了。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能走多远？技术性的问题是：怎样管理经济才能在刺激人们的主动性的同时而又不失控？^①

与之相关的是关于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从中国文明发轫以

迪特默：《毛以后中国改革的起源》，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61-62页。

来，人民大众的经济境况取决于天命这种观念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如果人民的经济状况不佳，他们有权谴责政府，因为政府的义务就是给所有的人带来物质利益。在世界其他地方，经济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这样一种神话来得要晚得多，而且要合理化得多。当共产党宣称他们可以通过对经济的管理给全国带来进步时，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很容易使人民认为它是合理的。对政府有权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这种思想，中国人并没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但毛的统治的结束和邓的最初几年统治的成功，肯定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他们的有关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态度进行反思。毛肯定使人民懂得，政府可以成为他们福利的敌人，繁荣只有在党放松对政治的控制时才有可能到来。中共十三大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正式认可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应该受到限制，应该给民营经济以更大的活动范围。如果这种变化已经对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影响，它将使人民对政府的看法发生深刻变化。最终，这种变化将有助于解决合法性的危机。但在短期内，将可能会有相当的混乱，使得合法性更加困难——尤其是当人们感到向市场的转化会提高自私和贪污腐化时更是如此。在中国，多数人也会像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一样，已经学会接受领导人言行不一这样一种事实，视之为正常的，因而本质上是合理的。普遍的犬儒主义可以成为合法性一种相当稳定的基础。美国人认为腐化和欺骗会威胁到合法性这样一种观点是一种特殊的种族问题。在许多国家里，整个历史上人民都接受了各种形式的腐化，将之视为一种正常的情况。的确，犬儒主义更多地是合法性的基础，而不是它削弱的原因。因此，在中国，合法性问题更多地是领导者的自尊的问题。由于中国政治的节奏不是西方政体中的左一右翼，而是加强与放松控制、集权与分权的上下运动，领导者任何焦虑的增加都有可能转化为更大程度的压制。这将可

能伴随着政府试图进一步加强对意识形态的辩护。

此外，利伯索尔还指出了另一些不稳定因素。他说，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自前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强大的。但中国也有许多削弱这一体制的因素，而且影响很大，甚至可以将其称之为“体制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中的这种结构性弱点来自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帝国时代，尤其是晚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仍影响着现存的体制。这些因素包括：没有发展一种可以为中央—地方的关系提供法定、规则稳定性的观念；没有为中央政府征集税收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没有固定；没能使政治制度免受宗派斗争的影响；面对外部的压力，没能在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价值与方式上达成一致。

其次，中国采取的苏联体制有许多弊病，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很容易脱离国内的现实；它很难得到正确的信息；在政治继承事务上有很大的问题。在其度过早期的“外延式”增长阶段，应付社会发展的后果时，会遇到尖锐的经济困难和问题。中国就遭受了所有的这些难题之苦。

第三，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产生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1985年以后。其中包括通货膨胀、贪污腐化、国内市场的分割、官僚的反对以及人们对改革的超过现实的迅速增长的期望。

最后，中国在改革中发生的政治危机也使得人民进一步疏远了政府，这种危机使得邓以后的继承问题更加困难了。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治的前景会如何呢？

利伯索尔和克拉克两位学者的观点带有悲观的色彩，他们认

派伊：《官员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第164—166页。

利伯索尔：《中国的政治动态》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5—28页。

为 90 年代，中国处于不稳定状态的边缘。自毛泽东 1979 年逝世以后，中国领导人还从来没有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它们使中国政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不可能采取西方式的多党竞争制，它缺乏向这种制度过渡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它也不会回复到毛主义的集权制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长征老战士、他们指定的继承人与那些改革思想家和政治家，以及多数中国人民，他们都怕乱。在现实中，引起这种担心的不仅是不久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是中国过去 100 多年的历史。同时，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脆弱性和困难，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政治体制仍有相当大的能力面对社会，仍有可能避免严重的混乱。

从长远的观点看，旧的指令性的和威胁的方式将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困境，或取得一个广泛接受而又历史悠久的富有强大这一目标。要达到这些目的，邓小平的继承者们需要至少提供一些类似十年“改革与开放”期间释放出来的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将可能更少具有强制性，但基本上仍将是极权性的和中央集权性的，至少在国家的抱负方面是这样的。然而，在基层，贯彻政策的多样性仍会持续下去，政府在实现它的抱负方面仍会力不从心。

将各种导致变化的因素加在一起，将会有几种可能性：北京与更具有自主性的地方之间的结构性的对峙；改革家的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的复兴；在由继承问题产生的持久的政治对峙中发生军事政变；由于领导人的分裂所造成的群众性政治动乱；或者是中央政府的跨台。这些可能性并不全是相互排除的，例如，群众性的政治动乱会产生某种形式的政变。虽然这些可能性带有夸张性，但 90 年代中国政治体制不会再像 80 年代那样能够灵活、创造

性地解决地区、环境、经济、社会问题了。

兰普顿 (David M. Lampton) 对两位学者的论点颇不以为然，他指出，认为中国是一座即将爆炸的政治、社会火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都不会处于革命的状态。在近期或中期内，虽然可能产生动乱，但那将是局部性的、地区性的，并且是可以控制的，尽管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在中国，最稳定的因素是农民。这个群体不仅相对地处于隔离状态、文化水平也比较低，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十年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位学者访问了许多中国的学者，他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看来不是中国农民与工人的梦想”。

大量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宁愿计划经济的安全，而不愿意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不稳定性。他们已经习惯了过去 40 年的平均主义的道德观念和安适的处境。中国的工人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心理（他们支持改革（在抽象的意义上）希望减少腐化、希望改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们并不希望在一个很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艰苦地工作。

林恩·怀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的推测是很典型的，他说：革命很可能已经永远成为过去的事了；出于现代化的迫切愿望，改革的动力将会持续下去，虽然它将受到领导人之间在分权化和自由化程度的不停的争论的影响。民众的压力、经济利益群体的日益增长的势头，以及政府的业已削弱了的正统性，将在形成改革的基本主张中发挥长期、持续的影响。

利伯索尔：《中国的政治动态》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5-28页；克拉克：《中国向邓以后时代的过渡》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14页。

林恩·怀特：《中国革命的终结 领导的变化》载《过渡中的中国政治》第67-113页。

第三章 大悲剧：两次重大历史事件

用最广义的名称说，从 1949 到 1985 年这 35 年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大循环，或者两次痉挛，即毛泽东的“大跃进”(1958—1960)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每一次他都动员了群众的支持，希望在中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1958 年毛泽东动员群众向自然宣战。“大跃进”时期胜利与他失之交臂，于是他在 60 年代初向党内那些对他的政策积极性不高的人宣战，并且参与揭露他们的活动。接着到 60 年代中期，他向人性本身宣战。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普罗米修斯式的冲动：大跃进

一、大跃进的背景与起因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在关于怎样建立社会主义问题上，只有苏联一种模式可以遵循。虽然中国人在一些重要方面对苏联模式加以变通，但基本上照搬了苏联在制度变革和经济战略方面的模式：计划高度集中、行政管理、生产资料社会化、通过榨取农业和轻工业发展重工业，等等。整个一五计划几乎是苏联 1928—1932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关于一五计划的结果，多数专家都承认“，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判断，50 年代的工业化都是杰出的经济成就，但是像历史上所有的经济进步一样，它是建立在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剥削的基础上，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

在经济方面，最关键的问题是落后的农业不能保证工业的原料需求，不能使迅猛增长的人口获得温饱，令人吃惊的是，中国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从明朝 1368 年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 6 个世纪中，尽管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尽管 20 世纪上半叶人口继续增长，中国农业还是提供了适当的维持人口生存所需要的最低限量的食物。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水稻产量约为印度同期的两倍，而且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其工业化世纪开始时的大米产量稍高一些，正是在这种相对有利的环境下，使中国人能够在 一五时期抽出少量盈余，以负担重工业发展的费用。

问题在于，中国人的参照系并不是日本或印度，他们试图仿效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中苏两国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别。早在 1913 年 俄国的粮食总产量已达 8200 万吨 人均粮食产量为 580 公斤。而中国在一五计划前夕即 1952 年的人

均产量仅达 220 公斤，甚至在粮食与人口比例相对有利的 1957 年，中国的粮食和植物油的人均产量仅有苏联 1928 年生产水平的一半，中苏人均粮食产量分别为 290 公斤和 566 公斤 人均植物油产量分别为 1.7 公斤和 3 公斤。1932 年，苏联农业在遭受斯大林集体化计划的打击之后，其粮食产量比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减少 25% 即使这样 在伤痕累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 苏联人均粮食产量仍然很高。通过强制手段，苏联农民被迫出售了几乎等量的粮食。因此，当苏联有可能考虑如何最好地确保国家对历年的农业剩余产品进行控制时，中国首先要做的事情则是想方设法使农产品能有剩余，并增加这种剩余，然后才能掌握分配剩余物资的权力。总之，苏联粮食产量与人口的平衡使斯大林能够对农业实行必要的榨取政策，吸收大量的粮食以负担机器的费用和养活日益增长的城市工人。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中国在推行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量增加约 3%，粮食产量年增长率约在 0.29%（根据外国高级分析家的最低估计 到 3.78%（从中国统计数字产生的最高比率）之间。以增加肥料和农药为主的农业投资，每年增加 5% 促进了较高的增长率。但产量增长主要依靠传统技术：更多的投入劳力，通过双耕作物对土地更加精耕细作，以及更广泛地利用灌溉。一五期间，中国粮食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到 1957 年，即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根据官方数字，粮食产量的增加仅有 1.3%。工业增长是中共掌权以来的第二个最低点。与此同时，一五时期迅速的工业化伴随着迅速的城市化，因为工业需要劳力，城市的迅速扩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市较之不怎么景气的农村来说对人们有更大的吸引力。1952-1957 年中国城市人口增加近 30% 而农村人口仅增加 9%。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加重了食品供应的负担，而农产品的征收又赶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这就必然使形势恶化。尽管农村实行了集体化，在收购农产品方面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但城市

里 1956 年和 1957 年的人均食品供应量还是下降了。而且，棉花的生产也赶不上二棉纺织工业的增长速度，有时不得不进口一些棉花来填补原棉不足的亏空，而这样做又势必影响到重工业所需主要产品的进口。此外，由于社会的稳定以及公共卫生措施的改善，人口的年增长率由本世纪上半叶的 1% 提高到 50 年代的 2% 以上。总之，在人口成倍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计划的双重负担下，中国农业正在失去满足国家的全部需求的能力。

李皮特分析说 对中国的农民来说 粮食“自给自足”的基线可假设为人均 275—310 公斤，在人均 310 公斤的水平上，每天产生 1900—2100 卡的热量。这时可以断定，农业产量将进入剩余阶段，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自愿将粮食在市场上出售。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人均产量低于这个水平时，也不得不征购大量的粮食以维持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供应缺粮地区。1953—1957 年，国家通过税收和低价购买的方式征购粮食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并给进一步收购带来了困难。

中国经济的失衡，还反映在农业原料对轻工业尤其是消费工业的供应不足上。当时，大约 80—85% 的轻工业原料是由农业部门提供的，轻工业生产能力的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业部门在提供所需的原料上已经无能为力了。1957 年 烟草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仅为 52%，罐头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为 53%，制糖业为 66%，食用菜油业为 75%，面粉业为 68%，皮革业为 69%，只有棉纺织业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比较高，1956 年达到 94%，主要原因是进口大量的原料和这一行业生产能力增长的缓慢。

最后，这种不平衡在对外贸易上也显示出来。在中国的出口中，加工和未加工的农产品及副业产品 1953 年占 81.6%，1957 年占 71.6%。在整个一五期间，生产资料产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 90%。农业部门的增长缓慢意味着 包括一些先进

技术在内的进口商品的进口速度不能满足工业部门的需求。另外，由于农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进口结构便从生产资料产品转向粮食产品。60年代初这种现象果然发生了。

另外，城市工业化也并没有解决长期存在的城市的失业与半失业问题，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地涌入发展中的城市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领导人没有掌握能够认识自身困境的历史特性的数据。但是 1957 年夏末的粮食短缺已清楚地表明：有必要从根本上对他们的发展战略进行重新估价。

因此，尽管一五期间的综合增长是成功的，但它所体现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以重工业为中心、通过以国家收购价格从农村获得剩余产品为基础的迅速工业化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要获得高水平的剩余产品是不可能的。

到 50 年代末期，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越来越决心在农业上下功夫，认识到必须为加快农业发展采取一些措施。他们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他们可以开始一个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计划，把资源投向直接促进农业发展的工业上，这便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所采用的策略。另一条路是通过大力利用传统方法，尤其是加强水利建设，以增加农业产量。由于中国的决策者们不愿意将重工业、运输、国防和其他优先发展的非农业部门的投资拨充农业，而且，毛泽东本人相信，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机械化之前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过渡来解决。农业生产率可以依靠社会主义组织形式和政治控制，动员大量农业劳动力来解决。最终毛泽东占了上风，党被迫接受了毛泽东的现代化道路：将发展经济与发动群众和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化联系起来。1957 年 10 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毛泽东的“十二年农业发

展纲要”的冒进计划，从而平息了有关经济发展方针的争论。^①

一五计划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政治方面的。采取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结果必然造成政治组织和国家行政组织的苏联化形式的发展，即国家和社会的官僚化和正常化。毛泽东主义对管理简单化的偏好让位于复杂的日益增长的专业化机构；革命政党的干部转变成管理者和官僚职员；工人日益隶属于工厂管理者的控制；游击队多面手的革命观念为新建立的对于专业化的优点和技术专家的依赖观念所取代；随着新的等级制和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的出现，旧的平均主义观念破碎了；在工业化对专制的纪律、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合理性的要求面前，对群众和群众组织的创造性与自发性的革命信仰逐渐消退；社会主义目标被推向未来，并且部分地被仪式化以有利于直接的经济发展目标。

在正式的国家机关的扩展与集权过程中，特别是在那些负责现代化工业经济的发展与管理的政府部门的建立过程中，官僚化表现得最为直接明显。1952年，中国成立了与苏联类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指导工业化进程。1954年又成立了国务院以代替原来的政务院，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机关，它的成立进一步加强和形成了官僚的集权化及其复杂性。国务院统辖和指导着一大批处理经济生活的专业机构以及各种各样临时的或常设的委员会，如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以及科技委员会等，还有许多中央经济部门。数量最多、权力最大的部门都是与重工业的发展有关的部门例如只是处理机械制造的就有6个独立的部。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55-59页 所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第333-334页 李皮特：《中国的经济发展》第111-112页 安东尼·唐：《农业政策与成就》载《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大跃进》第2卷 引言 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 肯尼斯·利伯索尔：《从延安来的领导人的分裂》，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21-327页。

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有效的经营管理要求高度专家化的分工体制和以技术专长标准为基础的责任制。适应这种需要的关键是一个具有明确职责和权限的工厂厂长，他负责贯彻来自上面的中央政府的指示，并有能力在自己管理的工厂中实现这些指示。而对于工人来说，工业化进程意味着服从国家政策规定的、由厂长负责实施的日益严格的劳动规章制度。它还在工人队伍中造成了日益增大的工资差别和地位差别。比较熟练的工人被指定负责工厂生产小组的工作，或成为负责监督从前工人伙伴的监工。工资政策也越来越强调物质刺激，对熟练的、有专长的或效率高的工人发放奖金。这种工资政策在 1956 年达到顶峰，按照技术和产量的标准形成了范围很宽的工资差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前，工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独立地位，但是到了 50 年代中期，工会成为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工具，实际上成为国家管理和党的经济政策的工具。

不可否认，工人从工业化过程中获得了经济和物质利益，但是，工业化的实施方式使得中国工人对工厂经营活动享有的发言权并不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多。独断的管理体制使走向工人管理工业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希望破灭了，而政治生活的普遍官僚化又进一步使工人阶级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

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中，不平等表现得最为明显，城市的工业化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以剥削农村为基础的。虽然城市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农村经济却几乎陷于停顿。这样，便加大了日益现代化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经济差距与文化差距。

总之，官僚化趋势是由现代工业化的全面推进造成的，它的特征是新建立的对现代科学和技术专业化力量的信仰。“合理化”、“系统化”和“程序化”是当时的口号，它们反映了对革命传统的含蓄否定。在工业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宣布的目标逐渐变成一种仪式化的东西。虽然中国共产党依然热情主张社会主义与

共产主义的目标，并且毫无疑问热烈地信奉这些目标，但是他们实际的活动目标是迅速发展工业，实际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是那些最有助于工业化的观念——经济的合理性与管理的有效性观念。

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很快便被迫面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造成的手段与目的的两难困境。正如毛泽东主义革命本身是在农村诞生并得以发展那样，毛泽东主义者再次转向农村以复兴社会主义目标和日渐衰退的革命精神。^①

在这种背景下，大跃进的序幕拉开了。

二、大跃进的社会经济内容

就大跃进的经济意义而言，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充分发动闲散劳动力代替资本，以弥补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资金不足。中国经济的特点是严重缺少资本与耕地，而劳动力则相对充裕。一个有组织的、自觉的、竭尽全力地为创造资本而使用劳动力的运动一直到大跃进前还没有发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跃进体现了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全面尝试，企图在群众运动基础上把原来缺乏的一种资源因素（资本）丰富起来。这种做法对农业部门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就可以基本上实现不必增加额外投资的发展，从而消除农业对经济全面高速增长的羁绊，进而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主要是粮食的供给）。因此，其结果将为中国同时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打开绿灯。在1957—1958年间估计有1亿农民参加了水利建设。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是为了通过深耕、细作和密植来提高农业产量。

大跃进的另一个经济内容是提倡“两条腿走路”，这实际上就是技术上的“二元主义”即资本密集型的、大型的、现代化的企业

^①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第148—181页。

及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的和落后的企业同时发展，以便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来发展经济，同时解决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例如，当国家对一些骨干的钢铁联合企业进行新的大规模投资的同时，一切能够办到的地方也都在“后院”大搞土法冶炼钢铁。当时，现代化的大型企业由两部分组成，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建国以后迅速国有化的企业，以及苏联援建的企业。大跃进期间，后者在增加产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在 50 年代末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企业投入生产。但这些项目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是不成功的，例如，在黑色冶金业及机械制造业工厂中人均资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好几倍。而且，由于其规模和机械化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而需要大量高质量的原料，同时，在其产品的运输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在这种条件下对小型的、地方的小企业的需要就应运而生了。在一五时期，由于中国领导人将精力放在了重工业方面，它们未得到应有的注意；而在大跃进期间，它们却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①

艾克斯坦教授在评论大跃进的发展战略时指出，中国的大跃进或许可称之为纳克斯——埃考斯经济发展战略的类型。并无确凿的证据说明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否读过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但他们实际上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并带着某种程度的曲解采纳了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拉格纳·纳克斯(R. Nurkse)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化为资本——这构成了中国大跃进的主题思想；埃考斯(R. S. Eckaus)主张同时采用两种技术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这与大跃进时期提倡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密切相关。当然，这并不是说大跃进是预先周密策划好的一种战略，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大跃进是一场大运动。

^① 罗斯基：《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第 52-53 页；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277-280 页；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19 页。

大跃进的小企业政策起初在经济上是有部分合理性的。地方企业利用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无法利用或不想利用的资源，以较低的成本提高了工业生产；它们面向农业，生产适用于农业的需求，因而使现代部门可以集中于自身的发展。尤其是，成千上万的由公社建立的小商场、小工厂承担了逐渐进行的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负担。然而，在其他方面——生产的分散、强调自给自足和地方官僚的控制——大跃进的小企业远远脱离了它的早期战略。在这些方面，它们集中体现了毛的全民动员和反官僚的“理想”，试图为地方努力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手段和刺激。

总的来说，从上述意义上讲，“大跃进战略的主要观念毫无疑问地具有相当可观的经济效力”，因为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大办小型企业、技术上实行土洋并举等等，对于人口稠密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是行之有效的。所以说大跃进的失败不能说成是大跃进观念本身的失败，而应当归之于不切实际的愿望和技术不足。麦克法夸尔完全附和了艾克斯坦的观点，指出：大跃进策略的基本构想是正确的。广泛动员农民被经济学家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试图把剩余劳动力变成资本的一种合理办法。创办小规模“土”式工业项目可以看作是土洋双重技术的合理利用。

虽然大跃进由于在制订计划和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而归于失败，但是大跃进这个作为完全适合中国资源条件的发展战略的概念，对中国的计划和政策制订者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此后，这个概念又通过试错过程而逐渐被纠正过来。结果，在70年代，中国制订了一整套计划，打算把劳动力转变为资本和在某种意义上把它变为土地。可是随着这些计划的扩大，愈来愈多的劳动力被吸收进去，因此劳动力也变得愈来愈紧张了。这种经过调整的大跃进式的农业发展计划，通常是以大寨为样板，包括土地改良、

灌溉等等，一般还包括大大加强土地的利用率。

大跃进经济内容的第三个方面是计划与管理权限的下放。由于认识到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压抑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国在 1957—1958 年实行了分权改革，中央政府仍控制着国家资源的分配，但地方政府在有关劳动力、物资计划和企业日常经济活动中控制的权力大大增加了。充分使用地方资源和劳力要求将权力分散到地方有关部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认为，只有人民群众在自己的组织中真正参加了经济规划经济决策，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也迅速发生了变化。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由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组成技术工作小组。企业功能部门的专业管理由工业生产小组所取代。管理与技术人员的规模迅速下降，即便专业管理人员也从事日常劳动。这些实践试图反对社会等级和官僚主义，使管理更接近实际问题，缩小脑体差别，鼓励群众参加管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大跃进有许多合理的方面，然而，它却是以失败告终的，而且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为什么会失败呢？

首先，大跃进没有具体的计划，它更多地是一种社会幻想的产物，而不是一种类似于五年计划那样的经济规划。计划是基于目标和能力而认真制定出来的行动的蓝图，幻想是对形势的相互关系的观察；计划在本质上是经济方面的，而毛的理想则包括了社会动力的各种因素：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在 1958 年 1 月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被放弃了，新制定的纲要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55—59 页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 引言 第 4 页。

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20 页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283 页

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理想为基础的。这一理想表现出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的深刻认识，而这些矛盾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迅速的发展。但当时毛泽东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是提出了一个总的指导方针，他的头脑里还不可能在整个发展战略上有一个具体、确定、全面的考虑。此外，大跃进也反映了中国许多领导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缩小中国与西方以及苏联等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¹

另一个明显的祸源就是那种浪漫主义的想法，以为把人民巧妙地组织起来，便能增加生产力，认为精神比经济因素对生产更有效力。对于那些曾经克服过看来无法克服的阻力而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领导人来说，用长征精神猛攻经济问题以取得空前的奇迹这种想法是不难理解的。但这样做就使得大跃进的一整套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忽视一些必要的条件，这些必要条件就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和建设的转移不能伤害农业生产；劳动密集型技术能够生产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例如，它意味着，修建的水坝要能经受得住风雨的侵袭，在工程之前要就它们的可行性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等；小炼铁厂的产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其价值必须超过生产成本。这些要求在大跃进中被忽视了。在大跃进中，各个领域都无视技术标准，蔑视技术专家的作用 违反成本原则 结果所炼出数百万吨土钢 根本不能使用 造成资源人力的极度浪费。水利工程因缺乏地质调查与工程设计，严重破坏河流自然灌溉系统。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劳动力的强化使用必须与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同时进行，这意味着，如果劳动力投入使年人均产量增加了 25 公斤 而人均消费量增加了 50 公斤，那么持续发展的前景将是暗淡的，而中国领导人似乎没有考虑这

¹ 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14 页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55-59 页。

一问题。^①

5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环境也导致一种蔑视知识的气氛。百花齐放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反右派斗争极大地挫伤了城市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并且贬低了主要依靠他们的知识所制定的各项发展战略，结果，由此改变了人力资源的素质，为完全依靠群众性的劳动动员打下了基础，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在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中反映出来。到1957年夏秋之际，更激进的反知识分子气氛已经从城市地区扩展到了农村。无论在农村或在城市，反右派运动有力地提高了这样一批人的地位，他们相信只要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就能够完成被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视为不能完成的各项任务。农村的反右派运动正是这样推动了1956—1958年冬、春动员群众大办水利的运动。反右之后，在城乡各地都由原来重视技术专家变为放手发动群众，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内那些最善于做动员群众工作的机构将在今后的活动中充任更重要的角色。^②

大跃进还打乱了中国经济的管理体系，这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因为，大跃进方法的核心与合理的计划基本上是相矛盾的。

这首先体现在统计制度方面。虽然五年计划制度没有被抛弃但《六十条》中的第9条却播下了削弱统计制度的种子。在这一条中，毛介绍了一个生产计划3本帐的新制度。中央当局有两本帐：一本是必须完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希望完成的计划，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事实

^① 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119页 郑竹园：《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第11页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78页。

肯尼斯利伯索尔：《从延安来的领导人的分裂》，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21—327页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45—46页

上，这种双重计划制度并不限于中央和各省，它还往下推广到县级，因此又多了生产计划第四本帐。该制度的直接结果就是不断把目标提高。首先，当国家指标向乡村下达时，总是不断向上调整，然后，当接到来自基层的、乐观的预测时，中央当局再次将他们的指标提高，从而又产生层层加码的浪潮。其结果正如李卓敏所说的那样：指标大跃进。这种公布最低指标和对最高指标保密的制度在整个跃进过程中都坚持着，而且，即使当公开的生产产量预测在人们看来似乎是非常乐观的时候，毛自己还秘密地制定更加欣快的目标。这样，虽然指标仍然存在，但到了1958年，它们成了政治热情的象征，与现实已经完全脱离了。国家统计局成了地方党政机构用来刺激建设项目和展开竞赛活动的工具，它迅速失去了进行准确统计的能力。领导在好大喜功的地方经理人员异想天开而又无限夸大的报告中盲目飞行。感情用事，任意取舍到了绝无仅有的地步。

大跃进的分权、群众动员措施以及“政治挂帅”实际上结束了计划。分权使政府部门和银行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有关企业活动与能力的详细信息，于是协调与控制的功能就转移到了中央委员会身上，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党作为社会领袖的重要性而降低了中央政府各部的作用。但由于中央委员会权限不大和准备不足，由于首先要服从大跃进那种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它从事这种新职能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利用群众动员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就给意识形态上狂热的群众组织者以活动的机会；使中央很难驾驭地方积极分子，叫他们回到中央决定的秩序和程序上去，而经济管理所需要的，正是有条不紊的程序。大跃进全力动员资源所提出的需求，也超出了政府组织、行政官僚的能量，超过了它们的承受能力。过度的动员导致了经济、社会、政治组织的严重破坏。正是计划、组织与管理的毁坏导致了农业的大危机，这一危机而后

又波及到其他经济部门。

卡尔·里斯金还详细分析了导致大跃进失败的其他几个深刻原因。

首先是“原始积累倾向”。由于再分配政策如土地改革、国有化、集体化、税收、价格控制等，在 1949—1957 年间曾被有效地用于提高投资和贫困者生活水平，但到 50 年代末，由于投资率已超过国民产值的 20%，奢侈的消费方式已经消失以及收入的平等化，通过收入进一步再分配来获得投资的潜力已经很小了。在这种条件下，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就得放弃重工业的发展，但大跃进的方针却是要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共同发展，并通过“同步发展”而更快地发展。对先进的工业部门还将继续大量投资，与此同时将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三个经济部门共同增长，互相促进。大跃进解决这一矛盾的战略是：一方面动员至今尚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丰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仍然寻求利用从以前的地方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取得的资源建立小工业。而且，有许多制造家用器具、农具、工艺品的车间不久又转化为生产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工厂”。到 1959 年 5 月，只有 13% 的手工业者还留在以前的小合作工场中，从而造成了小商品的严重短缺。

“原始积累倾向”产生于以下几个原因。最主要的是以前的经验，激进的制度改革及收入的再分配对 50 年代初期和中期提高国家投资与贫困者的消费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强调“挖掘潜力”。毛泽东的经济发展观点不是西方那种固定资源供给的最优分配的经济学。他感兴趣的是，通过唤起劳动者的积极性来扩大资源的存货，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物力资源。最后，依靠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第 45—46 页，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20 页，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80 页，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49—50 页。

“原始积累”寻求资源的这两个基础又被农民社会中所固有的那种此得彼损经济关系的观念倾向而进一步强化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人人们记忆中几乎没有增长的经济中，将一个人的所得视为另一个人所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固定量的分配，而不是生产性剩余再投资的扩张，就成了经济准则。

其次是“重工业倾向”。大跃进的“两条腿走路”战略是想把现代工业企业集中于自我发展的生产能力上，使农业人口的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由地方企业来满足。因此，提高农业技术的主要责任及向农村供应消费品的责任属于传统部门的小企业。建立许多公社工厂就是力图完成这一任务。但实际上，这些企业产值的一半来自与农业无关的生产，而且产品的质量都很低。此外，大跃进期间，现代生产部门的重工业导向也出现在农村，对乡镇工业的生产结构产生了影响。

最后是“利润动力”。党和政府并不希望公社企业选择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因为国家决定的混乱的价格结构将使这种选择与国家的政策相矛盾。特别是，由于农业产品价格低于工业品价格，公社企业的产品无法与城市工业的产品进行竞争。因此，为了指导公社企业为农业服务，国家促使它们忽视市场信号。然而，在大跃进的高潮时期，由于国家对实物和财政的控制能力被严重削弱，公社在根据市场信号兴办企业方面有着很大的自由。农村为了增加收入，选择为城市企业服务的行业。^①

大跃进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迈斯纳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认为大跃进运动是为实现“现代化”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这种看法最能模糊大跃进的实质。诚然，寄希望于工农业生产来一个“跃进”确实是运动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唯一的部分。运动的另一个不可分割的也是更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希望在迅速发展

^① 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39—141 页。

经济的同时以同样的速度实现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按照毛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①

在大跃进的刺激体制中，毛泽东“政治挂帅”的思想代替了物质刺激。大跃进的经济政策试图不仅要发展生产，而且还要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意味着要削弱官僚主义知识阶层的优越感，缩小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差距。大跃进对组织与管理中的不平等的打击主要反映在通过大规模地降低收入差别来巩固集体和群众参与的政策上。在农村，同样的原则体现在“供给制”上。这种分配方法可追溯到延安时期，它本质上就是平均主义。^②

大跃进运动还有明确的反城市内涵。大跃进运动把经济和政治生活分散到相对自治和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整个设想，意味着彻底推翻了革命胜利后从苏联移植来的模式，同时，还采取了旨在削弱新的城市精英的权力和声誉的政策。强调“农村工业化”和将工农业生产结合起来的非常激进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及其居民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革命变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此相似，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基础的新教育政策，降低了以城市为中心、面向城市的高等教育制度的价值。人们寄希望于新型的农村学校，它们应培养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专业科学知识的“新农民”。大跃进运动中所执行的极端政策，反映了毛由来已久的对与城市大工业相联系的社会经济形式的敌视，这些形式包括：专业化分工、理性化的官僚机构、大型专业化组织以

①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260 页。

② 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38 页 所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339—341 页

及正规高等教育。大跃进的极端政策不仅对新的城市精英，而且对以城市为基础的国家 and 党的官僚机构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①

大跃进特别强调人的思想觉悟的作用及群众的思想。迈斯纳指出，在大跃进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迅速实现这场运动的社会目标只有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信人们就会像响应纯粹的物质刺激一样，对道德和意识形态作出积极响应；承认“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且相信会出现“多面手”的“新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将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对“人民群众创造力”的颂扬带有强烈的面向农村的性质，革命首创精神和有潜力达到高水平道德觉悟的花环，首先套在了农民的脖子上。施拉姆则把大跃进看作是毛的“军事浪漫主义”集中表现。他认为，毛不仅把战争看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冒险和对人类勇气及人类意志的最高考验，而且他的性格和想象力中的战争思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 他愿意用战争术语来说明经济的甚至科学的和哲学的问题。

大跃进还是一个“以积极的乌托邦主义和高度乐观的未来观为标志的时代”。当时已被推迟到无限遥远未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现在又变成了迅速完成的直接目标。农村公社不仅将带来经济奇迹，而且还将带来社会奇迹，即向以按需分配原则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跃进。公社将消除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甚至要促进国家内部职能的消亡。这些乌托邦式的社会革命任务不是作为取决于物质生产力先期发展的长远目标，而是作为当时的直接使命而被设想并加以宣传的，其实质在于，在创造马克思为实现其社会理想所规定的物质前提的同时，还要追求并实现这一理想的最高目标。人们设想，在一个就思想观念和精神实质还纯粹是乡村式的

^① 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 67—68 页。

迈斯纳：同① 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 年版 第 258 页。

背景中，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并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固有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信人类意识具有按照其指令塑造现实的力量，就可以使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和发展现代经济齐头并进。这种观点假定，共产主义的现状同它的前提条件是可以相辅相承的，共产主义的手段和目的因而也将是和谐一致的。^①

总之，从大跃进的社会内容来看，西方汉学家们大都把它看作是一场大规模的乌托邦试验。迈斯纳总结说：大跃进幻想中所宣布的社会目标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却不然。大跃进运动是个意义深远的乌托邦式的历史插曲，是一种对世界大同充满热情和期待的乌托邦，而且就马克思主义对这个词的贬义理解而言，它更称得上是“乌托邦的”。^②

三、大跃进的起源

麦克法夸尔在分析大跃进的起源时说：所有中国人事后的评价都是站得住脚的。它们反映了那些在冷酷岁月中生活并担任领导的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痛苦事实。但汉学家并不完全同意中国人所作的分析。在中国人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还是通过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对大跃进的起源做了另一种分析。

我们首先沿着费正清所特有的追踪史源的思路走下去。他认为：如果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历史传统的某些方面，就不能理解大跃进。中国历史的一个传统就是，国家当局对农村居民是无条件控制的。例如，习惯上5户10户人家组在一起，成为“保甲”，直到1000户人家都登记在一块，相互监督保证；为了工役和纳税，实行互相担保的“里甲”制度。从很早的时代起，中国统治者就用这种

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198-200页。

同^①。

③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376页。

办法在农村征集劳工，进行公共工程。总之，统治阶级一面向农村征税，一面告诉他们干些什么。纵观中国的历史，大跃进看起来就像是某一项古代巨大工程的最新版本。明朝重新凿通大运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成都附近修建美国 B29 重型轰炸机基地，都是从农村中召集民工干起来的。一个村长就可以奉命召集多数民工在几天以内完成偌大的工程。村民们就会带上粮食和铺盖卷 搭起席帐睡在工地。他们就地做活、吃饭、睡觉 把活 干完后一道回家。大跃进中修闸建坝、挖掘运河，不过是古代建筑重大工程（例如史前建设的安阳、郑州等都城）的翻版而已。指挥这些庞大劳动力，是统治者的特权。毛使用这样的权利是很自然的。^①

中国传统的另一部分是，一切中央命令都必须由地方当局实行，地方当局的士气、他们对中央的忠诚，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些地方当局用报告请求办法把事情向上级推，直到得到批准为止，而不是切实地为人民服务。大跃进中，中下级干部指挥生产时常有不切实际的情况，例如，种地时要把土挖得越深越好，结果盐碱渗到土地面上，复种太密，结果没法收割，等等。至于把农民生活改组为生产队或公社之类，也不仅仅是毛的独家发明。大跃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北魏时期，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有过各种农业改革。

再一个继承下来的因素，就是中国农民的顺从性，他们特别驯服地接受当局的命令，因为他们的和平、安宁和生活一切都依靠当局。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群众仍然觉得，大家都为了建设中国的共同事业而团结一致，所以中共领导人的一些幻想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人民信任毛，这一点就立刻为乌托邦主义和幻想打开了门户，因为大部分从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抽调上来的党的干部，狂热地紧跟领袖前进，并带动群众一起走。这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94页。

样，顺从加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产生群众性的歇斯底里。^①

几乎绝大多数的汉学家都承认，从最基本的层次来看，促使大跃进战略形成的动机还可以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倾向中去寻找。曾几何时，当革命遇到敌我力量悬殊的难以应付的情况时，军事和政治政策的中心环节便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来赢得胜利。因此，在此后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非常自然地把这段在野时期的斗争生活理想化了，把它看作是一段党和人民群众真正紧密团结的时期，当时，革命理想并没有被官僚主义和社会等级制度所玷污，动机纯正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克服了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坚持下来，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把人的意识和道德品质当作决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的唯一意志论信念，认为只有农民才具有真正的革命创造性的民粹主义观点，以及视落后为革命的有利条件的特殊信仰等等，这些革命战争时期的观念在大跃进时得到恢复并获得更为激进的解释，它们与解放后 10 年历史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结合在一起，最集中地表现为在大跃进前夜宣布的“不断革命论”。总之，如果毛泽东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衍生出来的社会政治后果表示憎恶，如果他对农业的基本障碍——这些障碍破坏了他所渴望的工业高速度发展的机会——表示不满，那么，毛泽东和其他高级领导人似乎是会回首祈求延安精神或延安办法，作为实现他们希望的力量源泉。发动群众、社会平等、打击官僚主义以及对物质障碍的蔑视，所有这些方法都将再一次被中国革命的缔造者用来拯救中国革命。^②

大卫·巴克曼 (David Bachman) 在最新出版的《中国的官僚、经济与领导 大跃进的制度组织根源》一书中从一种独特的角度，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76—277 页。

②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262 页 施瓦茨：《哲学家》载迪克·威尔逊编：《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 年版 所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337—338 页。

对大跃进的制度根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的这种分析被当作是对大跃进根源的最新发现。

巴克曼发现，与大跃进联系在一起、被称为毛主义的许多经济政策是由计划部门和重工业部门建议的。自力更生，工业援助农业，强调中、小工业分权等政策并不是由毛明确提出的，而是由中国计划部门和重工业总部的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为什么计划者们会倡导一种会毁掉其政治、经济地位的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会采用这些政策呢？

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大跃进政策的许多建议实际上是为了加强计划部门和重工业部门的地位。重工业和计划部门领导人提出这些政策既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考虑。从经济上讲，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可以表明农业增长落后、中国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中国经济系统的需求。从政治上讲，他们提出这些政策是为了对付财政、农业、商业和轻工业各部门想要改变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企图。后者提倡更多地通过市场、价格来管理经济，更多地向轻工业和农业投资，更多地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提倡一种缓慢但稳定的经济增长。1956年末到1957年初期间，他们在削弱计划部门和重工业部门的权力和资源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1958年初的计划中，重工业和其他相关的部门将得不到优先考虑。这些部门的领导人看到了这种政治挑战，并作出回答，提出了自己的帮助农业的计划，提出通过增加重工业资源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为什么毛和党采用了计划者们提出的方案呢？首先，毛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事务不清楚，这一点是毛自己后来也承认了的。因此，他们必须要依靠官僚和经济专家们为他们拟定计划。其次，财政部门的改革方案明显失败了。在财政部门控制经济的期间内，中国的农业增长进一步缓慢下来。当时对财政部门的方案作出这种评价也许是不公平的。因为到那时为

止，价格刺激是否得到充分的时间发挥作用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国领导人对这些改革措施进行估价的时间却已经到来，而估计的结果对财政部门是不利的。此外，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和财政部官员的某些观点是吻合的，当毛和中共把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上升为阶级斗争时，财政部的许多措施也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错误。最后一个原因，也是由于毛和党似乎别无选择。

巴克曼进一步分析说，这种状况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的中国政治是一种高度官僚化的政治，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形成了若干官僚同盟，这种同盟甚至在整个毛的中国和毛以后的时代都存在着。而且，在整个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他们的政策立场都是一致的。政治官僚同盟的形成和他们倡导同一政策的原因在于：单一的官僚机构没有力量提倡和捍卫他们的特殊利益，他们不得不在负责综合监督的高级领导人的帮助下，形成一个广泛的倾向或政策方案。官僚们由此可以组织在一起。由于他们的任务和资源环境自 1949 年以来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这些联盟和他们的利益也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①

毛泽东也是大跃进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麦克法夸尔指出，任何没有被北京的政治需要搞得裹足不前的人必然从史实中得出结论 没有毛 就不会有大跃进 没有毛 就不会有人民公社 没有毛 就不会有大炼钢铁 没有毛 就不会有大跃进的复活。^②

大跃进反映了毛的理想，反映了毛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看法。毛从大跃进中看到了把中国从苏联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大好机会；此外，他还看到了竭尽一

^① 大卫·巴克曼：《中国的官僚、经济与领导 大跃进的制度组织根源》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376—380页。

切努力发掘中国人民的能力和智慧的大好机会。他认为通过跃进就能打破贫穷落后的恶性循环，使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①

大跃进还反映了毛泽东性格与思想中的倾向性：在政治矛盾中，毛倾向的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倾向的是地方而不是中央；在社会矛盾中，强调政治上的红而不是技术上的专，强调的是群众和干部而不是官僚；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物质刺激；他倾向于一种“军事浪漫主义”的性格和想象力，而不喜欢稳定的计划。这些思想有助于分析大跃进波浪式的、无计划的、最终导致混乱的性质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的形成。^②

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想象力所左右。他们曾为再造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长征中将他们引向胜利的人，也定能引导他们建立一个社会纯洁、经济强大、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新国家。^③

费正清坦率地表明：如果不承认毛泽东把农民从文盲、疾病、营养不良以及散漫不团结之类的缺陷中解放出来的决心，那是不公正的。毛在这方面的理想主义，与世界上最伟大革命者的乌托邦目标是不约而同的。当毛认为普通男人和女人都可以由无私的、为社会服务的理想，而不是由利己的物质刺激激发起来时，大跃进似乎有一段时间是表现出来了。人的天性是可以转换到为更高级社会服务的。^④

四、大跃进的结果

大跃进以积极的乌托邦追求为开端，却以普遍的幻灭和灾难而告终。

1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55—59 页

2 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16 页 施拉姆：《毛泽东》第 259—260 页；所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342 页。

3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 第 376—380 页。

4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81 页。

麦克法夸尔指出：大跃进有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那里的人民应该认识到他们不必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地处于自然的枷锁之下。毛坚持不懈地宣传这一思想，将中国人民激励起来。尽管肯定有许多农民从动辄发火的基层干部那儿接受指标时，经验使他们持有怀疑态度，但无疑也有很多人由于想到他们可以通过一次巨大的努力摆脱贫困的束缚而欢欣鼓舞。然而大跃进的过火作法及其最终崩溃，可能使不那么富于韧性的人一蹶不振，对经济发展失去热情。^①

大跃进首先想要从生产上来一个大的突破。如果单纯从短期的数量角度上讲，那么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动员了大量的人力，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产值方面的确出现了大的突进。专家的各种估计表明，在 1957—1960 年期间，至少是工业增长出现了“大跃进”（见表 3-1-1）

表 3-1-1 工业增长率的各种估计：1958—1960(%)

资料来源	总产值或净产值(基期价格)	1958	1959	1960
刘一叶	净产值(1952)	19.6	27.0	—
刘一叶—李	净产值(1952)	19.5	32.2	15.7
赵冈	净产值(1952)	30.3	31.5	—
官方统计	总产值(1957)	66.3	39.2	29.0
罗斯基	总产值(1952)	45.0	22.1	4.0
菲尔德	净产值(混合计算)	42.1	21.5	5.1

资料来源：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32 页。

但问题在于，在单纯追求数量的冲击下，产品的质量和品种被严重忽视了。产品质量不过关，甚至不能应用，产品品种不对路，

①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7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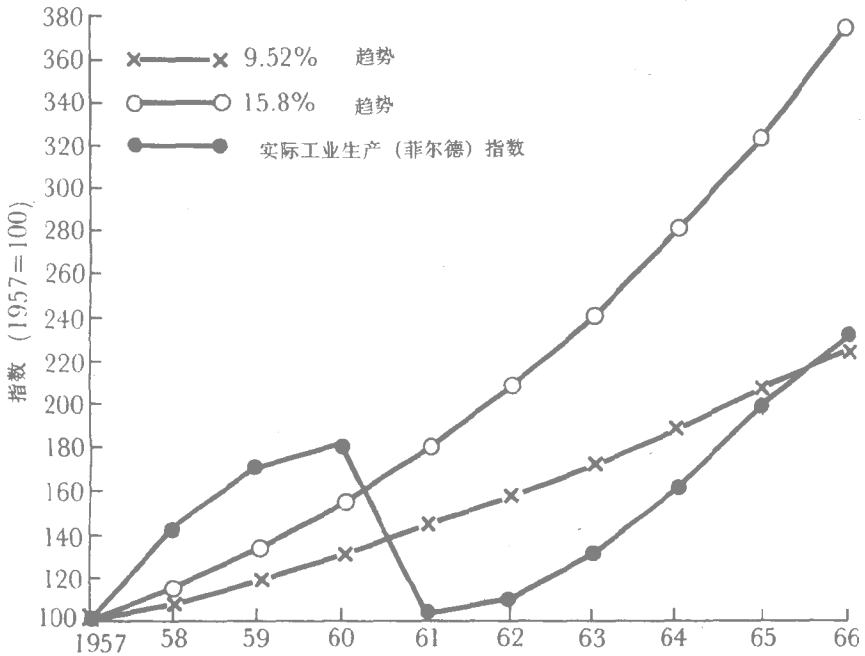
需要的产品严重短缺，而不需要的产品则大量积压。这实际上是对稀缺资源的一种严重的浪费，是同大跃进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正如一位汉学家所说的那样，大跃进的口号是“多、快、好、省”而实际上“多、快”完全压倒了“好、省”。

有关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卡尔·里斯金做了系统而有特色的分析。有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使中国丧失了“大约 10 年”的增长时间。为了说明这一论点的有效性，里斯金对两种假设的增长率进行对比。一个是 1957—1966 年中国可能的年增长率即 15.8%，一个是根据中国 1957—1977 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的增长率即 9.52%。里斯金认为，如果丧失 10 年的假设是指中国需要许多年才能恢复到以往工业产量的最高水平，如果不是取大跃进时期的而是取 1957 年的产量为以往的最高产量水平，那么丧失 10 年的假设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以后，实际工业产量从来没有低于 1957 年的产量水平。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大跃进的统计是有效的，那么 1960 年的产量即为最高水平，这一产量水平一直到 1965 年才恢复。从这个意义上讲，丧失 10 年的假设至少有一半的效应。然而，实际上，这一结论不应以 1960 年的数字作为分析的基础。

表 3-1-2 中国工业生产的实际增长与可能增长：1958—196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实际工业生产	142	173	181	104	111	134	161	199	232
假设趋势 (菲尔德)15.8%	116	134	155	183	208	241	279	323	374
假设趋势 (中国)9.52%	110	120	131	144	158	173	189	206	227

图 3-1-1 中国实际工业生产与假设趋势曲线:1957-1966



资料来源：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34-135 页

里斯金指出，为了正确估算大跃进的损失，一个更有意义的分析是看中国恢复其以往的增长趋势所需要的时间，在实际增长率低于历史增长趋势的期间里所丧失的产量或许是分析大跃进代价的一种粗略的计算方法。遗憾的是，究竟以哪一条趋势曲线为参照系更为合理，不得而知。一种可能的参照系是一五期间的 15.8% 的趋势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工业产量低于这一增长趋势的状况发生在 1961 年，以后就从未达到这一可能的历史增长趋势。然而，普遍认为，一五期间的增长率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因为：(1) 50 年代早期和中期的恢复性质的因素已不再发挥作用；(2) 苏联贷款已经结束；(3) 农业的缓慢增长将制约工业的增长。

另一种可能的参照系数是 1957 年以后的工业平均增长率即 9.52%，实际工业产量低于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情况发生在 1961 年直到 1966 年才恢复到这一历史发展水平。1961—1965 年这 5 年期间每年工业生产指数累积达 161 略大于 1962 年的趋势曲线数字。但这一比较忽视了 1958 年、1960 年实际产量（假设它是正常的，并且没有反映消费与投资的实际所得）高于历史发展趋势增长率的状况。对中国的工业化来说，大跃进期间所付出的实际代价相当于根据 9.52% 增长趋势所推测的 1962 年的工业总产量，它大于 1958 年的实际产量，虽然它不是丧失 10 年 但却是相当巨大的损失。

最严重的损失发生在农业，它导致了严重的饥荒，就一个国家和平时期所造成的生命的损失而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记录。

早些时候，在中国坦率地承认人口死亡的严重状态之前，一些外国专家根据最近发布的 1955—1965 年死亡率与出生率统计及 1964 年和 1982 年的人口普查所表明的人口年龄分布结构，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确出现了大量的死亡。这种灾难的发生，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三年期间，尤其是 1960 年 自然灾害几

乎遍及全国。但是，国家政策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长期的和短期的损害，同时，由于救济措施的延缓和混乱，也是致使粮食短缺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缺少实际的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建立的水坝和水库造成了土地的盐碱化，这是河南、河北和山东三个产粮省份直到 60 年代末仍未恢复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提倡的不合理的深耕密植方法，从农村抽出大量劳动力用于工业及运输，取消自留地，食堂的供给制等等，都是形成危机的重要因素，大跃进政策不仅对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还严重地拖延了经济的复苏。政治气氛迫使人们不得不夸大农业收成，使领导人无法对供给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地方干部为了给自己赢得荣誉和保证地位的稳定，不仅不去寻求救济办法反而隐瞒实际情况。过度的粮食定购是农村粮食短缺的首要原因。党和政府的决策使危机进一步严重，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提出挑战时，毛正在设法使大跃进的政策降温，对彭的清洗使政策发生逆转，这无疑加重并延长了饥荒。此外，正如毛所承认的那样，50 年代后期的中苏争论占去了中国领导人的大量精力，延误了他们对国内危机的认识和反映。

从长期的观点看，大跃进最不幸的遗产就是对计划体系的影响。从此以后，集权—分权周期一再重复出现。在集权强制期间，虽然产生了平衡，但却导致了一种僵硬的、无生气的经济，因而被迫走向分权；另一方面，分权虽然刺激了经济活动，但却导致了混乱和失调，因而又被迫走向集权强制。显然，这种发展模式与东欧的发展模式有着很大的类似性，这种增长中的周期性波动成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大跃进是同这种体制分离的象征，它采取了一种行政分权的办法。行政分权这个替代物，之所以失败，不仅在于做过了头，而且还由于它把官僚模式的许多弊病带给了地方，因此，决策中的主观与盲目、有效利用稀缺资源的制度压力的缺乏以及生产适应需求途径的堵塞，在行政分权的官僚

划体制中全部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大跃进最主要的组织遗产就是修正后的人民公社。毫无疑问，人民公社制度是长期压制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改革时期解散人民公社时，对它的主要指责是，它是国家直接地、不适当地干预农村事务的一个工具，压抑了农民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但另一方面，人民公社成立时的另外一些使命是将工业、卫生、教育和文化普及到农村。事实证明，在组织农村基本建设，促进技术变化、引进社会福利和发展乡村工业等方面，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是一个便利的工具，1962年以后在农村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很多是在大跃进期间兴办的。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正是这些半集体、半政府性质的组织在发展农村生产性、基础性设施所取得的成就，才使农业生产在它解散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成为可能。此外，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只有在比较大的和集体性的组织中才能完成。

同经济的灾难相伴而来的，是政治上发生了不妙的转折。大跃进是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失败与挫折，由此产生了不稳定情绪、缺乏自信和领导的分裂。

首先，它造成了社会与共产党之间的不信任，削弱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沮丧情绪，加速了中苏联盟的决裂。在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的同时中国又面对一个日益险恶的外部国际环境。

更严重的是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清洗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以前，中共的政治局领导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总要在国内某一地点开会，讨论重大问题，做出政策决定。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可以

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44—145页。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322页 奥克森伯格：《中国动荡的社会》。

大胆提出不同意见，激烈争论，但一经决定，大家就跟着干。但是现在第一次毛把彭德怀的建议列为对他本人的非法攻击。当时来说，毛是胜利了，但这是代价极高的一种胜利。它打开了宗派斗争的大门，封锁了关于政策的坦诚的讨论，使延安时期形成的“圆桌”发生分裂。毛对彭德怀的清洗，破坏了党的领导的团结，成为通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哨战。开始时几乎每个人都沿着大跃进的战略前进，但是大跃进的失败使许多人对毛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还证明了毛是可以倒台的，破坏了领袖们间的团结一致。^①

大跃进还激化了中国领导人在思想、政策倾向等方面的分歧。大跃进使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改造不能同时进行；不同的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将前者放在优先地位，而其他一些领导人则把后者放在优先地位。毛的这一结论和他对苏联的“修正主义”的观念使他越来越对中国社会中的革命信念产生了忧虑，而他的一些战友们则越来越倾向于官僚的和技术的观念。^②

然而，1960年大跃进结束时，并不像1957年毛的自由化试验结束时他同刘少奇和彭真之间发生冲突那样，发生过毛与他的同事之间的冲突，可能是因为那些能够把大跃进的失败作为政治资本的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从未表现出向他的个人地位和权威挑战的意向。这样，毛退到二线去“舔他的伤口”，让刘和其他同事去收拾残局，在经济领域中或多或少地开始推行带有“修正主义”的政策。对党员们来说，一定像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尽管这个时代不那么令人振奋，但较少盲动，比较沉闷但也更稳重。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82页；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264页；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奥克森伯格：《动荡的社会》第36页。

结果，由于毛对他的同事们所选择的走出大跃进后的萧条局面的措施感到不满，对自己的威信和权威下降感到愤怒。最为重要的是，随着中苏分歧的恶化，他对革命蜕化变质问题越来越担心。这一切使他大步重返政治舞台。大动乱就要来临了。

第二节 向人性宣战：文化大革命

一、概述

对西方的汉学家们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题目。从社会科学的角讲，研究何以在 20 世纪和平时期的中国会演出如此一场“规模宏大的人类悲剧”，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它还是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正是在这一危机中，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力量和它的脆弱充分显示出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心态与中国的国民性也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大暴露。这对一个人文学科工作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

但是，文化大革命也正是汉学家们真正“拿不到学位的一门课程”。他们辛勤耕耘，却很少收获；他们力图理解，却总是误解。这也难怪，对于置身局外且处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外国学者来说，研究中国本来就有一种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更何况研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呢？

通常，对于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间会使它们的形象越来越具体，地位越来越清楚。但对于文化大革命来说，至少到现在为止，时间也没能使对它的估价变得容易。正如汉学家们所说的

①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第 380 页。拉迪：《重压下的中国经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321-327 页。

那样：“文革中这类暴行的广泛而详尽的记录把我们带到了难以理解的地狱的边缘。……在一个以讲究自尊和崇尚教育而著名的国家里，当平均主义者妄图泄愤于知识分子时，儒家学说的影响又何在呢？有些事情尚有待于解释，理解中国似乎并不随着历史的展开而变得容易些。”^①

迈斯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也感慨地说道：文化大革命设置了许多道德困境和历史困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时期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离奇复杂和充满矛盾，会使得一切历史的类比都陷于无效。没有一个社会会这样公开地裸露出自己的矛盾、创伤和受到的损害，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怪、曲折和异乎寻常的历史事件，充满着如此之多的讽刺和悖论，以及如此之多的由于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总之，文化大革命一个如此多维的事件，从如此之多的方面涉及到个人、国家和社会，因此，没有一个现成的分析方式能够容纳它的全部内容。

因此，尽管汉学家们运用各种方法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当我们看到哈丁坦率地作出如下的结论时，也就不足为怪了，他说：西方完全重复了中国评价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演变。70年代，许多美国人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期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财产公有制、平均主义和民本观念及他关于“官僚主义和现代化未必促进物质生活改进”的判断的一种有益尝试，运动起因被说成是毛对一个社会的“杰出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即“模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线，减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被领导

①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540页。

②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390页 派伊：《官员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第109页

者更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确信文化大革命会设计出防止中国在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下经济停滞不前的社会纲要。当中国人改为批评文化大革命时，西方观察家也一样批评它。拿毛的“狂热”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比，拿文化大革命与宗教法庭和大屠杀相比。运动起因不再被描绘成“杰出的想象力”，而被说成是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种误断。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被描写为产生古代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最集权统治的一个“混乱和破坏时期”。由于“消灭知识分子，取消大学，损害中国现在的经济，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落后了十年。”^①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专家们重复中国的结论的同时，他们也确实经历了一种逐渐接近正确答案的非常艰难缓慢过程。

最初，很多专家按照中国的新闻和政府报道，对领导人的言论作了许多分析，他们对中国领导人的言行采取了很严肃的态度，其结果是将他们的言论视为他们的动机，进而由此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②派伊在批评这种方法时指出，这样就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政治是一个混杂着谋略的过程，尤其是在动机和倾向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学家们完全附合了当时中国舆论所进行的宣传，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反对那些在社会主义中国提倡物质刺激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要用革命的理想占领工厂、公社、军队和学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实”的革命，因为毛试图创造一个新的上层建筑。他将改造人民，直到社会阶级不复存在。他们同意中国的说法，即文革的目的

^① 哈丁：《中国在危机中》，载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212页。

理查德普雷格（Richard Preger）：《追求纯洁性毛的文化大革命》载《共产主义问题》，1969年11—12月，第12—25页。威廉欣顿（William Hinton）：《中国的转折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文章》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版。

是将中国引向共产主义。

以后，专家们在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和意识形态原因方面，在分析精英层次的动机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些研究强调的是领导者的意图、政策、幻想、意识形态等。所做的解释大部分停留在领导人的愿望和个人政治活动，以及青年人的激情上。一些专家在分析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时指出，意识形态虽然对参与者来说非常重要，但很难据此判断他们的动机。个人动机很模糊的高层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深居宫中，彼此接近但却远离公众的生活环境。

再往后，这种强调意图的方法为另一种方法所取代，新的方法强调社会群体、组织以及政治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卡尔默斯·约翰逊(Calmers Johnson)是重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利益的第一位学者，他强调毛只能在他所控制的背景中从事“急救手术”(emergency salvage operations)。在60年代初官僚体系已经僵化了，党的领导人已不能使中国共产党适应群众群体的需要。毛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利用学生和其他群体来清洗官僚。其他分析家，包括奥克森伯格和约翰·刘易斯(John W. Lewis)将政策主张与职业群体联系在一起。但许多社会群体的政治态度并没有确切的定义。约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不同意官方在运动中使用的群体概念。他将左派和右派作了如下的区分：前者是贫穷的、不充分就业的学生和工人，后者是由军队领导、党的官僚和政府官员组成的联盟。¹

以后的文革研究开始提出更深一层的问题：为什么整个中国社会会对个别领导人做出如此极端的反应？由此出发，专家们越

¹ 约翰逊：《中国从结构的角度看文化革命》载《亚洲观察》，1986年8月第1-15页。刘易斯：《中国社会的职业群体与文化大革命》载张春树等编：《文化大革命：1967年评论》，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吉廷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Vintage 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69-72页。

来越强调对“行为”做出解释，越来越多地注意千百万参与者的行动、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总之，是从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观念，转而研究作为深刻根源的物质基础，从而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分析。他们指出，参与文革的个人动机在很大程度上要从性格中去寻找。如果中国人也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相反的假设会使许多事情变得不可理解）他们就会为了自己和他们的群体去行动。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呢？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多维的社会事件，因此，专家们提供了许多答案，对它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解释。

1.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在这样一场运动中，业已建立的党政结构被粉碎了，正常的控制系统被回避了，有 500 多家报纸和杂志被关闭，权威思想、职业化思想和杰出人物统治论受到抨击，这一切使中国脱离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把它推向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左派异端”的理想王国，那是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延安式军国主义无阶级思想的混和物。在行为中则体现了非常悖理的两个方面：受到监督的无政府主义、按照新的等级贬低秩序和权威，为了政党的利益而摧毁党，为了国家的权力而摧毁国家。^①

2. 文化革命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宫廷革命，是从紫禁城到地方系统的一场巨变。至少在 1969 年以前，在很大程度上它只局限于思想领域的“上层建筑”，它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其全面的冲击越过了农村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口。与大跃进不同，虽然它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但似乎不大，并且是短期的，并没有在生产上出现全面的大跃进，也没有出现 1959—1960 年那样的全国范围内

①② 普里波拉：《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际教科书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 477—478 页。

的经济崩溃，对农民的自留地没有全部取消。总之，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并没有发展成为经济基础中的大跃进。至少在 1969 年以前是这样的。¹⁾

3. 施拉姆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农村反对城市、农民反对工人的一个运动”费正清也指出“几百万拥护毛泽东而反对他的敌人的游行示威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反知识分子狂热情绪很像一种农民运动。”迈斯纳也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首先是对城市优秀分子的一场直接打击，它还试图扭转工业化城市在政治经济方面对农村日益增长的支配趋势”。总之，它是一种间接的农村反对城市的斗争形式，是旨在批倒城市官僚和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技术权贵的动荡。

从表面上看，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中国的城市里展开的，重大战役都发生在城市，主要的角色是城市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城市处于动乱的那些年代，除了个人崇拜的形式比以前更热烈和广泛外，多数农村在政治上是平静的。但它的反城市倾向在许多方面是明显的。人们到处宣传土地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和推崇农民艰苦朴素的作风。从组织方面来看，军队主要是一支农民军队，毛从未忘记城市工人并未为 1949 年的共产党胜利尽举手之劳而只是消极地等待军队占领城市这一点。另一方面，虽然党是在农村游击斗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但党却极为重视城市无产阶级，这是刘少奇长期以来的倾向。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前十年政治斗争中所涉及的中心政策问题之一。刘少奇认为，只有先完成城市工业化，才能对农村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毛则主张把更大的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农村的工业化中去，给农民群众更多受教育和享受医疗服务的机会。

1) 施拉姆：《毛泽东》第 308 页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325 页 迈斯纳《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 69—70、182—183 页。

4. 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是毛试图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点与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精英统治倾向之间的矛盾。可以解释为毛对官僚主义、精英特权的日益增长的反感，通过将群众引入政治生活，试图扭转由党的官僚化所引起的等级倾向，他还想使群众就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达成一致。然而，毛对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问题的定性采取了走极端的方式，同时，使毛失望的是，当他想要消除或削弱党的组织的控制时，他就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社会中所有的紧张和矛盾都表面化了。这是汉学家们当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

5. 如涉及到有关人的问题时总会发生的那样，这里面也有关于权力和地位的积怨。麦克法夸尔指出，不管刘少奇可能多么谦虚，他对机遇和个性使得党的领导权落入毛泽东手中有些忿忿不平。刘知道，他对毛的支持是使毛得以巩固自己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能会使那忿忿不平的心绪变得更为复杂。有件事很明显，就是刘并不急于赞扬毛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他似乎也不同意毛使用“主席”的头衔。与刘少奇不同，周恩来同毛共事 38 年，他之所以一直处于显赫地位，恐怕在于他同毛的关系。周的行为的主要动机既是要幸免于难，也是要尽心尽力：他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革命，并且不允许自己由于考虑“面子”而停止为这个事业做出贡献。文化革命还可以解释为一个对自己由于早期的失误而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人的日益不满的行为，可以解释为一个年迈的老人受了那些阴谋夺权的野心家的欺骗和操纵。此外如同大的历史运动一样，嫉妒、挑拨离间、阴险的报复在事情的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江青对王光美的嫉妒。

6. 文化大革命还是一场学生运动。罗斯特里尔（Ross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1 卷，前言，第 3 页。普里波拉：《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479 页。斯卡拉皮诺：《发展政治学》，第 66 页。

Terrill) 对这场红卫兵运动与西方的学生运动作了比较系统而又颇具特色的比较分析。他指出：红卫兵和 60 年代的西方学生都受到同样的教育，即要重视公共运动，都是在冷战的气氛中长大成人的。核武器对他们的灵魂深处存在着很大的影响。他们都被这样一种观点所支配：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人类的未来。哈佛大学反越战学生似乎是某种程度上的毛主义者，因为一种分裂的价值观让他们感到焦躁不安，他们对美国政府以及影响其生活的其他形式的权威不再抱幻想，感到社会必须变革，并认为他们的思想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在道德更新的希望这一点上，他们的斗争似乎和文化大革命交合在一起了。反越战运动是基于学生们对其周围世界的政治分析。但他们也作了文化分析：过时了的权威正在妨碍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个人的自我实现。像红卫兵一样，西方的游行示威者对现行制度的僵化充满怨气。作为新左派，他们对旧左派的许多方面不满，同样，红卫兵感到，他们的先辈已经从社会主义价值观蜕化了。60 年代，中国和西方的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在西方的新左派和基督教文献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不希望将孩子看成是财产。”在中国 动荡的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也导致了家庭观念的松弛和家庭权威的下降

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美国的激进分子经常发现，他们对事业的依恋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道路，甚至改革了对生活意义的思考。而红卫兵的经历则不是要走向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而只是要脱离生活的束缚。西方人拥有的自由多于他们使用这种自由的知识，而红卫兵则是由上而下地受人操纵的。西方学生感到新的组织“不再服务于人的需求”因而想要成立新组织，他们是以一种相当常规的方式恢复他们的生活的，而红卫兵则没有建立新组织以取代旧组织。在美国，青年们考虑政治选择，而中国的青

年从来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政治选择。①

此外还有种种解释。

二、文化大革命的根源

费正清依旧从中国的社会历史中寻找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他说，在仍然是一群文盲的人民中间，他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掌握特殊技能、享有教育特权和特殊地位的统治阶级之下长达三千年之久，政府是由一批精选人物来经管的。在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开始了公众的现代化过程，但在农村的农民开始参与政治之后，他们便会投身于排斥外国和排斥知识分子的运动，以此作为攻击由来已久的一小批上层人士统治的一种办法，这是中国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自 19 世纪开始 中国革命始终是一场旨在打破过去的桎梏的斗争，但由于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独特的文化等原因，实行这种做法便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就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居住在农村的为数极多的农民；另一个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中国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 80%以上的人口和 10—15%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当今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这种状况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因为，在革命中，受到疯狂攻击的是被视为历史的桎梏的权势集团中的人士——知识分子和官员，他们同属上层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这种矛盾的激化提供了一个温室，农民对少数特权阶层的仇恨已经积聚了几个世纪之久，农民意识中那种固有的平均主义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孔孟之道间的对立，使得人们对农民那种报复行为不

特里尔：《我们时代的中国：从共产党胜利的英雄传奇到天安门事件及以后》，西蒙和舒尔斯特公司，1992年版 第 84—85 页。

难理解。同时，普通农民得到‘解放’成为公民后，并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对地位的竞争。过去帝制时代不过只有百万左右有功名的士绅，现在则有上亿名群众组成的深谙政治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百万有才干的年青人急于出人头地，要上好的学校，找好的职业，并谋取一官半职。不错，红卫兵是城市青年而非农民，但是可以肯定，他们是在人怂恿下、在带有农民劣根性的舆论气氛中才胡作非为的。这场运动中所暴露出的落后的农民意识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同中国过去相信太平盛世即将到来的民间教派活动的长期传统一脉相承，总之，这是对毛能够拯救中国人民的一种民间迷信的崇拜。它代表了毛泽东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这是社会革命的起因。如果对它施行抑制，它可能潜伏一时，但随时都会重新冒头。1949年以后，群众参与政治等于打开了地狱之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次全面“算总账”。^①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矛盾又增加了新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产业工人的心理状态也与毛想要建设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吸收了某些技艺之后，势必认为技术知识是重要的，因此，他们与当时那种认为死记硬背毛著作中的词句便是发展生产的万应灵药的正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而且，由于他们是在主要是农业国的中国发展起来的，从他们拥有的现代知识和他们享有有利的经济状况两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特权阶层，因此，与极端平均主义的潮流不合拍。这种极端平均主义也是要以工农兵来取代职业作家政策的特点之一。而且，过去的发展政

① 费正清：《对中国社会变革前景的展望》载《中国向何处去》第28-29页；《美国与中国》第314、325页。

策对城市、老工人、技术人员有利，而对农民和青年人相对不利。工人可能不如农民那样容易参与 1966年年中以后日益频繁发生的那种极端和原始的、在对外国人畏惧和憎恨的情绪驱使下的种种做法。

绝大多数汉学家主要寻求文化大革命的现实社会根源，并且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对立面的绝不仅仅限于几个激进的极端分子，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工人、学生及农民对党的干部怀有深深的不满情绪，他们反对的也绝不仅仅是“一小撮”被官方称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对官僚机构的傲慢和特权的普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人会响应毛造反的号召。

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僚政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前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官僚政治在中国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复杂的发展；在近代，传统的儒家官僚机构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解体，取代它的是各式各样的新的官僚机构。如果说，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基本上清除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和无能，那么它并没有消除官僚主义。实际上，正如现代所有的革命一样，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僚的中央集权化，这种现象既是国家统一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也是它们的结果。50年代，新的共产党官僚机构迅速发展，无论就其“理性”特征还是就其办事效率来说，它都是典型的现代官僚政治。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到了60年代，复杂的官僚模式的社会阶层的不可遏制的增长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即便在共产党干部内部也是如此。

施拉姆：《毛泽东》第308页。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43页。

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的中国，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为独立的官僚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比在苏联更为肥沃的土壤。

从政治上讲，中国曾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一个十分典型的农民国家，也是一个社会各阶级都相当软弱的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比俄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少，在政治上也不成熟。此外，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背负着深重的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包袱。在一个饱受政治分裂和贫穷之苦的国家里，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制，但中央集权制又进一步加强了那些本来就有利于官僚化的历史条件。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与其说是被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差别所分化，不如说是为更加突出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所分化。毛曾将此说成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随着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领导者不仅掌握着政治权力，还控制着国家经济。在这些既定条件下，庞大的官僚机构便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成为统治力量。这种现象并不使人感到惊奇 事实上 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从经济上讲，为了摧毁旧秩序，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中国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计划体制。在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物资短缺不能归谁负责。但如今物资的短缺则反映了计划不当。中共挑起了这副令人惊愕的重担之后，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结构。政治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在官僚手中，逐渐脱离了群众。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和各集体单位的行政人员一经设立，就越来越忙于公文报表，不大关心普通的劳动者，变得更像一个上层阶级，成为一批类似过去士绅的地方新贵。追求名利和拉关系的人重新出现了，他们通过“后门”谋取特权，想方设法使子女进入较好的学校和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工分制也被内部的人弄糟了，奖金或额外津贴只发给某些人而不发给别人，农村偷偷地采用计件工作制度。正像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要求享受特权那样，农民要求有更多的自留地，要求有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农村的革命精神正在烟消云散。新的

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是个精选人组成的组织，非常讲究地位和保密安全，从上到下控制得很紧。一旦各级人员配备齐全，居上层地位的人就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缺少革命精神，而下层人员则感到动辄得咎，毫无用武之地。革命家把旧的官僚赶下去，不过是承袭了旧政权的弊害，这个规律被干部与中国公众间的鸿沟证实了。在新的干部统治阶级内部有许多等级，首先有公社或生产队里的“地方干部”与那些从党、政或群众组织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之分。在帝制时代的官阶有二十八品，现今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地区工资级别有二十四级，农村地区有二十六级。最高级的工资约为最低级的九倍。由于这些工资级别带有不同的特殊待遇，它们就构成了成就和威望的阶梯。当这种制度在 1956 年形成时，就出现了差别鲜明的社会等级。

共产党通过许多方式试图遏制这种趋势，如增加干部的体力劳动、将他们下放到农村地区、行政分权和动员群众、以及后来的废除军衔制等等。但它的直接结果就是 1958—1961 年的经济混乱和经济危机。而且，革命战争时期的平等主义已经退却，根深蒂固的权力主义与官僚主义倾向难以遏制。实际上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可以根据资历、工资和职权在权力和地位方面找到其等级的位置。这种社会等级模式的发展是政权官僚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精英革命特征衰退的一个主要特征。1960 年从大跃进向后退却和毛退出政治舞台中心，使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力重新恢复，由于面临着为了纯粹生存而挣扎的境况，群众的情绪变得消沉并厌恶政治。情绪低落以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民群众是官僚主义始终兴盛的一个条件。社会经济的混乱和紧张都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和政治控制。人们普遍对毛主义的群众运动产生反感，热衷于经济的稳定性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安定。当时的时代气氛所提出的指令就是重建秩序。这一切为官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党证明自己是抵抗群众运动的

源泉。到 1966 年，毛准备以揭开社会分裂作为攻击党的官僚的手段，但这样他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①

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非常强调意识形态、政策倾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因此，在他们看来，从更真实的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反映了各种思想的冲突，中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是由于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应该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的。因此，对文化大革命渊源的分析必须包括思想观念、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政策等各方面的问題。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由五种观念体系支配着，它们是传统观念体系、革命观念体系、官僚主义观念体系、技术观念体系和极权主义观念体系。传统观念在农村和老一代人当中取得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虽然没有一个领导人公开提倡传统的价值体系，但它的潜在影响是很大的。对毛的神化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一部分；革命的观念在中国很有影响，其中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它所提倡的平均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官僚主义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它还得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年轻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和处境困难的人的支持。技术观念是一种比较新的观念，周恩来及其他一些官员，特别是负责经济的官员，是这种观念的信奉者。它得到了那些利益与之相

^① 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185 页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50 页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332 页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313-314 页 鲍大可：《共产主义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与政治权力》第 435 页。

这一部分的参考文献主要包括：奥克森伯格：《中国：动荡的社会》；索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 鲍大可：《毛以后的中国》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 年版 邹说：《文化革命与毛以后的改革》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施拉姆：《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

关的人——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职业军人、熟练工人的支持。官僚主义观念首先得到了官僚，尤其是负责党的机构的官僚的发展和支 持。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刘少奇。实际上，毛谴责刘的“罪行”之一就是他要 从毛的手中夺取政权，将之转交到党的机构手中。刘还提倡其他的官僚利益：等级、纪律、论功行赏。这种观念在官僚、工业管理人员和一部分军人当中赢得了支持。极权主义观念得到了三种人的支持：(1)那些认为此种政治制度是迅速改造社会的最好方式的人，林彪就是这样一种人。(2)其权力直接因此而提高的一小部分官僚，康生和谢富治之流就属于此类。(3)没有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又分享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和荣耀的人 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就属于这类人 他们极力神化毛 其因概出于此。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各种观念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着，没有哪一套观念能够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尽管毛努力要把他的思想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它们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在社会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一五期间，技术与官僚精英形成了政府政策的基础 在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革命的与官僚精英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在 1959—1961 年的危机期间，传统的与技术的观念受到尊重；1962—1965 年，技术与官僚价值观又成功地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的与极权主义观念的追随者与官僚的和技术观念的支持者之间的尖锐冲突。虽然这种冲突最终将大部分中国人卷入其中，但它是从最高层逐渐向下层展开的。

或者更概括地讲 在 60 年代，毛和他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地以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 发展问题的理论指导。与此同时，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则仍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以毛的“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 指导。两者的分歧由于百花运动和大跃进而日趋尖锐化。1960 年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的戏剧性事件反映了党内领导人日益尖锐的分

歧：一部分人将中国的社会发展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从苏联的经验中受到启发和鼓舞；另一部分人则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作为中国革命的标准。根源于早期政策的党内的这些分歧日益发展为个人权威问题，如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等等。

这种基本思想的分歧，又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体现、发展起来。

关于社会矛盾的认识问题 在工商业社会主义过渡完成和农业化的推行过程中，刘少奇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决定了，后来又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在刘看来，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中国，是落后的经济基础阻碍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因此，主要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认为通过经济手段、通过实行平均主义可以驱除匈牙利式的社会动乱这个幽灵。同时认为政治结构不需要进一步修改了，这就是暗指中共不需要整风了。

毛泽东认为 在中国 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 所有制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基本上”解决并不等于“彻底”解决。因此 他认为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中的不完善方面以及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缺陷仍然会阻碍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毛尽管完全意识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也不反对实行一点平均主义，但对他来说，仅仅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是不够的，而毛更加确信，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更加关心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坚持采取政治措施，以便消除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使人民群众赢得更多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关于执政党的改造问题 在共产党组织内部，究竟哪一种问

题最严重，对党的危害最大，是官僚主义还是主观主义？毛认为，由于社会关系的改变和共产党执政的原因，官僚主义最危险。为了消除官僚主义必须采取敞开大门来整风的补救措施。他强调监督，特别是来自党外的监督。

而刘则强调社会关系的改变，强调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干部所面临的新条件、新任务，以及伴随执政地位而来的主观主义的危险。刘认为要克服这个缺点就要加强理论学习因而强调党组织和党员自己学习和纠正错误的重要性，重新强调集体领导和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刘还把党的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同某些国家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相比，但在谈到国家干部时，刘把官僚主义作为一个主要缺点，并不遗余力地说明怎样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在谈到党员干部时，却没有提到官僚主义或者提议监督他们。刘固执地坚持这一分析暗示出他对毛关于领导和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原因的剖析最担心的是什么。一旦承认执政党的地位是造成官僚主义的基本原因，并认为官僚主义导致了人民群众同党的可怕的疏远，那么整风方法就可能是公开辩论，以达到不但要改善党的工作方法甚至要限制党的权力地位的目的。刘的这种担心无疑是正确的。在 9 年之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正是对执政党的地位进行了冲击。

在这个问题上，1956—1957 年百花运动期间的事件以一种低色调的轮廓揭示了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刘少奇在八大一中全会上——然后又在 1957 年冬——低调呼吁在维护党的机器的基础上反对毛主义者公开整风的政策，在 1962 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中，他再一次重复了他的观点。对党内再次整风的这种抵制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刺激。1957 年的公开‘鸣放’在下述意义上预示着文化革命即在 1966 年，毛再一次转向党外团体对抵制整风运动的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

关于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问题 对毛来说，群众路线就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领导方法，就是说，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但对刘来说，群众路线主要是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答案似乎在于对先锋队的党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在刘看来，重要的是党员应当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人民的事业；这种献身精神的纯洁性是他们能够正确行动的最好保障。而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有献身精神是绝对不够的，而且在党巩固了执政地位以后，情况尤其如此；他要求经常向正确的思想来源——群众学习，并认为这是正确行动的最可靠的保证。刘的态度带有精英主义的味道，而毛的态度则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这些不同态度清楚地显示出两人在监督中共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刘显然认为，党的精英大公无私，应当不受外部监督；党员可能犯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最好用党内办法来解决。在毛看来，监督是深入群众的又一个办法。

关于革命与建设的问题 在此还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存在着的红与专的矛盾。在革命胜利以后，是迅速贯彻革命纲领，还是优先巩固革命成果和新建立的制度组织？通常，毛总是激进政策的发起与推动者，而刘总是希望巩固革命成果，倾向于放慢步伐。例如，刘曾主张放慢合作化步伐，而毛则斥之为裹足不前的女人，要求加快合作化的步伐。刘曾提出过社会主义革命只在工业生产占国民生产 40—50%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集体化。相反，毛则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和上层建筑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

尽管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从来都是毛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他看到伴随着现代化发展起来一个庞大的官僚、技术阶层时，当他看到党的官僚日益沉溺于物质利益、革命热情日益衰退时，当他看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日益扩大时，便产生了通过在阶级斗争中发掘社会力量使中国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与为发展中国所必须的许多官僚专家、知识分子的利益发生

了冲突。而且，毛一贯相信，被灌输了正确思想的人会有百折不挠的毅力，能够克服不可逾越的障碍，勿需具有发达经济基础这样的物质条件就能创造奇迹。打破中国的官僚系统，毛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对暴力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刘少奇等人则认为，对社会实行进一步社会主义改造，应推进国家经济现代化。刘相信党的无可争辩的权力，稳定的国家体制，中央的统一计划，官僚机构的控制，科学技术专家的治国本领等在工业和其他企业管理中处于关键地位。相信享有特权的管理阶层的权威、等级制度、物质刺激以及大家接受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的差别等等。

领袖与党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又与权力斗争、继承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这些问题上，毛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毛说他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有证据表明，他要求拥有发表纲领性声明的权力，但并不要求绝对服从。毛可能一直都在试图对他的矛盾的两个方面给以同等的重视，但却从未成功过。但刘少奇所支持的看法却是非常鲜明的，即：毛虽然是全党的领袖，但“他也要服从党”。非斯大林化毛似乎已经开始担心他的地位了，尽管非毛化不大可能发生，但他的某些同事可能乐于利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攻击斯大林的机会来削弱他的地位。由于毛自己曾决定，为了防止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那种拜占庭式的争斗在中国重演，他要逐步把权力交给他的同事们，这使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他让出权力的意愿，被他对那些过于热衷权力的同事的怨恨所抵消。在 1956—1966 年期间，这种怨恨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成了促成“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思想冲突是各个社会都存在的，而且，以上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极为成功地共事了许多年。为什么这些思想冲突在 60 年代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才无法容忍刘呢？

特里尔对此的答复是：因为毛超越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党，而刘仍旧是那主义和党的信徒。毛刘的分歧早在非斯大林化时已存在。毛对来自莫斯科的震荡做出最终反应——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哪怕它还不完全是一条马克思主义道路；刘落在了后面，坚持正统观念。只有当毛失去了历史的信念时，才可能要清洗刘。^①

特里尔的这个答案太过于一般化，没有展开。相对来说，邹谠的分析则比较系统、深入、具体。

邹谠指出：毛和他的反对者由于政策分歧而展开权力斗争基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也不再反映大众的利益和愿望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所在就是，毛的思想占了上风，也必然会占上风，而与此种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政策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于中国条件的产物，扎根于落后的农村地区，在当时，它是符合中国的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成分很适用于解决分散的社会的一些问题；矛盾理论为在缺乏稳定、可接受的政治秩序条件下的不可避免的暴力冲突提供了依据；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学分析指导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积极地参与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过程；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概念适应、满足了为取得特定目标所确定的解决方案的需求；党的建设理论适应了那种重建新的政治共同体必须由高度组织的团体开始进行的特殊环境。在毛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胜利确定了毛的领导，并使他的思想合法化。

但毛思想中这些导致中国革命成功的因素也包含着导致以后中国动荡的因素。问题在于，在革命胜利以后，它几乎一成不变地

^① 特里尔：《毛泽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147—148页。

加诸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仍然成为形成、证实政策的基础。同时它的许多内容也由于毛本人的因素而进一步激进化了。更重要的是，毛当时被许多其他领导人和群众当作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的当然的权威诠释者。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已经大大改变了，毛的思想中的许多成分已经同中国的现实产生了差距。这些基本的、自 1958 年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被他推向极端的成分主要有：冲突思想、思想方式的两极化倾向、人中心论思想、政治统帅一切思想、思想观念比物质条件重要的思想。这种日益加深的差距由于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体制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断加剧。

中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政治精英在单一信念的基础上通过一种政治制度和群众组织建立起来的。在中国所有的组织结构和原则都同党组织的结构和原则相近。例如，人民代表大会的结构与党代会的结构类似，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推行到各种组织中去。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接受了现代意识并使之适合于中国条件的团体改善了一种组织体制、发展了一套实践经验，然后，将这种思想与实践模式推广到全国。但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在确定总的方向、在将各种共同体结合在一起、在政权的合法化、在谋取大众的服从等方面发挥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由于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和毛泽东在重大决策中的特殊地位，意识形态和政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样，对政府的政策的批评很容易变成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在这种条件下，1959 年以后毛的国内外政策的失败不仅产生了对这些政策的批评，而且对毛的思想也提出了疑问。

于是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个集团，它们的分歧不可能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妥协、调解或解决，因为意识形态的适用性本身已经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断判对错的标准也不复存在了，因为体现

在意识形态中的标准也成为争论的问题。因此，曾经发挥一体化功能的意识形态现在成为分裂的力量。党的团结消失了。毛和他的追随者遇到党内大多数的抵制或反对。这种对抗和意识形态与组织权威日益加深的分裂不可能由这样的一种政治系统来解决，它已经不可能解除它的领导人。与此同时，各级牢固的党的机构也很难清洗掉。这时，毛的健康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特殊环境将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引入了领袖人物超凡魅力的常规化过程，最后，这一过程转化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与常规化、官僚化的机构之间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建立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一部分人为了解决高度分化的政治共同体问题而产生的，这样一个问题需要一个彻底的解决和革命性的变化。其中，中国政治的传统文化也发生了影响：最高统治者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政治系统的独裁性质、对皇帝的个人崇拜、明确的精英的存在、个体对集体的依附 等等。

此外，汉学家们还在文化、心理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一点将在下一个问题中加以阐述。

三、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根源

60年代，在西方，对文化大革命的暴力的看法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见。西方的知识分子很少亲身经历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似乎比它的暴力更引人注目。只是在回顾中人们才更多地注意到，文化大革命在吞噬孩子，它的理想评论助长了暴力行为。

学者们最终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充满了愚昧、偏见和仇恨，它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痛苦磨难，是以广泛的、令人发指的对抗行为为特征的：家庭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阵线；父母和子女对立；亲朋好友

① 邹说：《文化革命与毛以后的改革》第3—66页。

变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同学之间刀枪相见。为什么在和平的环境中会产生如此血腥的行为呢？文化大革命是以在精英之间的分歧为开端的，但中国的精英政治永远充斥着政策分歧与权力的斗争，为什么这些分歧在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为强烈的憎恨感情？如果毛要维护党的纯洁根除阴谋集团，他就不能使用其他更有效的方法吗？精英冲突是如何转化为大众的冲突，使他们做出如此野蛮的行径？随着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真象越来越多的揭露，这些已经成为汉学家们越来越感兴趣的问题。

曾经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因为毛的号召所引发的，而不是以听从他的广大公众的动机为基础，红卫兵不是自发产生的，是毛为了自己的目的动员起来的。这种观点将文化大革命视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群众团体和社会集团的作用是非本质的。

这种观点遭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非议，认为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他们认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负有责任是不可否认的。首先，他点燃了那场燎原大火的星星之火。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已不再相信党了，于是他号召“小鬼”去冲击党。毛放纵红卫兵并向他们保证“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旨。如果红卫兵看上去像一群狂热的宗教徒的话，那么，是毛给了他们一部恰当的教义。毛在 1966 年同样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他把“造反”放在了中心。他相信，如果年轻人具有造反精神，那么就会造福于中国。这是一种愚蠢的理论，在愚蠢的实践中流行。红卫兵在造反中寻找满足是有他们自己的原因的。他们是失去的一代，突然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他们曾经上过中学，但是那种在学校里被唤起的希望却得不到满足。他们得不到大学里的位置，也找不到城里的工

塔克（Robert C.Tucker）：《大哥确实存在吗》载《威尔逊季刊》，1984年8月第106-107页。

作。一直受拘束的一代人正在达到无拘无束的顶点。看来毛忘记了“学生政治”与管理一个 7 亿人国家的政治之间的差异。“学生政治”具有不稳定性和动机混杂的特点。还有，毛在 1966 年 8 月要求放松公安部门对社会的控制和鼓动红卫兵“夺权”也是文化大革命暴力产生的必要原因，并可对它的许多方面作出解释。此外，毛的声望使得他一旦认可了造反，它就使每个心怀不满的人的参与具有合法性而且使这一运动迅速扩展起来。

问题在于，虽然如果没有毛的煽动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但是，并不能说毛是唯一的原因。他是必要的原因但不是充要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没有干柴，一个火花就不会变成熊熊火焰。实际上，在 1966 年 6~7 月的‘五十天’期间，在毛没有公开他的姿态之前，群众动员就已经开始失控了。如果毛没有否定中央委员会的代理领导，没有认可红卫兵，党有可能在当年夏季将形势控制住。但是，群众反对代理领导这一机会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虽然毛用了一年的时间试图动员群众，但直到党中央派出工作组之前，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且，当局势日益严重到不可开交，暴力横行时，毛几次设法收揽缰绳，但是很少成功。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他不曾预见的东西，就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事情发展得如此广泛、暴烈。

对领袖的崇拜也是如此。历史证明，领袖的超凡魅力是如此剧烈的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当时，在中国，对毛的崇拜变成了国家的政策，而且毛有意地支持了这一崇拜。但能否用它来对冲突作出解释呢？不能肯定。问题是许多人和群体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文革中群众的热望和激情来说，对领袖的崇拜与其说是

① 特里尔：《毛泽东》第 140 页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99 页 林恩·T·程氏译（Lynn T. White III）：《动混政策 文化大革命暴力的组织原因》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 27-28 页。

原因，不如说是一个指数。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正如与之相关的暴力那样，它是一种需要作出解释的现象，而不是对进一步的结果作出解释的因素。重要的不是领袖寻求盲目的支持，而是如此多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崇拜。

于是，学者们在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时，他们在方法论上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很自然地越来越从个人因素、思想意识因素转向 60 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对中国的社会政策以及文化进行了广泛的分析。由此也促进了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方法的转变，因为，对此问题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分析。

从政治结构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得出了如下的结构论：有理由认为，“修正主义”体制虽然有效地使经济复苏起来，但引起了普遍而敏感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的根源就是杰出人物统治论。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定水平的经济平等，与世界上其他多数国家相比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从政治角度上讲，它是一个对“异端”极不宽容的等级社会，它引起了人们的怨恨，而与激进的毛的思想就更不相容了。党在它设定的界限内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使它变得傲慢并脱离了群众，导致了动员背景下的两极分化。其证据成为对精英人物进行大批判的前奏，这导致了自解放以来轻而易举的大规模的清洗。以后的事实使这种情况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对当权者的攻击还必须要估计到遭到失败、幸存者会进行报复的可能性。其次，是“革命群众”自己发起对刘的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毛自己在公开场合上对刘少奇还保持沉默，虽然有可能推断说毛并不支持刘，但发起批判的正是红卫兵自己。虽然这些批判不乏夸大其词，而且通常是错误乃至骗人的，但它不是没有基础的。60 年代的经验及时地提出了一个警告：在政治僵化和杰出人

物统治论的背景下的现代化，会导致一种极度紧张的社会情绪，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紧张就会爆炸。^①

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投入了对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各个社会群体的成分以及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角色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些分析表明，根据社会阶级定义的群体在运动中是十分重要的，在最初的红卫兵运动中，其成员资格多半限于“出身好”的家庭（即出身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家庭）。1966年夏末，党对运动的控制权被中央文革小组剥夺之后，红卫兵组织不再是清一色地由“出身好”的人所垄断了。自此以后，表现重于成份，除了工农子女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也成为最出风头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者。罗森（Stanley Rosen）对两千名成为红卫兵的广州学生做了调查后发现，大约四分之三激进的组织成员来自带有“中等或坏的标签”的家庭。五分之四的保守红卫兵来自工人、军人和官员家庭。另一份材料显示，在一个对广东约 2200 各中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绝大多数（73%）参加了保守组织；而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61%）和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40%）则参加了造反组织。同一个材料还显示，“保守”组织吸收的大量成员（82%）是出身于干部和工人家庭的学生相反，“造反”组织吸收的成员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家庭（45%）于是，在红卫兵团体中出现了两大联盟。由于大批在前些年被送到农村劳动的城市青年都返回城市参加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队伍更加壮大，但运动中的暴力和派性斗争也更为严重。由于这些人失去了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便加剧了动乱的气氛。他们是青年中怨气最大的一部分人，他们对党怀有深深的不满，尤其怨恨党的干部子弟与军人干部子弟，因为这些人可以设法

① 迪特默：《毛以后中国改革的起源》，载《从毛到邓的中国政治》，第 51-52

不用下放，并享有进入大学的优先权，返城青年通常都参加比较激进的红卫兵组织。于是，这种社会分裂与政治分裂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加深并且越来越尖锐。运动中的‘保守派’与‘造反派’陷入了似乎是无尽的暴力与报复的循环之中。^①

红卫兵组织中的这种社会成份色彩在他们的行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革初期理论上红卫兵打击的是“四旧”（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而实际上他们通常是打击资本家、国民党党员、右派分子，以及这些人的亲朋和同情者。1966年10月打击的靶子从“四旧”转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每个单位党的主要领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女长期以来因受父母因素的牵累在教育和工作上处处碰壁而心怀不满，所以1966年底，当他们被允许参加红卫兵之后，在炮打本地当权派时，他们表现得要比本地干部和军官的子女还要积极。^②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充分暴露出来的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在过去属于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者在新制度下却变成了社会政治方面的保守者，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保守；而许多人出身于1949年前的中国特权阶级的家庭，在解放后却成为社会和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对这种矛盾并不难作出解释。在1949年以后那些主要出身于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革命者及其子女在政治地位、教育机会和就业等方面都受到关照，在新政权下他们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资本家、地主以及知识分子的子女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歧视，这种情况下教育系统最为明显。60年代两种教育制

^① 李洪永（音）：《红卫兵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韦斯特维尔出版社，1982年版；罗森：《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阿尼塔·陈（Anita Chan）：《中国社会结构的轮廓：广州学生看法的变化》载《世界政治》，1982年4月号；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26页。

^② 沃格尔：《广东改革》，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度产生两种类型的学生，从中学毕业后可争取进入大学互相竞争。一部分是知识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有好的家教，容易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经由考试获得高分是无法否定的。另一部分是党员、干部等新的统治阶级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被认为是革命的，第一等的，他们是升起的一代，而且毕业后可依凭内线关系分配到优越的职位。但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常常不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高，虽然后者的阶级成分被认为很低。这个阶级背景的差异在红卫兵派别斗争中常常造成相互敌对的因素。因此，那些解放前出身于下层阶级的人（至少是解放后接近于政治权力的人）与革命胜利后的秩序及其产生的新的不平等具有一种保守性的利害关系，而从前的统治阶级的后代却成为新的下层公民。所以毫不奇怪，后者热烈地响应毛批判官僚特权、实行进一步的平等的号召而前者则集结起来保卫党并且将自己的“革命”力量转向攻击那些从前的社会特权阶级的后代。无论学生运动在其他方面有多么不合理但在1966年夏天自发性学生运动中的政治分裂都是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的最合理的表现。那些出身于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学生，由于其父辈不是党的干部，因而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的人数不成比例地少，他们大致对等地分别加入了激进的和保守的“造反派”组织。^①

工人阶级也不是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加入战斗的，它也成为对立群体的阶级，即它分裂成老工人、技术工人与年轻的非技术工人、学徒两个阵营。前者受益于旧的工资和奖金制度，他们一般希望保存现有的政治秩序；而后者较差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使他们更倾向对党的官僚机构造反。在作为国家永久雇员的正式工人与大量的半无产阶级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之间存在着更加巨

^①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20页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03页。

大的鸿沟。后者主要来自靠近城市的公社农民及少量的城市失业者，他们只在一定的时间内被雇佣，随时可能被辞退，从而生活在最低限度的生存线上，他们不仅工资微薄，收入的一部分还要上交给所在公社、生产队，而且还缺乏正式工人所享受的最起码的社会福利和工作保障。人们最初至少在理论上论证说，合同制是一种缩小工农差别的手段，但现实中的合同制不过是为国家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几年，合同制和其他剥削劳动力的形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①

另一些学者在广东收集了大量有关这种团体的材料，他们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激进团体的成员是形形色色的，包括许多青年，甚至三轮车工人以及其他许多对自己处境不满的人。激进的团体不仅吸引了没能摆脱其“资产阶级”的标签，而且在妒忌情绪的驱使下联合工人和知识分子反对官僚。许多激进的出版物通常反对军队的政策，反对“大联合和三结合”这些最终使军队发生较大影响的团体，他们经常批评党的书记。激进派经常反对的是整个党的委员会而不是个人。他们有时认为派性有革命的潜力，强调对“党内当权派”的批评。

而右派团体则在行政领导和专家中寻找造反对象，它们的成员通常来自干部家庭。“工人”一般参加两个联盟（虽然他们更多地参加保守的联盟），因为在境况不好的工人和境况较好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有时，冲突公开地在有不同标签的群体间发生。攻击的目标是“牛鬼蛇神”，尤其是那些有资产阶级标签的非党知识分子。混乱给了许多干部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在地方巩固自己的地位，打倒那些在社会上有声望但却被贴上坏标签的可以取代他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单位内领导间的竞争是明显的，通常采取的方式是：文革前的领导，他们容易被指责对以前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432 页。

的工作负责，自然倒向保守的团体；代理领导却倾向加入激进的团体。领导在这期间并没有消失，但以前领导的下属总是得到更多的权力。^①

马克·布洛克尔（Marc Blocher）和戈登·怀特（Gordon White）对地方的一个技术单位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状况做了研究，发现，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保守的组织，而同样部分的‘坏的’或‘普通的’阶级背景出身的人却加入了激进的组织。^②

林恩·怀特在《动乱政策》一书中把上述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指出了这种社会分裂赖以形成的条件，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对抗得以发生的条件。这种条件就是错误的社会政策。此处所强调的长期的管理政策——以及小团体和个人在长时期里为应付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政策的无意识反映性行为——证实了一种既真实又具有可分析性的教训。这些政策就是：成份论、庇护关系和群众运动，它们是一种动员资源、节省费用的方法，但它们的效应只是短期的，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从长远的观点看，它们的广泛运用必然会产生混乱。

怀特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必须考虑到其目的的多样性。一些人受到攻击是由于成份不好；有些人是由于他们的日常官僚工作方式引起了不满；有些人则诱导了相互争斗的群众运动。只有各种群体、个人的行为规范的混合体才能对这种混杂的目标作出解释。对受害者和攻击者起影响的是各种新旧亚文化。它们不全是不正常的或起辅助作用的，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对以舆论为基础的社会分界线做出定义。把一切都归结于毛这种

罗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第 302-322 页。

布洛克尔怀特：《当代中国微观政治：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之后的一个技术单位》纽约夏普出版社，1979 年版 第 81 页。

解释过于狭窄，但有些解释又过于广泛，它们忽视了国家政策的具体力量和群众的力量。例如，中国文化中父权制那种固有的弊端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空想主义因素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因密切相关，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划分成份、操纵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些强制的方法却有力地强化了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倾向，因而其结果就是暴乱而不是和平。在中国文化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政策的倾向性。但这些倾向并不总是产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混乱。任何“文化”都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决定着人们的具体行为。一致性不是它的特征；它的特征是实用性。总之，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对抗现象作深入的分析，就必须对上述的社会政策进行研究，这些政策包括：

首领与庇护制度“庇护关系”制度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在中国的许多单位中，严格的家长制领导方式是相当普遍存在的，一个庇护人的领域就是一个单位；对那些受压制的人来说，反对这种关系是非常自然的。在文革前的岁月里，通常是领导中的一个成员在一个单位中占统治地位，在更高层的领导眼中，他对这个单位负责。他一般是一位男性的党的书记，被称为“带头人”。当一个人引起他的不满时，就会被“穿小鞋”。对一个下属来说，与庇护人的关系搞僵就意味着艰苦的工作岗位、缓慢的提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磨难。从苏联引进的制度使中国政治文化中庇护关系的传统进一步强化和正规化了。从此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争取个人自由的斗争，而不仅仅是为了群体利益。

划分社会群体 这里所说的群体不是指经济意义上的阶级，而是地位群体，也就是中国所常说的成份。在中国成份的标签种类繁多，包括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地主、小资产阶级、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知识分子、学生、右派、左派、中间派等。这些社会群体的政治、生活待遇都与这些标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而相关的权力则集中在少数领导者手中。在这种条件下，划分成份与操纵和运动相互作用，形成了对官员和城市群众的一种特有的刺激结构。

群众运动 如果没有使暴力成为合法化的运动，由划分成份和依附关系政策所造成的团体意识就不会在社会中发生如此大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群众动员一直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无不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运动的加速进行形成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出现在集体化中，而且还出现在土地改革以及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模式的一般程序是：先由各级政府进行周密策划和基础工作，然后，政治金字塔中的更高层提出的指标突然增加。在经过全力的紧急动员之后，新的目标“达到了”。接下来指标不断提高，直到最终目标完成为止。再往后就是调整，以纠正正在忙乱的运动中出现的问题。领导人在他们的文章中并没有讲清这种冲击波式运动的逻辑。

在这三者中，前两个政策都产生了群体和个人利益意识；其中，划分成份政策产生了社会集团，依附关系使庇护人成为拥护或反对、遵从或攻击的对象。群众运动政策提供了一种背景，使前者产生的意识转化为现实中的暴力，并使暴力行为合法化。正是这些政策的综合效应产生了暴力。而与前两项政策相比，群众运动政策更容易产生暴力，它在短期内可产生明显的效果，但在长时期内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因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暴力行为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单单是团体利益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造反集团”如此的自觉和积极。仅仅是以个人利益和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人们联合起来相互为敌。仅仅强调运动产生暴力不能充分解释，这种压制是怎样受到指导的，或者说明谁是它的受害者。个别的分析只是基本说明了不同的行为逻

辑，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是行政政策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其他研究者强调运动方法，认为它是极权主义的结果。安德鲁·沃尔德 Andrew Walder 开辟了现代中国‘新传统主义’的依附关系研究，但忽视了对行为的‘群体’或‘极权’的基础研究。他谴责在运动中得到集中体现的极权模式，但他没有指出服从的积极刺激，也没有表明一个制度可以在负刺激下运转。

总之，中国自 1949 年以来推行的政策积累了一种具有爆炸性的社会力量，它的爆发不是他们完全所能控制的。毛的作用是把导火索放在了炸弹上，这个炸弹不是他一人所造，其作用也没有一个人可确切地预见到。刘和毛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共同支持了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这些政策有助于党赢得了内战，也为以后的国内政策的许多胜利打下了基础。1949-1966 年期间，中国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都认为成份论、操纵群众和群众运动是必要的。与一些小规模运动和领导个人野心的即时效应相比，这些政策对千百万地方干部长期对群众所形成的压力，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根源来说，更为重要。

但林恩·怀特也由此得出了一种乐观的结论。他说，在中国会发生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吗？回答是否定的。广泛的群众暴力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已经使地方干部灰心丧气，尤其是在城市，他们不愿再使用那种产生暴力的政策。毛主义政策不能永远适用，许多地方干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由于决策者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这种政策现在就更难应用了。地方精英在 60 年代曾经纵容团体间的斗争，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互相争斗了。“永远不再”也已成为他们的座右铭。清教主义和君主主义在 17 世纪 50 年代的英格兰变得令人厌恶，在 18 世纪的法国，派系斗争也变得令人生厌。同样的现象现在也发生在中国。高层领导的分裂，如像毛刘之间的严重分裂，很容易再次发生。但如果城市中不存在广泛的失意、挫折，其结果就会完全不同。现在，地方干部对

导致文革的压力是持反对态度的，这种态度将继续对这个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

理查德·所罗门、阿尼达·陈和派伊等学者则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及其暴力行为的根源做了具体分析。

理查德·所罗门试图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传统的权威家庭结构来全面解释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在其长篇著作《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所罗门指出中国的父子关系一直是权威式的，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关系也是如此。他认为，对儿童最初几年的培养是不太严格的，但到 5-6 岁时便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 禁止儿童的一切具有侵犯性的行为。这种矛盾造成了中国人在权威面前的双重性特征：对长辈的顺从依赖和怀有敌意。这种心理素质表现在政治权威上，也产生出一种传统的矛盾心理。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这种受文化束缚的人格类型依然保留着。毛泽东决定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方法便是鼓励群众造权威的反。青年一代响应了毛的号召，在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中，造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阿尼达·陈对所罗门的这种解释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一种“新瓶装旧酒”，忽略了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历史的复杂发展过程。在她的《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一书中有如下结论：中国的年轻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权威人格”的某些性格特征，他们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他自己。进一步的观察又使她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年轻人身上所共有的权威信仰和情感需求，与其说来自他们父母的影响，不如说是在学校里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在这些年轻人中，谁对毛泽东主义的信条奉行得最起劲，谁就会被官方称作积极分子；而那些较少献身，也较少政治上成功的同学相比，他会发展更高层次的权威人格。当然，这并非说，是学校当局或共产党领导有意识地把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所表现的狂热信仰这样的权威人格的极端形式灌输到孩子们心中。党的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只是竭力鼓励那种与毛主席的教导相一致的高标准的道德和守纪律的行为，不难看到，正是通过这套体系，这些教导很快就产生了效应：个人献身行为成了竞争的内容，对于政治正统的夸大需求被灌输到孩子们的心中，而对于被排斥对象的强烈歧视却受到了鼓励。在 60 年代城市中学里“权威人格”已经成为这些毛主席的孩子们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它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作为对家庭影响的反抗，这种学校社会化的突出特征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方式，赖希和马尔库塞在考察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时，他们专门研究了国家权威取代家长权威的这种转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如苏联，也出现了这种极相似的现象，戴维迪·巴布观察到，在苏联，国家接替了很多家庭的社会化职能，儿童对国家充满了激情。党的领袖和党本身成为人们强烈的热爱对象。在后工业社会民主制度下，一个相同的趋势也出现了。随着家庭内部父亲作为权威形象的下降，青年人从同辈群体和大众文化中去寻找权威的代理。

中国与现代工业社会相比仍然相去甚远，还不具备工业社会的那种技术上十分复杂的传播体系。但是，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的普及和影响，组织良好的大众传播网络，在创建大众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少在城市中如此。争先恐后地学习雷锋的现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这种现象曾遍及中国城市中的教育系统。国家对价值观形成和行为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家庭的作用则十分微小，儿童们对党、国家、毛泽东和英雄模范的情感取向部分地代替了对家庭的情感取向。

阿尼达还进一步指出，那些过去形成的性格特征，也并不是永久固定的。作为文化大革命斗争后果的感情破灭，在这些同样年轻的成年人当中出现了政治非社会化（political desocialization）

现象。随着同辈集团的约束的解体和其对意识形态信仰的怀疑，他们对权威社会角色的顺从也就消失了。

派伊则从新旧文化交替的角度对红卫兵的行为进行解释。在他看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那种狂热，部分地产生于中国公众道德感情的心理基础中一种深刻而又不完善的历史过渡。现代中国在关于什么能够并且应该成为道德规范的基础方面经历了深刻的不稳定过渡。在西方，这种过渡也曾较早地、更为复杂地出现过；在中国，它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出现，并且只是部分地完成了。这种过渡是从历史的道德基础——关注成为正直、优越的个人——向现代的道德基础的过渡，这种基础是一种要求对所有背叛者进行惩罚的道德义愤感，这种义愤感是每个共同体都具有的。传统的儒教道德观追求自我修养的，追求成为一个受别人尊敬的优越的人。它是一种包含着为了自我的原因而寻求美德的道德。对其他人的行为来说，“我”的义务就是要成为行动的榜样。自我陶醉是维持传统道德标准的一种心理力量。现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逐渐地、在毛统治时代则更为迅速地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道德问题。他们日益体验到道德义愤感，这种义愤感支持国家以一种无私的坚定对所有的罪行进行惩罚的全面的刑事准则。从心理学上讲，这种义愤感是受别人应该从“不允许我做的事上滚开”这种思想所产生的忿恨和狂怒所驱使的。它的基本理论基础就是：“如果我不得不受到约束并受到了挫折，那么其他人也都应该受到这些磨难，任何打破了准则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不仅是以公平的名义而且也是响应公正的道德义愤感。”

在西方，宗教权威作为道德基础的衰弱使世俗道德的建立成为必须。其结果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兴

1) 阿尼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版。

起。而在中国，由于缺乏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的完善标准从来就没有强大的根基。相反，共产党给出了一种新的但只是部分吸收的与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标准。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推动力就是攻击那些被视为践踏这些新准则的人。

当西方的思想方式产生了类似的变化时，伴随着道德感情的心理动力学方面的变化也随之产生。道德很少再是对自恋感情的反应，即一个人热望被他人视为优秀的、值得尊敬的人，而是更多地对由严厉、不妥协的超越自我的表达所产生的侵犯行为的反应。在西方这种历史的过渡是同狂热、忿恨、危险、嫉妒联系在一起。在欧洲，当严厉、抑制性的社会化过程开始实施时，这些情感都产生了，尤其是在清教徒和中产阶级中间。这种抑制性的孩童训练不仅与中产阶级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同随着加尔文派教徒中资产阶级的兴起所提出的全面的刑法准则的要求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年轻人面临越来越多的严重挫折，他们对逃避同样的惩戒和不受他们控制的一切人感到极端愤怒，在这种社会化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充分的压抑。他们的忿怒尤其指向那些被认为是践踏了新社会约束准则的当权人士——因为正是这些人将这种严酷的思想强加在他们的头上，因此是他们受挫折的原因。对老年人的愤怒也是这种动力的一部分；老年人象征着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憎恶的，并代表着一个松散的、因而不受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抑制性规则约束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道德义愤作为一种强大的爆发性的力量自然会对准象征着权威和想像中的落后的老人；一旦暴力侵犯被释放出来，它的目标就变得模糊不

清，打击的目标范围也就扩大了。」

四、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所有的学者都承认，正如没有毛就没有大跃进那样，没有毛也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使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的是，虽然毛不可能精确地预见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任何后果，但是他所走上的那条路所具有的危险性，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他为使中国的政体成为 1966 年春天那样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他为什么要毁掉它再来重建？

更多的学者是从毛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毛对中国革命的信念中寻找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这些人认为，毛对于城市官僚主义有着极大的反感，这表现在他的一个信念上，即农民必须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受惠者。他的长期经验使他深深懂得，妨碍农民过好生活的是些什么东西。不过，毛在掌权以后，解放农民的思想不得不让位于另一种努力，即在中共领导和控制下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在这种努力进行的当中，毛忧心忡忡地看到那无可避免的中央政府机关和各级官吏机构纷纷建立起来。他看到新的官僚主义阶层承袭了古代君主专制政府高高在上，而农民群众一如既往地被压在社会底层，受新的卓越者的盘剥。他害怕旧时代统治阶级恣意控制农村百姓的时代又将出现。在 50 年代毛一再重复要保持革命目标的真实性：防止农村阶级关系的两极分化，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 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在党内的影响。60 年代，毛在党内的地位被削弱了，他看到国家现有各种机构对于他的业绩和政策广泛而又不断地表现出否定或抹杀的迹向。一群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使用伊索寓言式的文体，写出间接的讽刺或历史故

① 卢西恩·派伊：《干部与官员：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113-120 页、119-121 页。

事，对大跃进的失误和毛的群众动员策略加以批评。这一切使毛惴惴不安，毛以更忧郁的语调告诫党要忠实革命，指出，除非改变旧的社会习惯和党的领导方式，否则，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并且认为这是有苏联作为前车之鉴的。他看到，在苏联，社会主义政府已经被一个腐败的官僚主义所颠覆了，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一个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技术上受过教育、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成长起来了。他断言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正在增加，旧的政治文化仍然存在，它根植于千百万参与党、国家与经济组织生活中的那些人的本性和作风中。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到了60年代，他的这种论调越来越多了。对自己在党内权威的关注以及对以上问题的看法，使得毛下定决心开展阶级斗争，反对这种落后的影响，这种斗争最初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毛第一次指出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和权力斗争的角度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最终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该怎样看待毛泽东的这种观点呢？

专家们指出，不可否认，毛察觉的许多缺陷，的确深植于当时社会的现实中。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的党组织严重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高层党政机关人浮于事，工作平平，整天陷于官僚主义的事务圈里。在大跃进之后采取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但其代价是在技术高和技术低的工人之间、在拥有好地和土地自然条件差的社员之间、在天资聪颖和智力平庸的学生之间，在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民之间，差距日益拉大。总之，从现代专家管理条件下个人特权不可抑止的趋势和新统治阶级的腐败现象来看，要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那是困难的。同样，以西方一般对苏联共产党专政的评价来看，不能说毛的这种对苏联不信任的看

法是错误的。^①

问题在于，毛对这些问题的定性采取了走极端的方式。在与滋生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作斗争的过程中，毛由于无法正视伴随着他所创造的制度而来的某些冷酷的事实，便虚构出了魔鬼来解释为什么总是出差错。最主要的幻想就是被夸大了 60 年代中国的阶级的作用。他认定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出现是中国滑向修正主义道路的征兆，他要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寻找伪装起来的“资本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源。毛对一些阿尔巴尼亚军官解释他说的“走资派”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些解放前卷入阶级斗争的人，但 1949 年以来，在新的形势下，他们并不了解斗争的意义。确实，他表达了自己的逻辑推理与分析，但这种分析并未给予“走资派”之类的术语任何有意义的解释。他宣称，资本主义正在复辟，所以必须进行一场思想领域里的战斗——文化大革命；否则，社会主义就会退回到资本主义。但是这样一种分析判断很可能是错了。

总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责任，公正地说，应归咎于毛对 60 年代初中期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判断失当。^②

“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毛泽东过去思想和行动发展的自然顶峰呢？自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起，这一直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人，特别是在开始时，倾向于把“文化大革命”仅仅看作是一种老年心理失常。如利夫顿（Robert J. Lifton）和所罗门等人人都认为，毛的日趋衰老成为其确定自己权威的一个重要障碍，由于毛预感到他的死亡，对此他做出了“极敏感的反应”，发动了文化大革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86-287、299 页。

哈丁：《中国在危机中》，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 213-220 页。特里尔：《毛泽东》第 144 页。

命。派伊则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偏执狂性格的必然结果。①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不仅是毛一生的顶峰和最高成就，而且还是他过去一切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例如 麦克法夸尔认为，“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毛为中国设计的一条不同道路和努力。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代表着他对中国革命的毕生思考和努力的高峰。

在施拉姆看来，上面这两种判断都是错误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毛革命道路上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终极，而是他一生可能的而且完全合乎逻辑的结局。他暴烈和容易冲动的性情，他好走极端的习惯，以及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想方设法对党内批评他的人进行报复的动机等等，都促使他走到这一步。他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将临，并决心在有生之年使中国发生决定性改变，这种心境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诸种因素的作用。但因为他长期以来信奉必须考察客观现实的思想原则，也因为他对党作为必不可少的领导工具所怀有的感情，他遏制了自己，或者说，上述因素本应对他有所约束。可以说，他并非命定有这种结局，但是有这种结局也并不令人惊奇。

特里尔和迈斯纳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毛泽东主义的顶峰，毋宁说是一场温室中的游戏。毛要建立一个新社会，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受到的推动更多地来自对旧势力复活的恐惧，而不是对未来的憧憬。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乌托邦”运动，那么，与大跃进不同的是，它的特征是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消极的乌托邦。至于在必要的破坏活动之后将会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否

利夫顿：《不朽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卓越书社，1968 年版 派伊：《干部与官员 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158-163 页；所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411 页。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 第 12 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259 页。

必定会带来某种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办法，这一点含糊不清。^①

文化大革命还反映了毛泽东在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局限性。

在一个官僚主义传统深远的国家里，培养公民直接参与公众事务，以此作为一种矫正方法，这样一个目标本是值得称赞的。这也是毛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形成的政治风格的特点。但有理由怀疑，青少年狂热加上群众暴力，能否作为管理现代国家的方法而成为官僚主义的有效替代物。看来毛忘记了“学生政治”与管理一个7亿人国家的政治之间的差异。“学生政治”具有不稳定性和动机混杂的特点。²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大动乱呢？

如我们在第二节所阐述的论点那样，专家们认为，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他的能力和巨大声望，使他在公认的权力结构中享有很特殊的地位，以至于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虽然他也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通常程序。但所有的牌都掌握在他的一边，要出什么，或不出什么，一切由他自己决定。他操纵局势，使得中央委员会以及其他指示决议完全按照他的需要通过或批准，毛使党的领导人遵照一切服从领导的传统，从而束缚住他们的手脚。忠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能够预见到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们。^③

费正清还指出，毛所以能够如此，还有体制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毛泽东作为一个神通广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领袖积累起来的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对这种特权没有先例或风气可加以限制。之所

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 203—204 页；《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399 页 特里尔：《毛泽东》第 156 页。

施拉姆：《毛泽东》第 300 页 特里尔：《毛泽东》第 140 页。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97—299 页。

以可能，又因为他主持这样一个政权，它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基于他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意识。

关于这个问题的原由，所罗门进而强调说：从党的主席凌架于党的官僚之上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强调相互依赖文化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心理上的脆弱性。尽管有大跃进那样的错误，毛泽东仍然是国家统一与政治权威的强大的象征，党要抛弃他，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党仍然是主席声望和他所给予的组织的统一的俘虏。

但党内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有更有力地抵制毛的错误。中国官方今天在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更强调中央和地方同毛在 1967 年以后进行的抗争，1967 年的“二月逆流”特别受到称赞，说它是党对文化大革命“不断抵制”的典范。不过到这时，文化大革命已得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正式认可，武斗、冲突和混乱已不可避免。如果早些在反对毛的行动中取得更多的一致而不是对他的决定表示赞同的话，党的机构或许能够制止文化大革命。但他们没有那样做。在毛最初的步骤中，如逮捕罗瑞卿、批判彭真等，毛已经把几个对他的方案缺乏反应的官员赶下了台，并取得了周、刘和邓为代表的党的机构的默认。他们一向是惯于和这个伟大领袖一道前进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被引导到一座大山，一个火山口。^②

所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415 页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316 页。

哈丁：《中国在危机中》，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 217 页；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305 页 奥克森伯格：《动荡的中国》第 42-43 页。

第四章 难解的结：知识分子问题

这个阶级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问题，直到现在这个党还没有学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有这个棘手的问题是因为一方面国家要实行现代化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把知识分子改造得令他满意又似乎不大可能。

——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

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纭的主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第一节 从传统的“政治动物”转向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行为思想的演变

一、文化传统

佩里·林克(Perry Link)在谈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这些观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不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着手做起，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默尔·戈德曼(Morl Goldman)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的概括：在儒家文化的传统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在道德、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功能。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发言人、国家的公仆、统治者道义上的批评者和道德的倡导者。他们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他们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又成为传统价值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密切认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明显特征。这种认同关系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学而优则仕”。这一特征起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对知识的尊重，起源于中国的“仁政”文化。儒教强调指出，人性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改善的，通过适当的伦理教育和规劝，可使一个人成为有道德的人，随着其自身修养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导致与家庭、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中国的“仁政”要求统治者依靠美德来治理天下非如此不足以顺乎“天命”保持国泰民安，因而也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从事伦理教育和规劝

林克：《毛以后的知识分子与文化政策》，载鲍大可编《中国的现代化》，第81-83页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的必然是有知识的人，理解认识统治美德的，也只有那些儒仕们。因此，知识分子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地位，最终被赋予一种统治力量，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们有理由，也有愿望使国家发挥他们的才能。他们接近权力中心，指导公众，是统治者与人民的中间人。

中国的文字也是使知识分子成为统治者这种特权的一个原因。费正清和戈德曼都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汉语本身是一种极难学的语言，因而几乎成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它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社会工具”。它不是中国农民借以获得知识和真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因此政治就成了学仕们的奢侈品。文人学者是天生地、或者依照传统与国家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总之，在传统的中国，“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中国学者的社会角色和西方学者的社会角色是大相径庭的。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之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们立志于仕途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中国士大夫关于个人角色的传统观念阻碍他同其他人结合成独立的政治组织。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把一切独立的团体、一切的集体行为都视为一种威胁，因而极力加以压制。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群体而行动的，群体的权利从来没有被制度化，群体行动被视为是具有破坏性的。由于他们只能在意识形态上得到承认，而没有制度化的地位，同时又没有像欧洲那样的避难所，没有不同信仰的宗派冲突，也没有教堂同国家的分裂等等造成的分歧，因此，知识分子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共团体或自治组织去充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173 页；弗雷德里克·C·韦克曼（Frederic Wademan）：《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 第 45-46 页

分施加他们的影响。在心理上，群体行为也是令知识分子反感的，因为它降低了士大夫个人的身份，而士大夫却必须以这种个人自主性所带来的自豪感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的依附性的心理补偿。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出现政治和经济危机时，知识分子们只是非正式地联合在一起，表达他们与政府的不同观点。或者，他们与权势者结成同盟，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而这种同盟在派别斗争中非常容易形成，知识分子们寻求政治地位，而各政治派别也通过他们寻求支持。^①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讲到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地位时，是指他们具有这样潜在的力量，而实际上，总的来说，知识分子中真正能够踏进仕途大展身手的机会是很少的。大部分人都在当官不成的时候从事教书的职业，但这种职业收入微薄，他们的经济基础大大地妨碍了他们在道德上的义务，损害了其政治批评者的独立地位；知识分子最后一种职业选择就是留在家乡，组成地方绅士，反对苛政 保护地方的利益。

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间的这种密切的认同关系很早就存在了，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商代政治实体。经过以后各朝代的不断努力，国家发展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了旨在发现人才、利用人才的荐举、考举制度，文官差不多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录取的。

在中国在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如朱熹和王阳明等，都有做官的经历。在近代历史中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种知识分子与国家密切相关的情况。第一，19 世纪的中国学者接受外国思想并开始改革的进程非常之慢。第二，当旧秩序崩溃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精神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无论是改革家还是革命家，差不多都专心致力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 4-5 页。

② 郑竹园：《天安门事件的背景》第 68-70 页。

于“救国”。他们都仍然向往于国家。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发生了一种分裂，胡适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学者不参与政治，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伟大批评家鲁迅鼓励批评和出版自由，都是为了社会秩序的进步以及运用国家权力，决不是从政治中撤退出来。^①

从知识分子与国家间的这种密切认同关系中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后果。首先，即在经过了严密的考试制度和成为统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这些人就都成了经典学者或保守派，成了具有服从性的学者和思想家。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到 20 世纪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儒家学士，因此，这些人要维持现状。这也就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保守、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②

其次，由于知识分子必须同某个派别的领导人结成一定的同盟，这样，他们便会在某种程度上陷入身不由己的境地。知识分子不同观点的表达，即使是学术性的作品、理论性的文章、意识形态领域的探讨，没有相应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都是不能持久的。由于知识分子表达自己的能力取决于派别斗争及其政治庇护人的容忍，因此，他们对政策施加影响及提供自己的计划的机会必定是短命的，因为他们的庇护人的斗争和利益在不断地变化着。此外，对立的政治派别也会尽力地驱散或反对他们。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各个政治派别都试图利用知识分子避免公开的冲突，并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知识分子的争论只是推延了冲突，而不能避免冲突。一旦某一派想要战胜另一派，意识形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66—267 页。林克：《毛以后的知识分子与文化政策》载《中国的现代化》第 81—83 页。

^②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 3—4 页。费正清：《费正清谈中国》载《美国人看中国》第 291 页。

态的冲突就会无情地导致主要倡导者的权力斗争，进而导致他们的代理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牺牲者。

与上述同国家间密切认同行为相关的另一个行为是，知识分子还是统治者道义上的批评者和道德的倡导者。既然他们掌握着真理，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就有权对社会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他们是当官的还是不当官的，都把自己视为道德法庭的主判，敢于不计后果，甚至冒着遭到惩罚和处死的危险，把发展方向引向应当去的地方，而不是正在去的地方。同时，他们对百姓的福利也很敏感，容易为统治者的压迫和腐败所激怒。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高风亮节的儒家士大夫曾是专制帝王的不共戴天之敌。但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知识分子保守倾向的原因，他们改革朝政的热情以及坚守信念所产生的动力，都是为了重申和维持传统的政治形态 而并不是要改变它的基本前提。

在中国，“清议”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思想的行为，是一些知识分子一起为精神复兴而奋斗的“非正式的集团”。这种“清议”通常在发生政治困境或继承危机时出现。这些事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组织起来，解决在他们看来是由于政府或统治者的失误而导致的错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以便改变现实。一个著名的“清议”运动发生在 19 世纪清末时期，当时的这种团体是由受过人文主义教育、在政治上处于中下地位的年轻官僚组成的。他们也是在世代的冲突中形成的，以便得到由于受到政府中年老的官僚阻碍而受到挫折的提升机会。他们要求光绪皇帝把年轻人提升到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

戈德曼 《中国的知识分子》第 240—241 页。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 42 页 戈德曼：《党与知识分子》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231 页。

中国需要精神复兴，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还认为，政府有必要赢得公众对意识形态的支持以使政策能够贯彻下去。他们利用论文、思想辩论、历史、文学批评、诗歌、戏剧等方式影响公众及决策者的思想。在人民共和国危机时期，这种“清议”为知识分子的非正式组织提供了榜样。它是共和国知识分子批评的预兆，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对毛的批评。^①

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儒教并不从法律上保护忠诚的反对派，而是从意识形态上为之辩护。在西方，批评政府的错误行为，是知识分子的权利，而不是他们的义务，在中国则不是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权力，但根据中国的政治文化，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这样做。因此，在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忠诚和对信念的忠诚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知识分子批评政府偏离行为的思想及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政治变化的先决条件这种传统，由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下来了。即便是那些强调经济发展的自由化知识分子也认为，思想的表达终将导致政治领域的变化。同样地，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相信，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着力量与道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发表议论是出自他们的良心，是他们的义务。但也有不同，即当领导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则时，他们无法缩进自己的书斋或躲到山里隐居起来，追求学者或艺术家的清高生活。在当代中国，他们不能置身于这个制度之外。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批评多采用隐喻的、间接的方式，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文学，如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这种批评方式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继承下来。用隐晦的

^①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 5 页。

^②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 3—5 页；《党与知识分子》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323 页；林克：《毛以后的知识分子与文化政策》载《中国的现代化》第 81—83 页。

方式提出批评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在苏联，类似的活动也用伊索式的语言。中国所特有的，这种方式不独为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所采用，以便绕过审查，高层官员们也运用同样的方式。甚至提倡公开冲突的毛泽东自己，也用一种半隐晦的格言来表达他自己。政治领导人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同盟都担心公开的冲突会毁掉政权。毛主义者和党的官僚都寻求保持一种表面上的一致。如同在传统的制度中一样，这种间接的方法是为了防止派性的瓦解，为政策辩论提供一个机会。⁹

派伊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认为，幻想与幻灭的周期性的紧张是中国政治的特征，这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知识分子一直力图使自己现代化以便进入中国政治的核心。他们不断地为政治必然属于知识阶级这一不可遏制的信念所驱使。这表明，即使最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继承了中国政治的伟大传统。但是，现代化虽然会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却不一定有利于政治领导人地位的安全与稳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统治者疏远了，他们对统治者的道义上的批评是出于他们被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结果。他们天然的表达能力有助于突出中国政治的残酷性效果，因为，由于被拒之门外，知识分子将政治描述为由幻灭和疏远所笼罩着的愚昧的过程。在五四运动表明共和政客缺乏爱国主义之后，在昆明的教授和学生宣称国民党腐败无能之后，在毛泽东宣布不再有百花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表达他们的感情的。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潜能几乎完全局限于对黑暗现象持不满态度的角色。由于无法贯彻他们自己的计划，否认任何有力的建设性方法的可能性，他们便集中于中国统治者的道德与人格的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7页 郑竹园：《天安门事件的背景》第68—70页。

缺陷上去了。^①

五四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次运动试图创造一种西方化的新文化，作为解决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出路。五四的知识分子不仅是时代的最强有力的和最敏感的代言人，而且还从意识形态上为推翻旧制度和 1949 年的革命变化作了准备。

重要的是，在那些政治形势混乱的年月里，一些与任何政治团体无关的非官僚的知识分子组成了强大的知识与文化组织。由于政治权威的衰竭，也由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应是自由的、不受政治控制的。就是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如中国著名的作家鲁迅，也信奉主张多元论、公开辩论和知识分子自治的“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还造成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疏远，他们像传统的“清议”团体一样也参与了政治活动。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国家已经失去信心，但并不是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因没有根基或悲观厌世，而退出公众事务。相反，他们努力把自己同社会与人民联系在一起，他们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复兴和统一。这样，思想独立但参与政治活动的“五四”传统与早先的“清议”先辈们就成为 1949 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而深受西方影响的胡适和他的自由派学者们，则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学者不参与政治。不管他们其他方面的思想如何，就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而言，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但他们传统的决裂也不是彻底的，当日本侵略中国时，即便是他们也在政府里作起行政官来了。

同时，另一种分裂也发生了。在孔孟之道时代，学者训练出来就是从事公务的“学而优则仕”可 19 世纪以后革命的作家们，

^① 派伊：《中国政治的精神实质》第 43-44 页。

则将矛头指向社会的弊端和不轨行为，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与从事公务背道而驰的阶级中成长起来的。总之，传统的知识分子现在分裂成两部分，从事公务的和从事公开批评的。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共以新的国家权威来统治文艺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各式各样的中国自由派爱国者都参加到革命中来，他们对国民党缺点的攻击态度，自然地导致他们对中共方面出现的各种缺点也加以批判。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要求回避那种以暴露阴暗面为能事的做法。这种要求独立于政治控制的自由主义精神导致了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①

迈斯纳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还塑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另外两种思想特征。第一是民族主义与在文化上对传统的背叛这二者令人不可思议的结合，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特征来源于知识分子从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它反映出一种希望中国在那种为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支配的世界中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的民族主义愿望。他们的反传统特征，来源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将是否有助于维护国家和使国家强盛作为判断所有观念制度的价值的标准，由此他们必将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为国家自强于现代世界之林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必须从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智慧中去寻找，因为正是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给世界列强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其次，由于传统的中国信仰和价值观念不能服务于使国家强盛这一根本目的，因而必须予以抛弃，这也是前面结论的引伸。

第二是中国知识分子极端相信观念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并且始终认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然先行于社会、经济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173页；《美国与中国》第236页；《费正清谈中国》载《美国人看中国》第291页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8页、《党与知识分子》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33—234页。

和政治的变革。毫无疑问，强调和过分强调观念，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观念的重要性，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但是在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中这种趋势的强度和密度看来都是空前的，它意味着某种强调意识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的普遍倾向。

二、继承与革新：1949—197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伟大的变革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摈弃了过去，也摈弃了过去对传统和合法当局的尊重。但是，他们发现，纯粹个人抗议得不到真正的慰藉和满足。旧的君主政体被推翻了，但议会民主制却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替代物。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心理上说，他们追求必然和肯定；从政治上说，他们渴望安定和效率。由于旧中国天下的崩溃以及使人蒙受凌辱的西方人侵，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从历史上说受到了挑战。以上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毁灭自我意识和建立自我意识那些惊心动魄经历的反应，而建立自我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改造的核心内容。

卡罗尔·哈姆琳指出，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对朝代的忠诚，在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潮流中演变成为一种将对民族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的爱国主义思想。在 1949 年以后，这种国家主义很适合于“列宁主义的神话”，即党的利益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党是无所不能、一贯正确的；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忠诚和服务应该属于党。在现实中，党为了实现这个神话，对社会实行了全面的控制，对知识分子从思想到组织都采取压抑的政策。由此形成了一种对传统学者—官员的现代看法——人们可以将他们称为代表既成体制的知识分子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他们在心理、组织和经

①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16—19 页。

② 施拉姆：《毛泽东》第 235—238 页。

济上高度地依赖国家。新中国的国家政策一直在强化知识分子的这种角色，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也相信，这是他们理想的角色。

罗伯特·利夫顿在有关的一项研究中指出，50年代早期“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以对现政权的新式孝道来取代构成传统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孝道。他认为，重新确定个性的方向，即使对那些对现政权不抱同情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样做填补了前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普遍地实行的强烈反对父权所造成的真空状态。施拉姆就这个问题也论述道：毫无疑问，毛泽东个人是了解由于反对父权和反对以父亲为中心的传统所造成的真空的，他本能地懂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对必然性和权威的怀恋。可是他的理解有极大的局限性。由于他从未接触过现代科技知识，他未能了解某些成问题的态度远非是他斥责的“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相反，它们是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其他任何人只要想得和他完全一样，就会富裕起来。因此，当他努力把自发行动和纪律调和的时候，他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服从上面。^②

以上所述是专家们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主要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这主要表现在国家与知识分子的高度认同上。在当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是现在既成制度的一部分，正像过去一样，他们致力于现行体制中发挥作用，而不是站在现行体制的对立面。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即使对政府及其政策的表面上的不忠，也是一个

哈姆琳：《知识分子疏远的经济代价》，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308-321页。

利夫顿：《思想改造了极权主义心理》，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61年版 施拉姆：《毛泽东》第235-238页。

艰难的选择。他们很少异化，而是相反，颇为列宁主义。高级党校毕业生，甚至莫斯科训练的留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十分相信中共中央的统治。1966年，当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击政府机关中的、包括教育机关中的知识分子时，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是国家的独裁专制的反对者，他们反对的是毛泽东的民粹派主张。譬如作家白桦在1984年12月全国作家协会上说：“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必须是中国的真正的儿子。”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对中国的富强及中国政府的严厉与温和政策多少负有责任。这种责任之所以存在，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中国就是中国，它现在是，而且永远是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一个现实。因此，一个知识分子要站在中国及其人民的立场上讲话。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的观点能被政治领导人所接受，那自然是好事，否则，他就不能散布他的观点，而只能等待适当的时机。

同时，在现行的体制中，无论是在行政、教育部门中，还是在科学部门中，知识分子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政府和党的系统中，他们是编辑、作家，教育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对于党的路线问题，都能够发表长篇大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擅长于旧学者的技艺，如写字、绘画、做诗、考古、搞历史研究等。不但如此，他们也像真正旧时代的儒生官宦一样，形成互相尝试、互相攀比的高级士大夫阶层，如果有机会也可以为权力地位而雄心勃勃地争夺起来，如果派别斗争发展起来的话，他们自然也会自立门户，成为这个或那个帮派的成员。这些新的学者—官吏阶级也有他们通常有的派性和士大夫的个性。他们关于农民有知识和对于农民的关怀的强调，大部分属于理论方面，正如明朝和清朝时代的仕绅一样。社会革命也许不在他们手中继续下去，但是他们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官

僚阶层的坚硬外壳和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也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依靠政治派别的做法。这样，在知识界中充满了政治气氛、因此，每一次知识界的激烈争论和辩论，都是政治气候变化和重大政治行动的信号。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与政治庇护人的联盟使他们具有公开地通过新闻媒介，在较长的时间里，向更多的听众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机构。

当然，这种现象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例如，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与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结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同盟，以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在允许正式对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进行批评的同时，苏联作家们也要求对其他政治罪恶进行公开批判的权力，赫鲁晓夫迅速否定了这种权力。苏联官方媒介继续发表隐晦批评苏联体制的文学和戏剧。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苏联，发表不同政见的主要渠道是在体制之外，通过地下出版物或外国出版界。在中国虽然地下作品越来越重要但在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发表见解的主要方式还是像传统的知识分子那样，与现政权的政治派别结成同盟。像以往那样，这种程序具有准官方形式的不同政见的特征。

这一因素及传统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使得党统治下的国家制度——包括文化制度——充满了政治紧张和不稳定。尤其是，将一种虚假的统一加诸于一个多样化的复杂的政治体制中，对知识分子具有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它使得知识分子用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传统在当代中国又复活起来。当政治争论的其他途径被关闭时，政治观点的间接的表达就采取了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317-318 页 林克：《毛以后的知识分子与文化政策》载《中国的现代化》第 97 页。

②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 10 页。

各种艺术作品的形式。处于政治中心的各个派别都寻求通过文化知识分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某种程度的多样性为特征的中国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主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中心的冲突往往通过它们以间接的形式辩论。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需要艰难的选择。每个政治派别都承认“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因此，如果是一场集体化运动、反贪污腐败运动、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和推翻“党内资产阶级”运动，知识分子就要运用他们的知识使这些口号变得有血有肉。历史学家就要找到早期人们对官僚主义的痛恨，记者们就要选出适当的新闻以证明当前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符合人们的愿望，哲学家们就要表达当前的政策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找出适当的引语，而小说家则要创作出贯彻这些政策的英雄人物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政治服务”口号又进一步扩大为“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这实际上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再为文化大革命服务，而是为邓小平的改革政策服务。服从党的统一，以及指派文学的需要，使得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和利益，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但是，由于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永远包括不同政治派别的妥协，因此，在官方政治路线内部，总是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供知识分子作出不同的解释。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以一种间接的和复杂的方式反映了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同样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状况。

另一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思想行为中的许多因素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和思想发生了冲突。汉学家们将这种冲突集中在以下几种意义上：在传统的儒教中，知识分子作为道义的倡导者，是群众的自然的领导；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工人是社会的主导

鲁道夫·瓦格纳 (Rudolf G. Wagner):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年后的中国》第159-160页。

力量，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五四运动的继承者，知识分子倾向接受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要求一定程度的多元化，要求对社会的阴暗面、对政治弊端加以揭露；而按照党的要求，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必须歌颂群众、歌颂社会。作为现代化的推动者，他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决策地位。而在党看来，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他们是一种危险的阶层，首先要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

中国政治领导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对双方都发生了影响。它促使老一代的领导人使用更极端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知识分子和年轻政治干部的不满上升了。为了维持对社会的控制，中国领导人几十年来推行了将国家变为思想和组织沙漠的政策。在大多数东欧国家和苏联成为可能的事——一个老练的富有政治经验的旧秩序的挑战者得到发展，这些人在关键时刻能够勇于向前，而且有声望、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在中国得到了迅速而有效的制止。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满足于其学——士的传统角色，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则每况愈下。他们盲目地忠实于“朝代”，盲目地信奉于国家领土与思想的统一。其结果是与其他社会集团（工人和农民）的隔阂，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忽视和极度的漠不关心。他们没有设法打开其他的信息、争论和组织渠道，这些渠道将使他们成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并使他们向权威挑战。他们失去了成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机会，政治家能够在保持超出他们控制能力的范围内利用他们的知识。

戈德曼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两个部分，即激进的知识分子与自由的知识分子，并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作了深入系统的分

① 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年后的中国》第182页。

析。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彭真、陆定一和周扬关系密切。在北京市委中，有邓拓、吴含、廖沫沙。在中央宣传部中有田汉、夏衍、阳翰生、巴金、茅盾。他们的领导者是周扬。此外还有学术界的一些著名学者，他们当中有翦伯赞、吴含、冯友兰、周谷城等。

激进的学者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他们当中有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

自由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他们中的大多数既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都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如同他们的前人那样，他们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内批评他们的反对派。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们出生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的性格成熟时期都是在具有世界主义的上海文化圈中度过的，在那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西方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当共产党于 1949 年建立政权时，他们在文化、学术、新闻等领域，尤其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宣传部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激进的知识分子也都是学术辩论的行家里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 1949 年以前受到教育，他们成长得较晚，当时对西方思想的开放已不如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日益上升，因而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比较多，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地位比较低，属于文化界和学术界中较低层次的官员。在组织与行政管理方面也缺少经验。

在某些方面，与激进知识分子相比，自由知识分子更接近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激进知识分子像他们的清议先驱那样，寻求恢复传统的原则；而自由的知识分子则像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寻求基本的变化。后者认为，毛的革命原则不再适应日益复杂的

社会。他们想要将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指导原则应该是实用的经济发展，是科学技术与行政能力。同时，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也像 19 世纪末的前人清议集团那样，反对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反对的，既有世代方面的，也有个人方面的，既有机会主义方面的，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他们谴责他们的对手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们的理论基础与反对派是一样的，但他们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两个团体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政策之间的冲突。正如传统的清议运动那样，政治冲突总是交织着个人竞争与世代冲突。

关于这一点，瓦格纳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的原因之一，他说：不应想像，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被非知识分子的党的干部系统地分类、隔离和迫害。相反，从一开始，就有大量的年轻知识分子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加入了对老知识分子的批评。事实上，“四人帮”中的三个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江青是一个演员；姚文元是个文学评论家；张春桥是个音乐评论家。对知识分子的最恶毒的攻击通常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看来，在那些自称希望得到改造并接受他们在不久以前以最轻蔑的态度称为下层民众的工、农、兵的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 有着极大的‘自我憎恨’(self-hatred)。^①

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在大跃进之后明显起来。由于毛在 1959 年压制对其大跃进政策的批评，于是，关起门来解决分歧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冲突被公开了。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他们相应的政治派别，而且还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们特别关心的事物。这样，政治领袖们在利用知识分子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释放出他们始料不及，且无法控制的力量。这两个团体都认为，革命需要改变基本的

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 年后的中国》第 168 页。

价值观，但更符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官僚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认为，这种变化将起源于经济和技术领域，即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经济基础。而毛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则认为，除非进行思想领域，即上层建筑的改造，否则这种变化就不能持续下去。党的官僚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反对大跃进中使用的思想斗争和群众动员的方法，而主张采用传统的经济方法。相反，毛和他的同盟者则认为，大跃进中生产的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党没有对群众进行适当的教育，用经济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认为，党是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力量，致力于为建立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目标而进行无休止的斗争。而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官僚和自由的知识分子则认为，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机构，通过与知识界精英的合作逐步使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派别之间的区别是所强调重点的不同，而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本质的不同。自由知识分子还提出了自由的要求，即政治生活及文化生活中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和恢复某种儒家的价值观，如强调和谐、妥协等。他们不是想回到过去，而是要求一种更温和、更灵活的政策，以便解决大跃进产生的社会问题。党的官僚虽然愿意接受科学化和程序化，但并不想接受人道主义和多元论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允许一定程度的理论多样化，但不允许政治多样化。因此，在党的官僚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间存在着固有的紧张关系。

在 60 年代初，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强调毛思想中的主观意识方面，而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仍然详细阐述毛在大跃进中明确提出的信念，但由于大跃进导致的经济危机，他们现在更多地意识形态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强调这种信念。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过渡不能自动地使意识形态发生转变。因此，有必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虽然它们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但它们的影响仍然存在。在大跃进中被唤醒的用来克服自然、

经济约束的主观力量现在被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将主观意志与革命热情等同起来，试图通过动员群众的革命热情反对资产阶级上层建筑。1963—1964年激进知识分子使用的观点、用语和信条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激进知识分子还发起了摧毁思想与官僚机构的过程。他们成了中国的新左派。他们的观点不仅表达了其自己的思想分歧及个人的野心，而且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群体的真实的对社会经济的不满，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他们反对僵化的等级制度，反对老一代受过较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与年轻一代受教育较差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不平等。激进知识分子对老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攻击使他们开始为世人所知，也使毛得以用来反对党的官僚。

激进的知识分子是否清楚，对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攻击，使党的领导人处于易受攻击的被动局面，还不得而知。在多大程度上是毛怂恿了这个集团，又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利用了毛，也不得而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段时期里，毛和他的追随者江青、康生和陈伯达通常表明反对自由知识分子的一般目标和界线，但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们并没有直接监督激进分子的文章。激进分子在攻击自由知识分子时所使用的语言、所写的文章以及他们所提出的信条都是他们自己的。

激进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在1963—1964年时，还没有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走向极端。毛与官僚之间或两个知识分子集团之间的立场分歧还没有走到不可挽回的分裂地步。虽然激进知识分子响应毛关于重新开展思想斗争的号召，但他们的观点还没简化为一种陈词滥调。他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承认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在学术层次上交换意见、进行辩论，在多数情况下，是以非敌视性的、平等的方式进行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并不是站在中宣部的对立面，而是在宣传机构内形成了一个集团。

三、改革开放对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影响

改革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哈姆琳指出，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可怕、悲惨遭遇之后，在精神上摈弃了国家主义的思想方式，开始追求自我满足；这是当今发生的基本变化。在毛死后，多数有思想的人，尤其是红卫兵，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盲目信仰。犬儒主义和对政治行动主义的反感取代了对毛的崇拜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这种“信仰危机”是毛以后改革的主要促动力量。

第二，在 80 年代初，为了消除毛主义者的政治基础并在一党制内实行改革，文化与政治精英们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在思想上则出现了从毛时代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完全依赖关系到两者相互依赖关系的过渡。当现代化目标代替了阶级斗争时，国家需要知识分子来复兴经济的文化，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化”，以便为政权的合法化提供思想基础。在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论证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时，知识分子开始探讨和吸收西方的思想体系并复兴、反思了中国的文化遗产。同时在“科学与民主”这一五四运动口号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思想。他们还重申了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

第三，80 年代末，知识分子开始打破他们传统上对国家的经济上的依赖。国家允许他们开辟第二职业或离开政府部门创建新的企业，如咨询公司，乃至私人学校和门诊所。半自治性的思想库、报纸、杂志也开始脱离政府机构并得到了国外的、私人的或集体的资助。这些活动不仅加强了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还有助于改变他们的社会角色，使他们更接近于专家而不是教士。如一些年轻的律师为农民打官司，记者为专业杂志或报纸工作，四

通研究所起草保护私人企业的法规等等。^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理查德·迈德森，1988年3月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毛以后改革的社会效果”专题讨论会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对改革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声称，他“不仅是作为一个观察家，而且是作为当时中国文化争论的参与者”来撰写这篇论文的。因为，中国80年代文化热时期，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赵复三发表于1988年3月《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大量引用了美国的一本著作《精神特征》的内容，而迈德森正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同年秋天，这位美国学者来到中国，采访了大约50多名中国学者，在对这些采访作了总结之后，他得出结论说，他与中国学者的谈话，对于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问题提供了典型范例。

采访是围绕着赵复三的文章展开的。迈德森指出，问题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这篇文章写作的环境和作者所持的立场所引发的争议。这篇论文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上探讨了西方化问题。迈德森说，在他采访的学者中，许多人对赵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另一些人则对赵所处的环境表示同情。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赵表示不满则是由于：他写作像个知识分子，而他的行为则像个官员。

这场争论所表现的问题实质就是，在改革的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知识分子是独立于国家寻求他的知识、道德和经济基础，还是附属于国家成为一个写作官员，这是改革以来向中国提出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在改革以后，许多知识分子要求新的社会角色。他们开始渴

哈姆琳：《知识分子疏远的经济代价》，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308-321页。

望职业自治，要求确立知识界的完整，以维护这种自治。在某种程度上，一些知识分子是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享有这种地位的吸引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在更大的程度上，他们是由于改革后自身处境遭压力而提出这种要求的。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此深感苦恼，这种苦恼之所以如此之深，是由于改革使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抱有同样深的希望和欢乐。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哪个群体曾像知识分子那样怀着更多的希望和欢乐支持改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反右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直遭受迫害。而在 70 年代末知识分子被告知他们是未来中国的关键，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他们的知识。而知识分子自己也认为，他们将成为重新恢复活力的中国的领导者。但实际结果却是，虽然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相比，在 80 年代末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但他们在改革初期曾怀有的希望最终幻灭了。在十年改革之后，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大多数掌握中国政权的人并没有尊敬、信任他们，或听取他们的意见。虽然他们没有看到回复到毛主义时代的危险，但他们担心，某种导致思想改革和反右运动的社会力量仍然保留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就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进一步认为，这场运动只是渗透在中国政治中心的更深的反知识分子主义的明显的表现形式。这种反知识分子主义还表现在经济政策中 这种政策使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的收入大大下降了。当他们看到其他一些远远不如他们的社会阶层，如小贩 可以赚更多的钱时 他们更为忿忿不满。“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是 80 年代末在中国最常听到的议论。知识分子尤其怨恨伴随改革而来的贪污腐化。他们赞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认为，先富起来的是那些不该富起来的人。

知识分子还对改革进程的不合理性感到失望。他们倾向认

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建立在合理规划与经济和谐的基础上。但他们看到的却是日益混乱的分权化过程，许多单位和地区只考虑眼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

在知识分子看来，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专业最有资格使用权力。但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却是，那些在他们眼中没有能力的人管理的政府却忽视他们的建议。因此，知识分子们日益要求政治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既是他们免受运动迫害的唯一有效方法，也是他们发挥领导作用的唯一有效途径。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这是可行的，或者某些知识分子在目前还不愿意寻求这种独立角色。一些知识分子更愿意与现存的政治秩序妥协，而不想同它对立。但是，这些学者通常都是那些与高级官员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要求自治的知识分子与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存政治秩序妥协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不是以年龄、意识形态甚或党派联系为界限的，而是以与中国统治阶层的个人关系为界限的。但是在各类知识分子中甚至在那些由于个人原因愿意而且能够将知识分子角色与官员的作用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当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有着更大的感召力。

在知识分子意识到自治的方法以后，他们开始遇到广泛而又基本的挑战：他们必须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积极而又现实的见解。这是一项极不容易的事。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他们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没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因此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人们可以发现各种新思想的倡导者从系统论、信息论、计量经济学到存在主义、荣格心理学等等。正如在五四时期那样这些新的思想被一小群学者所采纳，而通常在其倡导者能够充分掌握这些新思想的词汇或理解其意义之前就被抛弃了。这种五四式的选择主义其源概出于缺乏自信。此外这种缺乏自信还表现在它是对传统观念的强烈攻击的姿态出现的。但问题不仅仅是接受所有的新思想而且在于由于中国的传统基本上是封闭的、静止

的、压抑的和不科学的，因而所有的旧观念都必须否定。这种做法并没有为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经济、政治问题提供一个适当、平衡的解决方案。

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严重的精神危机感反映在，而且有时也归因于改革所造成的经济、政治的两难境地。当改革打破了僵化的桎梏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有了新的活力，但这种活力是茫然的、不一致的，没有一贯的方向或公众的支持。到 80 年代末，由于权力下放，中央政府已经丧失了对中国经济控制、协调的能力，因此，80 年代末中国的政治经济似乎是在漫无边际地漂泊。同样地，由于缺乏职业运行的制度基础，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也在漫无边际地漂泊。

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党已经丧失了利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国知识分子的能力。对外开放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国际学者协会的机会。中国学者有了在国外学习、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杂志发表论文和向国际基金会申请财政援助的机会。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声望不再完全取决于其中国同事的判断。大量的研究得到了国外的支持。他们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道义上的支持。他们的工作不再受政客的严格控制。这一切的确有助于他们取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此外，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中国政府也鼓励他的学者、研究机构向企业化方向发展，寻求非官方的支持，包括来自海外的支持。与此同时，它还降低了他们的收入，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之类的运动也伤害了他们。在失去政治控制的同时，它并没有赢得他们的精神和同情。^①

中国知识分子以其“忧患意识”而自豪，虽然历尽磨难，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这种责任感。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职业者的社会责任的传统结合起来的能力。西方知识分子体现了一种普遍性的理想，反对和抵制政府的同化或商业利益的腐化，他们具有职业上的

献身精神，在实践中力求寻求客观真理。他们对那些最接近这种真理的人给予赞扬，对那些便利而歪曲真理的人给予鞭挞。他们保卫那些由于讲真话而受政府迫害的人。此外，学者职业由于寻求普遍的人类福利而使其活动拥有合法地位。他们支持“暴露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鼓励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的研究。他们奖励那些首先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者，奖励那些提出综合解决方法的学者，奖励那些超越一般智慧的解决方案。

在谈到改革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时，费正清和戈德曼各自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费正清指出：中国社会的结构改变了，今天的知识分子和过去儒家的士大夫很不同。1890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新的思想行为特征，他们开始不太服从强权。1895年后，他们有了现代的教育背景，很多人到西方留学，回国后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后来产生五四运动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社会很有价值的一群。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会被消灭的，但他们不一定是以旧的形式存在或表现自己（如“学而优则仕”），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农业官僚主义的社会，它现在是一个逐步工业化的国家，需要现代的技术人才和各种专业人才。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去做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就这点而言，他同意毛泽东的一个主张：既要批评自我满足的官僚，也要批评过分自满的知识分子。现在，你可以看到党的官僚的自满。他们认为自己是什么都能做的人，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知识分子进入这个阶层，有了特殊地位后，同样相信自己是什么都可以做到的人。政治官僚和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同的人，但这两者相结合，反而会成为一种专制控制。中国知识分子过分相信自己，这容易产生不民主的政府。因此，中国的某些官员应该受到批评，某些知

识分子也应该受到批评。

在戈德曼看到，将来，不同观念之间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这种争论最终会阐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传统模式。新的模式不会以西方持不同政见者那种连贯的、制度化的表达反对立场的方式出现，但由于与西方思想的日益接触，它也可能采取与现存模式不同的一种模式。在周期性地允许非正式的知识分子团体公开地、正式地表达不同观点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为人民共和国提供了一个构成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新模式的机会。它无意中损害了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实行统治所必须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②

第二节 冲突与和谐：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一、1949—1976年

新中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极不稳定的，呈现出一种强制阶段与放松阶段的周期性变化，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也随即表现出萧条、繁荣的循环特征。

戈德曼概括说 每一个周期的内容都各不相同 每一次的转变都取决于内部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外部事件。这种摆动还取决于这个政权在反正统力量和创造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因此在 50 年代，党贯彻了一场反对不顺从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 10 年的早几年，它强迫西方化的知识分子转向苏联；在 1955 年，它将持不同政见的左翼作家胡风及其追随者当作反面教员；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它攻击批评党的政策的知识分子为“右

① 费正清：《费正清谈中国》载《美国人看中国》

②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 244—245 页。

派”。但当知识分子越来越不愿意工作时，党便终止运动，接下来就引进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反胡风运动以后的 1956 年和 1957 年上半年的放松，以及所谓的百花齐放运动，在当时的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中都是走得最远的。在这几个时期内，党颂扬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甚至鼓励对压制他们的官员进行批评，党相信，控制的放松将刺激知识分子工作。但是当知识分子不仅对干部，而且对党的全面控制提出挑战时，党迅速发起了另一场思想改造运动。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对知识分子采取全面罗致的方针，不论其出身如何，只要肯参加革命的行列，都受到欢迎。早期的中共，与其说是代表工农阶级，不如说是代表知识分子。1939 年，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并在占领区内普遍实施。但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强制与知识分子的多元化要求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存在着了。

新政权建立初期，由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统治极度失望，他们是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党为了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也放慢了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步伐，对知识分子大体上采取争取与“包下来”的政策，以便进一步巩固维持新政权。思想改造工作在 1953 年前仍只是一般性的坦白和检讨。1954 年以后进入典型人物的思想批判，对俞平伯思想的批判标志着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发生转变，从强调知识分子尽力工作和专业特点，变为强调正统的政治观念和非专业化，这一思想改造运动到 1955 年批判胡风运动时，发展到高潮。胡风从历史舞台消失以后，反对“胡风主义”的运动依然继续进行，因为运动的真实目的是要对全体知识分子实施严格的控制，肃清他们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

的思想体系，使知识分子重新树立思想意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若干年的思想改造和批判作家胡风、哲学家胡适运动以后，知识分子表现出严重的消沉迹象以及从社会参与中退出来的趋势，更使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沉默下来，引起了知识分子对党的强烈不满。许多学者和作家都不敢再发表作品。自然科学也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动辄加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帽子，如称中医为封建医学，西医为资产阶级医学，米丘林学说为社会主义学说，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是资产阶级学说。在这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下，知识分子言必称马列主义，使学术界一片凋零。这使得一年前刚刚宣布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成为一种讽刺。在日益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对思想与政治的专制下，过去形成的知识分子的支持逐渐消失。知识分子在 1949 年时怀有的期望退化成为不得已的顺从。

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气氛所引起的知识分子的这种消沉的情绪对政权的巩固与经济发展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中共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十分缺乏的问题立即突出出来，国家愈来愈转向知识分子和各类专业人员寻求帮助，从而进一步使中共认识到争取知识分子合作的必要性。

1956 年 1 月，知识分子问题成了中共中央一个大型会议的重要议题，这些议题包括：一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许多党的官员并不想帮助知识分子解决他们复杂的政治问题，除了工作之外，不与他们交往，不信任他们，不尊重他们；二是必须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尤其是要提供更高的待遇和更好的设备。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十分缺乏，并概括地论述了党为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知识分子力量所准备采取的措施。他说，当前关于知识分子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

需要……”党在动员知识分子力量方面的三项任务是：更好地使用他们；信任他们，以便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保证给他们以更好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总之，党需要知识分子参加经济建设，为了充分利用他们的才干，就必须正确地对待他们。

周恩来的讲话以实际行动付诸实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工资增加了，政治、社会和行政性事务减少了，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在政治上，甚至还鼓励知识分子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关于科学工作的指示，在这年晚些时候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以便制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12 年发展规划。

为了进一步打破学术消沉和僵化状态，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试图从根本上消除知识分子与中共的对立状态。这一政策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改变过去以行政指导文艺及科学的方式，将文艺、科学与政治分离开来，允许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家有独立思考、辩论和批评自由。使长年以来思想被束缚在教条主义中的知识分子能够有一个宽松的环境。

总之，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相信，如果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发展中被赋予建设性的专业角色，并给他们机会对部分党的干部的僵化、教条态度进行批评，他们将会愿意服从党的事业，服从党的正确政策。从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道路范围内开展的党与非党知识分子间的批评性对话中产生的，将是政治团结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混乱。毛认为，鼓励群众对干部滥用职权的批评是防止党群矛盾的最好方法，而压制批评将会导致混乱。党员与“人民”之间的批评性对话将解决两者的紧张关系，促进社会变化，防止党脱离

群众。

1956 年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运动和其后的反右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最至关重要的转折点。“百花齐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给予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由 以进一步获得他们的合作 提高他们的技能 同时 通过知识分子批评官员，以改进官僚体制，提高其效能。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改革官僚体制做法的翻版，它反映了毛对官僚特权的担忧。最后，它也是同苏联出现的解冻遥相呼应。

最初，知识分子对这一政策抱有怀疑的态度，中国知识界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 放者不多 百家争鸣 鸣者太少”的状态。1956 年下半年的波匈事件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以很大的影响 它对“百花齐放”运动是一付催化剂。毛泽东认为 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国发生，就必须让社会不满情绪发泄出来，因而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进一步鼓励知识分子大胆鸣放。毛泽东当时的估计是，中国知识分子经过 8 年的思想改造 大多已经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开放言论不会导致大的震动。毛泽东的主张曾一度遭到党内许多同事的反对，但最终还是他占了上风。党开始大胆地推行鸣放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逐渐大胆地发表言论，畅所欲言起来了。但运动一展开，知识分子的言论很快超出了党所预料、规定的范围。到 1957 年 5 月，他们很快把批评升级，对中共政权也批评起来——对它的基本主张、工作作风、学说和实践 等等——都攻击起来 而且如此之激烈 甚至运动搞了 5 个星期就不得不结束了。

毛和他的同事们受到震惊。运动的结果表明中共改善知识分子关系政策的失败，他们迅速结束鸣放运动，很快作出报复，并推行了一条更激烈的知识分子政策，企图在最短期间内，使知识分子

工人化 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替代“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同时重新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同时进一步推行知识分子的下放运动和交心运动。在这期间，国家把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当作反右运动的对象 大约 40—70 万人，大都是比较有才能的知识分子 统统被撤掉职务 给他们贴上灾难性的“右派分子”的标签，定为人民的敌人。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谴责和反知识主义的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在大跃进运动中 更积极地推行使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打成一片的政策。

大跃进这场天灾人祸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使经济恢复元气，缓和社会的紧张状态，党除了在经济领域恢复物质刺激外，不得不重新起用在百花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在大跃进期间受到贬低、冷落的知识分子，以便得到知识分子的合作，解决经济困难，取代中苏分裂后撤走的苏联专家。他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批评，只要它能够产生一个有利于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气氛，并且不对党的政治控制产生威胁。于是，党又开始了一个宽松的时期。

党内的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倡以知识分子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作为发展的先决条件。陈毅在 1961 年 9 月的讲话中指出 多年的思想改造已经使知识分子成为可信赖的了，实际上他们不再需要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政治会议和体力劳动上。周恩来在 1961 年 7 月 19 日的讲话上也鼓励更大的言论自由。虽然周没有要求任何对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但他提出了一种与西方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更为接近的方法，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任何工作都是被允许的。文学和学术问题应该与政治问题相对地分开。周还要求将政治与职业更多地分离开来，他指出，一个虽没有花时间去学习政治但却做好了本职工作的人，要比那些喋喋不休的谈论

政治而无专长的人对社会主义更有价值。周的看法由邓小平在 1961 年的讲话作了总结：即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毛泽东在 60 年代初也表达了一种意见：知识分子的工作相对来说应少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 1962 年扩大的党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不一定是革命的；只要他是爱国的，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并允许他们工作。为了表示支持放松，他鼓励人们不要怕讲话，只要他们不破坏党的纪律或不从事阴谋活动。^①他承认，过去，党对一些持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的处理是不正确的，如对王实味，毛当时坚持认为，对王应该进行劳动改造而不应该杀掉。

为了寻求与知识分子的合作，党的领导人甚至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与特定的学术领域并无多大的联系，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与百花运动类似的是，宽松的环境甚至发展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学术问题也不再被当作政治问题对待。西方的科学遗产以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得到了承认。

但 60 年代的放松与 50 年代百花运动有明显的区别。在 60 年代，知识分子问题不允许转化为政治问题。放松一开始，党就要求在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以前就要求过做出这种区别，以便他们能在自己的领域不受政治干扰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现在党也要求这样做，以使知识分子不再认为党对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容忍是检验政治问题的一种约束力。然而，多数知识分子不愿意参与这种宽松，因为它的性质还不明确。像过去一样，他们担心，这种宽松是为了发掘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为了丰富文化和科学。由于在政治与学术争论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他们担心，学术问题会错误地转化为政治问题。

^①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

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党的官僚，都没有兴趣使知识分子的生活自由化或使其更为多元化。

而且，就在这期间，中国社会内部正潜伏着一场重大的危机，以毛泽东为首的激进派领导人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领导人之间的对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分歧正逐渐地尖锐化。中国政治冲突的序幕已经在学术界拉开了。在 1962-1965 年间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者、作家对诸如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农民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人的本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法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讨论。论战和讨论是学术性的，基本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和开放的气氛下进行的，但从其理论内容和政治含义来看，它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 1963-1964 年的中国，知识界的发展成了中国政治生活重大变化的晴雨表。正如在 1957 年和 1961-1962 年那样 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冲突的马前卒和那些在可能导致党的分裂问题上不想与毛直接对立的领导人的代理人。党利用知识分子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周扬的鼓励下，1962 年 11 月，在山东召开了中国古代圣哲孔子逝世 2440 周年纪念大会 据说 大会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确定儒教关于仁慈政府的美德，以冲淡毛使政治对抗尖锐化的努力。之后不久，在 1963 年召开了一个与上述论调大相径庭的全国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大会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日益激烈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同时“帮助他们”同广大的劳动人民 同工人、农民和战士打成一片”。劝告他们在工作中“不要躲避或掩盖政治矛盾之间的斗争”。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所发起的旨在反对在他们看来得到党的领导支持的 知识分子所宣传的政治“修正主义”的方法之一。毛泽东警告说，除非知识分子改造自己，否则总有一天，他们会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毛泽东看来，观念并不仅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思想本身就是一股决定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方

向的历史力量，纯粹的学术争论并不足以改变形势，还需采取其他措施。1964年初，是中国知识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这一年的2月毛泽东提出了既简单又严厉的补救措施：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分批分期下乡下厂。同年6月他号召按照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斗争路线进行一场“整风运动”。他指责说：在过去15年里，知识分子“当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深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知识分子都把自己视为1915—1919年中国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思想继承人，这场现代启蒙运动打碎了许多封建文化和政治专制主义的传统枷锁，并导致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半个世纪后，作为第一次文化革命产物的毛泽东却发动了一场使知识分子成为主要受害者的新的文化革命。第二次文化革命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一幅讽刺画，它很快便以政治迫害，思想压制和文化蒙昧主义为标志，并在毛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身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在这场极端强调“阶级”和“阶级立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中，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是遭到怀疑的对象。他们的知识以及相对富裕的物质地位使他们远离工人和农民。在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中，知识分子在一个已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似乎成为最明显的“资产阶级”。他们成为十分便当的靶子，并且常常是机会主义者的靶子。由于缺乏防卫能力，知识分子成为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各派的政治替罪羊。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同属文化大革命的首

①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382页；所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449—450页。

要受害者。但由于他们没有保护自己的组织机构，很少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没有防卫能力，因而他们比党的官员更加脆弱，他们受到的迫害也最厉害，受到迫害的时期相当漫长。

该怎样对中国社会中这种悲剧性的历史事实做出解释呢？对此，专家们费尽心思地试图从各个角度提供答案。

这种希望实现进步而又不利用它最珍贵的资源——最有才华的人才的现象并不为中国所独有，它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代价，在其他国家的革命中也都发生过。这是为什么呢？

费正清指出，要试图理解这个冷酷无情的历史事实，一种方法是把它看成一种阶级斗争，可以说成，代表群众的新上台的和那些曾参加过统一战线并贡献过高级技能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这两者间的阶级斗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农民的态度，不是充满善意和宽宏大量的。相反，倒是有一种报复性的、反对知识分子情绪，似乎表达了一种世代积累下来的对少数上等人的仇视。中共党内新上台的统治阶级，看不起学问，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一知半解，他们是有极大破坏能量的。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 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

派伊则把这种现象看成是革命过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化因素之间相互摩擦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过程 因此要将旧秩序培养的大部分“资本”抛在一边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们发现，他们要调整以适应迅速变化社会的新秩序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因而被推到一边。但中国的形势远远不只是这样一种现象。在中国，人们看到了一个个政治阶层反对那些准备为建立一个更先进的国家贡献力量的知识分子的有意识的、无情的行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政治阶层更加接近中国社会的中心，而知识分子则在其对现代化的探讨

过程中被疏远了，他们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以便减少对政治阶层的威胁。这对于政治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深刻的心理意义。它意味着，与其他大多数过渡社会中的政治阶层相比，近代中国政治阶层更加牢固地根植于社会现实，也不像其他许多过渡社会中的领导人那样关心外部世界的判断。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知识分子服从与幻灭的系列不过是中国掌权者与知识分子的基本冲突的不断重复故事的最新的一章。在每一个周期的发端，当新的统治者得到政权时，由于知识分子焦急而又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抱有接近权力的可怜的希望中支持新政权，这种冲突就减弱了，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当掌权者对知识分子的疏远使得后者完全放弃了影响公共事务的希望时，这种固有冲突的紧张程度通常就变得明显了。我们有可能将现代中国政治动力学〔动态〕描述为这样一种政治：政治权力的核心已经从一种反知识分子的政治阶层转移到另一个反知识分子阶层，并可能观察到，在这一运动的始终，政治阶层已经受到知识分子的喊叫的包围，他们一直被拒绝在实际的决策领域之外。知识分子不时地接近政治王国的核心；但政治家的反知识分子主义就一直没有被淡化，知识分子获得承认总是要以牺牲道德准则和理性主义观点为代价。

这种摩擦的惯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保持强大的势头。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头几年，它曾努力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吸收到国家重建的事业中去。50年代初的运动曾致力于将具有现代技术知识的海外华人召回祖国。然而，从此之后，通过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新政权都将它的有才干的支持者砍掉。三反、五反、学习苏联、大跃进、反右运动、肃反、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运动，中国的政治阶层不断地疏远知识分子。甚至在党内，这一过程也同样发生了，这主要表现在它所力图要解决的“红与专”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知识才能的重

要性。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因此当中国发生社会政治冲突时，知识分子很容易被当成首要的牺牲品。建国初期，党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知识分子不像工人、农民或资产阶级那样，能按照通常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标准来划分，无论知识分子在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他们只能算是一个社会“阶层”或“分子”，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因而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在本质上是不可靠的。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一篇论知识分子的讲话，试图明确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阶级地位。他说，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知识分子问题就已不再主要是他们政治与思想上可靠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缺乏专家和技术人才的技术问题。1957年6月通过恢复知识分子在1956年前的阶级地位，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又回复了阶级斗争矛盾的旧概念。

但由于中国越来越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同时知识分子又不构成一个社会阶级，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就由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决定了，他们也是阶级思想的载体，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值得怀疑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社会中最脆弱、也是最容易被当成“资产阶级”的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处于社会阶级的最底层，甚至在地主、资本家、反动派及其他阶级敌人之下。政治上对

① 派伊：《中国政治的精神实质》第40—42页。

立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地拿知识分子开刀。

更多的汉学家是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思想行为之间的矛盾来作出解释。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的和全局性的，有很深的根源。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然而，就中国政治的万花筒般的变化无常的状况而言，它与其说提出了文学应该为谁服务的主张，不如说提出了不应为谁服务的主张，即知识分子。毛指出，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必须服从党所规定的政治任务。文学必须提倡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的功能不同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作用，不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毛虽然早些时候把鲁迅称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在讲话中却否定了鲁迅所代表的观点。鲁迅提倡西方的文学形式和西方思想，而毛却敦促作家回到传统的民间文学方式去；鲁迅的著作揭露了社会黑暗面，对于民众和权贵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没有正义感同样进行讽刺，但毛则号召文学为党的目标服务，歌颂群众。作家们不能再依据事实或自己的观察来批评现实，他们要把现实描绘成它应当成为的样子，或党和毛所认为的那样。毛对作家的指示，后来又扩充为对全部知识分子的政策，使他们成为党的宣传机器的“齿轮和螺钉”，并迫使他们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或者接受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组织权威。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从 40 年代初，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向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强迫他们遵守党的政治路线。

另一方面，作为儒家仕大夫和五四运动的继承者，中国的知识

分子有他们自己的要求。按照孔孟之道，知识分子们是懂得治国的正当原则的，也主张专家判断自主权，同时，他们也以道义上的责任对统治者提出批评。和他们一起的还有现代业务专家，他们也要求专业领域内的自主权。而根据五四运动的精神，知识分子们主张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要求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①

这种潜在的冲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就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在 1949 年以后，随着党内分裂的加深以及对问题公开辩论的机会减少，形势变得进一步复杂和具体化了。从历史上讲，党的干部以“德”作为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而知识分子则以专业的“才”作为标准。领导革命胜利的领导人在群众动员等方面有着非凡的能力，但这未必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后者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样，取得革命胜利的精英与在阶级背景和政治倾向上不可靠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就显示出来了。虽然共产党的反知识分子主义在许多方面与早期的政治阶级不同，但中国发展的结果却是非常相似的。虽然共产党的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要明确、复杂得多，可能对知识分子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毛主义的实质强调的是人而不是机器，是人的意志而不是人的思想，是意识形态的忠诚而不是实用的现实主义，这样，就为强烈的攻击知识分子提供了基础。党通过种种手段防止来自知识分子的威胁：从重要的岗位上驱逐出去、大规模的放逐、对出版物的严格控制以及忽视教育、轻视优秀人才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浪费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使整个知识分子政治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 1949 年以后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更

戈德曼：《党与知识分子》，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243 页 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 年后的中国》，第 161 页。

适合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学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

总之，由于党一方面要维护它的权威，并要求知识分子们绝对服从这种权威，另一方面决心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不想看到一个窒息为现代化中国所必需的首创精神的现象。因此，它对待知识分子的方法是矛盾的：一方面要强迫他们严格地遵守正统；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他们有效地从事工作。这种矛盾的目标产生了知识分子政策的循环，即强制阶段与相对放松阶段的反复出现。

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毕竟，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重大决策，主要是由毛泽东作出的。

许多专家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追溯到他 1919 年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种冷遇在他的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创伤，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分子置于他们应从属的集团。特里尔则把毛泽东的这种心理因素追溯到儿童时期父亲对他的影响。他说：毛憎恨过他的父亲，然而最终，父亲的幽灵还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现。他的父亲不喜欢看到毛读书，年轻的毛反抗过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但是，毛嘲笑读书的某些做法很像他父亲在韶山曾经做过的。父亲要他从事体力劳动，年轻的毛憎恨在田里干活。然而延安时期和以后，毛把知识分子赶出他们的书房去参加体力劳动，压制的阴影又笼罩在被毛泽东“整顿”过的人身上。

但更多的观察家则从毛泽东的整体思想和他所在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分析的。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取决于

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 年后的中国》第 153、159—160 页。

特里尔：《毛泽东》，第 200 页。

他的关于社会革命力量的观点，指出，毛泽东强调“从精神上 and 道德上改造人民”，认为这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和手段。因而毛强调对农民、青年和无知者的依靠，忽视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其他一些人则对迈斯纳的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分析是片面的。

施拉姆在反驳迈斯纳的观点时说：任何人只要稍微回忆一下毛在 1956 年 1 月的见解，就会知道，认为毛一贯敌视技术的和官僚政治的专门知识的论点是显然站不住脚的。在向最高国务会议作的关于农业发展 12 年纲要的讲话中，毛明确指出要达到消灭中国的农业、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况的伟大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是要有干部和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①

费正清提出了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毛对 20 世纪上半叶过来的受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抱有极大的矛盾心理。他们的技术是中国的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但他们价值观则受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他们的专业知识为他们发挥个人的判断并在相应的领域中进行决策提供了资本，这同中国的儒家文化是非常接近的，儒家宣称，他们可以独立地进行价值判断而不依赖于统治者。而毛的道德复兴精神与此毫无共同之处。在他看来，革命不应有多种声音。正是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他对知识分子观念和政策的左右变化。

解放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1956 年初，毛是相信知识分子的，认为在经过了几年的思想改造后，他们的世界观已经是“红”的了。在同年 6 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还是乐观

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载《中国季刊》，1984 年 3 月号，第 202-203 页。

费正清：《中国人的自我表现》 载特里尔编：《中国与与众不同》 亚洲协会 1979 年出版 第 97 页。

的毛估计在 500 万知识分子中，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会超过百分之三。所以对于党的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和方法进行“百花齐放”式的批评是有益的。可以代表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在整个对共产主义制度忠诚范围内争辩是非的。并且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大约一个月以后，毛在青岛的讲话稿中，相当大地修改了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期望：“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他还指出，党对知识分子中的“中间派”的领导权还不巩固。因此，他强调，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队伍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显然，尽管毛并不打算把响应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的那些右派当作反革命分子甚或反动派，但 5 月和 6 月初所发生的事情还是促使他再次修改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估计。从 1957 年以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开始认为知识分子无非是一些舞文弄墨的人，并且对他们怀有一些恐惧，认为都是他不能加以控制的人。这种反应，导致他发表了许多言论，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什么一切伟大的智识成就都出于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之手，什么“崇拜技艺是一种拜物教”等等。这样他就倒退回去，回到他所出身的老根中国农民上，认为这才是智慧的泉源和未来的希望。^①

弗朗兹·舒尔曼则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毛关于中国社会矛盾思想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虽然按照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知识分子不能称为一个阶级，但实际上他们组成了中国社会三个大群体中的一个。在毛泽东 1957 年的一个讲话中，毛已经

^①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271-272 页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1 卷 第 347-348 页。

开始讲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在大众的头脑中 知识分子已经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 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在毛看来，正是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群体产生了中国社会的矛盾。这在反右运动中明确地表现出来。虽然反右运动是以反对对党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但它马上变为反对整个知识分子的运动。他们的错误不是简单的偏离，而是保守主义。因此，正如 1957 年所表明的那样 反右运动变成了“反保守主义”运动。行政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都受到攻击 不仅由于在百花运动期间提出了批评意见，而且还因为对群众路线缺乏热情。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工厂。而且，群众路线很快就有了具体的内容 即工人农民被送进“工农大学”而且被告知 他们也可以参加管理 设计和科学试验。

类似地 所罗门也认为 毛坚持“鸣放”政策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他的直接的政治目标，一方面是他个人的政治风格。就政治方面而言 解决“矛盾”的斗争是对待党内外“右倾保守”思想的一个工具，毛强调党对知识分子“既团结又斗争”的联合政策。毛喜欢斗争的政治风格，表现在他试图使党与知识分子处于相互斗争的状态中 它将暴露和“纠正”每个社会团体的错误或“不正确”的态度。毛的百花齐放的实质就是，他试图使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在批评性的辩论中互相对立，这将使双方不合理的行为得到暴露和纠正。1957 年春那样前所未有的自由化趋向，是毛自 1949 年解放以来同党内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这是一种“形右质左”的战略。

所罗门还批驳了那种认为鼓励非党知识分子对党进行批评是毛为知识分子中的反党分子设下的陷阱的说法。他争辩道：且不

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第 90—91 页。

所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272、297 页

管这种解释忽视了“鸣放”运动直接对准党内“资产阶级化”的所有证据，还有许多证据表明，毛本人曾推测，在经过严格的纪律训练后会把他们的批评限制在有关党滥用职权的范围内，不会对党的统治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攻击。而且知识分子已得到警告，他们的批评必须保持在党的领导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二、改革后的知识分子问题

改革翻开了新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新的篇章。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没有过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仍表现出周期性特征，但从总的趋势来说，是向着宽松的方向发展的，而且宽松的程度也是改革以前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明显地减弱了。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所享受的思想与行动自由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大，知识分子可以不受政治影响，自由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学术分歧不再被当作政治异端，新闻和出版自由也开始付诸实施，虽然仍受到许多限制。对国外的思想和文化也采取了开明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独立于中国科学院，也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说明中国试图将社会科学与有关社会历史的政治观点分离开来。但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将社会科学与政治路线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离开来，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社会科学相比，科学领域的多样性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自然科学被认为是与阶级特征、社会结构无关的东西，而社会科学仍被认为是由阶级立场与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索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 311—312 页。

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 年后的中国》第 157 页。

决策过程发生了一个重大改革，即在反对教条主义和提高知识分子地位的基础上，动员知识分子将现实主义和职业化带到决策程序中去。中国已经建立了思想库，如农村改革研究所，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等等。虽然这些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但这些机构的建立本身就表明，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它们大大地改善了有关实际领导人的资格和现代领导人的必要资格这样一场争论的条件。这对中国 80 年代改革的成功它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①

最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从以前的臭老九再次变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又被允许加入共产党，并给予相应的职位，可以对党的官僚提出批评而不一定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

以上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宽松可以为毛以后的政权赢得社会基础，当时，社会中对文化大革命普遍存在着强烈的不满，将这种不满释放出来可以使新的政权进一步合法化，并为重大的政策变化提供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迫害最深、遭受损失最大的是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为“臭老九”处于社会阶级的最低层 甚至在地主、资本家、反动派乃至其他阶级敌人之下，政治上对立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地拿知识分子开刀。这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对这个一次次抛弃了他们的国家进行深入观察。毫不奇怪会有许多人会像白桦的电影《苦恋》中主人公所发问的那样来问他们自己：“你爱这个国家 但它爱你吗？”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 党在新时期内必须赢得它的支持。同时，中国还需要通过知识分子医治整个中国社会的创伤。在中国，文学作品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和说教功能，对文化的政治讨论通常运用医学术语 好的作品是“健康的”应该受到鼓励 坏的作品是“有毒的”应该予以禁止。因此 统治者扮演医生

^① 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第 78—179 页。

开药方的角色，而知识分子的作品可以起到药物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在精神和心理上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创痛，需要“健康”的作品来医治。伤痕文学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其次，为了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改革后，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有两类人非常重要：一部分是科技人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们被党严重地疏远了，现代化要得到他们的合作，就必须承认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的自治权；另一部分是知识青年，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的牺牲品之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酷事实，中国社会中没有哪一个群体会比他们更为玩世不恭了。在他们与年老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世代隔阂。从领导者的角度看，通向年轻一代的桥梁是那些曾经受过四、五十年代革命的乐观主义的影响，对革命的观念基本上采取认同态度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许是青年唯一尊敬的人，疏远他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如果要赢得他们的合作，自由的政策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在后工业时代，国家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因为，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官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与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但知识分子在这些目标上与国家进行合作的愿望和机会都是不确定的。

再次，有一部分高层领导人，他们倡导放松控制的政策是出自他们的信念，他们认为，文化的创造性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的。这种看法不仅认为言论自由是未来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它还认为，即使在目前，它对

林克：《毛以后的知识分子与文化政策》，载《中国的现代化》，第 83—86 页；
V·舒瓦茨：《透过半开的国门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革与进程》，载《亚太事务》，
1986—1987 冬季号。

林克：《毛以后的知识分子与文化政策》载《中国的现代化》第 83—86 页；哈
姆琳：《疏远知识分子的经济代价》载《90 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 308—320 页。

揭示政策中的错误也有积极的意义。

最后，它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周期性变化演变的必然结果。甚至在毛死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经历过短暂的争论阶段和一定程度的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最压制的时期，知识分子团体就提出过与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和价值观不同的政策和价值观。这些知识分子团体从来就不是强大的，但是，当他们的观点与领导者的观点一致时，他们就成为变化的动力。像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与政治庇护人的结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这种联盟的紧张，以及这种结盟来自政治斗争这一事实，使得知识分子的影响是短命的，有时，也决定他们本人的命运。自由知识分子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在“四人帮”垮台后则被接受、复兴了。激进知识分子的观点在 1964—1965 年间受到了压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得以贯彻。70 年代初加强理论科学的观点受到压制，而在 70 年代末以后却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因此，这些不同观点的影响不是一时的。它们之所以受到压制，是因为它们与其说来自组织化的体系，不如说是来自政治冲突。^①

但是，尽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与知识分子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在短时期内是无法解决的。

首先，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是政府在减轻知识分子的疑虑上能走多远。在过去，当放松释放出的力量开始威胁到党的权威时，这些力量就立刻遭到镇压。例如，百花运动最初始于对政治问题的批评，后来转变成民主要求，并导致对党的统治和共产主义的疑问。又如，在 60 年代早期，对大跃进的批评变成了对党的领导人的攻击和对一个更开放的社会的要求。当政府出于形势所迫而采取压制政策以后，参与者被迫保持沉默。像以往一样，70 年代末的放松并不是建立在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 243—244 页。

为知识分子言论自由提供制度及法律的保护的基础上。相反，对知识分子批评的容忍是出于政治分歧和紧迫的经济需要。但他们的地位仍缺乏任何持久的保证，他们没有进行变革的权力，国家至今仍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法律，将知识分子与党的全面控制分离开来。什么“花”可以开，什么“家”可以争，这些问题仍然要由党来决定。因此，如果知识分子像以往那样超过了党所容忍的限度，这一相对的自由化就会被立即取消。虽然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的独立加强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当政府再次认为有必要加紧对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的控制时，就很容易将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与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区别开来，分别加以对待。在领导人内部，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要保持僵化的独裁政治结构，领导人仍然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并为知识分子的活动范围规定了明确的限制。¹¹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系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首先，对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仍不能容忍。官方教义的内容可以修正，受意识形态束缚的活动范围缩小，但政治体系仍保持意识形态的正统性。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合法性的基础，知识分子必须按照党的路线改造思想，必须服从党的利益以表示自己的忠诚。一旦知识分子跨越了党所允许的范围，就要对他们进行压制。中国仍不断开展反意识形态异端运动，包括 1979 年的反自由主义、1983 年的反精神污染、1987 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疑与毛时代的整风运动相比，毛以后时代的运动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抵制和回避，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制裁也比较轻，但它们反映出党维持意识形态色彩的决心。在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 240 页 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 年后的中国》第 172 页。

改革时代 知识分子经历了新的宽松与收紧的周期。

当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与以前相比大大改善了，但与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相比，知识分子有理由感到不满，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有削弱知识分子地位的趋势。在中国，教师、记者、作家以及教授们都由国家支付固定收入，并且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在 1978 年，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比体力劳动者的收入高大约 2%，到了 80 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相对收入就已经开始下降。80 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威胁。1986 年，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的收入已经高 10% 从此以后，差别进一步扩大。从长远的观点看，对知识分子的忽视和这种不平等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瓦格纳在总结改革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说：经济上受通货膨胀的胁迫，政治上受领导人的抛弃——在他们作宣传员时容忍他们，在他们用自己的声音讲话时憎恨他们，在公众价值观从教育和文化转向金钱和消费品时受到冷落，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持续地受到削弱。

郑竹园：《天安门事件的背景》第 83 页；林克：《引言 中国文学的控制机制》，佩里·林克编载《野火烧不尽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大众文学与争议文学》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8 页；哈丁：《中国的政治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第 322 页。

林克：《毛以后的知识分子与文化政策》第 98 页；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40 年后的中国》第 172 页。

瓦格纳：同上。

第五章“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生平和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不是毛当前的活动，而是毛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及其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是判断毛在历史上地位的决定性因素。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

第一节 概述

美国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开始的。1951年本杰明·施瓦茨出版了后来在西方颇负盛名的著作《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首次使用了毛主义（Maoism）这一术语，此后这一术语便在西方汉学界广泛流行起来。

1952年哈佛大学的布兰特——施瓦茨——费正清三人小组在西方汉学界首次开始对中国共产主义史作严肃的研究，不久他们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一书问世，在这本著作中他们进一步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文献来阐明“毛主义”的形成和理论特点，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样，毛主义的意义就在施瓦茨、费正清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确定。因此，人们一般把《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与《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这两本书作为西方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标志。但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以及文献的限制，汉学界中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人数很少，影响也不大。

从60年代开始，汉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注意，成为中国学的一个重要内容。60年代初在《中国季刊》创刊号上出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威特福格尔与施瓦茨之间就毛泽东思想而展开的著名论战，此后不久又有科恩、陈志让和施拉姆论述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的专著问世，这些都对美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推广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材料非常缺乏，研究的深度及广度仍受到限制。例如毛泽东在1917年至1923年间撰写的完整的文章几乎无法得到，没有什么文献集可资利用，实际上，唯一的资料来源，除了毛讲给埃德加·斯诺的自述以外就是李锐的青年毛泽东传记的第1版。当时散见各处的毛原话摘录

是如此地零碎，以致实际上每一个作者都在凭自己的想象来自由创造关于毛在五四期间和之后的思想历程的图景，然后再选出若干合适的语录来支持这种图景。而毛在 1923 年至 1949 年这段时期中的许多演讲和文章已经公开发表并能在中国之外的图书馆中找到，所以关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情况有了改善。但是，因为掌握极其分散的资料需要花费时间和钱财，所以学者们利用原始资料的自由还是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从 60 年代中期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后，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家感兴趣的中心课题。这个时期的毛泽东，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以威严高大的形象耸立在人们眼前，“美国开始了对毛主义的疯狂崇拜”。同时，中国出现的历史事件，不仅十分尖锐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问题，而且也对人类事务的许多领域提出了敏感的挑战。这一切都是同毛泽东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出现了很大的进展。60 年代闻名的中国学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施拉姆正是靠研究毛主义成名的。到毛泽东逝世时，西方“毛泽东学”的结论，大体说来是这样的：毛泽东是劳动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是中国民族利益的体现者。中国革命的成就归功于毛不顾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所执行的独立路线，归功于毛对农民运动、军队、革命根据地赋予特殊的意义，而这一切都是毛的发现。不过，总的说来，这时美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冲动和客观条件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它依然受到资料的巨大限制。

毛泽东研究的第一次重大的实质性突破是在 70 年代初。主要原因是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文献材料大大增加了。当时，同时出版了由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编辑的十卷本的《毛泽东集》和西方学者收集的其他包含着成百上千条毛泽东在 1949 年之后发表的各种言论的红卫兵出版物。不久后，又出版了东京版的《毛泽东集》

5 本补卷。这一切为西方对毛泽东的精神和思想的研究提供了

十分有利的条件。施拉姆指出，竹内实等人主编的这部十五卷本的《毛泽东集》在今后许多年中将成为所有研究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言论和著述的人所使用的标准本。

与此同时在 1976—1977 年间，欧美学者就毛泽东思想问题又展开了第二次大辩论，这场辩论的目的，在于排除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的阴谋论和僵硬的反共产主义障碍，尊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毛的思想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参加论战的学者共十一人发表论文十四篇。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如施瓦茨、迈斯纳、韦克曼、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塞尔登、安多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格利等，都是论战的主要成员。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不仅起点高而且影响既深且广。

80 年代后，美国学者对毛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中国已经发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其中包括许多毛本人写的文章的原文。在这些材料中，有些是公开发行的，另一些在原则上仅供内部使用，不过，有时外国学者也被允许接触它们，而且其中有一些也已进入了中国之外的图书馆。因此，使西方学者能够系统地提出对毛的评价的资料基础已大大地扩大了。不仅如此，西方学者在中国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了，如 1980 年夏由特里尔、施拉姆、迈斯纳、爱德华·弗里德曼、邹谠、陈志让和奥格斯·麦克唐纳(Augus McDonald)等人组成的一个阵容强大的西方汉学家研究毛泽东生平小组，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和考察。

其次，由于已经过去几年时间了，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有可能使自己不再老是着眼于过去盛极一时的文化大革命了；他们已经有可能对毛的一生的意义进行思考，而不是把某一段时期或某一个事件不管它是延安时期还是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毛的模式范例或毛的经验总结。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后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重新作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与论述，特

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欧美学者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们开始对原来的观点进行反思。同时，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及未来中国的影响，也促使他们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

在这期间，大文献方面的主要进展是出版了由德国小组主持、由美国小组和日本小组参与编辑的七卷本的《毛泽东文选》。该文集使用德文和中文两种文字，包括了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到他一生终结前所写的著作。这部文集是收集在中国之外发表过的也许是在中国之内发表过的毛 1949 年以后的文章最为全面的一个文集。一些汉学家认为，就目前来讲，就这方面的文集而言这部《毛泽东文集》是仅有的最好的一部应该被收进每一个严肃的关心中国事务的图书馆之中。

在 60 年代到 80 年代这段期间里，美国学者发表了一大批有关毛泽东思想与生平的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阿瑟·科恩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弗里德里希·韦克曼的《历史和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威尔逊主编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派伊的《毛泽东：领袖人物》、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 年》、迈斯纳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特里尔的《毛泽东》、泰维斯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等。

根据斯卡拉皮诺分析，美欧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论著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一为传记性著作，其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二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其代表作有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韦克曼的《历史和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三为评论毛泽东理论地位的著作 其代表作有迈克尔的《毛泽东和不断革命》、威尔逊的《毛泽

东的历史地位》、斯塔尔的《继续革命 毛的政治思想》四为强调心理-文化因素的著作，如派伊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所罗门的《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等。

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美国学者主要应用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比较研究方法，这种比较研究是分几个方面进行的。一是把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进行比较。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毛泽东的战略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共同点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基础或“革命先锋”，重视政治和思想意识的作用，创造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强调人和人的实践的作用。迈斯纳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典型。

二是把毛泽东的思想同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重视人的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这主要来源于中国儒家传统。比如，斯塔尔把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同西方的哲学传统和中国的哲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毛泽东重视矛盾问题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而重视对立面的斗争则主要同马克思的思想有关。费正清、施瓦茨、施拉姆等人都努力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寻找毛泽东的思想根源，如费正清说：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回想起儒家修身自省的学说，特别是16世纪的哲学家王阳明；儒家思想向人们灌输了对父亲和皇帝效忠的思想，而现在毛泽东思想把效忠的对象转移到党和人民。不少人由此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把毛泽东思想和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葛兰西、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在这种方法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大量运用了“普罗米修斯主义”、“唯意志论”、“民粹主义”、“军事浪漫主义”、“雅各宾主义”等术语，用以形容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特征。这些词汇、概念一方面给

我们以新鲜感，加深了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某些特征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容易将我们引入歧途。

第二，历史背景研究方法。这种研究的目的是要发现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性质和政治背景，以便对毛的早期政治思想作出生动的解释。它试图把毛所形成的政治概念同这些概念原来所针对的事物结合起来，并且讨论毛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在面临政治上的关键时刻所认为的紧迫和重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毛，因为毛主要是一个革命的实践家，他的理论概念经常是在实践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理论研究的步骤中形成的。毛的理论发展从来都不是仅仅阐发他以前的信念；发展着的经验和变化着的政治环境使他的思想不断改变。同时，按年月顺序研究发展的诸阶段也是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们才能了解到毛的有关的政治策略经验。这样的研究并不排斥对毛的政治思想作一般的概括，而在一些学者看来，它可以分为幼稚的概括与慎重可靠的概括。

这种从历史背景中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方法最初是由陈志让系统地加以运用的。他在出版《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时指出：“直到现在为止，对毛主义的研究并没有与毛个人的经历、与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与中国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不容否认的，我特别注意给他们以充分的重视。”以后，施瓦茨、施拉姆和沃马克等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都十分强调这种方法。

第三，心理研究方法，即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这种方法典型地体现在卢西恩·派伊的《毛泽东领袖人物》一书中。在该书中，他运用了一种心理—历史方法。他指出，那些专注于毛的思想的来源与内容的人，没能解释毛为什么运用那样的思维方式。他们本身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他们所分析的，与其说是他的心理过程的根源，不如说是它

的产物。派伊对毛的个性中某些持久的特性有许多生动活泼但也带有片面的描述。然而，描绘毛的个性并不是派伊的目的。在派伊看来，个性和思想一样终究是终极产品。派伊所期望的，是对毛的个性和思想作出解释。施瓦茨在评论派伊的这种时候指出：在承认非心理因素的同时，派伊最终发现，在他自己的关于心理原因的叙述中，几乎没有他不能解释的，它与弗洛伊德对原欲的解释导致人们追溯幼年时期的原始家庭关系是十分相似的。使人耳目一新的是，他放弃了关于毛泽东仇父情结那种庸俗的解释，并有力地驳斥了这一理论。但使许多人同样感到不满意的是，他在关于毛对母亲模棱两可的态度方面所作的解释，他指出，毛泽东的母亲最初以养育之爱沐浴着他成长，后来又部分地收回了这种感情，将她的慈爱让给他的兄弟分享。施瓦茨认为，这种方法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毛泽东以后的经验对他的基本思想和个性同样也有深刻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总结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方法。例如沃马克认为在研究毛泽东早期、中期、晚期著作的关系时大体有三种研究方法：一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把毛泽东各个时期的思想看作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认为“毛的青年期与成熟期之间的连续性比不连续性或发展更为重要”。二是“还原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同样强调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观点有连续性，但不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而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研究的。三是“非连续性”方法。这种方法努力把毛泽东成熟时期的思想和早期思想、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区分开来，然后对各个时期的思想加以评价。按照这种非连续论，毛的早期著作中的思想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1922—1965）一直是潜伏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才重新显示出来。沃马克认为，撰写《历史和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的韦克曼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撰写《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的所罗门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法；

而施拉姆则用第三种方法。但是，从这样的角度区分研究方法，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不同意见，比如，施拉姆就不认为他采用了沃马克的所谓“非连续性”方法。因为他不但在某些问题上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非连续性的，而且还认为毛泽东在另一些观点上是有连续性的。

像所有的研究领域一样，美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也分成许多流派。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主要流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左派”。

长期在哈佛大学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施瓦茨，威斯康辛大学历史教授迈斯纳以及施拉姆、斯塔尔等都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也被称作“哈佛自由主义客观主义学派”或“哈佛学派”。这一流派观点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在 50 年代提出的著名的“毛主义异端论”，即认为中国东方革命是由中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特点所决定的，不是莫斯科阴谋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特创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表明，它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持这一见解的“自由派”学者认为，这样的分析不是低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而是肯定了“毛的独创性”。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威特福格尔等，他们又被称为“美国首都和西海岸长期扶植起来的反共学派”。这一流派认为，“自由派”所提出的“毛主义”是不存在的。毛主义的论题是“一个毛主义的传说”。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农民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独创性的贡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只不过是列宁主义思想、斯大林主义战略和第三国际立场的复制。

“左派”是在 60 年代后期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学者组成。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有：霍普金斯大学的佩弗、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的沃尔德、哥伦比亚大学的安多斯、华盛顿大学的塞尔登等。

“左派”学者鲜明反对“自由派”学者的所谓“毛主义异端论”。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是“左派”学者中不少人由于受到我国“左”倾观点的影响，不但没有仔细地地区分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同“左”倾错误观点之间的界限，而且在强调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致时，竭力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因此当中国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时，公开指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以后，他们就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受到很大的震动，研究队伍中出现了各种相当复杂的变化。

目前在美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中，占上风的是“自由派”。

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西方特别表现出明显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与西方的毛泽东研究在目的上的差别。施拉姆教授指出：作为在中国推进革命事业的毛的继承者，当前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发言人所关心的是，继承和发展毛的思想中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因而对于指导未来的革命是有用的部分或方面。而西方学者所感兴趣的，不是制定一种“正确的”革命学说作为中国所自称的或所依赖的“毛泽东思想”而是确定在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是什么构成了毛的思想和政策的精髓或核心。这个“毛主义的主流”的内容，不应该根据什么对今天的政治有用来确定，而应该通过努力判断什么真正代表了毛本人的最大特征来确定。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毛作为衡量标准，即使毛自己可能把这些年看成是他一生经历的顶峰；而是意味着要努力发现某种平衡，或努力确定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之间大量自相矛盾的记录中的重心所在。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经济落后地区反对强大的国民党

和日本侵略军的艰苦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充满了冲突、斗争和战斗的概念。这些概念在长征和延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系统的总结和发挥。由于力量悬殊，只有经过长期斗争才有希望取得胜利，斗争采取了一种持久的、循环的形式。反围剿、抗战都是在这种斗争形式中进行的。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正是这种思想观念形成了各种运动的旋律，如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这些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峰。基本上讲，这种思想在新的条件下是为了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并导致了不断革命理论的复活。

第二，伴随着这种冲突、斗争和战斗的思想观念，毛的思想还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趋势。它日益将事物分为对立的两极。分清“敌人”和“人民”成了政治制度的基础。这种思想方式可以从流行的口号中体现出来，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的文学艺术政策也体现了这种思想特征，它要求作家或者描写英雄人物，或者暴露敌人的邪恶，它谴责描写“中间人物”的作品。

第三，毛的思想非常强调人的因素。在艰苦的斗争中，要在物质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并赢得胜利，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民众的支持，因而所强调的是人的思想而不是武器装备。这一因素与物质条件的匮乏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以及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特征。后来被称为“老三篇”的三篇著作集中体现了毛思想中的这一特征。

第四，毛泽东思想还要求各社会生活领域的政治化，即他所说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党指挥枪、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以及“又红又专”这些原则，也都是毛泽东思想这一组成部分的具体体现。

第五，毛一直认为，人的意志和人的思想比物质条件更重要，

在他看来，用正确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取得胜利的最可靠的因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毛才非常重视思想改造。在毛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已经包含了思想改造方法的成分，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这种方法得到了系统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统治的时期内，毛一直不停地运用这种方法。

当然，这种概括是高度抽象的，每一个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深入、具体研究的学者最终会发现，仅就革命战略家这一个方面而言，是有可能为毛泽东描绘出一个前后一贯的政治形象的，但当把毛泽东作为一个理论家来看待时，那他是太复杂多变了。

首先，无论是就具体政策而言，还是就对自己思想观点不同方面的侧重而言，毛泽东本人都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毛泽东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导致这种立场变化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把世界看成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其中的根本问题 或者说“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从另一种非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可以把毛泽东观点上的侧重变化视为一系列矛盾因素之间动态关系的结果。这些矛盾因素，时而一个方面占主导地位，时而另一个方面占优势。各种因素的变化程度，与社会趋势的“科学分析”联系得不够紧密。而其他如对总的政治形势、毛泽东的一般心境和他的同事的评价等，常常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邹说：《文化大革命与毛以后的改革》第 18—25 页。

施瓦茨：《哲学家》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载《中国季刊》1984 年 3 月号；《毛泽东》。

斯卡拉皮诺：《国外研究毛泽东的几种类型》，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6 年第 4 期。

第二节 对美德的追求：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一、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

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的观点，一直是汉学家们非常关注、争论非常激烈的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农业集体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作为党的领袖，他为党的创立、发展、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什么他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群众把它打碎再来重建？在这个问题上，专家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正统论”，一个是“异端论”。

“正统论”认为毛泽东基本上遵守了列宁主义原则，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短时期内他才走向了极端。

施拉姆教授指出，毛泽东是一个“天生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不仅表明对组织的关注和信任，表明群众需要由党的精英来领导，它还牢牢地掌握了这样一个原则：政治斗争是社会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键所在。革命时期政治永远领先于经济这一论点是列宁主义的核心。由于这种天生的列宁主义的素质，毛的革命热情一旦被引向正确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的航道，他就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①施瓦茨也指出，早在青年时期，列宁的先锋队思想基本上克服了毛泽东的无政府—民粹主义倾向，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毛的一种更为深层的感情，即群众需要领导，并确立了将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理想组织的思想。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 55 页。

本杰明·施瓦茨：《哲学家》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第 23 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是群众路线的积极倡导者。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可以是思想的一种源泉，正确的政策是从这些思想中经过精心提炼而产生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这样，既可以使人民群众深信那些他们自己不可能系统发挥的思想，又可以使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运用它们。这套理论的提出表明了毛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带有偏见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彻底决裂。毛为打破这一概念而整整奋斗了半个世纪。

然而，甚至在这一方面毛也没有违背列宁主义原则，因为他不曾怀疑列宁主义的关于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的思想相反他一直认为尽管革命运动的领袖信任人民群众但群众最终却必须学习和领会领袖们的思想，他们自己对构筑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是无能为力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为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正确理解表明它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也不是与其截然相反的东西。它与列宁的这一概念是互为补充的，实质上与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只是更强调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这一特殊方面。因此，毛在提出“群众路线”这一公式的同时，也以列宁式的严厉态度强调群众必须接受由革命精英们实施的集中指导。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

总之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60年代初毛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由政治精英构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证明，他坚定不移地信奉列宁主义关于党是先锋队的思想。但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他对组织怀有最坚定的信念时期，他也一

贯反对把组织本身成为目的，包括党在内。^①

1962年，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毛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表明他对党内“保守倾向”的焦虑。从党的作用，从更一般的革命的组织结构来说，毛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此之前，虽然毛宣称在党内存在右倾反对派，但他依然认为党是指导革命的一个独立的工具。

1965年12月，党已不再是贯彻他的意志的一个驯服的工具体。毛与党的大规模冲突已迫在眉睫，这时，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宣布民主就意味着“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管理”。他认为，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每个人来管理社会，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但他还没有走向极端，还多次号召要依靠“党的高级领导和基层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对中国社会的特性和发展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号召，提出群众可以无需党的领导。在反对党的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在内部，他采取整风运动，强迫干部参与劳动；在外部，他根据群众路线的原则，将党的机构暴露在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一次，他不再像1942或1957年那样将党的干部视为可救药的病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可以被红卫兵公开给予屈辱而加以胁迫的敌人。不仅如此，他还开始把矛头对准了党本身，而不仅仅是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从本质上讲，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消除党的成员和专家的特权地位而使现存的官僚与技术精英声誉扫地，根除将来可能产生的各种等级关系。这种政策的理论依据就是毛在延安时期所说的一句话“造反有理”。从此以后，毛将自己凌驾于党之上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化身。毛允许自己被神化而成为真理和权威的源泉。而群众就是所有权威的基础；他们还是智慧与创造性的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前言，弗雷德里克·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源泉，这些财富将使中国在不依靠满脑子国外理论和知识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或专家而取得中国的经济与技术发展。毛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缩小工农差别的措施。这种让城市居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而不是用城市工人的知识和纪律性来影响农民而缩小两者差别的思想，特别表明了毛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成分。即便如此，到了 1966 年底和 1967 年初，党的生存开始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毛不得不在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做出选择时，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异端论”认为，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观点是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并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这种论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迈斯纳。

莫里斯·迈斯纳提出 诚然 毛是一个天生的列宁主义者 但这只是就他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革命战略的大师而言的。而在理论上，毛不是一个纯粹的列宁的门徒，因为他从未真正成功地用一种纯粹列宁主义的方式解决“觉悟”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他把党看成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发源地和“社会主义觉悟”的思想化身；另一方面，他同样坚定地认为，革命创造的真正源泉是在群众，尤其是在农民。虽然，毛总是认为，群众可能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途径来指导，并且，毛是一个以列宁主义组织原则为基础的、为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提供领导和指导的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但毛从来不像列宁那样绝对信任党和它的组织。毛总是表示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和智慧，这是列宁既不具有，也不曾表示过的。对于毛来说 党是群众的“先生”但更是群众的“学生”。特别是在 60 年代初期，他在失去了对党作为革命的可靠工具的信任后，更

加强调后一点。¹³

毛的这种信念的源泉之一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在毛开始从事其革命生涯的 1919 年他就倡导过“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而这种民粹主义思想也影响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民粹主义的冲动促使他将一种几乎是固有的革命社会主义意识赋予给“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当代的毛的一条语录，但它导源于毛早期的民粹主义思想。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表示，革命创造性的真正源泉不在于党，而在于自己行动的自发农民运动中。不是党来判断农民是否革命，恰恰相反，农民运动本身就是判断党的革命性是否充分的标准。

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的这一信念也一直没有改变。1955 年，毛又一次将革命的农民与不那么革命的党对立起来。他指出，当大多数农民都在努力从事激进的社会变革时，许多党员却像小脚女人那样裹足不前。不是农民落后，恰恰是党变得太胆小谨慎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主要寄希望于农民群众，即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革命高潮。毛坚决主张，恢复集体主义和振兴社会主义精神的社教运动，主要以由绝大多数农民组成的组织为基础，而不能由为上级党组织控制的“工作组”来掌握运动。在发起“大跃进”运动时毛赞美群众“无限的创造力”说他们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党则不如对群众那样非常看重。

到 60 年代中期，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反抗和普遍冷遇，毛泽东的不满和担心增加了。他再也无法控制这个党了——这个他在 20 多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创建和指挥的党，这个在革命胜利后他担任了 15 年正式主席的党。毛泽东

迈斯纳：《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 106-107 页；《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59-60、366-367 页。

感到痛心疾首。但最使毛泽东感到痛心的是，他亲眼目睹、却又无力防止党从一个革命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保守的官僚机构，党竟然向他长期与之斗争的官僚主义屈服了。于是毛泽东向党宣战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起初完全绕过了党，号召群众反对党和它的大多数领导——直到这些巨大的动荡产生出混乱，才迫使他勉强地重申，党的权威是一种政治的需要。

总之，毛的‘相信群众’完全是非列宁主义的，不注意这一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韦克曼的观点介于上述两种论点之间，他认为，毛的群众路线思想基本上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毛还从党的合法性和防止政治僵化和专制这个角度来强调群众路线。韦克曼说，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先锋队与群众的辩证关系的学说同毛主义的群众路线有所不同。接近于前者的是刘少奇等人，他们首先是通过与群众民主协商制定党的路线，然后再由中央机构来实施新政策。更正统的列宁主义党派则认为，按照群众路线的作法，群众有些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只有党才能真正理解人民的利益。毛并非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坦率地承认党员因其具有党性而比无产阶级自身更具有无产阶级的意识。但他同时也强调党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人民。“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也许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尚未形成工人贵族这一幽灵，所以，毛不具有列宁对如此容易资产阶级化的人们所抱有的那种矛盾心理，从而要求有一个独立的党的先锋队。由于党就是人民的代表，因此，党和群众之间如存在任何障碍，这就表明党正在犯错误。但是，毛不仅相信党员直接接受群众

批评可以避免政治僵化，而且还确信群众路线能最好地激发与引导集体主义的社会热情，并通过消除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隔阂来统一无产阶级的意志。

二、主观与客观

汉学家们指出，关于历史过程中主观力量与客观力量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决定和限制政治活动，还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可以造成根本的社会经济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西方社会中，他们的社会、自然观在本质上是希腊式的。因此，他们一方面主张人的主观能动性及人对客观环境的改造，但同时他们也承认人的局限性及人对于环境的适应。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同时还坚持认为：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生活在其中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

泰韦斯认为，毛泽东并非无视客观限制。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是一个非速胜论者，而且，正是坚持对政治和经济的客观状况进行现实主义估计，并据之调整目标和方法，才使得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同样的现实主义也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活动中的一个经常性特征，这一特征甚至在他以加快发展速度为基本目的的时期也呈现出来。1956年初鉴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突如其来迅猛发展的形势，毛泽东就警告说：“应当把无法做到的东西从我们的计划中去掉，使计划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所有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汉学家都强调，与任何一位马克

① 韦克曼：《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第20页。

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26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72页。

思主义理论家相比，毛都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上层建筑的作用。毛泽东主张，不管物质条件多么差，一旦把人的主观意志因素充分地调动起来，那么就根本没有不可跨越的障碍。毛泽东指出：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 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 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 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并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 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 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施拉姆对毛泽东的这段话极感兴趣，认为它深刻地表达了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思想 而且 后来的实践表明 毛泽东不仅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军事领域，还进而推广到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这种强调主观力量的作用是他的思想的一个特色，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革命生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普罗米修斯式的推动力。

迈斯纳走得更远，他指出：诚然，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从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理论中获得了关于社会主义未来

的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但他关于未来的信仰并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即客观力量这种信念之上。毛的不断革命论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相应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着被严格规定的多少有点滞后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的观点。所肯定的是必须尽快实现“上层建筑（社会关系、政治形式和思想意识）的变革”。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创造历史”所做出的字面解释的基础上的，并由此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决定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的意识以及人的政治行为是决定性的因素，最典型的命题莫过于毛得出的下述结论：主观可以创造客观。这是一种极端唯意志主义的信念。对毛来说，人的意识的创造活动几乎不受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条件的限制，用正确的思想和意志武装起来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随心所欲”地自由创造客观现实。既不必考虑具体的本国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必顾忌可能包含本国革命在内的国际革命条件。

毛泽东的这种强调人的意识与人的意志的思想特征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同毛泽东的个性的最基本的方面是非常协调的。它出自这位具有强大意志的领袖改造自然的冲动，出自他改造人的迫切愿望。毛对现实感到不耐烦，他迫切征服人、事物、事实和理论，他要打破一切的抵抗力量。毛泽东的这种个性，施拉姆称之为“军事浪漫主义”，施瓦茨称之为“诗人的幻想”。

其次，它产生于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的历史环境。“五四”时期，两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吸引了毛泽东，而且它们分别被他所敬仰的两个学者信奉。一条道路叫做“过程”，它的倡导者是陈独秀。陈独秀笃信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二条道路则强调“意志”的力量，它的倡导者是李大钊。李大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道德和冲动力的新解释。李大钊相信人完全有能力改变自身的环境，相信“人类的良知有塑造社会现实的本领”。革命的早期阶段，毛泽东是信仰并在实践中遵循“过程”的信念的。但中国革命的经验使毛几乎完全倒向了后者。这种唯意志论加上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对中国人民——农民作为潜在革命者的深信不疑成为毛泽东的典型信条。

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运动的基础主要是农民，而党的领导人主要是从各个阶层——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农民——中吸收来的，这些事实为阶级品德的主观化、强调“无产阶级精神”提供了客观条件。毛泽东关于社会力量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同样，这种强调个人修养的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长征和延安时期的经验强化了毛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这就是，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够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造历史现实。不断斗争、英勇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这些苦行主义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后来大力宣传的“延安精神”的核心。它在本质上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

施拉姆指出，终其一生，毛泽东关于意志与物质的关系的观点一直没有重大的改变，这表明，在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问题上，由传统和经验形成的个性至少和客观现实同样重要。^③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97、215页 特里尔：《毛泽东》第115页 施瓦茨：《哲学家》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第26页。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6页。

施拉姆：《毛泽东》第208页 施瓦茨：《哲学家》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第26页。

三、革命与建设的主体

毛泽东上述思想的这一特征的逻辑结果必然是，他特别注意发展和保持一种“正确的思想意识”因为在他看来这才是决定革命成败的终极性因素。按照毛的观点，正确的思想是进行有效的革命行动之首要的和根本的前提，正是这种假定，使得在延安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设”方法，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使之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时期，一向成为红色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之一。^①

毛泽东思想这一特征的另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在农民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建立了农村苏维埃根据地，并把农民视为主要的革命力量。

诚然，毛泽东一直强烈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客观阶级状况，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热心推动者，但他同样也倾向于按照道德和思想标准而不是按照客观的社会阶级标准来确定人们的“阶级地位”。对于马克思来说，一个具有潜在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产生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前提，而在毛看来，那些被认为具有“无产阶级”观念的人的存在就足以证明一个革命阶级的存在。他的这一思想实际上证明了，共产党队伍事实上是可以不受无产阶级支配的。它意味着人的思想倾向并不像历史唯物主义所断定的那样来自他的阶级出身。他的阶级现在要取决于他的意识形态；一个聪明的农民可以成为一个“无产者”。这是主观的政治考虑对经济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的胜利。

建立农村苏维埃根据地，同样早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想法。关键问题是毛泽东把农村根据地置于比较优先的地位。毛在

^①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55—56 页。

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他自己的战略，他离经叛道地声称中国的“革命”先锋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贫农”。他深信中国的革命必须依靠农民，因此他甚至在共产国际批准以前就着手建立农村游击部队并创立了苏维埃。

既然是无产阶级意识决定着革命的力量，那么，毛泽东思想中的农民意识和长期的革命经验使他对农民有着特殊的估价。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本身。报告强调了农民依靠他们自己的首创精神正在完成全部革命工作，反对一切外来的干预和有组织的控制。正如战争时期“人民战争”的革命战略是基于深信农民自发的革命精神一样，在解放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毛同样重视农民的作用。“人民”这一概念在1958年和1927年一样都主要是指农民群众，毛泽东又一次把农村作为进步和新生的基本源泉。“先进的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被当作完成对人的道德和思想进行改革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已不再由城市无产阶级而是由农村人民公社来承担。在“大跃进”期间，农村人民公社被视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体差别的机构，并在实际上被认为是最终废除国家的内部职能的机构。而“文化大革命”也主要地是一场农民反对知识分子的城市官僚的斗争。

迈斯纳指出，毛的这一思想方面有着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毛的许多其他方面也有典型的民粹主义特征。例如，毛对职业专门化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度不信任，其强烈的反官僚倾向、反城市的癖好及其革命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等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206-207页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63-64页。

等。当然，毛并不简单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外观下的民粹主义者，但是，民粹主义的观念和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

然而，这些列宁主义的思想异端也很有可能发挥某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功效。如果不是由于民粹主义倾向将毛泽东吸引到农村，并且又提供给他那种对农民群众自发革命创造力的信仰，要在中国进行一场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是极不可能的。毛主义革命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方面，尤其是仇视官僚主义的精英主义，不信任正统制度和特别关心手段与目的的矛盾，对在革命的中国继续保存革命的希望，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毛主义没有在中国创造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它确实造成了一个持久动荡的革命形势，为达到（或至少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了可能性。如果将马克思的改变世界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的论断看作是衡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的话，那么，与列宁主义者相比，毛最终或许可以被判认是一个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毛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成分和正统的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尽管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但它决非 19 世纪俄国的信念在 20 世纪中国的复活。毛泽东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自觉的继承人，他的思想目标和思想类型基本上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和政治传统，他有意识地与上述传统保持一致。然而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他也许是不自觉地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具有共同的信念和思想，而且，这类信念和思想也未必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政治传统。毛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成分的形成，尽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影响，但却不是因为这种影响才形成的，它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现象。虽然，中国传统知识的渊源可能发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调查研究的问题，不过似乎应更多地从存在于现代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一些因素里，寻找民粹主义成分

出现的原因。这些条件是：以农民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正在外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力量之下分崩离析；本国资产阶级缺乏生存发展能力；一个与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存社会大相径庭的知识阶层出现了；这个知识界的成员们期望通过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寻根并代表农民利益说话，填平把他们与社会分离开来的壕堑。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民粹主义可以看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以及它使人类和社会付出的代价，特别是由农民承受的那些代价所提出的抗议。从这些一般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乃是一个受外国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力量威胁的、经济上落后和基本上是农民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出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施拉姆的观点与上述几位汉学家的观点有着微妙的区别，他没有像他们那样走得那么远。

例如，他指出，迈斯纳过分夸大了毛对农民、青年和无知者的依靠 或者更广义地说 夸大了毛对‘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改造人民’的片面倚重，认为毛把这种改造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和手段。^② 他还说，一些人由于毛泽东看到了农民身上固有的潜在革命性，认为革命必然在农村发生，就认定他是一位“农民革命家”。一些人则走得更远，坚决认为毛泽东在 1927 年不仅仅是暂时放弃了城市，而是完全抛弃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概念，完全否认了城市知识分子杰出人物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且使自己成为实现农民所固有的空想抱负的圣徒。然而，与其说他是个农民革命家，不如说他是个农民出身的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因为，如果不是处在这样一个革命时代，他本来可能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实践自己的治国之术的。

① 迈斯纳：《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② 施拉姆：《毛泽东研究 回顾与展望》。

③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12 页。

但施拉姆承认，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的认识以及他头脑中某些农民意识的影响，从 20 年代中期到他死去，持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这些东西同他思想中的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成分融为一体，确实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各种成分彼此冲突的思想模式。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之一就是，尽管农民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它必须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本身不能单独发挥政治作用。施拉姆指出，毛的理论贡献不在于用和它对立的东​​西来取代这个原则，而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

在美国有过这样一种论点，即毛泽东的矛盾理论是苏联的翻版。例如，阿瑟·科恩就曾指出，毛泽东在 1937 年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毛所说的事物发展的基本原因是其内部矛盾这个前提，和列宁的“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的观点完全一致。科恩还说：被认为是毛泽东的独创性的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也是由 30 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②科恩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多数学者的反对，他们确认，毛泽东思想中的矛盾思想基本上是毛的独创，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之一。

人们常常指出，毛对辩证法科学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发了“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两个概念。而且，随着情况的继续发展，矛盾的两个方面会发生变化，原来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有可能取决于它的对立面，或变成次要矛盾。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10、51 页。

阿瑟·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2-16 页。

毛为何把矛盾的两个方面的问题置于突出位置？对此施拉姆指出了两个理由。一方面，毛对辩证法的理解带有道教和其他中国传统思潮的浓厚色彩；另一方面则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模糊不清而又复杂的特征（换言之，就是国内矛盾的含混性和复杂性），并力图把这种洞见在其革命策略中具体化。马克思本人所看到的社会，被认为是日益两极化的社会，整个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两大集团，对于在这种类型的社会里发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来说，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是清清楚楚的。一般说来，在革命解决这种冲突之前，人们可以指望基本矛盾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在中国，由于国内形势和与列强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因此，在一个既定时期内，要确定哪种因素或矛盾是占主导地位的，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了，而成为迫在眉睫的策略需要。

第一个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中的瑕疵 第二个特点则是他的这一思想的优点。

毛泽东的这一论点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为他论证上层建筑可能成为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提供了主要依据。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

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 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 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83—83、85—86 页。

从这种论点出发，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精神力量——“意志”——能决定革命。^①

毛泽东还十分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及其作为变化动力的理论，是由黑格尔创造、由恩格斯发展、列宁广泛应用的。毛泽东以其独特的方式掌握、运用了这一理论。毛泽东否定了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已不复存在的观点，断然宣称，即使在阶级冲突消失以后，也依然存在着由生产力不断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继而产生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和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特点，是不断存在着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只有与既存的现实实行彻底的革命决裂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和斗争。在他看来，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矛盾的解决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实际上就是十大矛盾。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也依然存在矛盾的观点背离了正统的苏联思想。

毛还分开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指出了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这些概念与思想灌输和思想改造的方法有着明显的联系。江西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方军人的思想灌输、1942—1943年的整风运动、朝鲜战争时期的思想改造和百花运动，在这一连串的运动中有着一明显的发展线索。

毛泽东矛盾思想中在政治上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矛盾不仅存在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中，而且还存在于政府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中，存在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中。这是最具革命性的一个论断。他的这一命题中的领导者并非单纯地指下级官

^① 韦克曼：《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第360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86—87页。

僚机构中的官员。毛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排除与人民发生矛盾的领导者也许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这种可能性，也没有排除在一些问题上领导者是错误的而人民是正确的这种可能性。他的这一论断的逻辑结果就是，既然党的领导人都有可能犯错误，那么党就应该接受来自人民的批评。因为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被当作人民，所以党能够听取意见的范围和领域也很可能是非常广泛的。

正是这样一个论断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它最先导致了1957年那种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不愿接受的政治形势。当毛发表这个观点时，百花运动正在全面开展之中。党员，甚至一般群众都受到鼓励，对经济、行政和政治机构提出批评意见。这一政策有着双重目的：一方面它要避免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毛将匈牙利事件归结于官僚主义和匈牙利领导人的压制方法；另一方面，通过让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可以唤起他们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热情和良好意愿。但事情的发展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他不得不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而强调组织和纪律，以加速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在经济领域，这意味着大跃进；在社会机构领域，它意味着建立人民公社。而所有这些激进的政策都在不断革命论中找到了依据。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个新的命题还是未来文化大革命的预兆。

五、个人与社会

在毛的历史发展观中，人占有中心的位置。他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创造力”。然而与西方的政治文化不同的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人的实质的主要方面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广泛而具体的各个不同集团中的一员而存在的，他要受许多社会、政治关系的约

束。一个人要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就只能以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的身份出现。同时，这些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各处于不同的地位，其中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毛泽东首先强调个人对社会和集体的责任、义务。这种观点和中国古老的传统观念中所强调的个人应受社会约束的思想是协调一致的。在近代及现代史上，这种个人观念的历史根源就是根据地 and 革命战争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其背景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这种现实决定了，在国内，社会只能有限度地提供可用资源，在外交上又屡受威胁，因而必须提高工业化、技术化的社会竞争实力。这些历史的、客观的力量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产生了“个人的绝对克己和完全溶化于集体之中的终极目标”。

个体的价值以他对人民、群众、集体的服务来衡量。如果一个人能够完全溶合于集体之中，那么，他只有在提高共同利益和集体目标时，而不是在个人有所成功时得到满足和自由。他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和环境，并为新社会而努力工作。

另一方面，如果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得不到社会给予的利益来平衡，那么，相应的，社会就要对个人负起全部责任。如果个人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那么社会本身也必须加以改造，使其成为值得个人效忠和服务的对象。对毛泽东来说，既要求对个体加强斗私批修和思想改造，而同时又要求党必须服从人民的利益。

如果以社会阶级的观点判断人民和群众的利益，那么有些阶级是不属于人民的范畴的；甚至人民内部也分成许多阶层，各处于不同的地位。以暴力消灭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被认为是提高人民利益的必要措施。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都是如此。虽然这些改造不能够完全铲除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

影响并取消他们某些经济特权，但实际上消灭了他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力量。社会阶级结构改变的时候，财富的重新分配也在同时进行，通过这种财富的分配，下层阶级从上层阶级手中获得财富，从而使社会关系进一步趋于平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及农民是它的同盟军的观点，以及他对贫农、下中农的同情，事实上提高了人民的利益，其结果则主要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受剥削最深重的社会群体上。因此，在阶级观点的支配下，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之中，存在着向社会的、经济的平等推进的强大动力。从政治上重视贫下中农，或是对他们福利的关怀，是驱使毛为了防止农村新的阶级分化，避免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而实行合作化的动力基础。从某个角度而言，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可以作如下分析 在毛泽东看来 上层互相重叠、互相关联的特权集团，已形成一个新的阶级，在当时的背景下，由此而引起的不平等无论它能给受益最少的阶层带来多大好处，都不再是公平的。正如 1965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对公共卫生的指示所表明的那样，他要将新产生的不平等纠正过来，首先是尽最大可能提高最无权益的群体的福利和生活水平。在教育方面，他希望纠正不平等的步子要比刘走得远得多，快得多。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均等的重视是超过对经济效率和技术价值的重视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将平均主义推进一步。^①

邹 说：《中国革命的价值》载奥克森伯格编：《中国的发展经验》纽约普里格出版社 1973 年版 第 27—32 页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社会革命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转变过程

专家们指出，建国以后的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有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转变的时间是 50 年代中期。具体地说，是在 1955 年年中。

50 年代早期，苏联的发展模式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解放初期，中国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苏联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接受并在实际上提倡过这样一种理论观点：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国民经济的农业部分完全从属于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重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优先于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合作化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农业生产以提供城市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由于实现现代工业化已变成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经济生产的能力和从国家从农业经济中获得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的能力便成为衡量农业合作化的效用与价值的标准。同时，农业的社会化以城市的工业化为前提，因为只有现代工业才能为大规模的集体农庄提供技术和机械化。

毛泽东还表明，他要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城市工业环境来指导和启发乡村中落后的农民群众。这种观点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毛在这里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应该教育农民。

同时还可以看到，毛一开始就明确制定的经济政策是谨慎和渐进的。1950 年 6 月，他号召保存富农经济以利于早日恢复农业

生产，指出，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毛还要求农业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采取说服的办法，不能用命令主义。即使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毛在此类问题上的观点也没有多少改变。1953年8月他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1955年3月毛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关于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接受苏联模式的原因是专家们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许多学者对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强调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时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独立精神，以及在这之后如此轻易地接受苏联经济发展的道路感到困惑不解，以为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结果，是一边倒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但施瓦茨则认为，毛决心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似乎是出于一个真诚的信念，即苏联的经验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总之，毛强烈地意识到，取得政权所需要的革命战略与建设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正是在延安时期，他断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性时，他也读了苏联方面关于苏联发展的许多文献。他也许拒绝了斯大林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的权威，但在拒绝的同时，也伴随着对斯大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很大尊重。在50年代初期，曾经发起过一个运动，号召所有干部认真研究斯大林的经济著作，作为经济发展的讲义之一。在政权建立的头几年，毛谦逊地承认，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在毛主义的延安观点中，也有一些与斯大林战略颇为适应的成份，党把工业化强加到社会身上的做法，是与毛坚信以政治力量进行社会变革的信念一致的。斯大林模式的动机是迅速完成优势军事力量，在这一点

①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第196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143—145页。

上也肯定与毛的民族主义动机是一致的。与苏联模式的区别（这一点很重要）在于，毛不像斯大林那样不惜让农业生产停滞，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的一次演说中，毛在号召加速集体化时说，正因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才有可能在实行斯大林经济发展战略时，避免苏联所遭受的不良后果。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建立了特别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诱导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时较易成功，特别是因为绝大多数农民是贫苦的。毛无疑知道，苏联的集体化曾导致国家严格控制粮食收购的渠道，但同时却损害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在他自己的演说中却表现了强烈的信心，认为在中国，集体化将引起生产的迅速高涨，不仅足以满足中国庞大人口的生存需要，而且也足以满足国家年复一年的要求。他的这个前提增加了他对中国采用苏联模型的能力的信心。

到 1955 年年中，毛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当时，他在农村发动了一个快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他的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写的序言和按语中。毛 7 月 31 日《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不仅标志着他脱离了党关于合作化的步骤及其采取的方法的既定政策，而且还标志着在关于合作化运动的目的以及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二者的关系这一更为普遍的问题上，毛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在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后毛发动“大跃进”运动乃至“文革”运动的许多思想萌芽，例如毛认为觉醒了的群众在改造自身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主观努力是无所不能的。而且，在他看来，中国农民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良品质。

毛的讲话还表现出他对农业合作化重要性的坚信不疑，并否定了他本人在 1949 年提出的观点：农业社会化依赖于优先发展“强大的工业”。毛认为，当时农村中存在着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

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而且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一天天发展，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天地严重起来，中共在农村的天然同盟军将会变得越来越弱小，而潜在的敌人将会变得更强大。毛顽强地和真诚地反对“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并继而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将最后达到共产主义道德的深化，犹如他在大跃进时期所希望一举达成的那样。毛根据 80% 已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结果认为“集体化将提高农业生产”并得出结论“在农业方面，在现有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他提出，如果中共对自己和对群众缺乏信心，不敢将合作化推向前去，就不可能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社会主义，如果到那时实现不了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换句话说，对毛来说，农业合作化是实现当局基本目标的必要先决条件。”

施拉姆认为，当时毛的思想还没有走向极端，他指出，毛当时试图进行的决不是片面的、“农村式”的革命。毛关于合作化问题的看法的显著特征在于，集体化应比机械化先行，但它不能走得太远，因为对拖拉机、抽水机等工业品的需求将是很紧迫的。概括地说，毛这时仍坚持他在 1949 年便提出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种观点。这就意味着要使农民学习知识，特别是学习城市所创造的技术知识，从而把他们带入现代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将起关键作用。

但总的来说，从此后，毛泽东尽可能强调集体化将给农民带来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这正如他强调集体化将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一样。毛指出，大多数农民依然很贫穷，而农业集体化是“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的唯一出路。农业集体化决不单纯是城市工业化的手段。毛指出，工业化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项密切结合在一起的革命任务，他警告人们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削弱另一方面。在这种警告之后，隐藏着毛对第一个五年计划

造成的为了城市利益而剥削农村这种情况的深深的敌意，以及他对整个城市工业化战略和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①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化问题的解决似乎卸下了毛心里的一个很大的包袱，现在他可以把他的精力转向一项更艰巨、更长期的任务上来，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国家。在他看来，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重大发展表明，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为了赢得知识分子和农村富农人口的支持，采取了一系列的“自由化”政策。

但正是在推行“自由化”政策时期，确切地说是在 1956 年的百花运动时期，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第一次发生严重的疑问。这时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认识集中体现在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文章中。这两篇著名的讲话在许多方面都讲了一个相同的道理：要懂得事物的相互关系，不要顾此失彼。在经济领域，他虽然肯定“中国经济建设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但他反对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做法。与此同时，他提出应当注意沿海与内地的和谐发展。在起草这个报告时，毛当时也认真听取了陈云和其他经济工作方面的专家的意见。表明了毛的妥协立场，他想藉此获得党内广泛的赞同。

开始引起这种疑问的因素有很多。在国外，是斯大林的逝世所引起的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变化；在国内，则是中国模仿苏联模式所导致的经济困难和严重的社会后果：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特别是农业的滞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制约；而社

^①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1 卷 第一章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196—197 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142—147 页。

会问题则主要表现在：出现了新型的行政和技术精英阶层；城市工人阶级中日益深化的不平等和工人越来越屈从于严厉而压制的劳动纪律；由日益官僚化的共产党统辖的更为强大、更具有压制性的国家机构；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逐渐扩大了的经济和文化的差距。

1957 年秋的反右运动，是毛的思想的又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大鸣大放运动使毛对知识分子的幻想破灭，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关于知识分子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毛不再讲要培养一批出身好的新型红色知识分子，而是借助于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毛看来，真理比知识、红比专更重要。毛对专家的抨击对“大跃进”战略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失去了对专家的尊敬，就为依靠群众性的劳动动员打下了基础，并转而开始强调运用小、土技术，这种技术不需要懂得什么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为知识机械化和水利建设这类任务的需要而创建较大规模农业组织的趋势日益成熟。在 1957 年底到 1958 年初，出现了现存高级社合并的运动。

到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晚期经济思想许多特征便进一步形成、固定下来了。

二、社会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费正清指出，如果将革命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社会价值变化区别开来看的话，那么毛泽东是一个社会文化变革的工程师。^③ 这是西方学者们普遍接受的论点，但这一论点很容

迈斯纳：《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 195 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144—148 页。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 第 45—46、348 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164—174 页。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341 页。

易导致研究中的片面性。近年来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就有一种趋势，认为毛是田园诗式的乌托邦的信徒，他鄙视西方所谓的先进工业社会而宁愿选择‘稳定状态’的经济。

许多学者反对这种倾向，他们指出，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是毛泽东的最高理想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为此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但另一方面，要求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的决心（这不可避免地联系到经济发展），从来也是毛的最高理想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一生都向往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毛从未停止过号召加速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毛在主宰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的 27 年中，一刻也没有停止号召迅速发展经济、增加产量 钢铁多少多少吨 粮食多少多少吨 等等。

进一步的研究还证实，在毛的思想中，虽然现代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保证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但现代经济及其带来的富足生活依然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设想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并没有设想共产主义乌托邦能够在经济永远落后的条件下存在。从“大跃进”一开始，毛泽东就十分强调“伟大的技术革命”的必要性。他在 1958 年 1 月宣布，中国的工业生产要在 15 年内超过英国 这成为当时群众集会时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分析经济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的关系时，毛泽东描述了一个经济落后与思想落后的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圈。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人民的思想仍然受到束缚，人民的创造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克服这一恶性循环的途径是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将其转化到经济发展的任务上来。

但与此同时，这些学者们也承认，毛泽东关于革命与发展的关系的思想是复杂的。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

¹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142 页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269 页。

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里斯金指出，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的价值是迅速的经济发展的动力，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因为，它们可以更广泛地动员群众，他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将会带来经济与技术的奇迹。在所有的因素中，毛把人的主动精神看作是第一位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的主动性确实被调动起来了，这一点可以从兴办乡镇企业、水利建设及医疗保健的发展等方面体现出来。^①

郑竹园认为，阶级斗争概念是毛的经济思想的支柱。毛认为，甚至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资产阶级的传统思想仍然存在，因为，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当中有一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反应在党内。阶级斗争概念奠定了毛的不断革命的思想，由于认识到人的自私的本性和农民及小资产阶级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毛得出结论，不继续革命，就不能避免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这两个概念导致他利用群众动员和思想改造作为取得经济发展的工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两个口号，反映了毛要依靠革命热情来实现工业化。^②

另一方面，在毛的思想中，这两者的关系并非总是和谐的，它们的冲突有时是非常尖锐的。而在共产主义理想与经济发展发生矛盾时，毛泽东通常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例如，艾克斯坦教授曾指出，文化大革命可以部分地看作是对 60 年代初期政策方向的反映。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毛证明，他决心同经济社会中的修正主义倾向进行斗争，不惜以经济的低速增长为代价。因此，当毛否认工业化要求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时，他却不能容忍妨碍实现理想的政策，即使它们对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利。施

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202 页

② 郑竹园：《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35-37 页。

拉姆也指出，在毛统治中国的后期，他对经济发展的后果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虽然毛断定“进城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却是非常含糊的。^①

三、“共产主义新人”思想

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他们的行为永远受经济力量的驱使，此即“经济人”思想。强调人的因素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一个主要特征，但毛的思想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专家们将毛的这种思想概括为“共产主义新人”思想。

在毛的思想中，人是最重要的潜在力量，或者更具体地说，人是可塑造的。他们可以通过共产党的组织与灌输而发挥他们巨大的潜在力量。与强调人同样重要的是一种近乎救世主式的品格，即这样一种信念：“人皆可以为舜尧”。虽然对人的这种教育运动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而且倒退的危险总是存在着。这种危险只有通过提高警惕、不断的灌输和周期性的“整风”运动才能克服。这种共产主义新人，通过鼓舞、灌输和使用，就可以成为一种巨大的可以征服自然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个突出特征则是他的自制能力，他们是大公无私的人，具有献身精神和克服自然局限的意志。在他的这一思想中，个人的忘我精神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机器及又红又专这些思想，都是从共产主义新人这种思想中引伸出来的。这并不是说，毛肯定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实际上会遵循这种理想。这只是意味着他相信，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可以接近这种思想。^②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142、230 页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50 页。

^②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304—308 页 郑竹园：《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30—31 页。

毛泽东强调人、意识、意志、政策与组织以及政治挂帅的思想，体现了某种列宁主义成分。毛最先接触的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列宁认为，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农民群众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共产主义。但在毛的思想中更多地突出了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他的这一思想特征的客观基础之一，是中国的经济落后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先决条件的缺乏，当毛发动中国革命时，现代工业部门的工人还不到人口的 1%，中国革命成了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特征和中国经济的落后，对毛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论。在这种环境下，革命必须有意识地去开展和组织，而不能期待它在经济社会危机时自动到来。在这一哲学中，工业化具有双重作用，并来自两个不同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革命通过迅速的工业化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由此，无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工业化是取得军事与经济力量的首要手段和必要途径，在当代世界中，它是取得大国地位的唯一途径。另一个客观基础是，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缺少的国家。毛泽东认为人力和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思想改造与群众动员可以取代资本装备与技术专家。

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关于“落后的有利性”的特殊观点而且，正是这一观点构成了不断革命概念的基础。“落后有利性”并不单纯是指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看法，即现代世界中经济落后的国家，具有可以通过借鉴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技术来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有利之处。它所提出的“有利性”更多地是指由于落后而产生的精神上和社会上的优势。早在 1919 年毛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在痛惜中国的软弱和极端落后之余就将这种状况看作是产生充

满活力的创造性和革命力量的巨大源泉。他十分自信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能力……压迫越深 反抗越烈 蓄之愈久 其发必速。毛在开始他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生涯时，就致力于在那些受到现代经济力量影响最小的一部分人中寻找当代革命的源泉——尚未卷入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农民和没有被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化的非城市化的知识分子，并使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在革命的农村与保守的城市之间划分了一条界限。毛泽东在建国后把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和建设的有利条件归结为“一穷二白”即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这一事实中获取了力量 and 美德。

“一穷二白”的理论还隐含着一种与 19 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中心命题十分相似的观点，即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免受窒息了先进西方国家革命精神的那种历史的“过度成熟”和道德堕落的痛苦。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宣称，前工业化的俄国正是因为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比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离社会主义更近。毛泽东也宣称“一穷二白”的中国具有革命的特殊有利条件，认为前工业化的中国正在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的道路。赫尔岑曾以“我们一无所有”而宣布了自己对俄国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 毛泽东则发现 中国还是“一张白纸”这种条件是它走向社会主义伟大前途的保证。毛泽东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中国的“文盲”优于西方的财富。就中国农民在中国全体人民中是一个最无文化的部分而言，也即是就其更少受物质财富的腐蚀、对现代世界的种种伎俩最无知而言，他们在品德方面，在革命能力方面显然最优越。

施拉姆指出 毛赞赏“白”并不意味着他对技术进步不感兴趣，或者说他是现代技术的敌人。相反，他的目标就是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国家。但他还是表明了优先顺序的。如果要有选择倾向的话，他的选择将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是军人而不是党的干部，是具有政治热情的红卫兵而不是有能力的学生。总之，是

那些愿意干的人，而不是有知识的人。这一切正是“延安精神”的体现。延安时期，动员人的能力要比技术知识来得重要。在今天，它采用了一种极端的形式。恰恰是由于中国的落后性才使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革命能力。中国最穷的是农民，而最白的是青年人。毛一方面相信农民最愿意革命，另一方面也相信青年人最能够接受适当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的转变。如果说“一穷二白”理论的作用是加强了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中国社会中真正的革命阶级的信念，那么它同样也标志着毛泽东恢复了他对青年人怀有的特殊信心，而这种信心形成于他的性格和思想的形成期，即 1915—1919 年的新青年时代。

四、自力更生思想

就广泛的政策意义而言，自力更生是延安时代的产物，在 30 年代末开始广泛使用。在 50 年代的多数时间里它消失了，在“大跃进”开始时重又出现。事实上，自力更生作为一个发展目标早已在 50 年代后期居于显著地位。然而它的突出意义和重要性在 60 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而显著地增强了。

汉学家们还指出，自力更生这个口号包含有几种概念和特性，而究竟以其中何者为突出点和着重点，则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换。因而自力更生作为一种行动方针已在几种不同的意义上和为了不同的目的具体地应用过。

首先，它像中国许多的长远目标一样，可以作为一种道义感召的重要来源。这就是说，它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手段，为工人和农民、工厂和公社、各级干部以及国家机关的个人成就树立自豪感，可以成为激励人们使出最大干劲的一种方法。奥克森伯格和戈德

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前言；《毛泽东的思想》第 167 页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十二章。

斯坦对它的含义做了如下的解释：自尊和尊严只能争取，不能赋予，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自力更生是一个适用于从受压制中获取解放的口号。它同美国少数民族居住区内一些黑人要求管理地方学校的愿望有着共同点。1956年秋天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之后，中国大概很快就意识到，莫斯科今后所能提供的经济援助将越来越少，因为为了要稳定东欧的局势，它必须在那里花费更多的代价。特别是鉴于1960年中苏关系的破裂，它可以使中国尽量能顶得住外国经济上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自力更生本身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排外主义的和保证安全的意义，同时也表明，它并不完全是反映了毛的武断。自力更生还准备作为一种手段，以便尽量减少外国人的思想意识、影响和欲望的输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可以成为使中国的社会制度保持纯洁的一个方法。这会使外国来访者同中国对方的接触尽量减少。^①

自力更生还是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毛轻视分工和相对优势的概念，无论是在人的方面还是在地理方面。相反，他赞同社会的每一个部门都应该从事同样的经济活动。中国的农业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从事生产活动的，它们无论各自的生产条件怎样，都从事粮食生产。同样的实践还表现在各省都建立了“小而全的工业体系”。在原料、机器和消费品方面都相对地自给自足。每个工厂和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商店、医院、学校等各方面都面面俱到。毛的理想的公民是“多面手”，他们既是工人，也是农民、战士和学生。^②

这种蜂窝经济观念与毛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方面密切相关，即对全面的中央计划的不信任，他想通过分配决策的地方化和最

①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192页；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204—206页。

② 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18页。

小程度地依赖外部环境来简化协调机制。毛认为，中央计划机构将变得保守。他和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一样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计算机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一个中央计划局，要全面系统地建立一套指标、确定价格和分配产品是不可能的。但毛不愿意让市场替代计划。这样，自力更生就成为毛取代市场和计划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方法：每个地区、企业尽可能依靠自己的资源。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北京建立概括的目标，较低级的政府将建立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政府将动员中国大量的人力投入生产。

就经济发展这个意义上而言，自力更生还带有一种强烈的自给自足的含义。从根本上讲，自力更生是指每个单位要在内部挖掘发展资源。外在因素并未排除，但它处于从属的地位。自力更生包括以下几个特征：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包括劳动力与技术；反对不加选择地模仿国外的方法，以有利于积累适合中国条件的国内的经验；依靠国内储蓄筹措资本积累；在中国建立综合的工业体系。就关系到地区和当地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来说，这种追求自给自足做法的根源，多半在于运输上的障碍和中央计划制度所固有的资源分配上的阻塞。自力更生的要求，还由于其他一些考虑，如要求分散工业地区和发展落后地区等 而得到加强。

格利还指出，有破有立的辩证法是毛自始至终所信守的法则。毛将辩证法也用于经济发展，例如，毛强调自力更生但他从不提倡闭关自守，也没有不加分析地拒绝一切外援，他从来都主张要引进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 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

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 18 页；里金斯：《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204—206 页。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

格利 见《外国研究中国》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 47 页。

五、其他经济思想

平均主义 毛强调平均主义，反对利用物质刺激提高生产率和效率。从准确的意义上讲，毛的平等主义是同无私忘我精神联系在一起。它要求人们发扬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的传统，提倡道德的与精神的动力。这种思想忽视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关系，赞同一种以感觉需要（如大跃进）和政治承诺与态度（如文化大革命）为基础的分配制度。虽然工资等级制度并没有完全消除，但工资被冻结了。到了 70 年代，奖金被取消了。这一政策包含着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关于市场的影响、政治权力的分配、资源配置及一般的社会价值。

郑竹园的看法则带有实用主义的味道。他指出，对毛来说，平均分配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由于认识到中国普遍的贫穷，不可能找到一条在一夜之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捷径，毛得出结论，实行平均主义政策可以取得群众的支持。

波浪式发展 毛不喜欢平衡稳定的发展，他批评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一句话反映了他的个性——“‘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根据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这一总的观点来看经济发展问题，毛得出的一个经济原则是：经济发展只有通过迅速的、波浪式的运动才能取得。他说，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这是一般的规律。任何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形的，螺旋式的。他认为，波浪式的概念产生不平衡和矛盾（如由于部门间不平衡发展而造成的短缺），但进步正是由它们推动的，问题因此产生并获得解决，经济形势将比以往更好。

① 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223-224 页 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 18 页。

② 郑竹园：《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34 页。

以后，毛的不平衡理论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波浪式增长机制包括以下两方面的流动式的不平衡：一是生产发展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二是社会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后来指出，这些不平衡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关键。毛的许多同事仍然认为，只有经过长期、全面的经济发展，才能产生社会主义文化和高度集体化的适当条件，而毛则认为，是这样的制度建立起来，并广泛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价值观，经济的加速发展就会到来。一直到 50 年代早期毛认为经济的完全社会化条件只有在长期的经济与技术进步之后才能出现。在 1955 年他否定了这一论点，认为，只加速进行社会化，才能带来生产的转变。1958 年他又增加了新的观点认为社会化与政治教育运动是最关键的因素。文化大革命发表的言论表明，在他生命的晚期，上层建筑的改造成为他的主要目标。认为，这种改造将产生经济的迅速发展。

“大跃进”以后毛修正了他对波浪式发展的强调转而将其与一种“按比例”的，然而仍然是迅速的增长结合起来。这反映了他对一五计划和“大跃进”的“不平衡”战略的不满。这两种战略都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他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仍然为他的波浪式理论辩护。^①

工业与农业的关系 施瓦茨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大跃进”是毛主义战胜苏联模式的标志，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是，在革命时期行之有效的延安精神，同样也适用于现代化建设。但另一方面，从严格的经济战略看来，它并不标志与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之一——偏重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轻视农业决裂，实际上并没有从重

克里斯朵夫·豪(Christopher Howe)、沃尔克(Kenneth R. Walker):《经济学家》，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2 卷，第 334—336 页。

工业部门的投资中挪动资金转到农业。尽管在 1958 年到 1959 年间大力注意了农业部门以及小工业和手工业，当时预期最辉煌的跃进，将发生在先进的工业部门，而农业则将继续依靠有组织的人力而不依靠大量的资金。这样，集中注意农业以及新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根据依然就是这样一种推断，即毛泽东是赞成斯大林关于资金分配的观点的。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在 60 年代初期的危机时期所作出的“农业为基础”决定，应被认为是与斯大林经济战略的决裂，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观点也没有改变。虽然它是伴随着“以工业为主导”提出的，但它强调工业本身应尽可能为农业服务。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时期，这个政策坚持不变，乃是中国社会能够经得起文化革命这样的动乱的弹性力量的主要原因之一。^①

“延安经济学”所有论述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汉学家都坚持认为即使不在延安时期之前至少也是在延安时期“毛的经济学”就诞生了。延安模式的本质就在于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在于经济工作中的分散经营、群众动员、平均主义、自力更生以及对农民美德所给予的重视。建国以后的毛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安模式的普遍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体现了“延安模式”，并使毛和他的许多战友分道扬镳。

施拉姆并不完全否认这种论点 他承认 毛在最后 20 年中 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了延安的思想轨迹。但他同时指出，要证明 1958 年的“大跃进”思想在任何意义上讲都已内含在这些早期理论之中，那就太片面了。这些初期理论只包括农民的自助而没有那些具有公社特征的多方面的综合组织；它只强调土办法，而不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使用现代技术。总之，在延安，没有靠“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把大的和小的、现代的和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 是时，

^① 施瓦茨：《中国的发展经验》 载奥克森伯格编《中国的发展经验》。

毛的著作中还没有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因此，人们如果能够辨认出延安的自给自足经济与 15 年后在自力更生口号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间的某种实际连续性，那么，以连续性的思想进行周详的政策阐述就很困难了 甚至这种思想的连续性根本就不存在。

第六章“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与开放

自1949年以来，中共领导人首次明确地把经济发展放在其他意识形态或政治目标之上，并且认识到，为了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基本的改革，经济改革必须是包括整个社会在内的广泛的现代化的一部分。

——鲍大可《中国的现代化》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而言无异于“第二次革命”，它不是那种毛泽东式的“疾风暴雨”的革命，而表现为有序而缓慢的变革，但它所引起的变化比较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甚至更为深刻，……必须看到邓小平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有根本性区别的，他们把中国引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哈里·哈丁《邓小平思想
与后邓时期中国将面临的问题》

第一节 “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改革的进展与局限

一、物价改革

所有的专家都强调，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物价改革。价格改革既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又制约着其他各项改革。没有价格改革，银行家和企业家就不能在有利性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做出决策；没有价格改革，企业破产和劳动力调整就会弊大于利；没有价格改革，贸易的自由化就会产生损害中国长期发展的扭曲的贸易方式。与此同时，价格改革还具有很大的风险，可以导致通货膨胀，破坏中国经济的稳定，引起社会的不满。

一般认为，价格改革应该达到的目标是：价格必须反映相对稀缺，即生产者的边际社会成本（私人的和外在的）和使用者的边际社会效用（使用价值）。市场价格必须是提供信息、协调、刺激的主要方法。如果产品的价格不能反映经济中的相对稀缺，那么简单地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就会导致投入分配的严重失误，同时也无法起到对企业的促进和惩罚作用。

中国在放开市场价格方面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在农业方面尤其如此。过去单一的固定价格现在已经发展为固定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而且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支配的范围越来越大。同时，价格的功能不再仅限于会计核算和财富的再分配，它已开始具备协调、信息、刺激等方面的功能。但价格改革的发展不断受到挫折，并且很不协调。事实表明，中国在价格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从理论上讲，价格关系的概念，包括商品与要素价格的相互关

系，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或者是，虽然理解却被忽视了。整个市场价格体系——而不是个别商品价格——放开的必要性还没有真正被认识到。其次，人们普遍不愿意承认，价格既向下浮动，也向上浮动，价格浮动的水平是通过供求关系自动调节的；最后，领导人担心，如果在短期内放开价格，由于需求过猛，而造成社会动荡。中国的理论家和决策者普遍认为，价格改革需要在有利的条件与环境下进行，并与其他改革相配套。但这就陷入了一种无意义的循环反复推理，因为，有利的条件（供求平衡）在价格体系混乱的情况下是无法取得的。

在实践中，为了比较容易地走向自由市场价格，中国实行了价格双轨制，这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办法。不容否认，销售与价格的双轨制增加了企业的决策权。但从总体上讲，它并没有使中国的价格体系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反而使得旧体制中严重的价格扭曲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就不能发挥正常的刺激作用，因为，对企业来说，增加投入的分配量或减少产出量对企业利润的影响要比改善生产大得多。这样，企业在与上级机构的讨价还价与施加影响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同时，超出定额的商品价格水平是否体现了社会供求关系也很难说。首先，这些价格不同于均衡价格，后者是在没有定额的条件下产生的；其次，资本与劳动力价格不反应稀缺关系；最后，在现存条件下，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保护的，市场，买卖之间的关系渗透着政治因素。

双轨制还产生了另外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是经济领域中的物价上涨。在需求过度的情况下，自由价格通常会导致价格的猛增，因而成为引发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严重问题则是涉及面更为广泛的贪污腐化现象，它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直接和极大的影响。珀金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中国要解决这

个问题，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开展有力的反腐败运动，但他认为，除非领导层的道德水平有普遍迅速的提高，或者除非中国回复到50年代的体制，反腐败运动这种方法是可能无效的，而且还可能产生一种反作用，即政治压抑感；另一个方法就是消除产品差价，从双轨制过渡到单轨制。中国如果过渡到单轨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单一的价格究竟是市场价格还是国家以低于市场供求关系而确定的价格。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市场对投入量的分配的作用将会减弱。国家将重新集中对这些投入的分配，或更有可能的是，投入分配将在企业之间通过不正常的渠道进行。^①

中国价格改革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表现在相对价格方面。改变相对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本质，相对价格不改变，经济改革就不会有任何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和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受斯大林主义的相对价格的困扰”

50年代初期和中期确定的价格结构没有考虑到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基础工业——原料、能源、通讯和运输——以及中间产品被稳定在相对低的水平上，使国有企业的利润集中在最后生产过程。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越来越通过物资平衡系统来分配，以防止定价过低产生过度需要。而且，一旦价格结构固定下来，就很少进行调整。

拉迪的看法是，双轨制是为了减少国家用固定价格分配的产品数量，而增加相当一部分市场上出售的产品数量。在双轨制下，除了若干种商品以外，固定价格结构并没有得到调整，许多企业不能以固定价格获得所需要的全部投入。在理论上，如果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营，那么，平行市场的广泛存在将促进资源的合

普里波拉：《中国的经济试验》，载《共产主义问题》，1989年1-2月号 珀金斯：《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 未来的挑战》前言。

理配置。因为一定数量的投入物按国家固定价格得到供应，等于企业得到一笔补贴，而不会影响它们对投入物使用的选择。但现实与理论是否一致并不明朗。

哈特兰—桑伯格的观点则非常明确，指出双轨制并未改变原材料价格的人为的低下。在这种价格体系下，国家定额以上的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当工业生产迅速发展时，对投入的需求远远超过供给，固定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额越来越大。从理论上讲，瓶颈产品价格的飞涨应刺激相应的投资与生产，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反而导致了贪污腐化。这或者是由于国家要保留这些部门为己所用，或者是由于信贷机制没能为非国营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煤炭及其他原材料生产都是典型的大规模生产，需要大量的投资和长时间的建设周期。中国不充足的信贷市场将私人 and 集体企业排除在这些生产领域之外。因而，自由市场对这些生产的刺激功能就不能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和深受政治影响的银行系统不能保证将剩余的信贷投入其他经济领域。地方政府为了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集中发展加工业，因而加剧了短缺。到 1989 年，供给短缺已严重到如此程度，以致许多工厂不得不停工待料。在十年改革中，中国推行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加重了这些资源的短缺。到十年改革的末期，短缺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不对改革方案的性质作全面的修改，中国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如果增和的压力持续增加，瓶颈部门继续落后，短缺就会更加严重，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紧缩的时间将会延长，发展的期间将会缩短，直到中国经济处于“滞胀”状态为止。双轨制将中国经济钉在斯大林主义瓶颈的炸弹上。

桑伯格还补充说，为了达到资源的最优分配，中国的相对价格也许没有必要反映世界的价格。中国的国内市场很大，一般

① 拉迪：《中国的经济体制再造》载《中国向何处去》第 116 页。

情况下能够在没有世界市场的帮助下形成规模经济，因此，一个反映相对稀缺和中国消费者偏好的价格体系将使中国的资源生产率达到最优化。与此同时，当中国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开放时，它还将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最大的贡献。然而，如果像燃料、动力、运输或劳动力这些重要资源的相对价格仍受行政控制，不能反映国内的稀缺，资源分配的扭曲便会依然存在，生产率和增长率就会受到损害。

如何进行价格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战略的问题。某些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主要熟悉西方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经济低效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干预，这种干预扭曲了价格，使它不能反应稀缺价值。只要取消了这种政府干预，价格就会反映相对稀缺，市场就会有效地运转。珀金斯批评说，以这种方式分析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把许多事情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他们假设，有效运转的市场的其他条件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如果商品不能在市场上买卖，或者，如果企业经理的行为不符合市场规则，即使有正确的价格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珀金斯强调，价格改革必须以企业行为的转变为前提条件。

阿尔伯特·凯德尔(Albert Keidel)提出了一种具体而又颇具特色的设想。他提出，在价格扭曲的情况下贯彻价格改革有三种政策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政治风险。选择其中的一种注定要失败，但将三者结合起来则有成功的好机会。

第一种方案是，引进价格改革，然后增加非国营企业的直接税收，让其税额等于由于价格改革所导致的利润及财政损失。一项明确的税收可以取代旧的价格体系中所有的财政转让。但如此巨

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第26-32页。

珀金斯：《市场与计划 企业经理的关键作用》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66页。

额的税收不仅会引起强烈的反对——对农村经济来说，通过直接征税将财富转移到城市比毛时期的价格渠道还要露骨——同时也难以征收。它还将削弱由价格改革所强化的刺激，并使政府处于不利的地位。毫无疑问，一个直接和更有效的税收系统是需要，它将有助于解决问题，但它自身并不足以支持价格改革。

第二种方案是，贯彻价格改革，同时通过利用国家赤字和向银行借贷保持对城市的补贴。中国在 1985 年和 1988 年使用的就是这种政策，但它导致了通货膨胀、城市的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它最终会消除由最初的价格改革所带来的任何积极影响。如同税收那样，保持轻微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有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使投资和就业机会最大化方面，但让货币独立发挥作用极少成功。

第三种方案是迅速增加城市劳动力和大规模城市投资的生产率，同时限制城市消费水平的增长。这种方案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但它在政治方面也是最困难的，因为它会大大损害城市的消费水平。提高城市的生产率还必然导致城市劳动力的调整、就业的变化、解雇以及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城市居民反对价格改革影响的严重性。价格改革的基本问题，最终与由经济变化所引起的政治、社会乃至心理因素联系在一起。如果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变得比较明显，改革就会变得容易些。利用经济周期实施相应的政策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推行相应的实际政策伴随着居民期望的调整。同时这种方法还有助于抑制周期自身的恶化。

膨胀性扩张阶段 新的就业机会和不断增长的收入可以减轻失业，使价格的上涨更容易接受。不断扩大的销售额也可以使企业负担得起新的或更严厉的税收。这时最适应于推广价格改革、增加投资创造新就业机会、引进有争议的税收。

紧缩阶段 在明显的萧条阶段，人们对就业和收入的期望下降，对解雇和调换职业的抵抗也就会相应地减少，这时就应加强推行企业破产和财政改革、促进管理人员降低成本、调整劳动力、节省城市投资、减少补贴。

当然，经济周期并不能解决经济改革的所有问题。法制、商业机构、社会保险、失业救济、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完善需要一个缓慢、逐渐的训练和经验过程。但经济周期不仅会减少价格和劳动改革的社会影响，还引出了价格和劳动改革的程序，等待其他较慢的改革的成熟。最重要的是，对经济周期本身及其对改革的意义认识还有助于避免严重的不稳定的危险。如果决策者在扩张阶段已经到来的时候刺激经济，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就会导致囤积，削弱金融机构，激起保守势力对改革的反对。相反，如果在周期的收缩阶段进一步紧缩，而这时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下降，就会造成失业、资金短缺和工资上长缓慢，从而引起工人的不满 威胁社会稳定。

二、市场的发展

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必须要建立商品与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职位、国营企业的大部分生产资料）的自由市场，它意味着买卖双方可以根据供求关系自由进出市场，同时还要取消投入产出的实物配给。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首要条件。否则，企业经营机制就不能改善，企业行为就不能步入商品经济的轨道，企业决策自主权就是一句空话。从 80 年代初开始 中国从建立消费品市场着手，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对中国市场的发展状况，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不同的分析。

阿尔伯特·凯德尔：《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前景》载《90 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 119—134 页。

一些学者从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着手来分析这个问题。因为，尽管中国的非国营企业不符合完全竞争机制下的经济模式，但它们的经营更趋向于市场导向；这些企业部门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是从非正规的信贷资金市场获得的，而不是从国家银行体系中获得的低于甚至负于实际利率为形式的补贴；企业的全部原料投入也直接从市场购得，而不是国家分配的；工资也同生产力和企业利润挂钩，不同于国营企业的固定工资；最后，它们以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其全部产品，而不是将其交给国家按统一价格批发销售。总之，私人经济和集体经济受国家控制的程度较小，它们的活动主要是面向市场的。因此，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市场也就相应地越发达。

由此分析中国市场发展的学者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论。

集体和私人企业的兴起是十年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这些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21% 上升到 1988 年的 36%。若以此标准来衡量的话，在中国的经济状况下，国家的作用已缩减到接近意大利和法国的水平。而在这两个国家中，国营企业只生产了国家产值的三分之一。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这个因素，再加上国家有意放宽对物资的控制和国营企业也根据市场需求部分地从事定额外生产，到了 1988 年，资本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和其他非中央计划渠道流通的。1985 年对 429 家工业企业的调查表明，大约三分之一企业的 40% 的投入是通过市场购买的，大约二分之一的企业将多于 40% 的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另一个资料表明，由国家统一的调配系统掌握的商品的数量，已从 1978 年的 265 种下降到 1986 年的 20 种。最后，同一个资料表明，按国家指定价格交易的商品只占农产品交易量的 35%、工业消费品的 45% 和工业原料的 69%。即使像煤、钢铁这样的战略物资，国家控制的比例也大大下降。这些统计表明，中国经济已

从完全由国有制占支配地位、由中央计划指导资源和商品分配的苏联模式经济 转化为含有大量私人、集体经济成分和市场发挥较大作用的混合经济。^①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从具体、综合的角度对中国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土地市场 除少数小规模的城市房地产外，中国实际上没有土地市场。只是在农业实行新的长期承包合同制后，才出现了一些转租土地的现象。乡办企业的工人原是农民，这些人把自己的土地转租给了自己的邻居。中国是否出现出租土地的市场还不很清楚。

劳动力市场 到了十年改革的后期，劳动力市场仍只是部分存在，且非常不完善。在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中，工人与企业的关系是非常僵化的，在这里没有解雇和流动的权力。在其他类型的企业中，虽然允许流动，却因为社会保险或失业救济制度尚未建立而受到阻碍。工人除非有一块可耕种的土地，否则解雇后的日子就没法过。在农村，劳动力可以从土地转移到乡镇企业，但不能到城市企业工作，合同工的流动性大于国家指定的正式工的流动性；与原苏联相比，在中国，企业之间对劳动的竞争实际上不存在。在原苏联工业企业中，每年有 17—20% 的人离职，而中国企业实际上没有人离职，退休工人由子女顶替，而对于新人的选择则进行严厉的行政压制，有技术的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很小，不可能鼓励有效地利用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

产品市场 这种市场的出现受到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首先，国营企业不能给自己的产品自由定价。有些价格被有意定得很低，有些则被定得很高。它们可以按浮动价格出卖其部分产品，

拉迪：《重新评价美中经济关系》，《美国亚洲苏联研究局分析报告》 珀金斯：《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

浮动范围不能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的 20%。它们也可以按完全自由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同时，其投入生产的部分原料也必须以“议价”或市场价格购进。其次，贸易发展的内在障碍非常严重，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垄断，从而妨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扭曲的价格结构使得那些效益很差的企业也能获得很高的利润，并能地方政府提供税收，因为它们在竞争中能受到行政上的保护。最后，对国营企业来说，不存在能够保证有效竞争的破产机制。

资本市场 在十年改革期间，国营企业从国家得到被有意压低的利率的贷款，致使这些企业在投资时不考虑效益问题。它所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私人银行的利率以及这些银行的持股人所获得的利润高得吓人。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很不发达，股票及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十分落后。

普里波拉指出，要素市场的这种极有限的流动性破坏了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条件：资源不可能根据需求而迅速转移。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供求失衡状况得不到任何改善；通货膨胀趋于严重；隐蔽性失业和生产率的下降进一步加剧。对关键项目投入和产出的实物定额也同样损害了市场发育的条件，虽然目前定额产品的项目减少了，但仍在实行的定额产品的数量和其重要性，扭曲了这些商品的剩余“自由”市场和其他商品的市场。

三、企业行为

与 1978 年相比，在 80 年代末，中国的企业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已不再追求总产值的最大化了。但企业行为还远远不符合经济原则。它们关心利润，但它们往往致力于通过低税率、优惠

拉迪：《中国的经济体制再造》载《中国向何处去》第 111—124 页。约翰·艾尔斯特：《中国改革的局限及其原因》载《中国向何处去》第 99—110 页。普里波拉：《中国的经济试验》载同上第 99—110 页。

信贷来获得利润，而不是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销售来提高利润。同时，在存在过度需求以及某些投入的价格人为偏低的情况下，企业仍可以简单地通过增加产量获得利润。总的来说，国营企业的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不是由市场机制所制约的。

约翰·艾尔斯特对中国的企业行为做了具体的描述，他认为，中国的企业行为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因素得到解释，即向上级寻求保护、与之讨价还价和实行联合抵制。国营企业内部的关系是一种保护主义的依附关系，它通过两种主要的机制发生作用。一方面，以表现的好坏，即思想觉悟和忠于企业的程度作为尺度衡量工人，并依此确定劳动模范、先进及其他鼓励。另一方面，普通工人中怀有不满情绪者被通过关系或“联系”而稳定下来，这种机制流行很广，从利用已有的感情联系到建立实用主义的友谊，以至赤裸裸地行贿。关系好的工人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得到房子、日用消费品和其他短缺产品。其结果是每个人或者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点关系带来的好处。而且，经理对工人的依附并不亚于工人对经理的依附，因为他们不能随便解雇工人。结果中国的工人在与雇主讨价还价时，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居于更有利的地位。国营企业与政治上所属的行政上级之间也存在同样复杂的关系。其间也存在保护主义，企业必须与其行政领导、税收部门和地方银行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与企业息息相关。同时也有讨价还价，企业与工业局的合同条款不是单方面制定，而是双方协商订立的。另外，双方也联合起来抵抗中央政府，因为，企业和地方机构在保护低效益企业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银行将无限地增加给企业的贷款，不会眼看着自己的企业破产而袖手旁观。

怎样才能改变企业的行为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国的中国

经济问题专家们的分析仍按照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来展开的。

德恩伯格只是原则上指出了企业财政约束的意义：企业软财政约束仅仅意味着，生产者与购买者由银行系统或国家财政给予补贴以便他们能够继续他们的生产活动。比较经济体制文献表明，区别不同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看它们对企业和消费者实行硬财政约束还是软财政约束。在中国，实现硬约束这一目标很困难，不仅仅是由于广泛的政治社会原因，还由于特定的经济利益群体的压力。显然，在从苏联式经济过渡到混合的经济体制过程中会存在严重的过渡问题。这种过渡的效益和负担应该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别局部的。至关重要的是，领导人应该逐步停止对那些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生产者与购买者的补贴。中国当局在引进硬财政约束方面过于怯懦。不幸的是，这一过渡问题会成为中国混合经济体制的永久性的特征。这种补贴，实质上是让整个社会承担个别企业的损失。通货膨胀也分担改革的代价，但决不是以这种非常不平等、低效的方式来分担的。

珀金斯则指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切断企业与政府官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他指出，一个独立的、本身受到硬财政约束的银行体制是很有意义的。一些不能将其损失转嫁到中央银行的银行将具有强大的刺激，促使企业还本付息。创建新的公有制形式，如一个企业拥有另一个企业的股份也是向这个方面迈出的一步。由这样的所有者组成一个董事会将达到同样的效果。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决策者相比，这样一个董事会对企业的利润会更感兴趣。可以想像，对各部的部长和中央计划者重新进行训练，以便让他们根据经理们削减成本和提高利润的能力而不是像现在那样根据其他标准对他们进行

德恩伯格：《中国的混合经济体制：特征与后果》，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97—98页。

奖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政府官僚仍然控制着干部的指定与提升，企业经理就会试图做他们认为这些政府官员想要做的。^①

罗格·戈登(Roger H.Gordon)对影响企业行为的其他因素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指出改革之前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成绩是根据其完成政府规定的实物指标进行评估的。改革以后评定的标准改为企业所完成的税额和会计利润。按照西方的标准，企业的税率仍然很高，但实际上留在企业经理和工人手中的利润比例高于四分之三。与西方企业相比，中国企业中会计利润与企业经理和工人收入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理论上讲，这种强大的财政刺激与财政分权结合在一起，将会导致效率的明显提高，但事实却并不这么简单。

在正常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的增加是根据市场需求提高生产实现的，但这要有一个必要的条件：价格必须正常发挥信息和刺激的功能。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价格只是部分开放，而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反映成本和稀缺。这一因素与决策权下放结合在一起，各种扭曲行为就难以避免了。当会计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很大差距时，会计利润很难接近实际利润。同时，在现行商品价格不同于市场价格时，各种商品的易货贸易就会出现。

易货贸易对企业的会计利润和边际刺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低价的产出用以交换现金和足够数量的低价投入，这两个会计误差就会抵消，税前会计利润就不会受到影响。但事实是，企业经常以低价产出交换低价消费品，甚至从事桌下现金交易。在这种交易中，出售者竭力隐瞒，购买者则尽力张扬，人们听到的是企业的一片叫苦声。它们的产出价格的通货膨胀率很低，是按国

^① 珀金斯：《市场与计划：企业经理的关键作用》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64-169页。

改革本身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它们的锋芒所向被歪曲、削弱了。事实上，这些改革措施并非出于将中国经济从国有制向多种形式的所有制转化的需要而推行的。这些改革的倡导者一方面想要借用产权转变的思想，一方面又不愿意从这些概念中得出它的逻辑结论。他们的真实愿望是在保存国有制的前提下将改革措施作为管理国家宏观财政的一种手段，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些迫切问题：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将消费者手中的资金转向积累。增加国库资金和抑制通货膨胀是这些改革措施的主要动力。实质上，这些改革混杂着很多的国家统制经济的成分，这样改革便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承包制是中国城市改革的主要特色之一，这种制度规定，让企业经理按预先确定的数量每年上交国家利润，企业经理拥有经营自主权，超过承包额部分由企业提取一定比例的利润。通过这种制度，国家保留企业的所有权，同时，鼓励企业进行市场导向的经营。到 1989 年，80% 的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制。但总的来说，这种制度在集体和私人企业要比在国营企业来得成功。因为集体企业必须寻求自己的投入和市场，它们的竞争能力大大增加了。此外，由于承包制没有制定惩罚未实现利润目标的企业的条款，允许倒闭的只有私人或集体小企业，国营企业通常都要得到补贴，因而集体、私人企业有着提高效率的强大刺激。而对国营企业来说，承包制只是提供了胡萝卜，但却没有在他们的发展方向上挥起大棒。

股份制在许多方面也是中国经济所特有的。首先，“企业股份”这一概念就很特别，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不存在的。与这一

索琳格：《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措施》载《共产主义问题》，1989 年 1—2 月号 第 19—33 页。

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第 23—24 页。

概念相联系的是确定企业财产中多大的比例属于（国有）企业，因而导致了无休止的争论；其次，企业股票的股息是预先确定的，而且包括在公司的成本中。因此，持股者不承担任何风险。此外，通过股票持有者选举董事会管理企业、消除政府对公司事务的干预这些设想并未付诸实践。例如，一项报告坦率地指出，虽然地方金融部门被赋予代表国家行使所占股份的权力，但这些机构却转过来向企业自身的管理部门委派任务。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恢复了传统的管理方法。

从理论上讲，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它主要关注的是所有制的形式，而忽略了所有者的“财产权”。财产权是指受到法律保护的获得、使用和处置商品、劳务及其成果的权力。它所受到的唯一社会限制就是保护他人财产不受侵害所必须的约束。正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常看到的那样，财产的法律名义上的所有者（无论是私人、私人自愿协会或是政府和实际的管理者与使用者一般是区别开来的。如果一个财产的法律名义上的所有者拥有上述规定的广泛的权力，同时又是一个这些财产的管理使用者，或者，他将这些权力自愿地委托给实际的使用管理者时，这就是“私有财产权”。这种广泛的权力形成了有效控制财产、劳务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私有权是市场体制运转的必要条件。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信号变化迅速地购买、使用和出售商品和劳务而无需请求上一个等级的允许，是市场的本质特征。市场的信息、协调、刺激制度和财产关系的私有制与行政计划和公有制是不能相容的。每一套体制的运转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要求某种形式的所有制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占支配地位。否则就要冒得到两

家定价出售的；而它们的投入价格却以接近市场价格的通货膨胀迅速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当企业会计的审计工作由企业自己进行时，为了增加企业留成中的经济利润部分，企业的偷税漏税行为就难以避免了。当市场价格在通胀的情况下迅速上升而国家定价又相对稳定时，这种税额就会急剧增加。由此而导致的税收损失，促使政府于 1986—1987 年转向承包制。

然而，易货贸易并不是在所有的市场上都是可行的，只有在无需花费成本的价格扭曲的条件下它才存在。这种扭曲经常迫使政府不得不继续进行干预，无论是以直接的指令决策形式还是以提供优惠信贷或对投入进行补贴的形式。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它不仅鼓励企业争取更多的资金，在仍然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的情况下，还促使企业要求尽可能多的熟练工人。不合理的利率是导致企业“扭曲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的银行贷款利率长期保持在远远低于市场的水平。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很大程度上，利息以至本金成了企业可扣除的税额。允许这种扣除无异于允许企业将贷款投资于交税。从理论上讲，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根据目前价值对边际投资进行正常的征税，因为流向政府的税金与企业所得收入成比例。当企业破产时，政府遭受同样的损失。因而，低利率实际上是使贷款投资享受补贴。这样，贷款需求超过了资金供给，当日益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利率下降期间尤其如此。为了对信贷实行配给，政府的干预就必不可少。

在对资源配置进行决策时，政府不能依据企业的财务帐目作主估项目的根据。这样政府就面临如下的选择：或者修改由错误的价格而导致的扭曲的会计审计制度，或者直接对资源的配置实行计划。在扭曲严重的情况下，尤其在利率、能源价格、汇率、熟练工人成本扭曲严重的条件下，修改财务帐目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不愿意依靠这种帐目来判断企业的经营状况，决定哪些企业

产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存在着财务上的问题，如果仅仅要求企业将会计利润中的税后净额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它们仍是分配投资的依据。但这些投资不是为了积极的自我发展，而是来自一种消极的判断。如果企业预期未来的利润税率很高，它就会宁可通过投资获得一部分税后利润。此外，即使企业的纳税是建立在正确的经济利润的计算基础上，如果企业管理者和雇员对未来没有把握，那么仍然会产生扭曲的刺激。例如，管理人员可能会出售现存资本以便得到现时利润和奖金，希望将来企业亏损时他们已经提升或是退休了。在西方，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是建立在股值变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当前利润的基础上。

珀金斯指出，要让中国的企业行为符合市场规则——至少像南朝鲜的企业那样——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做得越多，放松对价格的控制也就越容易。

四、企业体制的改革

要使企业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经济实体，使它的行为符合市场规律，根本上讲还是要改革企业体制。

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的许多改革措施，如允许企业破产、国营企业资产的转移、建立股份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校正企业的经济行为。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除此别无出路。如果企业的效率并没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济行为也没有由此而改善，原因不在于这些改革措施本身。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中国经济专家多萝西·索琳格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

戈登：《改革中的中国企业行为》，载《美国经济评论》，1991年3月，第202-206页。

珀金斯：《市场与计划：企业经理的关键作用》，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64-169页。

套体系中的弊病的风险。

再看企业破产。中国的《破产法》将破产的企业定义为“由于管理不善而导致亏损，不能偿还所欠债务的企业”。这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破产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事情简单明了，只要企业所有者用完了资金即告破产，而在中国则有种种限制。国家通常要对亏损企业给予补贴，有关部门在各方面负有很大的责任，官员们不仅因为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而受到惩罚，还要向法院为企业提出两年调整改组方案的申请，并负责贯彻这一方案。最后，国家还要保证破产企业的工人在其失业期间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推行《破产法》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要为破产企业的失业工人提供必要的福利基金几乎是不可能的，它超过了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这不但不能解决财政危机，反而会加重这一危机。这样，改革的真正动机便与改革的结果出现了矛盾。第二个问题是价格严重扭曲在这种情况下《破产法》的贯彻也只能是官僚主义的。许多企业亏损的原因是最终产品的价格规定得太低，有些企业则是由于经营不善。这两种企业在现行体制下都不会破产因为政府提供了日益增长的补贴况且《破产法》要求有关行政部门对亏损企业负很大的责任。这实际上是给亏损企业提供了一个保障，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样就使《破产法》失去了意义。正是试行《破产法》时国家补贴急剧增长。1981年给亏损企业的补贴为100亿元，1987年用于补贴的预算达360亿元。总之，由于推行《破产法》首先是为了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而不是为了加强企业自治所以这些问题一出现，《破产法》的推行就

德恩伯格：《中国的混合经济体制特征与后果》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94页 普里波拉：《中国的改革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东亚经济研究中心出版，1990年版 第139—140页。

步履艰难了，它迫使中国转而更多地实施另一个改革方案，即企业兼并。

企业兼并就是将亏损企业的管理权和受益权转移到更强大的经营较好的企业。在这里，它旨在减少政府财政负担的直接动机就更为明显了，这点从这一措施的推行过程中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1984年，地方政府在企业合并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央将大型企业下放给地方，与此同时，对亏损企业的补贴也由地方负责。为了节省财政支出，将亏损企业补贴的负担转嫁到企业身上，地方极力推行企业破产方案，至于效率和规模经济等问题几乎全然不顾了。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中央和企业的不满，因为，一些企业管理人也抱怨说，企业的规模太大了。企业兼并为减少各级政府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极端的意义上讲，企业兼并实际上就是国家用旧的行政管理方法重新分配企业财产，用以维持和增加国有企业的财产。

然而，对企业兼并问题引起更大争议的并不是中央与企业的上述反对意见，而是它在现实中的一个潜在危险：由于财产权的转移而引起工人的不安，由此进一步暴露了这一改革措施所遇到的局限性。于是，1988年股份制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因为股份制并不改变企业的现存机构，因而对工人的就业不会产生威胁。

以上这些新的改革措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与之平行发展的还有一些带有中央集权统制经济性质的管理机构的发展。它们使企业的自主权受到约束，使价格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

拉迪：《中国的经济体制再造》载《中国向何处去》第120页 索琳格：《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措施》载《共产主义问题》，1989年1-2月号第19-33页。

索琳格：《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措施》载《共产主义问题》，1989年1-2月号第19-33页。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问题出现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消费基金与投资基金失控以及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等。为防止并抑制这些现象，政府除加强原有的机构外，还建立了一些新机构。这些机构种类繁多，其中包括物资供应局、工业公司、产权市场、企业破产办公室、商业协会、信托投资公司、经济与技术合作委员会等。中国关键部门（煤碳、石油、钢铁、有色金属、木料、水泥、电力、化纤、造纸、烟草、机械及军火工业等）的许多企业处于这些“公司”的管辖之下。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监督、管理、计划企业的活动，尤其是计划外活动。这些机构还将自己视为企业的法律所有者，保护这些企业免受竞争的威胁。而对他们的经营状况和社会经济效益通常置之不理。这样，以前存在的官僚机构的权力将转为市场权力。这些权力主要体现在他们控制了关键性的供给和多年形成的关系网络上。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加强的是各级政府机构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而不是像官僚们所声称的那样要“政企分开”。这些被注入行政计划的、国有经济中的改革措施与其说是改革传统的体制不如说是强化了它的特征。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中央财政要推卸财政责任时，生产资源和“市场”力量日益集中在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上。但概而言之，尽管官僚中间人在交易渠道中利用了关键的中间联系的作用，尽管地方行政的影响增加了，胜利者仍是国家——它的机构和官员。由于本应反映成本和稀缺的价格在中国的“市场”中没有取得支配地位，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另外，信息渠道不畅，而且信息倾向于掌握在国家干部手中。在这两个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之前，在财产关系发生变革之前，目前的改革不会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中国未来经济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官僚的活动是最终促进真正市场的发育、建立、完善，还是他们利用这些机会使

他们的权力永久化。^①

五、决策权力的分散化

在改革前 20 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主要是“行政性分权”。中央计划当局的权力虽然多次大大地缩减，但是，每次放权都是增加地方政府和准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权限。对这种变化的局限性，中国的改革家们认识得很明确。80 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强调遵循“经济”原则，主张中央应把下放的权力更多地交给企业，而不是地方政府。但中国在实际推行改革时，仍然没有避免以往的弊病，虽然资金和物资分配的控制权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决策权分散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放权符合“经济性分权”的原则。大部分权力仍落到了地方政府机构手中 而且企业在生产、分配、投资、财政等方面的权力还要受地方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运行的影响既深且广 这种控制是以它们对地方资源（劳动力、原料、燃料、动力）和价格、税收等因素的控制为基础的。这种局限性导致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中国经济体制固有的许多严重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有些方面反而加剧了。

地方政府具有一种固有的本位主义倾向，它的行为受到地区性增长的强大压力。从政治方面讲，改革需要在增长中得到验证，地方希望保持较高的增长，以期得到中央的首肯；从经济方面讲，地方政府要为本地区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因而，他们需要更多的投资资金、更多的财政收入。价格的扭曲和收入分成制也强化了对地方本位主义的刺激，它们将地方政府引向那些能产生巨额

索琳格：《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措施》，载《共产主义问题》，1989 年 1—2 月号 拉曼·迈尔斯：《经济改革时期的财产权、经济机构与经济现代化》 载布鲁斯·里诺尔德斯编《中国的经济政策》。

“利润”的工业部门，而置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于不顾。在新的收入分成制下，这种“利润”的留成可以用于地方政府开支。这实际上是一种“地租”。当政府限制贸易或控制价格时，就会使这种“地租”上涨。在中国，政府规定的价格结构已造成了各工业部门“赢利率”千差万别的情况，1982年，固定资产的收益率在食品加工业中高达91%，在纺织工业中为81%，而在采煤业中低到只有3%。

地区权力的加强是提高效率的一大障碍。市场改革可以通过将稀缺资源从较少生产性的部门向较多生产性部门的再分配来提高效率。这种调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代价是会得到更多的补偿的。然而，在十年改革期间，地方政府通过它们增加的权力使提高效率的资源分配受到挫折。它们不是让市场发挥作用，而是对本地区的企业加以保护，使其免受外部竞争的压力。其结果就是一个日益分割的市场，而不是一个日益联合的市场。虽然自1978年以后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从当时的82100家增加到1986年的96800家（相比之下，匈牙利自从实行新经济机制以来，企业的数量减少，工业集中的程度则增加。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加似乎并未导致竞争压力的加强。因为地方利用垄断权力提高价格和地方利润。

由于产品市场的地区分割，新建立的企业经常能够为它们的产品创造实际上并不存在供给短缺的地方市场，结果是地区专业化程度令人惊讶地低下。每个地方都不愿为其他地区市场或全国市场生产某几种产品，而企图在各种制造品方面都相对地自给自足，结果出现了许多不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小工厂，虽然成本高，质量低，但可以用对其他地区的产品实行封锁的办法保护地方市场。例如，在中国的自行车行业中，在1982年，140家工厂中只有11家符合规模经济。但由于地方市场受到保护，新建工厂仍能出售其高成本的产品。地方自给自足的倾向原来就很严重，但1978

年以后的改革，特别伴随工业体制改革而来的财政体制改革使这种倾向进一步强化了。

地方权限的扩大还造成了宏观经济的失控。由于改革主要是将权限下放到地方而不是建立市场和财政责任制度，中央政府就只能通过地方的帮助推行货币财政政策。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关注本地区发展的倾向超过了它们执行中央的紧缩货币财政的倾向。它们利用银行贷款和财政收入发展新的有利可图的生产项目，以便增加本地区的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由此造成了投资失控和结构失调。由于让出了相当比例的收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得不到保证而面临一系列冲击和困难。中央无力控制局势，不得不忙于一次次的“灭火”以防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地方企业的发展，也使中国的能源、原料和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中的滞后部分处于更加严重的滞后状态。

总之，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如果按照分权的经济性原则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改革，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引起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六、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

中国的分权化与市场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改革时期，中央对资源配置决策的直接控制减少了，或者取消了许多可由地方、企业、个人来决策的资源配置的控制和限制。这种新的混合经济体制的结果之一，就是更大程度的经济不稳定性。在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中，经济的不稳定性是在预算内通过保持收

巴里·诺顿 (Barry Naughton) :《毛以后的中国经济与政治》第九章 李·津瑟 (Lee Zinser):《中国的经济成就》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 108-109页; 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第 18-19 页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四十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81-197 页。

入、就业、价格和支出的平衡 甚至预算本身的相对稳定 使这些不稳定内在化了，主要表现为投资与产量水平的极端变化。然而，由于改革的结果，以前的行政控制和约束大大放松了，相当大的不稳定表现为实际收入、就业、价格与收支平衡和预算。概而言之，以前的实际宏观变数的不稳定已经转化为财政金融变数和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变数的不稳定。同时，由于中国激进的改革者在实施分权化和自由化的同时，没能发展起一套宏观控制机制，没有确定明确的财产权以避免外在因素对经济的干预，这种不稳定又进一步强化了。可以说，由改革所造成的中国混合经济的特征表明，与这一经济体制相关的不稳定性可能要比苏联式经济体制或资本主义体制的不稳定性大。

以上是德恩伯格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特征所做的概括。对这些论点，美国的专家们没有多大的异议，只是对中国经济不稳定程度的估计，有的悲观些，有的更乐观些。但在具体的分析、评论中，由于宏观经济较多地涉及技术性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不必要的重复。相对来说，巴里·诺顿的论述颇具特色，且富有建设性。因而以下我们主要介绍这位学者的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宏观调控的具体环境。

以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中，改革措施通常是在经济状况恶化的条件下被引进的，改革的最初阶段伴随着对资源控制的分权，但与此同时“积累倾向”并没有决定性的转变。因为中央不愿意放弃对投资资源的直接控制，尤其害怕低投资率将导致低增长，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宏观平衡的紧张，这种紧张反映为产品短缺与通货膨胀的压力。于是中央计划者不得不加强对经济的控制 改革的基础受到了削弱。

① 德恩伯格：《中国的混合经济体制 特征与后果》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92-94页。

这种循环过程的特征在许多方面也适用于中国。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局部的、不平衡的特征。系统的价格改革一直没有出现，这意味着能源与原料的相对价格仍然很低，政府不得不对这些领域进行大量的投资。因此，改革导致的一个两难困境就是，当中央政府不再垄断投资时，它还要直接管理大量的投资。然而由于把大部分财政控制权下放到地方和企业，中央就必须从公民手中借钱来贯彻它的投资政策，这就大大地加重了综合信贷和宏观平衡的压力。对当前中国形势最悲观的解释就是，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投资愿望与改革所导致的资源控制分散的冲突状态的阶段。这样，进一步改革的前景将是黯淡的。

然而，这种悲观主义并没有可靠的依据，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区别。首先，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而且愿意减少中央政府投资，这样中央政府行为的变化通过减少对投资资源的竞争而使改革过程变得容易了。其次，更重要的是家庭储蓄迅速增长了，因此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并没有导致个人“积累倾向”的减弱。相反，中国的家庭与日本和台湾的家庭相似，储蓄了很大部分的收入。从1978年到1986年，国民生产净值的国有部分（财政部门与国有企业）已从26.7%下降到14.7%。与此同时，国民生产净值的非国有部分（家庭与非国有企业，不包括外资）则从6.5%上升到17.5%。1984—1986年，更多的储蓄来自国有经济外而不是来自国有经济内。而且这些储蓄基本上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由于家庭与企业储蓄的增长超过了其投资的增长，因而使净储蓄大量增加。因而，在1979—1983年，扩张政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家庭与企业增加的储蓄所吸收了。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由于财政赤字的大量增长、财政配额的急剧减少以及信贷的加速扩张，宏观政策——即政策部门的行为——已经变得具有刺激性了。与此同时，家庭与企业对这一形

势的响应却是，它们变得更具有储蓄倾向了。这种行为变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家庭和企业行为的迅速转变也使得稳定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变得困难了。因为决策者掌握的信息变得复杂了，难以对它们作出解释。例如，中国曾对“家庭储蓄”和流通货币是否“过量”有过无休止的争论，最终是不了了之。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积极效应远远超过了它的消极效应，因为，这种行为响应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在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极度紧张，否则，它就会变得极富有扩张性。因此，家庭与企业的行为变化为中国的改革过程提供了一个“中间地带”。就此而言，中国是非常幸运的。它为改革的进展和深化提供了条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在加强对宏观经济的间接控制的同时避免严重失衡的机会。

但这种机会基本上是偶然的，遗憾的是中国没有利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政府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投资控制政策。结果当以前的大多数储蓄被转化为本部门的投资时，部门之间的储蓄流动却没有得到改善。在市场经济中，外来的融资在不同的程度上包括股票与公司债，而在中国，外部的资金供应主要是通过国家银行系统提供的。这样，家庭的财产形式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企业“股票”与国库券只占很少部分，主要是储蓄。此外，银行贷款利率远远不能维持资金供求的平衡（在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也很难期望它做到这一点），所以国家银行系统的资金储蓄仍主要是通过信贷配给进行分配的。实际上，这意味着，大部分资金贷给了国有企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应从直接的行政控制转化为货币、财政等间接控制，这一点早就为中国的改革家所认识。但宏观政策的运用取决于各种行为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具体环境，恰恰这一点很少为人们所认识。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各种行为主体的行为已经由于改革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些变

化对宏观经济发生了基本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根据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化对经济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是改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此问题上的失败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功受到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成功的经济改革过程必须包括可以导致积累减速的经济决策控制的民主化。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将最终出现，它将为市场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提供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可靠性。

虽然政府与家庭行为的改变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可能性，但改革过程并不总是平坦的，因而在中国也出现了周期性。中国经济仍然具有科尔奈称之为“短缺经济”的特征。价格压力与关键产品的短缺一直存在。正是这种矛盾造成了经济改革过程的周期性特征。中国的决策者对宏观的失衡做出两种反应，一种是短期的，一种是长期的。在短时期内，决策者通过减少投资和消费来减少总需求，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与此同时，由于认识到经济问题与其说是短期的不如说是基本的不均衡，领导人决定充分利用加紧控制阶段来制定改革措施。因此，不同阶段的政策以强调主要矛盾为特征，包括短期的收控与未来的重大改革。改革表现出一种螺旋式的前进过程。但变化是不均衡的：分权过程快步向前，而价格和金融体制却滞后。改革的系统设计总是摆在议事日程上，但似乎总是一个悬案。

这种周期过程表明了中国没有发展和应用一个一致、可靠的宏观经济政策。这种失败是计划者控制手段的不足呢？还是具体政策决策的失误呢？总的来说，这些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就银行系统来说从 1979 年开始它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的作用仅限于建立一个为固定投资提供资金的新体制，以补充财政在投资方面的困难。当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银行系统没有作为宏观控制的工具发挥作用，反而加剧了经济的过热。中国银

行并没有从政治权力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要制定一个会减少工业投资与缓和宏观经济压力的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只凭银行系统是不行的，还必须减少工业部门的投资来源。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财政金融的进一步分权，或者是价格改革，将剩余资金投向能源和原料部门，最理想的是两种方法同时使用。但这些改革最终又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因为，实行紧缩政策是要付出代价的。由于各部门所付出的代价不一样，就必然会产生矛盾。例如，这无疑会减少工业部门的投资，从而遭到它们的反对。然而，通过同时减少短期增长的愿望和增加资源，中国就会实现一个更加平衡、持续——最终是加速——的增长率。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通货膨胀的原因。

在中国，如同在其他计划经济国家一样，通货膨胀威胁着经济改革。但事实表明，在从计划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不一定必然要伴随着通货膨胀。

在从指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对价格体系和相对价格进行广泛的改革。在计划经济中，价格对个人资源的配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价格对家庭消费起一定的影响，但大多数生产和投资决策都是由政府决定的，相对价格和利润不发挥作用，价格长期不变，价格关系严重扭曲。要过渡到市场经济，就必须使价格接近稀缺价值，并在生产与投资的资源配置中发挥支配作用。

在中国前 8 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消费价格水平的提高首先是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引起的粮食价格水平的提高。长期以来，由于人为的因素，粮食价格一向偏低。改革初期，粮食价格水平的提高是综合价格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从 1985 年起，综合物价水平急剧上升，但在近两年的时间里，粮食价格的上涨仍然是消费品物价膨胀的主要原因，这是个最大限度的价格调整时期。然而，从 1987 年开始，所有重要消费商品价格都开始上升，通货膨胀

加速上升。纯价格水平的上升（价格变化的货币现象）变得比相对价格的变化更加重要。正是在这种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才采取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强硬的紧缩政策，但它导致了增长的下降，破坏了改革。

这样，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经历了消费商品价格持续调整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出现了综合价格水平温和上升，继而又发展为纯通货膨胀阶段，这是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经济体制过渡时期价格体系功能的变化。在指令经济中，价格在资源的配置中不发挥什么作用，而在资源动员方面则是一个主要的途径。控制价格的政府为现代工业部门制定了高价格，这是相应地以农业、矿业部门和多数服务业的低价格为代价的。这种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保证将大量的资金留在国有现代工业部门，其中的剩余资金上交政府财政。因此，投资不是由价格信号指导的；相反，政府投资的资源却是由综合价格结构提供的。产品价格替代了税收制度，为国营部门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显而易见，如果价格体系要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它就必须抛弃早先的资源动员的功能。一个唯一的工具不能同时胜任两种不同的功能。当价格在改革过程中接近稀缺价值时（尤其是当部门间价格差异缩小时），宏观经济的稳定既要求建立一个新的税收体系，使政府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也要求在财政收入下降时减少政府支出，以减轻财政压力。如果两项工作都没有做，或进展太缓慢，政府赤字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压力的大小取决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途径。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长期以来，国家财政过度依靠现代工业部门获得税收，但改革以来相对价格的变化减少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利润。经济改革通过三个途径改变了价格关系：相对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农民收入相对增加，虽然提高了的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被政府补贴吸收了，但其他一些产品和农业原料价格的上升则转到了

城市居民和加工企业身上；其次，进入制造业的壁垒减少了，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最后，折旧率与利率上升了。高利润率行业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对价格的压力，大大地降低了工业的利润率。结果，自 1978 年以来，现代工业部门的财政剩余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1988 年现代工业的全部利润与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 16.7% 其中，国民收入的 3% 留归企业，2%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工业上交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 24.7% 下降到 11.6% 因此，财政收入也大幅度下降，下降幅度接近工业上交额下降的水平。从 1978 到 1988 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27.4% 下降到 19.8% 财政收入降低总额中的 84% 是由于工业部门上交额的下降所造成的。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下降是罕见的。其结果就是国民生产总值中财政部分的巨额下降、长期的财政危机以及公共部门的借贷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工业利润的下降既不是由于工业增长的下降，也不是工业部门效率的下降。工业产值的增长大大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现代工业中劳动力的比例增长了 15%。价格调整后国营工业的要素生产率在这期间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利润的下降几乎完全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所造成的。由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上升引发，因工业企业的增加所造成的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加剧。为了应付财政收入的巨减，中国政府削减了支出，因而，公开的财政赤字仍不严重。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35.4% 下降到 1988 年的 22.1%。1988 年，财政赤字只占国民收入的 2.3%。政府在削减财政支出的同时，还大规模地削减了军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政府的各项补贴增加了。但是，财政变化并没有充分显示出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急剧减少，而中央政府的投资计划并未相应地下降。1978 年，全部中央计划投资占国民收入的 9% 到 80 年代末又恢复到 8%。考虑

到需要为投资过程的各个阶段筹集资金，将近一半的中央投资计划要由财政收入支出，为了给投资计划筹集资金，中央政府需要借的资金占国民收入的 5%。如果我们将政府投资计划当作衡量中央政府实际支配的投资来源的标准，那么，全部政府借款需求相当于财政赤字和中央投资计划赤字的总和，占国民收入的 7%。巨额赤字对宏观经济平衡产生了巨大压力：从 1987 年开始，政府借款总额需求超过银行系统的贷款总额。

国家储蓄结构的变化导致了银行体制性质和信贷政策的变化。家庭储蓄剧增，自 1984 年以来，家庭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年增长率超过了 8%。在大多数国家里，当家庭储蓄上升时，银行系统就日益发挥中介作用。与改革前不同，银行现在成为将储蓄导向工商业的渠道。在特定的条件下，日益增加的家庭储蓄使得为公共部门筹集资金成为可能。

信贷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1983 年期间，每年的借贷增长率为 13%。从 1984 年开始，信贷加速增长，1978 年的年增加率已达 26%。信贷政策的急剧变化对价格上升产生了直接的压力。但在 1985 年，这一因素被占国民收入 5% 的贸易赤字给抑制住了。而且，工业产品也在迅速增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贸易赤字逐渐消除（1988 年中期），预期的通货膨胀越来越明显。持续扩张的信贷政策最终导致了膨胀加速上升。扩大的信贷政策与逐渐增加的中央政府的借贷需求是矛盾的。当中央政府的需求在 80 年代中期上升时，就对企业的地方投资产生了威胁。当时政府既不愿减少自己的借贷，又不想冲掉其他投资，于是转向扩大信贷政策。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

财政赤字与价格改革只有在银行系统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以适应物价上涨时才会引起通货膨胀。1984 年底，货币政策已变得非常软弱。这种变化是导致 1988 年通货膨胀的形成与爆发的最后因素。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增加了贸易逆差而暂时受到抑制，

但当赤字缩小而信贷政策仍然保持宽松时，公开的通货膨胀就上升了。货币政策的这种变化可以同通过银行系统为政府投资提供资金的需求联系起来。

总之，中国在调整价格的同时没有对税收和财政体制进行改革。结果，财政收入迅速下降，最终超过了财政资源的限度，因而不得不转向银行系统来获得这些资源，从而造成了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这表明，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不可避免的，勿宁说，它是经济改革次序错误的结果。

上述事实可以由中国改革过程的两个基本特征给予充分的解释。首先，改革过程是放开产品价格和在经济中引进市场机制，尤其是，放宽进入工业部门的限制和城乡企业发展起来。第二，在将财政关系合理化和建立税收制度方面，在理顺财产关系和资产使用义务方面，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意味着，改革过程中发生的相对价格关系的调整导致了财政收入的剧减。如果政府默认它对资源控制的减少，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然而，当政府寻求保持大量的中央政府投资计划，并命令银行系统提供资金时，便导致了扩大的信贷政策，这种政策最终扰乱了经济及经济改革过程。

这一分析表明，渐进的改革过程不一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对价格的调整的确造成了短期通货膨胀的“苗子”。但如果采取了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可以控制的。相反，通货膨胀的导因在以后的改革中出现了。如果中国政府在改革的早期阶段推行了税收改革，将税收基础扩大到工业以外的部门，他们可以在 80 年代避免通货膨胀。渐进主义的改革战略要求及时进行财政改革，但宏观经济记录并没有表明渐进主义的方法具有固有的缺陷。中国的经历提供了渐进主义方法的优势与危险的有价值的信息。

第四是关于通货膨胀的对策。

由于有必要重新调整价格 并且银行系统仍然软弱 在 90 年代，通货膨胀仍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在 80 年代中期，一些中国的决策者认为，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并得出结论说，不必为此焦虑。如果这是真实的，则将很不幸。正是由于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决策者们坚持不懈地遏制它才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通货膨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加速发展。为此，可以采取如下的一些具体措施。

1. 尽快建立一个不受中央政府政治干扰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当然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实中 要在不久的将来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决不能忽视这一至关重要的措施。即使真实的独立性是不现实的，决策者也应该向银行系统指定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并公开支持银行决策的权威，从而加强它的独立的趋势。

2. 银行应该坚持一个温和、稳定的信贷增长政策。在中国经济具有增长的潜力并需要在价格变化时伴随着温和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信贷的增长不能压得过低。15%的稳定的信贷增长率将使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7-8% 的水平上。

3. 信贷的增长不完全没有制约，但是，银行应拥有自由变化的权限。一个依赖性的中央银行——或者受政治权威控制的银行——应该建立一套每月价格变化的灵敏的指标，并给予这些指标以很大的公开性。这个中央银行还应该有一定的决策权限，通过它对分支银行的借贷控制来调整政策。这样，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就能够看到政策的一致性，并逐步适应新的中央政府政策。当企业相信银行会根据日益增加的通货膨胀压力逐渐紧缩信贷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会变得更为有效并且更容易推行。

4. 由这种信贷增长所导致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将被充分利用起来 以便进行价格改革。价格的不断放开与调整 应与这种信贷改革结合在一起，逐步出台。个别价格的调整将只适应一些具体

的情况 如能源或住房价格。在其他情况下 价格只有在建立新的税收的会计制度,并允许较大的价格浮动的条件下才能“调整”。显然 某些重要的价格变化需要中央政府做出重大决策 但是 如果认为成千上万种价格变化都可以分别加以管理,以便将总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某个特定的水平 那就错了。另一方面 简单地继续冻结价格会导致未来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及更大的问题。

5. 为了形成对企业的硬财政约束,继续进行企业改革是必要的 从而降低经济调整的成本。

迅速地实施这套措施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并没有某种固有的东西妨碍制定这些措施。这些变化会大大降低中国通货膨胀的代价 这种观点也绝不是什么幻想。稳定、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 再加上不断的改革 将使中国脱离目前通货膨胀的困境。这还将会降低中国经济繁荣、萧条周期的频率,减少 1988—1989 年那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①

第二节 中国向何处去： 改革取向与改革战略

德恩伯格、珀金斯、格里高利·周(Gregory Chow) 这三位中国经济专家,在各自的研究中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即十年经济改革(1978—1988 年)已使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在将

诺 顿:《中国的通货膨胀 型式、原因与对策》载《90 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 135—159 页;《工业的财政与计划改革》载《面向 2000 年的中国经济:四个现代化》第 1 卷,第 604—629 页;《经济改革为什么导致通货膨胀》载《美国经济评论》1991 年 3 月号;《中国经济中的宏观政策及其反应 改革过程的影响》载布鲁斯·L·雷诺兹编:《中国的经济改革》学术出版公司,1988 年版;《宏观经济管理与中国的体制改革》载戈登·怀特编:《经济改革时期的中国》麦克米兰专业与学术出版公司,1991 年版。

来的一段时期内，这种体制将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特征。这三位经济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混合体制是介于苏联式经济（国有制，对资源施行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国有制，对资源施行分权化的市场分配）之间的一种体制。与以前的经济体制相比，这种混合体制的经济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但它还算不上是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制。^①那么，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算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制呢？中国怎样才能过渡到这样一种体制呢？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构成了以下部分的主题。

一、经济模式的选择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30 年代的一场国际大争论。当时，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发表了一篇论文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这篇论文在世界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导致了一场大辩论，当时的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都加入了这场辩论。主要的争论点是有关管理的效率问题，尤其是市场社会主义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目前中国经济专家对中国经济改革取向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仍没有超出早期争论的范围。而且，总的来说，争论似乎并没有使分歧缩小。专家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中国以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另一派主张中国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前者的代表人物有珀金斯、德恩伯格和诺顿等人；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里波拉。

从最基本的层次上讲，争论的焦点是：市场社会主义本身会导致日益紧张的周期危机吗？由此又产生两个问题：首先，市场社会

德恩伯格：《中国的改革对美国政策的意义》载《美国经济评论》，1989年5月号
珀金斯：《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美中关系》 载理查德·霍尔顿编：《美中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格里高利·周：《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经济发展》，1986年10月。

主义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有效地运转吗？其次，如果能的话，有限的市场社会主义能像资本主义那样有效地运转吗？

多数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专家认为，理想的市场社会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固有的因素会导致日益紧张的危机或阻碍经济的有效运转。而且，实际的市场社会主义将取得更大的收入平等。主要问题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管理人员得到的收入是他的工资和一小部分利润，不能出售充分的所有权股份，因此，他从事有效管理的刺激，尤其是有关企业长期计划的刺激，就受到限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理者承担的风险和得到的收入要大得多，因而他们的管理效率有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

普里波拉则明确地指出，在经济效率与“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包括：(1) 社会主义工资制度——按劳分配；(2) 团结——扶贫致富而不是通过竞争给落后者以惩罚；(3) 安全——保证充分就业和社会主义企业不致关闭；(4) 国家决定的社会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这些准则实质上是让公民接受生活水平的缓慢增长，容忍卖方市场，对人员流动给予制约，严格限制言论等方面的自由。而经济效率原则则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 旨在促进参与生产的每个人有效工作的刺激机制；(2) 对成本和利益进行仔细的核算，终止非效率的生产活动；(3) 对当前形势和外在此条件作迅速和灵活的调整；(4) 维护企业家的地位、职权，它意味着个人主动性的自由；(5) 个人职责。普里波拉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与经济效率这两者之间的和谐只有在奥斯卡·兰格的想象中才存在。实际上，普里波拉在这里依然重复了当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观点早就由另一位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作了明确的答复。

① 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 未来的挑战》第 12—13 页。

② 普里波拉：《中国的改革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第 115 页。

对上述问题的争论必然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不同流派所提倡的经济模式有效运转的条件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自由市场经济应该包括哪些基本要素呢？它同时还涉及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经济模式才是真正有效的模式？

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详细罗列了这种模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五个相互关联的环节：

— 必须能在开放的市场上买卖各种商品，包括大部分供国营企业作为生产原料的中间产品。

— 商品价格必须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必须反映经济中的相对稀缺 以便为市场上商品的自由买卖创造必要的条件 并为企业提供生产经营的必要信息，使它们能及时地调整生产。

— 企业经理的行为必须遵守市场规律，尤其必须遵守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销售以获取最高利润为原则 依靠补贴、低税或垄断获得利润，是违反市场经济行为的。如果企业行为不符合市场原则 那么 即使价格反映了相对稀缺 它们生产的产品也不会具有使用价值 不会符合市场需求。

— 必须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有一批真正懂得经济运行规律的专家来管理货币流量、调整工资、控制价格 以避免经济的严重失调。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率必须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什么水平是可接受的 什么水平是不可接受的 这个问题基本是由政治形势来决定的。

— 必须消除对商品销售的垄断，企业之间必须有竞争。严格地说 即使没有竞争 也有可能建立一个市场体制 但市场体制的优势也就丧失了。正是竞争这个因素促使企业进行有效的经营活动。垄断会阻碍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改进。

珀金斯还通过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及地区发展经验的总结分析表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要采取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除香港以外 政府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不仅提供基础设施 而且还指导企业的经营活动。在中国 既没有必要 也很少可能建立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体制。关键在于,新的体制必须能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 要让那些敢于革新的企业有利可图 要为它们提供市场和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同时对那些因循守旧的企业给予严厉的惩罚。而要达到这个目的 只要具备上述的条件就可以了。

主张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普里波拉罗列了这种模式成功运转的以下几个条件 它们是:

——放开商品与要素价格。必须反映经济系统中的相对均衡 即生产者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使用者的边际社会效用价格 还必须是提供信息、协调、刺激的主要方法。

——放开商品和要素市场 允许买者与卖者自由进出 取消对投入产出的实物配给;消除对经济行为主体进入交易的外来强制。产生一个使各种商品和服务价格趋向市场价格的趋势。

——必须存在国内市场和国内市场、买者与卖者之间的竞争。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如自然条件)不应存在任何垄断 无论是私有部门的还是在公共部门的 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

——买者与卖者必须以收入最大化为原则:买者争取最大利润 卖者则寻求最大满足。

——干预市场过程的宏观经济手段必须发挥作用 同时 应付社会安全与失业等问题的机构必须制度化。

——法制 法律秩序必须适应于整个社会 包括政治 无一例外。

——私有制必须占支配地位。

① 珀金斯:《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第20-21、68-70页;《市场与计划 企业管理者行为的关键因素》载《90年代中国的经济困境》。

普里波拉特别强调私有制的作用。这也是他和珀金斯等人之间的最基本的区别。他对私有权的强调，在本章第一节中已有详细的阐述。

普里波拉指出，如果中国决定使它的价格市场化，它就必须使财产权私有化。而且这两种改革必须同时进行，因为不这样，价格体系的信息、协调和刺激功能就会打折扣，经济核算就毫无意义可言。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景汉也认为，市场制度的先决条件就是私有制。但他不像普里波拉那样极端，不认为没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不能有效运转。他客观地承认，目前，要中国实行私有制是不现实的，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市场有效地运转起来，中国就需要形成企业家集团。如同美国的企业家集团那样 他们管理的是“别人”的财产 即管理“国家”的财产。在未来 他们是经济精英 没有做官的兴趣 独立存在 受到法律的规范。如果不能形成这种独立的集团，就只能搞私有制。他指出，也许社会主义企业家集团可以和私有财产制度下的私人企业家共存。并强调 这是改革希望所在。

即便存在着上述各种区别，但专家们在一个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即他们都承认，市场不是全能的，它绝不是万应灵药。它经历过崩溃，具有结构上的缺陷，也有非常棘手的道德方面的问题。即使极力提倡自由市场经济的普里波拉也警告说，市场机制在平衡个人产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方面是一个极好的机制，但在取得宏观平衡方面就不那么有效了。“标准的”市场不稳定（商业周期、通货膨胀、失业、在政治道义上都难以接受）的收入与财产的分配方

普里波拉：《中国的改革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第 139—140 页；《从经济体制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前景》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 209—225 页。

费景汉：《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的改革》载《中国向何处去》第 48—49 页。

式、收支的不平衡只有通过宏观的货币、财政手段才能调整。其中有些问题只有通过国家机构来纠正。没有这些市场控制的杠杆，市场制度就会陷入混乱的状态或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引进市场机制和私有制会引发一场公开的失业、公开的通货膨胀、衰退、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这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这种现象也发生在中央行政计划的经济体制中，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采取隐蔽的形式，这些现象足以引起对改革的不满。但在混杂的经济体制中，形势会更糟。改革的危险之一就是来自市场机制自身的性质。

李希腾斯坦对以上各派的论点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批评说，许多西方的观察家只是从狭窄的西方经济学的棱镜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没能认识到中国文化将要发生多大的变化。专家们给中国经济描绘的这些蓝图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模式。他指出，对一项成功的改革来说，只是罗列必要的改革项目是不充分的。

他进一步具体地分析说，在西方专家的探讨中，改革意味着用市场制度取代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市场制度需要独立的生产者，因而，改革又意味着用决策权的分权化取代决策的集权化。最后，经济改革还意味着以个人选择和经济自由为基础的经济过程的“合理化”，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决策都要以实际反映经济成本的价格为基础，等等。总之，“经济改革”、“经济合理性”、“经济成本”、“机会成本”等这些术语和概念最终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实践与观念。这些观念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理论家传下来的，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到萨缪尔逊、到弗里德曼。这并非说，西方社会对这些思想具有垄断权、这些思想与其他非西方文化不能和谐一致。但是，当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学家们讨论在

中国引进市场合理性与经济自由时，确实引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些理论是否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在中国文化上？西方式的经济合理性最终依赖于对成本与利润的客观、公正的计算。它是否否认个人感情因素的。如果西方的经济合理性占统治地位，那么，中国传统的家长制度与社会特权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经济与政治决策的基础。例如，雇用的标准将由能力而不是由血缘来决定。但现实表明，改变中国的家庭传统和中国社会的等级文化以适应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要求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许多方面，中国对西方的疑虑仍然存在，许多中国人对经济现代化的文化含义仍然感到恐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或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中国经济学家和改革家的思想中同样是含糊不清的，并成为当代中国政策争论的主要原因。

李希腾斯坦因而认为，改革的主要困难在于，它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能力。特别是，党、政府官僚、地方政府和经济单位（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合资企业等）将不得不作大的变动。然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如果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那么，政治改革则需要更为剧烈的变革：文化改革。整个社会关系、社会行为与社会观念都将变动，以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然而，在中国的文化中有某种抵制变化的特殊因素。它博大宏深，要确定其中的各种关系、行为和观念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古老的中国传统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机体内仍然具有生命力。“毛主义”和“邓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思想；它们是两千年前两种文化传统的变种，正如派伊所指出的那样。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显得非常艰难，就如同改变冰山的道路。所以，经济改革终究是深深根植于文化中的现代化——西方化的两难境地。^①

但普里波拉是不承认这种文化限制的，他指出，市场体制具有

① 李希腾斯坦：《处在边缘的中国》第 139、143—145 页。

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它具有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能力，甚至有时还从一些卓越的文化的衰落中幸存下来。……这种独立的功能正是资本主义之于它对立的体制的一个巨大优势：它至少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因为它更多地是依靠市场校对愚蠢的行为而不是依靠计划机制。市场体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有它的限制。但它的限制主要来自它自身的相对力量：在现实中，市场体制的移植有一个临界点，如果达不到这个临界点，市场制度、市场观念就无法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占支配地位，从而无法得到这种体制有效运转所必需的条件。科尔奈说得好：“真正的问题是混合成分的相对力量。”具体说来就是，官僚干预市场过程的频率和程度是有其确定的标准的，一旦超过了这个标准，市场就受到削弱，经济活动就会由官僚规则来支配。毛以后中国改革的问题就是，中国从未达到至关重要的市场移植的临界点。^①

二、改革战略与过渡模式

在 80 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改革遭受了许多严重的困难如收入的不平等、通货膨胀、贪污腐化等等。再有，中国的宏观经济也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财政赤字持续增长，部门之间严重失调，工业、建筑业、消费工业等日益受到原料工业、交通运输业和能源工业等瓶颈部门的制约。其中有些问题是改革过程所难以避免的，有些问题则是改革战略的失误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国家在将财政自主权下放到地方企业而又没有同时采取硬财政约束的结果。这个问题又由于在纠正供需失衡时，强调较快的经济增长增加供给，而不是降低需求更趋严重。贪污腐化是实行双轨制的结果。在没有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有效的税收体系下，允许个体企业

^① 普里波拉《从经济体制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前景》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218页。

和集体企业追求利润导致了各社会经济部门之间日趋严重的失衡和不平等。企业缺乏严格的财政纪律，致使国家收支失衡。^①

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强调指出，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没有制定一个改革的蓝图作指导，没有阐明改革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什么时候推出什么样的改革，什么样的混乱是不必要的，是可以通过正确的战略而加以避免的，什么样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是提高质量、消除短缺和浪费等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改革措施的贯彻速度、引进措施的顺序等方面也未进行系统的探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改革不是一个静止的问题，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发展的动态过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只是，而且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中国改革的这种局限性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经济理论的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对市场体制应如何运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对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也认识模糊，更没有一个科学的过渡理论；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的束缚，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不得不对各种利益、社会冲突作出多种妥协，同时，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正如李希腾斯坦所说的那样，在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时，西方经济学家在具体的优先次序方面几乎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总之，尽管有关改革过渡问题的理论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但这个问题是如此的艰难，以至李希腾斯坦会提出这样一种疑问：这样一个合理的改革计划存在吗？回答是：它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

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论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就是，它为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若干理论模式。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这一过渡内涵的许多方面

① 哈丁：《不容乐观的中国经济改革前景》，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48页 普里波拉：《从市场退却》载《共产主义问题》，1989年1-2月号。

作了公开的讨论。但历史的奇特之处就在于，目前的中国不是向马克思主义者们过去所确定的传统社会主义过渡，而是从这种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不幸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的经济学都没有包括这方面的内容。然而，建立一种指导改革家脱离中央计划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是有很多机会的。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对于那些经历过社会变化的人来说，指望他们接受一种普遍的过渡模式理论是一种幻想。许多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是在过渡实际发生以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变化不是在设计师的绘图板上发生的。相反，它是在充满着斗争的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发生的。在这样情势下，要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的重大社会变化不仅要求经济过渡，而且要求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过渡。

但是，无论如何，有关过渡理论与改革模式的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中国的面前，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再加上长期政治冲突的遗产，将使得经济变化难以实现，至少，合理的体制改革将成为不可能的。^①

尽管西方专家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他们毕竟开始做了一些尝试。下面我们概括地介绍他们的一些观点。

首先是改革的深度。珀金斯认为，中国用不着完全过渡到另一种经济体制，即自由市场经济。他认为，对中国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的体制内剪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脐带，一个独立的银行系统、对企业的硬财政约束、新的公有制形式都有助于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诺顿也认为，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没有什么固有的东西阻碍诸如新的中央银行系统、价格的逐渐放开以及

^① 李希腾斯坦：《处在边缘的中国》第 139—140 页。

企业体制转变等重大的改革。

普里波拉则倡导一种彻底的改革方式。他说，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全面地走向市场体制；没有什么妥协、如果、但是或者折衷。市场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市场这种妥协在理论上是不完整的。“全面的”意味着市场制度要在整个体制中占支配地位。他说，修补式的改革过去最好的教训就是南斯拉夫到80年代后期中国也经历了由这种改革所引起的危机。自198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如工业经济过热、工业投资失控与农业投资的停滞、社会消费的失控（主要是公共消费）、通货膨胀（1988年接近30%）、大部分城市人口消费水平下降、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政府用现金购买农产品的困难日益增加、公开的失业与劳动力就业的不稳定、贪污腐化，尤其是党政部门官员的贪污腐化，等等。在这些问题中，有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大部分改革则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从更普遍的意义讲，1988年出现的问题是由那些不全面地走向市场、步伐缓慢及零敲碎打的改革措施所造成的。经过10年修修补补的改革，中国不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因而，无论是行政调控手段还是经济调控手段，都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中国经济在1987年和1988年初期间，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必须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进行选择而有效的出路只能是市场经济。

其次是改革的广度。多数学者都主张进行综合的改革，因为一种经济体制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但也有不同，例如，珀金斯认为，总要有一定的顺序，他举例说，在过度需求的条件下全面放开价格，取消所有的实物配额，以

珀金斯：《不容乐观的中国经济改革前景》 诺顿：《中国的通货膨胀类型、原因和对策》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

普里波拉：《中国的改革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第13章。

产生一个完全的市场体制，这对任何一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不现实的。它会造成价格的全面上涨。他主张要首先改变企业行为 达到对它们的硬财政约束 以便为价格的运行创造条件。

而普里波拉则坚决主张全面的改革。他说，从理论的设想来看，改革必须是综合的、全面的，而不是部分地有选择地引进市场机制的某些成分来“完善”计划体制（即利用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更有效地运转）。但在实践中要有一定的妥协：用一些关键的、有机联系的改革措施组成替代体制的核心。^②

佩内洛普·普赖姆 (Penelope B.Prime) 在分析中国税制改革的经验时也得出结论，全面的改革是必要的。中国的税收改革旨在为企业提供积极的刺激，但由于没有贯彻其他改革而受到削弱。例如，企业对降低属于税收的那部分收入很敏感。他们不报损失，并不害怕破产，有时还希望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此外，政府还控制、固定了许多价格，企业利润并不反映效率和生产率的上升。普赖姆的意思是，改革如果不同时进行就会受阻。^③

再次是改革的速度。珀金斯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说，总结过去十年改革，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反省。采取渐进主义的改革方式明智吗？像越南、波兰试图通过一举消除价格控制和企业补贴实行一次性的彻底的改革是否更为可取？如果仍然认为渐进主义的战略是最有效的，那么改革措施按照什么样的次序排列才最合适？是价格改革领先于企业改革，还是相反？或者两者都按照渐进的方法但随机地进行？或许最一般的问题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应该怎样处理好改革的代价和效益；是效益必须超过代价，还是两

① 哈丁：《不容乐观的中国经济改革前景》，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64—165页。

② 普里波拉 转载同①。

③ 普赖姆：《中国财政的税制改革》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67—185页。

者一样不分上下？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①而巴里·诺顿并不全然否认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法，他指出，渐进主义有它的危险性，但也有它的优势。

普里波拉仍坚持他的一贯主张：理论上的设想是，迅速进行。改革进程的推延会导致停滞并导致累犯过去的错误，因为：(1) 推延会走向这样一个阶段：市场制度存在欠缺，并且不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无法充分发挥其配置功能；与此同时，部分地受到损坏的计划制度也不再正常运行（因此，改革在民众的观念中就会丧失信誉）；(2) 推延使得反对派能够组织起来进行反攻；(3) 延误会产生不必要的混乱、瓶颈和阵痛，导致恐慌。实践中的妥协：政治系统的负担取决于社会的承受能力。最关键的改革措施必须马上引进，改革的势头必须持续。短期的混乱（如通货膨胀的压力、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等）如果是由于体制改革引起的并且不会延误改革，或者是由于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失误引起的，就必须接受。^③

哈特兰—桑伯格则说的比较具体。他认为，渐进主义的主要危险是，相对价格的扭曲逐步恶化，中国就掉入了这个陷阱。在过度需求的情况下，部分地开放经济以及国内供给与需求的转化，使资源配置与相对价格的选择决策大大地复杂化了。^④

第四是改革的“先后顺序”。费景汉教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看法。他指出，在未来 20 年内，中国全面的改革从顺序上看应分为物价改革、融资制度改革，赋税改革、资本物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市场的改革。

物价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物价的浮动，至今物价还不能完全浮

① 哈丁：《不容乐观的中国经济改革前景》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 85 页。

诺顿：《经济改革为什么导致通货膨胀》，载《美国经济评论》，1991年3月。

普里波拉：《中国的改革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第 13 章。

哈特兰—桑伯格：《中国十年的经济改革 未来的挑战》前言。

动 政府不敢“放”，也就是中国国内人们常说的“调”与“放”的问题。现在最困难的就是这个问题。)中国不让价格浮动的理由表面上是怕通货膨胀，其实阻力基本上有两个：一是物价浮动要影响供需关系，就需要中间商人在供给与需求之间搭桥，把供给与需求的信息集中到一起，但在中国非常缺乏中间商人，在一般人的观念上，中间商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并且不承认信息的传输有生产价值。二是如果放开对物价的控制，很多政治官僚就无用武之地了，因此会丧失过去管人管事的特权，这就关系到党政分家、政治改革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用政治力量分配物资，使有些人可以买到“便宜货”，有些人买不到，这实际上就是价格歧视。放开价格不会有连续性通货膨胀，问题是，没有中间商取代政治官僚制度，自动调节的市场制度很难建立。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融资制度问题。融资不是“即期”买卖，而是“延期”的交易，这关系到一国的储蓄怎样借给投资者的问题，从而产生了信用问题。改革前中国没有使用利率的传统，与只涉及即期交易的物价改革相比，这种条件下的改革就难多了。这方面的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实现自由利率，因此融资制度改革应放在价格改革之后。

第三阶段是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涉及有没有买卖资本物的自由之类的问题。资本物品的价值由其赚钱的能力决定。如果没有自由的物价和利率，根本就无法计算出资本物的价值，所以物价改革和融资市场是资本物买卖的先决条件。

第四阶段是劳工市场的改革，这是一项更艰难的改革。它涉及到“人”的价钱，即工资。工厂本来是纯生产单位，而在中国，它曾经是改造人的单位，改革后虽然放弃了改造人的目的，但工厂还是个政治凝聚体，而不是工人意志的结合体，工人没有自由选择职

业的权利 工资也是由政治力量决定的。

最后是与政治的关系。李希腾斯坦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结果关键取决于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平衡战略。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 如果经济或政治因素走在了前面 那么整个规划就会陷入混乱，甚或是某种现代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② 普里波拉也认为，从理论上讲，市场体制与极权政治是不相容的。唯一的均衡状态就是市场体制与民主制度的结合。在现实中，市场体制与政治专制主义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可以共存的，虽然很不融洽。但这种结合是危险的、不稳定的，必须向市场制度下民主制的均衡点发展。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的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几个内在联系着的障碍。一是，要想对新机制的生命力做出评价，就不能仅仅囿于最初两年或五年出现的情况。新形式的均衡需要很长时间以后才会出现。正如熊彼特所说，两种经济制度的比较需要经历几十年乃至几世纪的时间。第二个障碍是，由于期限极短的合同使经济代理人无法做出长期规划，因而这些代理人的工作也不会比计划者强多少。这很可能影响了改革试验的成功。如果代理人能够对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做出规划的话，试验成功的可能性显然会更大。实际情况是，政府的压力太大，致使他们总想争取改革立见成效。其原因有二：第一，1978 年来农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太迅速、太令人瞩目，以至于工人们都期望工业改革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第二，保守势力将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任何短期耗损为把柄反对这一过程。结果，改革者便选择了反对意见最少的一条路。这样一来，他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看到消除不合理

费景汉：《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的改革》载《中国向何处去》第 46-49 页。

② 李希腾斯坦：《外在边缘的中国》第 143 页。

普里波拉：《中国的改革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第 226 页。

的价格体系的成熟时机，而这一价格体系正是改革进程的主要障碍。

同时，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计划者如果采用新的宪政、放弃某种权力仅仅是想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么，经济代理人仍会担心一旦经济发展遇到麻烦，他们那点权利就会被剥夺，而计划者却具有许多种权力，但其中没有一种权力能使他们自己处于无权状态。结果，经济代理人便会采取短期行为。只有在不带任何目的的情况下承认企业和个人的权利，权利才能具有令人满意的有用效应。因为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相信政府关于不允许违反权利的做法。中国人正试图完成一项内在自相矛盾的任务，即用计划的办法过渡到非计划性的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冒了这样一种风险（即用手段计划法对抗目的消除计划）。

另一个问题涉及到是否愿意承受过渡期的代价和损失。如果让人们认识到改革是以公正原则为基础并将扩大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那么人们可能会愿意经历这场试验。然而，如果人们看到改革只是今日中国领导层中越来越多的专家们设想出的一些目的性很强的措施，那么人们愿意忍受暂时痛苦的程度就将大大降低。如果改革不能在短期内明显改善自由平等的程度，也不能改善物质条件，如果改革的代价不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而是让某部分人来承担，人们就不可能给改革者以应有的支持，保证他们顶住保守势力的压力。因此，正式承认基本的自由权利对改革的成功无疑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它将创造一个稳定可信的环境，使人们能够对未来做出自己的计划，从而减少过渡期的代价。此外，它还能促使人们更愿意忍受改革可能带来的各种痛苦。

约翰·艾尔斯特：《中国改革的局限及其原因》，载《中国向何处去》，第99-110页；德恩伯格：《中国的混合经济体制》，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89-101页。

三、经济改革的前景

中国改革所特有的艰难特征，使专家们感到改革的前景难以预测。以下这三位专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前景做出种种估计。

李希腾斯坦在总结 80 年代中国的改革经验时说，在中国似乎存在着一个领导人不敢逾越的看不见的门槛，即“计划——市场门槛”。当接近这一门槛时，中国领导人必然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是跨越它，走进一个陌生的领域；或者是退回到原有的道路，寻求安全。这个门槛在一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一些国家跨过了，一些国家则没有跨过。

当接近这一门槛时，经济环境会发生变化。如果经济保持健康，没有发生严重的问题，跨越这一门槛就比较容易，否则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不幸的是，在中国，当它接近这一门槛时，经济形势变得恶化了。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刚好在决定进一步前进时升级了。

未来，中国能否最终跨越这一门槛，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 权力在党内不同派别内以及中央与外围机关的分配；(2) 领导的强化程度；(3) 各派别对跨越这一门槛的风险的认识。一个进步的、有改革头脑的派别的取胜，一个强有力的、具有同样头脑的最高领导阶层，一个运转良好、可降低社会变革风险的经济形势，将为成功的改革和跨越这一门槛提供必要的条件。

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如果没有能跨越这个门槛，退却到旧的中央计划经济，会产生两种结果：首先，假如回复到改革前存在的那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压制，它将最终破坏党的合法性。经济改革和自由化首先会导致对前景的期望值的升高，但这种期望是非常易变的，如果当局表现出犹豫或退却，能够很快地转化为幻灭、愤怒、社会抗议。其次，退却可能产生一种预想的形势的改

善。这种情况发生的条件是：(1)与旧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人被清洗了，代之以具有新思想、年轻的领导人，他们等到形势稳定后重新进行改革；(2)持异议者被成功地赶下台。掌权者重新推行集权和紧缩政策，并伴之以对反对派的压制，这会延缓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至少是暂时的。但是，当他们用另一种方法来对付“门槛”时就会再次进入循环 遇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改革压力、同样的危机以及同样的反应。

如果党在公众的压力下成功地越过了这一门槛，至少会有三种结果：(1)危机会得到解决，国家将迈向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某一种方式；(2)危机将得到解决，但国家将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3)持久的变动、停滞、混乱 甚或是社会革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民主政治改革大大超越经济改革，第三种结果是非常可能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民主会给遭受经济过度痛苦的群体一个发泄的机会，因而会阻碍经济改革。当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发生时，一个民主环境就会允许罢工、游行、示威等逐步升级。经济改革或许不得不做出不受欢迎的决策。原苏联出现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而当经济改革大大超越政治改革时，第三种结果也有可能发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官僚体制必须让位于新的体制，否则，经济自由化就永远也不会发生。但新的经济体制会大大改变现存的权力与特权的分配，从而产生一个反对改革的强大的保守力量。

因此，过渡时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保持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德恩伯格对改革进程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分别作了分析，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积极的因素包括：

——巨大的经济改革成果，将使即得利益者继续推行改革计

划，包括体制的改革。

——经济改革已经使得受益者的物质利益提高了，并且（或者）提高了他们的期望，他们占人口的比例已经使得领导人不可能再对经济改革计划加以限制，改革在大众的压力下将持续下去，甚至包括体制的改革。

——领导人已经投身于改革，以便使经济体制更好地运转，当领导人认识到零敲碎打的改革不能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端时，为了成功地推行现代化，他们将不得不寻求一个更好的经济体制。

——经济改革已经包括了决策权的相当大的分散化 高层领导人已经对经济改革失去控制。其结果将是一个新的、独特的中国的经济体制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传统制度与行为模式。

——中国领导人进行经济改革的企图意味着，经济学家和专家们在最高政治网络的政策制定中发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专家是真正体制改革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已经从他们自己过去的错误中（经济的和政治的）学到了不少知识，在未来的改革中他们将会更成功地达到自己的目标。

学者们可以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乐观主义的结论，这些观点概括地讲就是，经济改革的试验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改革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传统的苏联经济模式。

消极的因素包括：

——促进经济发展的，更多地是毛逝世后秩序的恢复及邓掌权后产生的释放，并不仅仅是改革。而且，改革还产生了许多问题 如财政赤字、失业、通货膨胀等 这使得领导人不得不恢复对经济的中央控制，使许多改革建议推延。另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个别的但却是主要的倡导者已经更多地强调计划经济。因此，1976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不能完全归之于改革，而且改革的结果也不完全是有利的。

——改革产生了一大批利益集团是不可否认的。从长远的观点看整个国家和所有的人都将是受益者也是正确的，但在近期内明显地只是一小部分是改革的重大受益者。

——中国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将会大大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一个以私人市场为补充的苏联经济模式会失败或运转得如此糟糕，以至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放弃这种模式。原有的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改革的包袱。

——尽管中国的改革使分权的程度大大增加了，但是，中国领导人不只一次地重新加强对经济的中央控制。而且，他们失去控制的主要是经济领域，但在政治、军事等其他社会领域中却没有失去控制。

——作为一个集团，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大大增加了，但是，当今中国政策的规划者主要是政治领导人，而不是经济学家。此外，最高领导人是列宁主义者，不会容忍背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经济学家们仅仅由于他们的知识和特长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得到政治领导人的庇护。而且，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支持改革的假设是没有经验根据的。德恩伯格的观点似乎是倾向于悲观。^①

哈丁则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三种可能的前景。

最悲观的一种可能是，中国的领导人对推动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不那么热心，这或许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物价体系、所有制结构的彻底改革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或许是由于没有进行新一轮改革的经济与政治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将不会扭转 50 年代中央计划的特征，而是仍将保持高度的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大量的公有制、政府对国营企业的高水平的保护和补贴，以及由此引

德恩伯格：《大陆中国的经济体制 新的模式还是旧模式的变种》载《大陆中国政治经济与改革》，1986年

起的低水平的增长率和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会出现眼前的危机，在长期内中国的经济会陷入前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在 80 年代出现的停滞状态。

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国政府试图进行新一轮经济改革，但这种改革将遇到严重的障碍，部分地是由于政府没有制定一个更为成功的经济改革战略，部分地由于改革计划由此失去了多数政治支持。在这种情景下改革遇到的危机不会像 80 年代末那样剧烈，但仍会出现从规则的市场经济的退却并恢复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

最后一种可能性是中国重新发动了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克服了各种困难。紧缩政策创造了对改革有利的前提条件，领导人下决心推动改革，他们的顾问制定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经济改革战略，改革的政治基础得到保证。在这种改革下，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规则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和体制所有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因此而获得了很高的增长率和生产率。

围绕着继承问题而存在的政治不稳定性，要准确地估计这三种前景的可能性是困难的。或许前一种前景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在中国社会各重要的领域和目前的计划与市场混合的矛盾中，存在着进一步改革的压力。更有可能的是，在 90 年代里中国将试图进行一场更为强有力的经济改革。如果邓的继承人制定了一个有效的改革战略，维持了政治支持，这种努力有可能成功。但苏联及东欧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中国自己在 80 年代末所遇到的困难会提醒人们，这种最乐观的前景绝不是一定要发生的。极有可能的是，第二轮经济改革会遇到许多同样的问题，经历同样的命运 正如 80 年代的改革那样。^①

哈丁：《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载《90 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 78—88 页。

第三节 辉煌的发展阶段：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

一、经济增长的特征

保持高速的经济发展是改革时期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经济改革的显而易见的积极促进作用。1952—1978年间，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从1978年改革开始以后的十多年里，中国实际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这一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东欧改革最成功的国家，是同期东欧各国年平均增长率的6倍多。不仅如此，中国的增长率实际上已经接近东亚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在这十年中，日本的增长率为4%，南朝鲜为7%，台湾为6%，新加坡为8%，香港为9%。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十年经济改革中，中国经济可以加入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的行列。此外，改革还扭转了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改革后的高经济增长率是持续稳定的。

在十年改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波动性，但与改革前相比也表现出很大的区别。首先，经济周期的性质已同过去大不一样了。在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在1978年以后，政治因素虽然仍发挥作用，但经济周期已经主要成为经济性质的了，它通常与紧缩与放松政策联系在一起，并相应地变成膨胀与紧缩阶段的交替。在经济性周期中，每一个阶段——无论是放松还是又一次的财政紧缩——都产生

约翰·哈特(John P.Hardt)、理查德·考夫曼(Richard F.Kaufman):《中国的变化模式 前景与问题》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难》引言 拉迪:《中国的经济体制再造》载《中国向何处去》第111页。

了一种由其自身的性质所引起的政策转移，并产生下一个阶段的经济条件。例如，膨胀一般会引起财政与投资的削减，而紧缩则会引起支出的放松。在每一个紧缩阶段，增长率都由于削减投资、节制财政支出和限制财政赤字而减缓下来。例如，1980年的衰退是由邓小平的控制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的调整计划所引起的；1981—1983年的周期过渡不是很明确，但1984—1985年的扩张则是1984年中国的城市改革计划和早些时候预备性银行改革的直接结果。1985年的收缩则明显地是控制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的结果。1986年早期的迅速恢复则是银行在企业资金短缺的压力下放松贷款的直接结果。1986年，金融改革从试验阶段进入全面贯彻阶段，又一次出现投资过热，中央政府再次进行干预，结果造成1987年增长率的缓慢增长。

其次，与过去相比，波动的幅度大大地降低了，没有出现改革前的大起大落现象。但在80年代末，当财政改革和市场信贷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价格改革与城市补贴之间的矛盾加剧以后，这一问题又变得日趋严重。这一后果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有所显示，因为在每一个相继的放松时期，经济的膨胀都更为严重——负增长率持续超过计划指标，投资、工资、进口、消费、货币供应以及价格等因素也无不如此。1979年到1980年工业产量增长率约为9%到1981年下降到4%。在相继宽松的四年中，每一年的增长率都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1985年高达18%到1986年又下降到9%到1988年又高达21%。

最后，从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上看，80年代的经济性周期比以前的政治性周期缩短了，从以前的4年减到2年。由于中国政府在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字时会采取强硬的手段，在90年代周期的扩张阶段可能要比80年代短。

从上述资料中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中国避免经济周期的能力是有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宏观政策手段

没有效率。中国的市场和财政系统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且难以预测 无法对投资和价格趋势进行合理的调整。

改革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目标也达到了 而且做得很好。

在改革前，中国主要采取外延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后果之一就是，个人并不是高速发展的受益者。扭转这种趋势是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以便提高物质刺激，从而取得更大的效率和提高生产率。十年改革的实践表明，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人均收入迅速提高。按 1987 年价格计算，1975—1986 年农民人均消费的年增长率为 9.9% 其他居民为 9.3%。如果将同期通货膨胀导致的价格上升因素去掉，则农民实际人均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 6.7% 其他居民约为 5.5%。对个人消费水平意义更大的是人均基本食物消费的提高。1975—1985 年期间 人均食物消费不仅以 2.9% 的年平均增长率迅速上升，而且食物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期人均食油、肉、糖、衣的消费水平增长率分别为 11.6%、6.9%、9.3% 和 4.4%。

改革还大大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人均消费水平的差异。虽然与 50 年代相比，差别仍然很大，农民的人均消费水平要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经济改革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例如，1978 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储蓄是农村居民的 10 倍 但在 1978—1985 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的年增长率高达 40%，城市居民的人均储蓄也只是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的 3 倍。

人均消费水平的高速增长是否以收入的不平等为代价呢？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率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成反比关系这样一个

① 阿尔伯特·凯德尔：《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前景》载《90 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 119—134 页 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 未来的挑战》第 6 页 津瑟：《中国的经济成就》载《90 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 117—118 页。

普遍接受的理论，在中国又受到挑战。当代中国的经验是最新的，也是最有意义的，它表明，两者可以是一种正比例关系，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负比例关系。经济改革的一个积极意义是，大部分贫困户的绝对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了。

改革的两个目标——提高效率、生产率和改善生活水平——导致了对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控制权的下放。因此，地方、企业和个人有了更大的自由动员自己的资源为市场和与经营成果密切相关的收入进行生产。按照公认的理论，这种改革将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至少会导致地区间的不平等。显而易见，资源、基础设施及市场占优势的地区将更充分地利用改革提供的便利条件，首先富起来。在中国，地区间收入差别已经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特别是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别。

中国人的生活已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过渡，但按西方的标准，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活还是很贫穷的，其人均收入在 800—1000 美元之间。加快提高生活水平，仍是中国的长远目标，尤其是要解决住房问题，在中国，房地产业将成为新兴的工业。^①

改革也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率先在农村进行的改革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79—1985 年农业部门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1953—1985 年年平均增长率的 4 倍。这样，国民收入中农业部门所占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35.4% 上升到 1983 年的 44.3%。只是工业部门的增长率下降了，国民收入中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从 1953—1977 年的 11.1% 下降到 1979—1985 年的 9.1%，这主要是重工业部门产量下降的结果。在轻工业部门，也如同大多数其他经济部门一样，经济改革看来发挥了积极的影响，这一部门的年增长率从 1953—1977 年的 9.1% 上升到 1978—1985 年的 12.3%。

① 德恩伯格：《新时期的中国经济》载《中国的经济政策》第 113—119 页。

总之 经济改革对生产结构的影响是 国民收入中 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了，其他部门，包括轻工业部门的比重则上升了。但从总的情况来看，经济改革并未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看来，改革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影响必将是长期的、渐进的。

经济改革还试图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如服务业、能源工业，尤其是运输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部门的年平均增长率在 1979—1985 年间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与其他部门相比，它们的发展是落后的，政府对能源和交通这两个瓶颈部门的投资很少增长，在 1977—1985 年期间，这些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实际下降了（从 13% 下降到 11.6%）。因此，从这方面讲，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现象不但没有纠正，反而有日趋严重的倾向。同时，这些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远远低于苏联模式经济的一般标准。

中国政府还希望在改革期间将积累率降低下来，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它曾一度成功过，积累率从 1977 年的 32.3% 下降到 1981 年的 28.3%。但是，随着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迅速增长的恢复、地方企业和政府能够从事计划外投资，积累率又迅速恢复到 70 年代的水平，增加到 1985 年的 35.3%。实际上，积累率从 1953—1977 年的 29.1% 上升到 1978—1985 年的 31.7%。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其说促进了平衡和经济发展的消费导向，不如说更进一步趋于积累导向。

二、经济效率与生产率

在改革前的 30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典型的外延型

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 郑竹园：《大陆中国的经济改革 后果与前景》 载《中国共产主义的变化与沿续 经济、社会与技术》第 2 卷，韦斯特维尔出版公司，1988 年版。

的经济增长：产量的迅速增加是通过大量的投入取得的。也许改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改变经济增长过程的特征，将主要依靠积累提高增长率变为依靠提高生产率促进增长率，将外延型的增长转化为集约型的增长，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中，降低新生产设备增加部分的比例，提高生产率和技术进步部分的比例。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这主要涉及到改革作用的时效及分析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德恩伯格指出，要准确地衡量改革在这一目标上成功的程度还为时过早。拉迪也认为，对目前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是如此的粗糙，以致于只能把它们当作专家们感兴趣的一种尝试性的指标，即促进技术进步与发明的一种经济能力。他提出这种观点有以下若干原因。

第一，关于制造业产值增长的官方资料自 1978 年以后是偏高的。首先，工业产值日益增长的部分是由私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生产的，与大的、国营的企业相比，它们的产值统计会有较大的误差；其次，同一产品多种市场的发展与通货膨胀导致企业在产值报告上的误差。产出的不同部分是分别以固定价格和市场价格出售的，而且在后者出现了通胀趋势，很有可能最近几年这一部分的产量是虚假的。至少，中国的一则消息指出，最近几年，至少有 3 个百分点的工业增长所表明的是价格膨胀的影响，而不是实际产量的增长。

第二，即使这些资料没有误差，甚或这些误差是可调整的，也无法弄清应该如何对生产率的资料作出解释。它们可能会说明两种情况，或者是最近几年促进发明与技术进步的经济能力提高了；或者是 80 年代是一个过渡的年代，在这期间，毛主义时代的非效

率现象被消除了，而发明与技术进步的基本步伐并没有加快。

总的来说，专家们普遍认为，虽然在改革的十年期间里，生产率确实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按照一般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外延型的增长仍占支配地位。当然，不同部门的变化程度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农业的情况要比工业的情况好。

在农业生产的增长中，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较大作用。在 1978 年开始进行农业改革时，曾预料要大大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但是，随着土地承包制的推广，农民对价格刺激和市场需求作出了迅速的反应，而国家实际上压缩了农用基金。原计划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将从 11% 提高到 18%，在 1984 年底，实际用于农业的国家投资仅占 5%，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不仅如此，农业的集体投资只有 70 年代末的一半，农民的个人收入也大多用于消费。总之，虽然农业产值增长率提高了一倍多，但资本与劳动力的增长则相当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率。因此，在 1978—1984 年间，在改革的初期，农业产量的增长大约一半是通过提高生产率取得的。德恩伯格的分析也表明，在 1980—1983 年间，导致农业产量提高的各因素中，改革政策因素所占的比重只有 45%，气候因素占 5%，另外 50% 仍是由于投入的增加。

然而，虽然在 1978—1984 年间，农业产量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显著的，但在 1978 年以后，这种进步消失了。以后的粮食产量再也没有超过 1984 年的最高水平。对这种状况的普通解释是，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土地更多地用于比粮食更为有利可图的其他农作物。这一解释具有部分的真实性，但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一旦将迅速增长的农村制造业因素扣除掉，那么，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 四十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91—192 页。德恩伯格：《新时期的中国经济》载《中国的经济政策》第 108 页。

1984—1988 年的农业产量增长并不比 1957—1978 年期间农业长期增长状况好。这说明了什么呢？

拉迪认为，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改革最初几年农业生产的增长是由于消除了集体制中明显的非效率因素。与过去体制中的工分制相比，家庭承包制将农民的收入和他们的生产率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变化明显地促进了劳动力的有效使用。一旦解除了对农村市场的约束，与毛主义的自力更生政策相关的低效率现象就急剧减少。当其他农作物的潜在生产者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到他们所必须消费的粮食时，相对优势的农业生产便很快发展起来。但由改革而导致的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发生在改革的早期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时的成绩，而不是向长期的高增长的转化。它的作用在逐年下降，而且很快就耗尽了。到了 80 年代中期，农村部门的增长很快受到各种因素的约束：土地稀少、投资短缺、基础设施薄弱、相对价格的变动等等。

与农业部门相比，工业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就更不容乐观了。但由于专家们运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有时甚至出现对立的结论。

拉迪通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分析的困惑。世界银行根据中国官方资料估算的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变化状况表明，在 1983 年，国有部门制造业的生产率呈下降趋势，用同样的方法分析 1985 年的情况也发现，制造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另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调查的 20 家国营企业的资料表明，在 1975—1982 年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可能以每年 4.7% 的速度迅速

①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四十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93—194 页、《中国的经济体制再造》载《中国向何处去》；德恩伯格：《新时期的中国经济》载《中国的经济政策》第 108 页 郑竹园：《大陆中国的经济改革 后果与前景》载《共产主义的变化与延续 经济、社会与技术》，第 2 卷 韦斯特维尔出版公司 1988 年版。

增长 增长的原因主要是 70 年代末的经济改革。^①

表 6-3-1 增长因素 国营企业(年平均增长率%)

	总产值	固定资产净值	就业	综合要素生产率	
				(1)	(2)
1953—1957 年	24.2	24.2	8.0	6.4	9.6
1958—1965 年	14.6	16.2	6.5	2.3	4.2
1966—1970 年	11.4	5.6	9.6	4.2	3.4
1971—1977 年	4.8	7.4	6.3	-2.2	-1.9
1953—1977 年	12.9	13.1	7.4	2.1	3.0
1978—1985 年	8.8	7.5	2.2	3.4	4.5

注：总投入权数：(1)就业,40% 固定资产,60%。

(2) 就业,60% 固定资产,40%。

资料来源 德恩伯格：《新时期的中国经济》载《中国的经济政策》第 110 页。

德恩伯格也作了类似的分析，他用两种方法得出了两种结论。他先通过对固定资产净值、工业总产值、就业量等因素的比较计算得出了积极的结论 指出 在 1978—1985 年期间，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率已经下降 并低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 而在 1953—1977 年期间，前者仍高于后者。除 70 年代早期以外 就业量的增加总是低于工业产量的增加。因此，1978—1985 年间工业部门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不仅比 1953—1977 年高 而且是产值增长的主要因素。根据表 6-3-1 的估计，在不同时期工业产量的增长中，生产率增长所发挥的作用分别是：1953—1957 年间为

^①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 四十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91—192 页。

16—23%；1978—1985 年间为 39—51%。如果这种估计准确的话，它表明，经济改革对生产率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重大促进作用。但他用另一种统计指标所作的分析表明：改革后效率并没有提高。在 1977—1985 年期间，单位产量的物质消费没有下降，而单位销售成本却上升了；由于价格的提高，单位资本的利润和税额只有缓慢的上升。因此证据是含糊不清的，要判断改革在使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成为增长的主要因素这方面的成败还为时过早。

德恩伯格总结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投资水平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在 80 年代前半期，有关中国工业效率和生产率得到重大改善的证据是非常有限的。发生重大变化的是投资的渠道多样化了。这些投资来源已经从强制的储蓄转变为更加自愿性的多样化。问题是现在出现了计划外的过度投资，由于允许自愿储蓄和地方投资，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中央政府会发现，要进行干涉、关闭这些单位或强制它们打破地区间的运输与贸易壁垒使其面对市场竞争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一些学者的结论则是简单明了的。

哈丁和鲍大可指出，在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尚无重大改进，从单位固定资产的产量计算，资本生产率自 1983 年以来仅稍有增长。至今仍停留在 1981 年的水平上与 1966 年相比则相差更远。工业产品质量没有大的进步，亏损企业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也没有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尚不平衡，有些部门，如机械、化工、冶金业的人均产量有很大提高，但另一些部门，如煤炭、电力和石油等几乎原地踏步 甚至还有所下降。

托马斯·罗斯基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自 1978 年以

① 德恩伯格：《新时期的中国经济》载《中国的经济政策》第 108—112 页。

② 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鲍大可：《中国的现代化：80 年代的发展与改革》第 11 页。

后，生产率有了迅速的增长。根据不同的假设，在 1978—1985 年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在 4.8—5.9% 之间。珀金斯也认为，在 1977—1985 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8%。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这一增长率的取得也主要是劳动力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在这期间，虽然资本增长率超过了 1976 年前的水平，但资本积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却下降了。劳动力的增长率也像以前那样维持在 2.5% 的水平。根据珀金斯的估计，在这 8% 的增长率中，其中约有一半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①

拉迪和桑伯格并不否认改革对工业生产率的积极促进作用，但他们指出，与农业部门类似，工业部门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是由于消除了毛主义时代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明显无效率现象的结果。例如，服务业（运输业和商业）的迅速增长部分地是由于改革期间纠正了前几十年忽视它们的政策，在 80 年代这些部门的经济活动明显地复兴起来。建筑业（主要住房建筑）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因素的效果是一次性的，不再可能发生。除非经济中许多现存的扭曲——尤其是价格结构——得到修正，劳动生产率将不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从总的结果看，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上仍然是外延型的，投资的作用大于生产率的作用。要使中国经济走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经济改革。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

从长远观点看，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珀金斯：《中国 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第 48 页 罗斯基 转自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

^② 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第 63 页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 四十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94 页。

投资来源 德恩伯格认为，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理论上
看，中国要实现在 1980—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发展目
标，较高的积累率将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按不变价格计算，到
2000 年中国需要的投资总额将是 1980 年的 3.5 倍 要达到这个
投资水平，就要求积累率仍维持在国民收入的 29% 综合要素生
产率每年增长 1.9%。

按德恩伯格的分析，中国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投资基金
供给将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一，财政预算拨款仍将是投资基金的重要来源，但不再会是
支配性的或唯一的来源。经过改革，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已经下降，因此，国家预算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例也随之从过去的
80% 下降到 80 年代的 50%。就是说，中央政府可以对二分之一
的投资加以直接控制，通过国家预算为这部分投资活动筹集必要
的资金。其次，自筹资金在 80 年代已开始成为投资来源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问题是，在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和采用适当的经济
杠杆之前，对这部分资金的投入水平和分配无法进行有效的控
制。在这种条件下，期望通过自筹资金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只能产
生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和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中央政府对
这部分资金来源加以行政约束和直接控制。因此，除非对价格
和宏观调控手段进行改革，自筹资金不会有多大的发展。

第二，国内银行贷款部分目前所占的比重不大，将来有可能成
为投资基金最重要的来源。这部分基金的优势是：资金投向可以
受经济杠杆（利息率）的直接影响 同时 有偿使用为对它的有效利
用提供了刺激。但改革后在这部分资金的运用上存在着许多问
题：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试验这种投资方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
央政府规定了不同的利息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借贷者以某种方
式借钱，却常把钱用于其他目的；利息率过低，致使银行用其他方
式贷款，把钱借给有特殊关系的顾客；此外，银行系统的工作人员

缺乏专业训练，缺乏取代计划者所必须的政治声望。由于这些原因，银行贷款在未来的投资基金供给总额中将少于三分之一，仅限于特定项目和个别部门，不会像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那样成为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

第三，由于中央政府对外债与出口外汇的比率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估计到 2000 年外资在中国总投资额中的比例将能限制在 10% 以内。换句话说，中国利用的外资贷款肯定会远远低于可得到的数量。较之贷款，中国更希望通过对外开放政策取得外商直接投资，然而，有三个主要障碍会妨碍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缺乏一套规定明确和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法规，使外商难以估价投资的成本、利润；缺乏兑换通货的保证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外商不能打入国内市场。

德恩伯格的结论是，中国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投资率，为了得到足够的投资基金，就必须依靠预算外资金来源，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开展彻底的改革，否则，中央政府就会发现，它的通过改革来开辟新财源的努力，只会削弱它的控制能力，减少可得到的资金，对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约束。^①

郑竹园也对中国的投资领域持怀疑态度，指出，自主权下放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急剧下降，并对中国的投资结构产生了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1) 企业与地方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急功近利的一般工业，其中有许多是重复、浪费的，并同大企业争夺能源和原料，而地方政府为支持这些企业设置了许多新的壁垒，加剧了“诸侯经济”局面；(2) 非生产性投资迅速增加，大量非生产性投资主要集中在居民住宅，严重影响了生产性积累；(3) 虽然能源与运输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的瓶颈，但这两大部门的投资仍受挤夺；(4)

① 德恩伯格：《中国的发展战略 投资的需求与来源》载《中国共产主义的变化与延续》第 80-104 页。

投资规模缩小，这不仅牺牲了规模经济效益，提高了生产成本，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

但也有一些人对此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国内的储蓄有极好的形势。中国现在是亚洲高储蓄国之一，其国民储蓄率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且很少用来投资，从而促使中国开始在深圳、上海建立股票市场，以开辟资本市场和开放金融市场。1992 年夏，中国深圳发出一条轰动的新闻，有 50 万人到场购买新出售的股票，负责出售认股证书的 300 多个银行官员被围得水泄不通。这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对投资机会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它还表明了普通人民将近几年的收入投入到进一步经济扩张中去的愿望。对此在中国国内已无疑问，问题是，如何对刚起步的股票市场加以有效管理，并同国际标准和规范逐步一致，这需要一个自然的过程。

经济体制问题 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的前景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和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的经济生产率、增长率和生活水平都取决于经济改革的命运。中国为国外市场生产尖端产品的能力、吸引外资的能力、吸引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也取决于经济改革的前景。但是，在许多专家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并不明朗。中国领导人是否承诺全面的经济改革，经济学家和计划者们是否制定了一个比 80 年代更为有效的经济改革战略，改革是否具有充足的政治基础，这些都不得而知。

最明显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将受到结构因素的制约，如基础设施及能源的短缺、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等。中

郑竹园：《大陆中国的经济改革 后果与前景》载《中国共产主义的变化与延续》第 34—58 页。

查尔斯·霍纳 (Charles Horner)：《崛起的中国》载《美》《评论》，1992 年 12 月。

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很低，受到运输及能源落后状况的严重约束。公路和铁路运输仍不能满足需求，电讯服务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虽然这些问题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但解决起来绝非朝夕之功。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工业改革还没有推广到大的国有企业，它们一直受中央计划的控制。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企业由于没能进行有效的改革而不得不依靠国家的大量补贴。其他工业部门的经济自由化也受到阻碍。

农业问题 1985年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表明，农业仍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同的是，中国土地稀少，人口众多；而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不可能通过粮食进口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中国的人均粮食进口额达到1981年韩国的水平，就将进口1.8亿吨粮食，届时世界粮食价格将急剧上升，那样，即使在以后的时期内中国赚取外汇的能力持续增加，储备额也会下降，同时综合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由于农业生产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期望中国农业的增长势头持续到90年代是不现实的。此外，中国还将遇到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由于土地使用权缺乏充分的法律保证，农民感到不安全，不愿意向土地投资，因而阻碍了农业发展；其次，由于农民是在小规模土地上经营，而且这一条件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就很难引进现代技术并改进效率；第三，过多的人力和物力从农业转向乡镇企业。另外一些问题还包括：国家对农业领域投资的下降、化肥供应出现短缺，其他投入的价格的上升（20—40%）、人均耕地的迅速下降、农业基础设施的退化、农业人

哈丁：《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78—88页；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主义四十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94页；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哈特、考夫曼：《中国的变化模式》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前言。

口的失控以及对生态的破坏，等等。一些中国领导人建议合并农场，重新实行行政控制，这可能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农业只有在继续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中才能取得发展。

总之，“农业生产经营责任制”曾对农业生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新的政策有助于释放出长期受到压抑的农民的积极性。但如此剧烈的效应是短期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农业部门的前景是不明确的。中国不能期望改革最初几年的高增长率会持续下去，责任制所产生的刺激效应会逐渐减少。可以肯定，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源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中国也许会发现，将经营决策权给予家庭的责任制可能会发展成一种自愿性的合作组织，以应付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有迹象表明，在一些地区这种自愿性的合作组织已经在试验中。

历史因素 珀金斯通过对中国和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比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珀金斯认为，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创造经济奇迹的直接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根据他的推算，这些国家和地区 9—10%的经济增长率，一半来源于资本积累，另一半则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则是由下列因素取得的：丰富的经济人才，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普遍强调教育，同时具有相当的管理经验；高效的管理体制，它有效地协调了政府与企业间的经济关系，促进了企业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成功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它促进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并为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提供了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为此创造了经济条件的收入平等政策等。

鲍大可：《中国的现代化：80年代的发展与改革》载《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四个现代化》第1卷第7—8页 郑竹园：《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珀金斯：《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哈特、考夫曼：《中国的变化模式》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前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中国已在人均收入、人力资源、积累水平和收入的平均程度等方面与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起飞阶段类似，而且还有丰富的资源。中国的海外华人在提供新观念、新技术及世界市场知识方面有着特别的意义。而且中国已经致力于开发世界市场。中国能否创造类似上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成就，则取决于在其他几方面所付诸的努力。^①

另外一些学者还指出，中国人民有着特殊的品性和文明，实用主义、适应性和创造性等都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对经济发展都起一种积极的作用。海外华人的经验表明，一旦他们从政治动乱和国家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他们那富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企业家精神就会表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的信念上进行的，但是，这个社会的真谛就在于它具有将口号与行为分别开来，以便服务于不同目的的能力。中国将会创造一个包括国营企业、各种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混合经济。这些因素使人们难以对中国的远景作出判断。^②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外部经济环境，这一点我们在下节进行阐述。

许多学者还根据不同的分析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作了具体的推测 有的比较乐观 有的比较悲观。

阿尔伯特·凯德尔估计，如果在 90 年代早期引进了价格改革 那么 到 2000 年，中国的国有部门将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90 年代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将达 7—9%。如果价格改革仍停滞不前，国营企业的生产率也停滞不前，那么，城市人口和国营企业就仍需要国家的大

珀金斯：《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

^② 本杰明沃德 (Benjamin Ward):《中国社会主义四十年》载《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四十年后的中国》第 123 页 斯卡拉皮诺:《发展政治学》第 77—78 页。

量补贴 政府为了实现这种补贴 就会导致大规模的赤字、通货膨胀、对非国有企业的收税的增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90年代的通货膨胀将会很高,并且难以解决,经济增长会由于不断的紧缩而减速,年平均增长率不会超过4—6%。^①

珀金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乐观。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曾推测 在到2000年的期间里,中国国民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将为7%,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为4.5—6.5%,从80年代中期的300—600美元增长到800—1000美元。这样,中国也将异常迅速地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珀金斯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制约:农业的缓慢增长、能源短缺、外汇不足、管理体制的僵化以及政治动乱。但他相信 这些经济瓶颈是可以而且将会加以克服的,政治动乱虽难以避免但不会像过去那么严重。此外,这些消极因素还将为其他若干积极因素所补偿,这些积极因素包括:大量运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较高的资金积累率、大量的熟练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等等。因此他说:“7%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不是幻想,而是一个合理的推测。”^② 在1992年3月24日亚洲协会举行的题为“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90年代的前景”讨论会上 珀金斯坚持了他乐观的结论 推测说:中国的经济在停滞三年之后将恢复高速发展,在今后十年里实现经济繁荣。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也在前不久的马尼拉讨论会上推测说:在本世纪初,中国的部分地区将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先期工业化地区在许多方面与东亚国家有着共同的特征。但另一方面,中国不能指望达到像日本及东亚其他新兴工

凯德尔:《中国经济改革的周期前景》,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119—134页。

珀金斯:《中国 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

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速度。同时，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可能同步实现现代化，即使日本、台湾和韩国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也有很大的差距，在中国，这个差距会更大。^①

而郑竹园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一向是比较悲观的。早些时候，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制的 1949—1979 年中国的统计数字，郑竹园推测：在 1986—2000 年间，中国农业的增长率将为 2.5—3%，工业的增长率为 5—6%。当时，在他的分析中，除了强调投资、刺激、管理等诸因素的不利影响外，还提出了另一个依据：经济基数越大，维持高增长率也就越困难。最近，他又就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做了概括分析。

第四节 改革的先导：对外开放

早在 70 年代末，艾克斯坦就预言说，中国将进入对外贸易起先导作用的时代。^② 如今，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们无不对这位学者的洞察力表示钦佩。

他们看到，在毛逝世前的 10 年里，中国似乎奉行孤立主义，追求自力更生，断绝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联系。而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政策出现了全面的转变。中国对外部世界各领域的态度都变得更开放、更自由了。改革后的中国领导人令人信服地强调，他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其现代化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他们认识到他们将需要国外的科学知识、资本和技术。中国领导人不仅强调扩大贸易尤其是进口先进技术的重要性，他们还开始向外国借款，允许外商建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建立了一些经

① 沃格尔：《中国与东亚的现代化模式》载《中国的经济政策》第 1—11 页。

② 郑竹园：《大陆中国的经济改革》载《中国共产主义的变化与延续》。

③ 艾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第 274 页。

济特区。此外，国际金融机构也开始同中国进行大的合作项目。中国领导人还说，这不仅是一个长期的政策，而且还打算逐步向外商开放整个中国。总之，自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政府追求对外经济开放的愿望是如此迫切，以至对它的强调有增无减。

同时，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中国发现，发展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要比国内经济改革来得容易。的确，一些中国领导人肯定会产生这样的思想，通过发展贸易、引进外资、科学技术与科学的管理方法，能够使他们回避改革的艰难的选择。无论如何，中国的改革家们将开放政策明确地看作是通过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联系而贯彻其国内目标。^①

美国的中国专家们对中国的对外开放给予了最明确、最充分的肯定。他们指出，在改革时期，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与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迅速而深远的变化，而且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是中国改革最突出的部分。

在十年改革期间，中国的贸易发展迅速。综合贸易额增长率为 10.5% 进口年均增长率为 9.6% 出口为 11.3%。从 1977 年到 1986 年翻了两番多 从不足 150 亿美元增加到 750 亿美元。在整个 80 年代，中国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达 13% 这一增长率持续到 90 年代初。同时，中国外贸增长大部分同市场经济国家有关。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 80 年代中期即已超过 10%，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一比例是比较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比率不仅高于其他大陆经济大国，而且也高于同中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一些小国。虽然一些美国专家认为计算方法有问题，夸大了对外贸易占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但他们一致

鲍大可：《中国的现代化：80年代的发展与改革》第 10 页 德恩伯格：《中国的经济政策》载《新时期的中国经济 延续与变化》 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第 317 页。

认为，无论从绝对数看，还是从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看，中国贸易的增长是迅速的。

在这 10 年中，中国的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85 年前，中国的能源出口还占中国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了 1988 年则仅占 8% 与此同时，工业品的出口则从 1978 年的 55% 上升到 1988 年的 70%。其中 纺织品仍然是最大的出口项目 出口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最快的，成为第三大纺织品出口国，接近世界经济大国西德的水平。同时，加工纺织品，特别是服装，越来越成为重要的项目，也同世界上最大、发展最快的国家相差不多。此外，化学、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也越来越重要。进口的变化则不那么突出。合成纤维、化工、橡胶，特别是机械占中国进口的 80%。为寻求国外的先进技术，机械和装备进口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总之，中国作为世界贸易重大因素的潜力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因素，1988 年工业增长中有 20% 取决于外贸。

由于这一增长率超过了世界贸易增长率，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国的重要性增加了。

1986 年，中国的出口额约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 5.6%，而 1980 年仅占 3.4%。1980 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出口额中居第八位 到 1986 年上升到第四位，略超过苏联的出口总额。1980 年，中国贸易额占国际贸易额的比例还不到 1% 而到了 1984 年就已经上升到 1.4%。

1987 年 中国的出口仍保持强大的势头 这一年 其出口额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 6.8% 并成为世界第十六大出口国(1973 年居第二十位) 其出口额已经超过西班牙、民主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丹麦、捷克斯洛伐克、挪威等发达国家 仅次于瑞典。1986 年，中国的进口额占发展中国家进口总额的 8.2% 使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市场。1987 年，中国还成为世界第十四大进口国

(1973 年居第二十三位)中国的进口额超过了南朝鲜、瑞典。^①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开放成就显得更为动人。无论在对外贸易方面,还是在吸引外资方面都是如此。因此,中国的硬通货贸易较之东欧要增长得快得多,到了 80 年代中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大于东欧的任何国家,而且高于任何低收入或同等收入国家。到 1985 年,中国的硬通货贸易额既超过了苏联,又超过了东欧各国。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部分地是靠借外债来筹资的,但是在 1977—1986 年,中国的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 18%,大大超过任何一个东欧国家和苏联。这一点再加上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直接吸引外资的能力,意味着中国外债增长同出口创汇收入增长相平衡的情况也比东欧各国好得多。^②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日益增长的一体化,也使中国经济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外商、旅游者以及双边贸易协会等。例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给中国发展援助贷款的同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具有深刻的影响,它很早以前就指出过通货膨胀和不受约束地向国外贷款的危险。中国在接近关贸总协定的过程中,对领导人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关贸总协定还指出了国内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危险。在整个 80 年代,外商对中国的观察认识方法也影响了中国领导人的决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而且也表现在高层人事变动的气氛和选择上。外国人权小组和国际上对诸如人口控制方法这些问题的批评也促进了中国政策的调整。最后,考虑到香港与台湾的回归与统一问题,中国建立了经济

德恩伯格:《中国的经济政策》载《新时期的中国经济 延续与变化》;哈罗德·雅各布森 Harold K. Jacobson)、奥克森伯格:《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迈向全球经济秩序》,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13 页;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第四章。

拉迪:《中国的经济体制再造》载《中国向何处去》第 111—112 页。

特区表明了“一国两制”的设想。

最令专家们感到吃惊的是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虽然早些时候一些专家推测说在 90 年代中国仍强调经济现代化和积极参与国际市场，但风波过后，这种乐观的论调几乎听不到了。在很多人看来，该政治风波会使得中国或外国商人及其政府关起国际市场的大门。

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外商投资、中外贸易以及国外旅游者数目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海外华人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中以香港和台湾最为积极。同时，由于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的企业为了逃避国内萧条，也纷纷涌入中国，在 1990 年中国和外商签定了价值 66 亿美元的 7000 多项外资合同。中国还得到了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特许及商业贷款。对外出口也迅速增长，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对外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到 2000 年，中国的年出口额将达到 1600—2100 亿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出口国（1990 年是世界第 14 大出口国）中国的硬通货储蓄已达到 400 亿美元，将近台湾的一半。

保持这种强大势头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除了表示中国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努力和决心外，普里波拉认为有以下直接的因素。

首先，毫无疑问这种繁荣带有周期性特征。1979 年开始的经济变革是以日益缩小的计划因素和日益增加的市场成分为特征的。在变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进入了滑行轨道，开始了萧条与繁荣的交替循环。90 年代初，中国刚好进入繁荣阶段。

其次，90 年代初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归结于农村财产权的日

克里斯托夫·克拉克：《中国向邓以后时代的过渡》载《90年代中国经济的困境》第 5 页 鲍大可：《中国的现代化：80 年代的发展与改革》载《面向 2000 年的中国经济》第 10 页。

益扩大，以及非计划企业部门的迅速增加，这些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的私有与集体企业。城市集体企业、服务行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雇用的工人已占工人总数的 60%。最重要的是，这些企业最有活力，与国营企业相比是中国经济效率最高的部门。这些新的企业是中国出口导向经济起飞的促动力量。在 1990 年，中国工业增长的 70% 来自私有、集体与外资企业，中国出口的一半产品是由这些企业制造的。在 1978 年，非国有部门的工业产量只占 20%；在 1991 年已经高达 50%。

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是向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最初，中国主要是寻求国外的技术和知识，1980 年以后，中国模仿台湾和其他亚洲市场经济国家，鼓励更多的“建设性”投资，以便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还意味着接受外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外国政府支持的特殊信贷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贷款，中国还加入了其中的一些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亚洲开发银行。

作为对外开放的一部分，中国还调整了汇率，使之更接近市场水平。1979 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少数几个国有公司垄断，如今，贸易公司的数目已接近 4000 家，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展开了竞争。

当然，说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是改革中最成功的一部分，并不等于说是没有问题的一部分，问题是存在的、难以避免的，有些甚至还很严重。否则，中国会做得更好。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外贸易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一些国家里，它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导部门，以出口的发展促进技术变化并打开新的市场，导致迅速的经济增长。在另一些国家里，对外贸易主要是发挥平衡的功能：通过进口来打破国内供

应的瓶颈，而出口的首要作用是为进口取得外汇。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属于第二类国家。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是作为平衡剩余与短缺的一个手段，即填补国内供给短缺的空白。国内生产越是充足，空白越是小，贸易的作用越小，领导人就越是高兴。同时，中国仍追求进口替代政策，旨在购买可以生产当时依靠进口的产品的设备。其主要目标是减少对国外经济的依赖，而不是增加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中国的贸易在引进装备和新技术方面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60年代以后的粮食进口弥补了中国的粮食短缺。据估计，如果中国在1953—1957年没有大量地进口机器设备，中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将不是6.5%而可能是3—5%。

1978年以来的现代化，进一步驱使中国大量地吸收西方设备与新技术，对外贸易被推到前列。但中国的领导人仍将出口主要当作进口工农业产品所必需的外汇的一个手段，严重地偏向于进口替代。虽然中国的出口增长迅速，但不断增长的贸易究竟是怎样促进经济效率的，是直接地通过低成本产品的相对优势的出口，还是间接地通过国际竞争对中国企业提供的刺激因素？这一点还不得而知。一般来说，从自给自足向开放贸易的转变应当会导致资源分配效率的极大提高。但中国的情况则不是这样，虽然贸易增长了，但国内经济持续的严重扭曲使得贸易有可能在实际上不是提高效率而是降低效率。主要问题来自中国价格结构改革的不彻底性特征。在这种环境下，最有利的出口商品可能不是相对优势的商品，而是那些国家定价低的商品。例如，由于有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合金的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相比偏低，导致了这些商品出口在1988年的迅速增长。由于国内市场价格固定，短缺立即出现，于是在1989年国家便禁止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国内价格结构的僵化似乎导致了一系列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商品的出口，不仅如此，还导致了有碍经济开放的官僚干预。类似地，外贸

体制也严重地将大多数国内企业同国际竞争隔离开来，大批量的中国进口产品在 80 年代中期约占 40%，是属于指令范围内的。这些商品的进口是为了弥补国内市场的短缺，而且价格水平等于国产商品的水平，从而消除了国外商品对国内价格的压力。其余商品的进口则由于许可证而受到限制，因而为国内企业提供了高水平的保护。此外，关税率高达 200% 为许多国内工业提供了强大的保护。

同时在接受外资方面虽然在 80 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但仍受种种因素的制约。首先，由于中国忽视西方的商业观念和实践，国外投资者遇到许多障碍。西方商人寻求安全和法律、规章制度 的指导，这些法律法规明确地告诉他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争端该怎么解决 该交多少税 向谁交 等等 以便使外商能对投资的成本、利润作出估价。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处于一种完全不发达的状态。中国指导外资的法律法规在西方商人的压力下缓慢地发展着。然而，即使在 10 年之后 外商仍然抱怨说 他们在中国的生意仍然充满着预想不到的困难。规章与规则仍然不经宣布而经常变动，更不用说解释了。有些新的法律甚至起反作用；对中国政府的法律追索权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外商的经营活动受到限制。一些外商的代理人抱怨说，他们对中国雇员的聘用和解雇几乎无能为力。雇员是由政府部门送来的，经常得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们付给工人的收入只有一小部分(10% 交到了工人手中 大部分都落入国家手中。

同时，对外商来说，在中国建立一个办事机构非常昂贵，而且也很不舒服。实际上，支出是如此的昂贵，致使许多外商宁愿将办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两个对立的社会：40 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郑竹园：《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447—448 页；卡尔·里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

事机构建在香港，那里的房租相对便宜，生活条件也舒适。

此外，中国缺乏兑换通货的保证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外商不能打入国内市场。

阻碍外商对华投资的因素也阻碍了外商在华的商业活动。法律法规晦涩难懂，在税收、费用、关税、额外费、定额、执照（许可证）检查证书等方面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官僚主义严重，所有这一切给外国的进口商和出口带来了无穷的烦恼。^①

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景如何呢？这自然要取决于国内、国外两个因素。

由于中国在改革前 30 多年的时间里对西方抱有敌意，并同它们隔绝开来，有些观察家得出结论说，这种政策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中，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费正清也曾指出，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是他们有时候太以自己为中心，以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他们的传统和习惯是看不起外族。当然，所有伟大的国家都会看不起其他国家，可是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观点很可能会带来灾难。他们没有像日本人那样能对西方作出反应。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太满足于自己是中国人。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是了解、学习外国。但是在理解外国时，总是把这些国家看得很危险，认为基本上都是不好的，这种态度很不实际。但费正清并未像许多观察那样，把排外看成是中国对外关系文化中唯一的一部分。他以及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如保罗·科恩、约瑟夫·利文森、马克·曼考尔等，总是强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兴起、并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排外主义与世界主义传统是极不和谐地共存在一起的。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沿海与内地传统：前者是外向的、贸易导向的，后者是封闭的、官僚主义的。19 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在两

哈特兰—桑伯格：《中国的十年经济改革》第四章 德恩伯格：《中国的发展战略 投资的需求与来源》载《中国共产主义的变化与延续》第 80—104 页。

个传统的继承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因此，中国未来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一种倾向占上风。

现实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状况。如果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就会增强，中西方的合作关系也会进一步改善，并使台湾、香港问题更容易解决。相反，如果中国退回到行政管理经济和对政治更严厉的控制，将压制中国与国外经济的相互关系，使香港和台湾的统一更为复杂，此外，如果退却到同武断的或者排外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则肯定会破坏中国与亚太邻国的关系。^②

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因素，如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而且资源丰富，和美国一样，它在传统上和需求上并不是一个贸易国，国外市场和进口原材料永远是经济发展的第二资源，外向型发展的倾向远不及日本及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强烈。同时，由于中国比其他国家或地区过早地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实行了社会福利制度，影响了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外部因素中，世界市场对中国发展的承受力是中国面临的潜在威胁之一。未来的世界贸易市场可能不会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增长迅速，也不会保持原有的开放程度。实际上，过去世界市场在吸收日本产品时已经感到很吃力了，如果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再挤进来，它会更加吃不消。更不用说，未来世界市场不会保持以往的发展速度和原有的开放程度，世界最大、最开放的美国市场已经今不如昔了，美国已经没有以往的强大和自信了。当美国要平衡它的财政和贸易时，它就不能像以往市场开放和消费者购买迅

《费正清谈中国》载《美国人看中国》哈罗德·雅各布森、奥克森伯格：《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 迈向全球经济秩序》第 10-13 页。

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 248-254 页。

速增长时那样吸收进口商品了。^①

另一个因素是，目前，美国的一些人还在政治上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尤其反映在美国国会大多数议员中，并集中体现在有关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辩论上。新上任的克林顿政府不可避免地将面临政治和贸易政策的困境，即，是屈服于国会的压力而给中国最惠国地位附加条件，还是像布什那样维持同中国的积极外交关系，并通过互相开放市场来促使中国的政治自由化。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失去最惠国待遇，它也将面临政策危机，现在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尽快进入“关贸总协定”以避免美国通过有关最惠国待遇的立法，因为入关后，中美间的贸易不再是由双边协定来规范，而是由“关贸总协定”规则来调整。

中国吸引外资也面临着别国强大的竞争，因为像前苏联、东欧、南美等国都在推行市场经济，积极谋求海外投资。此外，国际资本流通主要也由经济发达的七国集团所控制，1992年除了日本，其他六国都出现流动资金亏空，而且美国和德国还从国际市场巨额借债以偿还国内公债，这样，中国必须重新调整建设项目，增强在国际市场上引进外资的竞争力，尤其是提高国营企业的效率，增加对交通、运输、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然而，最近，中国的另外一个潜力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目，即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例如，香港投资者已经将大量的资金投向中国。即便是它的政治对手台湾也无法抵制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根据保守的估计，台湾在中国的投资约为40亿美元，实际数量可能要高得多。两个对手之间每年的贸易约为100亿美元，台湾掌握的硬通货达800多亿美元，而且有便利的投资机会。5000万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人是一支强大的商业和金融力量。在

珀金斯：《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沃格尔：《中国与东亚的现代化模式》载《中国的经济政策》。

世界范围内 海外华人掌握的流动资产 不包括证券 约为 1.5 万亿到 20 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日本 1990 年的银行储蓄总额总计为 3 万亿美元。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肯定会为利用这些财产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

但是，多数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认为，要想得出悲观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外部经济环境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 80 年代初，中国的出口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1%。即使中国的贸易发展迅速，它的影响也不会像一些人所推测的那么剧烈。到 1986 年，它的出口额也仅占世界贸易额的 1.8%。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也没有对国际资本的流动造成大的影响。例如，世界银行在 1981—1986 年间贷给中国的 42 亿美元仅占其同期贷款总额的 4.8%，1985 年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也仅占全球外国投资总量的 4.0%。从全球水平上看，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并未提出不可克服的挑战。无论是其出口的增长还是其对外资的吸收，都没有对日益发展的世界经济增加太大的负担，而中国对国外商品的巨大欲望——主要受外汇短缺的制约——将会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一些刺激。中国还没有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模式方面产生一个基本的影响。

世界银行和美国一家独立的专门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机构洛克科里克 (Rock Creek Research) 研究公司曾推测，如果中国继续改革 如果改革促进了经济效率 到 2000 年 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有可能达到 2000—2500 亿美元；如果改革受到挫折，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中国的贸易可能仅达到 1400—2000 亿美元。但即使是乐观的推测，90 年代中国的贸易的增长率还是慢于改革初期的增长。如果中国的双边贸易在 2000 年达到 2250 亿美元 则意味着 1985 年到 2000 年的年平均贸易增长率为 8.1%

远远低于 1978—1985 年的 19.7%。按照最悲观的估计则仅达 6.1%。因此，从 8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贸易占国民总产值的比率可能下降从 1985 年的 26% 下降到 2000 年的 20%。

· 从 8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国际经济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容纳程度将取决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增长。假设中国的贸易增长了三倍（从 1985 年的 700 亿美元增长到 2000 年的 2100 亿美元）如果同期世界贸易以年平均 5.0% 的速度增长，届时中国的贸易额将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2.5%。如果世界贸易的增长率为 3.5%，中国贸易额的比率将达 3.0% 如果世界贸易增长率下降，仅达到 2.0% 那么中国贸易额的比例将达 3.8%。即使是 3.8% 的最乐观的估计，到本世纪末，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也低于 1983 年苏联的水平，仅比意大利略高一点。出口还将受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出口需求以及中国工业体制低效与不合理现象的制约，进口也将受到出口增长的限制和中国在国际借贷的谨慎战略所制约。对中国的资本需求推测也表明，中国的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需求是相当一般和可接受的。在基本的意义上讲，世界经济已经容纳了中国的参与。

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对外信贷需求也有一个粗略的估计，认为，如果改革继续进行，中国出口工业的效率提高，中国的出口就会比较迅速地增长，贸易赤字就有所降低。相反，如果改革受挫，中国的出口潜力就比较低，贸易赤字就会迅速增加。世界银行推测，在 2000 年中国的债务将达 1280 亿到 1580 亿现值美元。洛克科里克研究所也做了类似的推测。关于外资来源，由于中央政府对外债与出口外汇的比率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估计到 2000 年外资在中国总投资额中的比例将限制在 10% 以内。换句话说，中国利用的外资贷款肯定会远远低于可得到的数量。

中国对外开放会对某些国家或地区，如对主要贸易伙伴香港、美国和日本等以及国际市场上的某些贸易项目如钢铁、化纤、机

械、纺织品、服装等，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将取决于中国的贸易结构，这种贸易结构有三种可能的趋势：制造业产品取代初级产品的速度；中国工业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步伐；中国进口机器设备和进口粮食、工业原料的比率。这也将取决于改革，如果坚持改革，中国的工业就会有更大的能力吸收国外技术、增加国内粮食和原料的产量、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同时，中国在发展的同时必须照顾好它与贸易伙伴的关系，否则，中国就会陷入争吵甚至会闹翻。因此，吸收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能力将主要取决于关心全球经济趋势的中国及其贸易伙伴的理解与期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行为的结果。

总而言之 在中国被视为“第二个日本”之前 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同时，政治和战略因素给了中国很大讨价还价能力。

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 248—254 页 珀金斯：《中国 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龙？》，哈罗德·雅各布森、奥克森伯格：《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 迈向全球经济秩序》第 10—13 页。